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十五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 · · · ·

第十五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十五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850x1168 1/32 印张11.375 插页8 字数 253,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平) 35,000

统一书号: 11094·118 定价: (平)1.60元

 网站编辑
www.mzdbl.cn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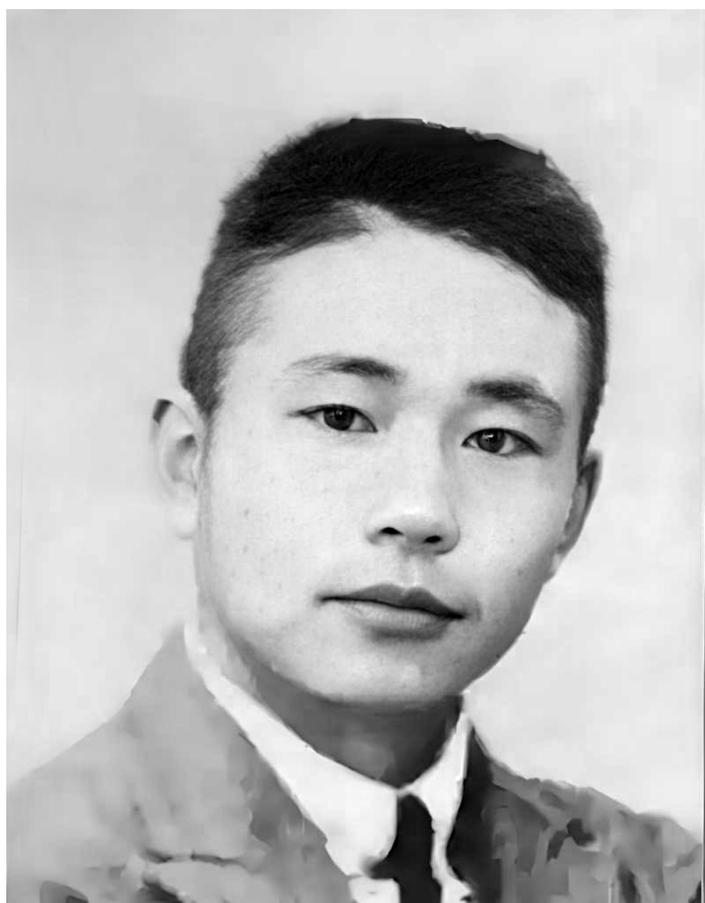
宣侠父·····	金 戈 鲍小牛 刘彤璧 奥存才	(1)
朱 瑞·····	郑建英	(58)
李慰农·····	青島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李慰农》编 写 组	(120)
周文雍·····	甄硕钦 温佩兰 夏琢琼	(148)
陈铁军·····	温佩兰	(170)
唐 澍·····	董建中 张守宪 王少民	(195)
谭寿林·····	李业安	(216)
郭滴人·····	郑学秋 陈仙海 张兆声 郭 翔	(236)
王根英·····	穆 欣	(256)
赵 罇·····	陈华鲁	(296)
王国兴·····	中元秀	(322)
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十五卷编后记·····	胡 华	(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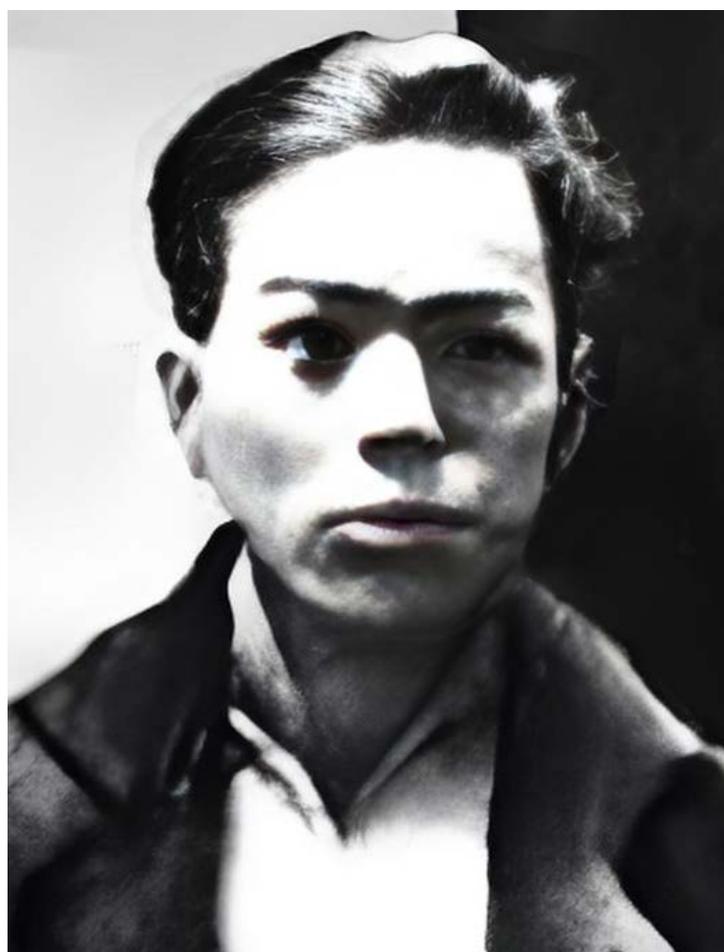
宣 侠 父



朱 瑞



李慰农



周文雍



陈 铁 军



唐 澍



覃 寿 林



郭 滴 人



王 根 英



赵 铸



王 国 兴

宣 侠 父

本页缺失

可屈。”蒋介石恼羞成怒，遂撤销了宣侠父的党小组长职务，并再次限期写悔过书，否则开除。宣侠父抱定了“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的态度，三日后便愤然离开了军校。回到杭州后，他对朋友说：“我和蒋介石闹翻了，我已脱离军校。”从此，侠父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三)

一九二四年九月，原属直系的冯玉祥部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政权。皖系段祺瑞在北京成立了临时执政府。冯玉祥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徐谦、顾孟余等人影响下，将部队改称国民军，逐步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图大业。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也派干部帮助冯玉祥，进一步对军队进行改造。

一九二五年春，宣侠父等九人，受在上海的党中央派遣，来到北京，经李大钊、徐谦等向冯玉祥推荐，以左派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到国民军中工作。当时住在张家口的冯玉祥，急切需要左派国民党人到部队宣传三民主义。宣侠父一到张家口，就被冯委派为宣传员，住进新邨五号平房。他学习苏联红军政治宣传工作的经验，在军队中成立了俱乐部，作为政治工作的阵地，并将随身带去的二百本《三民主义》和其他革命书籍，放入俱乐部的图书馆内。这些书籍很快被青年军官们借阅一空。他还不断从北京运来进步书刊和采购文娱、体育用品，以丰富俱乐部活动内容。

为了与军队内的传教牧师争夺思想阵地，宣侠父将新邰内的礼拜堂改为讲堂，用孙中山和冯玉祥的画像代替了耶稣像，给官佐们讲授政治课，进行启蒙教育。他利用在黄埔军校学到的革命理论，认真编写讲义，深入浅出地讲授《三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华史》。宣侠父多才多艺，又平易近人，经常帮助那些行伍出身的军官识文认字，还教他们打篮球、下象棋和围棋。他善于作古诗，书法又好，有时军官们登门请他写条幅，他总是有求必应，热情接待。青年军官梁冠英、吉鸿昌等，常找宣侠父讨论天下大事，宣侠父趁此机会，耐心向他们宣传民主革命的道理。这位年仅二十六岁的年轻宣传员的才华和品德，很快赢得了官佐们的信赖和爱戴，也受到了冯玉祥的器重。

一九二五年十月，国民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被冯玉祥任命为甘肃代督办。宣侠父奉冯命，随二师西征，从包头经宁夏到达兰州。他们沿途向军民宣传三民主义，宣传打倒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等主张，受到军民欢迎。宣侠父还和钱清泉一起，在二师内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兵运工作。兰州督署内的大讲堂，成为他们给二师少尉以上官佐和督署录事以上官佐讲授《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华史》、《国民革命史》等课程，宣传革命真理的课堂。他们还经常到梁冠英部和驻扎在东校场的吉鸿昌部，对梁、吉及其部下进行革命教育，启发他们投入国民革命的洪流中去。

(四)

宣侠父在甘肃期间，不但在军队内部作了大量工作，而且

还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到社会各方面的群众之中，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及各种群众团体、开展革命斗争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宣侠父和钱清泉初到兰州时，甘肃榆中人、共产党员张一吾（张谷）也被派回兰州。他们三人根据北方局关于建党工作的指示，于一九二五年冬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张一吾担任特支书记，宣、钱二人任特支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甘肃建立的最早组织。

特支成立以后，工作开展得特别活跃，很富成效。当时的兰州没有什么工业，只有一批挑水工人（因居民食用黄河水）和剃头工人。宣侠父等深入到这些工人群众中做发动工作，成立了挑水工人工会和剃头工人工会；还帮助郊区的贫苦农民建立了农会，与土豪劣绅展开斗争；在兰州一中和女子师范等校建立了学生会；天足会、少年同志会等群众组织也先后成立起来了。特支还出版《革命青年》和《妇女之声》等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

宣侠父和钱清泉的住地是督署后花园的塔影榭，军队内部的青年军官和兰州的青年学生，经常到这里来聚首谈心。宣侠父和钱清泉热情接待来访者，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并把《向导》、《新青年》、《独秀文丛》、《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进化简史》、《唯物史观浅说》等书刊推荐给他们看。宣侠父还经常深入到兰州一中、女子师范、皖江会馆、浙江会馆，以及地处道升巷口的中外大药房、玉泉山下的王家花园、国民党省党部所在地中街子十七号等地方开展活动，通过教育培养，在这些地方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如兰州一中教员王珣、丘纪明，学生阎可选、王文骅、王文昭；女师教员韩玉

珍、王静婉、谈中瑜；以及出身贫苦的中外大药房女老板秦仪贞、藏族同胞罗占彪（桑姆丹）等，就是这个时候发展入党的。

甘肃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民族团结工作极为重要。宣侠父认真执行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关于民族工作的政策和策略，平等对待回、藏等少数民族，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向他们宣传反帝爱国、自强团结、民族平等的思想。他是我党最早深入甘南藏民聚居地区传播革命火种的优秀干部。

在这之前，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回族），派兵进犯甘南藏民聚居地拉卜楞地区，征粮派款、抢夺牛羊，焚烧寺院，无恶不作，藏民恨之入骨。国民军到兰州之后，拉卜楞寺活佛嘉木样的哥哥黄正清，率领了一个十二人代表团，向甘肃代督办、国民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告状，求他主持正义，保护藏民的安定生活。但刘郁芬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不敢得罪拥有武装力量的马家势力，把此事长期搁置。宣侠父十分同情藏民的苦难，重视黄正清的请求。他一方面做刘郁芬的工作，劝其切实实行三民主义，扶助藏民，赶走马麒；另一方面将工作重点放在启发藏民的觉悟上。他首先帮助黄正清在兰州建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并亲手为该会起草了成立宣言。他告诉黄正清：文化促进会是一种组织形式，有了组织就可以和兰州其他群众组织来往，就可以参加各界社会活动，扩大政治影响。他还经常对藏民代表团讲：要创造条件学文化、学政治、学军事，提高觉悟。一个民族只有自强不息，内部团结，才能推翻邪恶势力的压迫，实现自由、平等。宣侠父每周给他们讲两次政治课，还教他们学习汉语、汉文，教唱《打倒列强》等歌曲；同时，也向他们学习藏话，彼此建立了亲密的友谊。黄正清很感激宣

侠父的帮助，给他取了个藏族名字，叫札喜才仁，意思是吉祥长寿。

一九二六年夏，宣侠父作为甘肃督办的代表，在桑姆丹（罗占彪）陪同下，骑马来到甘南欧拉部落（今甘肃省玛曲县），首先会见了嘉木样活佛之父——拉卜楞各部落总办黄位中，反复向他讲述了民族自强的道理，建议他首先团结附近各部落藏民，建立组织，提高文化，充实武装。接着，宣侠父又会见了十三岁的嘉木样活佛，还访问了附近部落的藏胞。

黄位中接受宣侠父的建议，决定成立甘青藏民大同盟，并派人分头去召集方圆四百里以内的部落酋长。七、八天后，酋长们纷纷应召而来，共有二百三十余人。宣侠父代他们起草了《甘青藏民大同盟成立宣言》。在一个半阴半晴的日子里，酋长们身穿皮鞞，围坐于鲜花盛开的绿草地上，召开会盟大会。黄位中宣布大会开始后，就请宣侠父讲话。

“我叫宣侠父，藏族名字叫札喜才仁。”会场上立即响起欢呼声。宣侠父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酋长们讲述了“团结起来，自求生存”的道理。他弯腰从草地上拔起一把青草，拧成草绳，一边用双手拉拽，一边说道：“将草拧成紧紧的绳子，无论如何用力，也难以拽断。但是，将绳草解散，成为一根根草，一拽就断了……。”他接着说：“我们藏族同胞要团结，各个部落要联合，拧成一股绳，就力大无穷，纵有十个马骊，也不敢再欺侮你们了。今天请各位酋长来，就是要建立一个同盟，团结起来，自求生存。”侠父诚恳的话语，打动了酋长们的心，酋长们争先恐后站起来讲话，表示要团结起来，赶走马骊。最后，盟主黄位中宣读誓词，并约定于十月在西昌庄正式结盟。

会后，宣侠父准备回兰州，答应下月再来。临行时，各酋长送给宣侠父许多珍贵皮毛和银两、马匹。宣侠父再三婉辞不受，而酋长们坚持本民族习俗，不肯收回礼物；直到宣侠父宣布将这些东西带回去转赠给兰州少年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周刊做经费时，酋长们才欢欣而散。

宣侠父回到兰州后，继续支持藏民的斗争。冯玉祥五原誓师后，督署和二师要在东校场召开换旗大会，誓师参加国民革命。宣侠父找黄正清商量，要他利用这个机会，将藏民的苦难情况传播出去，取得全国各地的同情和支持，也可对态度暧昧的刘郁芬施加压力，促使其下决心解决甘南问题。换旗会前，宣侠父就知道国民党省党部要印发宣言，并邮寄全国。他便代藏民起草了一份《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历数马骥的种种罪行。《泣诉国人书》印好后，同省党部的宣言一起邮往各地，并在大街小巷张贴。开会那天，主席台上坐着省级党政要员，还有马骥驻兰州一个旅的代表。宣传员将省党部的宣言和《泣诉国人书》一起散发，并给主席台上的官员们人手一份。马骥的代表看后面如土色，以为省党部是藏民的后台，便心虚起来，不敢作声。而刘郁芬却唯恐惹恼马骥，会后对宣侠父进行斥责。宣侠父据理争辩，为藏胞伸张正义。后来，宣侠父随国民军联军援陕到达西安时，还为此事去见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请他督促马骥撤军。黄正清等也继续在钱清泉领导下进行斗争。在上下夹攻下，马骥被迫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下令将军队撤出甘南。接着，甘南便成立了拉卜楞设置局；六月，嘉木样活佛回归拉卜楞寺。黄正清将藏民文化促进会也迁回甘南，还设立了三所学校，进行文化教育，培养人才。解放后甘南的许多藏族干部，都是从这三所学校培养出来的。甘南人民始终没有

忘记自己敬佩的朋友札喜才仁——宣侠父的革命功绩，他的照片和手迹一直被黄正清秘密保存到全国解放。

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间，宣侠父被任命为三路军（孙良诚部）总部政治处长。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将西北国民军改称国民军联军，把五色旗换为青天白日旗，冯玉祥任总司令，共产党员刘伯坚任总政治部副部长。紧接着甘肃督署和国民军二师也在兰州东校场召开换旗大会，誓师参加国民革命，宣侠父参加了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

五原誓师后，冯部重整旗鼓，转战宁夏、甘肃平凉等地，后挥师东南，援救被北洋军阀刘镇华部围困于西安达八个月之久的国民军联军第二军。在此期间，宣侠父日以继夜的工作。为了集中精力把军队改造成真正的革命军队，他辞谢了一般人求之不得的潼关县县长一职，经常往来于西安、华阴、潼关一线，指导政治工作，检查军队纪律，并果断地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

为了解决政治工作人员的严重不足，宣侠父从西安、华县、潼关等地，选拔了一批思想进步的中学生，举办政治训练班，并亲自给学员讲课。被他的学生珍藏至今的小册子《国民军史概论》，就是他当年编写的讲稿。在这本讲稿中，宣侠父科学地总结了国民军的成败和经验教训，指出：“一切军事行动只是政治的手段。国民军正是因为没有一种政治上明确的主张，对于各项政治问题都存徘徊观望的态度，遂至引起军事上的失利。”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生长在尚未脱半封建制度社会中，传统的复古和守旧的思想遂也变成国民军的思想。”在结论部分，宣侠父指出：“革命军将士必须明了革命是时代的使命，而不是领袖的命令。目前的任务，是要如何去明了世界

的潮流，如何去明了中国的现状，如何去明白三民主义的真谛。……在这里我们可以预料，历史一定要记载着：‘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国民军已由国民革命努力到世界革命’。”这本讲稿对于启发学员的政治觉悟，明确政治工作的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宣侠父根据国民军联军内部右派欲夺取党权军权的动向，既注意搞好上层统战工作，更重视我党的组织建设。他积极在部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令其隐蔽活动。后来冯玉祥与蒋介石、汪精卫妥协，驱逐了公开的共产党员后，这支军队中仍然保存了我党的一部分力量。据方仲如回忆，一九二八年他同刘伯坚回顾这段党的工作时，刘很坦率地说：“那时过分相信这支军队中的领袖人物，这是右倾观点，应该象侠父那样，尽力发展我们党的组织。”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刘伯坚代表我党提出“出兵潼关，会师中原”的战略方针，冯玉祥准备采纳之际，传来“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叛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众的消息，冯又犹豫不决。四月十六日，在我党发动之下，西安各界六万民众召开“拥护革命军肃清后方，会师中原”的大会。会后，游行队伍向国民军联军总部请愿，刘伯坚代表总部接见各界代表，接受和支持民众的愿望。在这种形势下，冯玉祥方下决心，于五月初决定将国民军联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并在西安召开东征誓师大会，率师出征。此时，宣侠父被任命为第二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领中将衔。在行军作战途中，他带领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基层，亲赴前沿阵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在澠池，他及时制止了一支骑兵部队向商会摊派公款的行为，并处决了民愤极大的县兵差局长和大土豪王

均。此一举动，深得民众拥护。

五月底部队到郑州，与武汉出发的北伐军会师。六月上旬，汪精卫来郑州时，宣侠父曾请汪精卫向将士们讲演党权问题。汪答应讲演，但对党权问题却避而不谈。宣侠父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所谓革命领袖在向右转了。为此，他悲愤地写下这样的诗篇：

右派诸人亦可怜，
反俄反共自嚣然，
如斯也作胜利想，
历史倒翻一万年。

这时，一场叛卖交易正在暗中进行。冯玉祥于六月十日与汪精卫举行郑州会议，又于六月十九日与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被蒋介石拉了过去，把在大革命中经过浴血奋战，立下功劳的西北军引入了歧途。接着便在军队中开始“清党”。但由于我党对冯的影响较深，冯对于他周围的共产党人素怀敬慕之情，因此没有采取同蒋介石相同的屠杀方式，而是采用“礼送”和驱逐出境的方式。他把一百多名军以上政工干部集中在开封一所学校中进行“审查”。宣侠父立即把已被集中的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党的支部。他被选为支部书记，在党员中做了许多思想工作，组织大家学习马列主义，准备迎接更艰苦的斗争。

七月十四日深夜，宣侠父、蒋庭松、刘志丹、王汝楫、方仲如、孔广耀、曾晓渊、刘贯一等几十名共产党员，被一排士兵押上了两节闷罐子车拉往郑州，又被挂在平汉路列车上。至

驻马店，大家才看到武汉分共的消息报道，有的人大骂，有的人沉默，闷罐车里更气闷了。见此情景，宣侠父便带领大家唱起了《少年先锋队之歌》和《国际歌》，使大家振奋了精神。车到武胜关，押车排长拉开车门，大声宣布了冯玉祥的驱逐令。……车厢被搁置在铁轨上，无人问津了。经宣侠父和几个同志向车站方面交涉，两节车厢又被挂上了南去的列车，在暮色苍茫中，驶向党中央的所在地武昌。

（五）

宣侠父等到武汉后，立即去找党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组织部决定，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去参加南昌起义，一部分赴苏联学习，宣侠父和几个有条件回家乡开展工作的，被派回原籍，发动农民运动。行前，组织部长李维汉给他们开了组织介绍信。

一九二七年八月，宣侠父带了一箱书和一包简单的行李，回到诸暨家乡。他在长瀾家中住了几天，了解了本县农民生活状况和革命斗争情况，很快便到小西区金村找到党支部书记金树栋（金城），接上组织关系，参加了金村党支部的活动。

侠父少年时与金婉琳（金铃）之兄同学，常到金村来，对金村农民十分熟悉。这次回来，得知村中金树栋、金树望等一批青年人都参加了大革命时的农民运动，组织了农民协会，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在白色恐怖中，这些人还加入了共产党，领导农民坚持斗争，心里十分高兴。当时全国正处于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时期，而诸暨的金村，却被称为“小莫斯科”，是全县有名的红色据点。而诸暨的反动势力也很强大，除了县长、县

党部的官吏直接压制革命力量之外，还有几个反革命巢穴，如被称为“华尔街”的墨成湖，出了许多商人阔老；被称为“下关”的磨石山，出了蒋鼎文等一批国民党要员。宣侠父住在金村，指导全县党的地下工作。金村的年轻人常在夜晚聚集在他的住地，听他讲北伐中的故事，讲形势，讲革命道理。他还为村中的咸德小学写了一首校歌，歌词是：

长山蜿蜒，洩溪清，绿杨荫里，一片书声和歌声。乘少年，学习参加大革命，这中间，翻天覆地自有人。……

根据宣侠父的建议，诸暨党组织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县城南一个叫滴水岩的石洞里，召开了全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的有宣侠父、陈绍龙、郭大善、金树栋、寿松涛、张以明、杨崇尧、汪益增、郭焕青、石康本等三十多人。宣侠父用平静的语调向大家讲述了半年来的形势，指出革命的低潮是暂时的，终要取得胜利，但需要进行艰苦的斗争。当前的工作是要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同反动势力进行长期斗争；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要不失时机地组织群众，展开斗争，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还特别强调了发展壮大党的队伍问题，认为全县只有四五十名党员，数量太少，不能满足斗争需要，而且党员分布不平衡，枫桥和下北两个区力量太弱。因此，迅速扩大党的队伍，是一项基本任务。这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由宣侠父等十一名委员组成的中共诸暨县委员会。在县委会上，大家又推举宣侠父任书记。但他表示他回来时间不长，对全县情况不熟悉，并说他不一定能在诸暨长期活动，建议由其他同志担任。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决

定让他担任县委军事部长。

一九二七年底，县委会议决定开展“二五减租”运动。那时的诸暨农村，正常年景下平原地区每亩稻田也只收三至五石（每石约七十斤）稻谷。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租田耕种，种子和肥料全由己出，收入的稻谷要一半交租。每逢收获季节，地主派“分稻佬”来坐地收租，佃户还得设酒席招待，并赠送“分稻鸡”。交过租，再扣除稻种，便所剩无几了，农民负担极重。县委提出的“二五减租”，就是从原来的百分之五十租额中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将收获量中的大部分留给农民，并取消酒席招待和送“分稻鸡”，还提出要增加雇农的工资。党的主张通过减租会，在各村秘密宣传，深得农民拥护。但这时县委内部在怎样实现“二五减租”上出现了意见分歧。有人认为“二五减租”起先是由国民党提出来的，还应该由国民党来领导实现，如果那里的地主不执行，我们就到县里打官司。宣侠父、金树栋等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主张充分发动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他们认为国民党对“二五减租”从来没有兑现，不能对他们存有幻想。减租是农民的迫切要求，党应该领导农民自己起来加以实现，这样才能获得农民的信任，让农民在斗争中认识团结起来的力量。争论结果，宣侠父等人的意见获得了多数人的拥护，遂形成决议：坚决执行“二五减租”，主要斗争对象是住在城里的大地主孙采臣等；由减租会带领农民向县政府请愿示威，提出减租要求；成立以党、团员为骨干的检查组，深入分稻现场进行监督，以保证减租决议彻底实现。

一九二八年庄稼长势良好。随着收获季节的到来，减租斗争也尖锐起来。地主们纷纷到县政府告状，要求派军警镇压减

租运动。有的农民害怕地主势力，开始犹豫起来。县委立即召开减租会紧急会议，做出两项决定：（一）地主如果不按农民所提条件来收租，减租会就代替地主收租，做为减租会活动经费；（二）组织农民向县政府请愿示威。从此，减租会组织也公开了，农民的情绪又高涨起来。特别是陶朱乡的金村、木桥头、聚仙房，上下桑园、毛家、山下赵、团聚等村的几千农民，整队向县城出发。县长下令关闭城门，农民将县城包围。减租会代表将请愿条件写在祭鬼用的黄纸上，送到县政府。县长看了，知道是农民的诅咒和警告，非常害怕，就派警察局长游骞出面，拒绝农民要求，并在四面城墙上架起机枪威胁。减租会声言“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将县城包围了三天三夜。这时，各村已开始割稻，地主们怕减租会进行代收，自己得不到租子，便慌了手脚，赶忙派“分稻佬”按照减租会的规定去收租子。陶朱乡“二五减租”运动的胜利，带动了全县。诸暨县又带动了肖山、浦江、嵊县等附近六县，声势十分浩大。党领导的“二五减租”运动终于以农民的胜利而告终，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

减租斗争胜利后，敌人开始有计划地搜捕共产党人。宣侠父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离开金村，回到了长澜。

宣侠父在家乡艰苦的环境里，结识了金村少女金婉琳。两人在共同斗争中，建立了革命友谊。一九二八年底，宣侠父与金婉琳结婚。新婚第二天，就有人向姚公埠派出所告密，幸得农民石永莲及时通知，宣侠父才连夜翻越坑坞山逃走。党组织考虑到他在家乡目标太大，不宜久留，便决定他到外地开辟工作。

一九二九年春节将临的一天，宣侠父告别了新婚的妻子和

父老乡亲，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六)

为了争取大革命时期曾经与我党有过合作关系的前国民军旧部，一九二九年春节后，宣侠父来到山东济宁国民党军孙良诚部所属的梁冠英部。梁冠英在张家口新邨驻团营干部训练班和国民军联军援陕、东征期间，同宣侠父曾经有过多接触。他出身贫寒，受宣侠父的教育和影响较深，和宣侠父情谊甚笃。这次他热情欢迎宣侠父的到来，将宣侠父待为上宾。宣侠父很快和留在该部的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他们创办了一个名为《混战》的刊物，报道红军战斗和工人罢工的消息，揭露蒋介石新军阀的反共反革命的罪行。《混战》上有三篇文章公开署名“侠父”，其中《狗咬狗，丢尽丑》和《吴精虫救主献策》两篇杂文，是专门揭露和讽刺蒋介石等反动军阀的；另一篇是短论，题目是《怎样纪念五一》，号召工人们开展斗争，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还提出团结起来，“用工人阶级斗争的力量，消灭军阀战争。”

宣侠父的革命活动被冯玉祥知道了。两个月后，冯玉祥便电令梁冠英将宣侠父押至开封，关押在总部军法处，后又转押于潼关监狱。在狱中，宣侠父仍不忘读书，不忘向难友，特别是向青年难友进行思想工作，还同大家一起锻炼身体，每天在室内练“八段锦”。

过了一段时间，冯玉祥为了与蒋介石打仗，将孙良诚部从山东调到河南灵宝。宣侠父被冯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分派到孙良诚部。孙又将他派往一支杂牌军队里去当代表。宣侠父明白，

冯、孙之意在“送客”。因此，临行之际，他告诉朋友说：我这次去当代表，不会再回来了。

一九二九年秋，宣侠父到达武汉，住在弟弟家中。因闻老父在他坐牢期间病故，便将妻子接来同住。后来，他又转到江苏镇江的三江营，住在妹夫家中。

一九三〇年下半年，在蒋冯阎军阀混战中，梁冠英率部三万余众脱离冯玉祥，投靠蒋介石。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为二十五路军，梁冠英任总指挥，驻军淮阴青江浦。一九三一年初，梁冠英得知宣侠父在镇江，便派人邀至军中，并任宣侠父为二十五路军总参议。宣侠父得以再次在梁部开展地下工作。

梁冠英虽投身于蒋，但对蒋仍时有提防。他一边暗中派人在津、沪等地与原西北军保持联系；一边又广召原西北军失业军官，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幕僚机构。这些人以梁为生，为梁图谋，梁视这般人为亲信，经常委令他们直接或间接在蒋介石周围活动。宣侠父与这些人大部相识，有的还是黄埔同学，因而倍受大家重视。他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和过去他在这支部队中的影响，很快建立健全了党的秘密组织。他还到上海，与左翼作家联盟建立联系，左联决定由阳翰笙同他联系。有一次，在上海见到阳翰笙，便托阳设法请上级党组织派人到二十五路军中工作。阳与在上海的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朱镜我研究，认为杜国庠当时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目标不大，容易隐蔽，就决定派杜去。以后，上海党组织又陆续派去了二十多位同志。宣侠父在二十五路军中办了俱乐部，下设社会科学等五个分部。社会科学部里有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室，经常组织进步军官学习《社会科学小词典》、《社会科学讲话》等书籍，使许多军官受到革命影响。他还和同志们秘密宣传红军打胜仗的

消息，鼓动官兵抵制“围剿”红军，反对军阀混战，不要为蒋介石卖命。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宣侠父和二十五路军地下党组织向官兵们做了许多有关抗日反蒋的宣传工作。部队群情激愤，要求回北方抗日的呼声甚高。宣侠父因势利导，鼓励官兵向上海的十九路军学习，起来抗击日寇侵略，挽救民族危亡。

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下，一方面派大兵“围剿”我革命根据地；一方面对国民党各杂牌部队加紧分化、瓦解和控制。为此，他任命宣侠父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议。这是一个只拿钱而无实权的闲职。

一九三一年底，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加入红军。二十六路军也是前西北军的旧部，许多军官都与宣侠父有过交往。因此，消息传来，宣侠父非常兴奋。正当他进一步加紧在二十五路军工作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那是一九三二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吕丹等几个秘密党员骨干正在开会，被梁冠英的军法处长发现，当即全部被捕关押。宣侠父得知，十分着急。他四处奔走，了解情况，终于探听到吕丹等被捕后表现很好，没有暴露党员身份，也没有泄露党的秘密。于是他便设法同他们取得了联系，鼓励他们一定要坚持斗争；并直接出面向梁冠英交涉，责怪梁不该因吕丹等议论抗日，对蒋不满，就加之于罪，要求释放这些爱国军官。由于军法处没有拿到吕丹等人的确实“罪证”，无法给他们判刑，加上宣侠父的周旋，梁冠英只好下令把他们“驱逐出境”。吕丹等经宣侠父的精心安排，虽安全撤离了清江浦，但二十五路军内党的组织却因这次事件而遭到严重破坏。

不久，上海又传来不幸的消息：“左联”根据宣侠父的建议和帮助而举办的湖风书局被英国巡捕房封闭，工作人员被捕；由湖风书局出版的“左联”公开刊物《北斗》亦被迫停刊。他意识到清江浦和上海发生的两件事情有着内在联系。但他没有因挫折而气馁，并写下“勿忘历史使命”六个大字，贴在书桌前的墙壁上，用以自勉。

一九三二年初夏，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二十五路军也接到了蒋介石下达的向鄂豫皖苏区进攻的命令。梁冠英在亲蒋分子郑运祜、王修身等鼓动下，暗中准备开拔。宣侠父发现后，立即找梁劝阻，希望他不要陷入反共泥坑。王修身等深恐梁冠英被宣侠父说服，遂对梁加紧威胁利诱，并造谣说：“你梁指挥再不迅速开拔，有一旅人马就要被宣侠父拉去当共军了。”加上二十五路军总部内上中层军官中进步分子占少数，多数人主张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于是梁冠英不顾与宣侠父多年友情，未听劝阻，率部开往霍山“剿共”。宣侠父遂愤然离开了二十五路军。

（七）

宣侠父是一位“文武全才”的优秀干部。他既能从事兵运工作和统战工作，又具有从事文艺工作的才华，为左翼文艺运动作出了贡献。

宣侠父爱好书法，练就一手王羲之的兰亭体，隽秀飘逸，刚柔相济。

宣侠父的旧体诗词也写得很好，擅长七律、七绝。无论他到哪里工作，凡朋友和青年们请他题词写字，他总是有求必

应，提起笔来略加思索，便可一挥而就，其内容都是即兴新作。可惜在战乱年代，这些诗作大都散失，保存下来的只有几十首。他在黄埔以前的诗，多为感叹个人身世之作，抒发愤世疾俗之情，为自己空有抱负、未得施展而长嗟，藐视和嘲弄权贵的昏愤无能，充分表现了他出污泥而不染、峻洁而孤傲的性格特征。下面这两首赠友人的诗，就是他早期的作品：

小住尘间能几春，
荣枯得失漫劳神。
云来云去原无定，
花落花开两不真。
鸡犬上天偏笑我，
骷髅得气也骄人。
相期第一关心事，
留取清清白白身。

傲骨嶙嶙枉自夸，
频年飘泊似无家。
鸟能管得云双塔，
萍尚占来水一涯。
觉我浮生真草草，
凭他世界自花花。
几番欲向湖头醉，
偏是酒楼酒不赊。

进入黄埔军校，特别是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以后，宣侠

父写的诗词的内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越出了孤芳自赏、愤世不平的境界，充满了革命的豪情壮志，唱出了时代的壮歌。诗词，成为他联络友人、鼓舞群众斗志的一种武器。

宣侠父还以“今秋”、“石雁”的笔名写过两本书，一本是自传体的《西北远征记》，另一本是长篇小说《入伍前后》。

《西北远征记》初名《灰梦》，是宣侠父一九二九年底至一九三〇年初居住汉口时写成的。这本书“一方面忠厚记录了作者本人和一批优秀青年，从一九二五年春初到一九二七年夏，在西北军这个复杂的环境中，参加那次轰轰烈烈革命的战斗历程，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很多有趣的生动场面，也记录了这个庞大的西北军，随着沸腾的全国革命，成为生气勃勃，所向披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到郑州与北伐军会师的胜利情景；又揭露了中国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后，冯玉祥将军到徐州与蒋介石结成联盟，背离了历史前进方向的事实。”它还“描写出作者戎马远征，从塞外重镇张家口，途经五原、宁夏，又跋涉黄河、西北黄土高原、到达兰州，又至大藏民族聚居地区俄拉草地，最后出师潼关重返中原，一幅一幅祖国壮丽河山的图景，充满诗情画意，简洁生动地描写了西北的风土人情，讴歌了西北各族人民群众和西北军一些爱国上层人物的善良正直风格，也辛辣尖刻地勾画了一些追逐官场的文官武将和‘党国要人’的丑恶卑鄙面貌。”^①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宣侠父在写这本书时，不得不把他和他的战友们“在西北地区和西北军中进行的共产党的建设和活动都隐略了”^②，但它仍然是一部“忠实的革命纪实”，“可供历史工作者研究参考”^③。

①②③金城、金树望：《〈西北远征记〉再版序》。

宣侠父写《西北远征记》时，正值“大雪纷飞”的隆冬季节。他扶案“呵冻起草”，由金城“在傍眷写”，“每天总是写到寒鸡高鸣，才搁笔就寝”^①。全书写完后，金城将其携至上海，经时在复旦大学任教的陈望道推荐，上海北新书局于一九三〇年出版，曾“受到人民群众特别是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的喜爱”。一九八二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又将其再版重印，在全国各地发行。

长篇小说《入伍前后》，是宣侠父一九三〇年九月至年底完成的，写的是两湖交界处杨楼泗的一个贫苦青年，先参加军阀部队，后来接受了革命教育，逐渐转变成革命者，团结士兵弟兄杀掉反动连长，发动兵变，带领全连投奔红军的故事。主题鲜明，情节生动，文笔流畅，很有感染力。当金城带上这部书稿又一次到上海联系出版时，国民党已颁布了反动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其中第一条就规定：对宣传鼓动兵变者严加惩处，因而未能及时与读者见面。一九三一年春，宣侠父二次到梁冠英部工作，与“左联”建立联系之时，这部书稿竟成了他向“左联”建议开办书店的一个“引子”。

那是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宣侠父与“左联”领导人之一阳翰笙，在上海的一家旅馆里首次会晤。阳翰笙后来回忆说：宣侠父“气宇轩昂，仪表非凡，说起话来干脆又儒雅，象文化人又有军人风度。”“我们一见如故，谈了很久，从‘左联’工作谈到写作与出版，从他在西北军的经历谈到他的近作。”^②这里说的“近作”，就是指《入伍前后》，宣侠父想请阳翰笙

①宣侠父：《西北远征记·自序》。

②阳翰笙：《宣侠父与左联》，《人物》1982年第3期。

看看，并帮助出版。阳翰笙读过宣侠父的《西北远征记》，认为那是一部“文笔生动、流畅，感染力很强”的好书，因此他很高兴拜读宣侠父的新作。但谈到出版，他为难了。因为“左联”当时的处境十分困难，出版机关创造社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了，太阳社也被封了，有几家同“左联”有些联系、尚未被查封的书店，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也不敢出版具有鲜明革命倾向的书籍，连出一本文学期刊都很费劲。宣侠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当即对阳翰笙说：既然出版这样困难，我们是不是自己办个小书店，我可以想办法搞点钱，交给“左联”来办。当时，缺乏经费是“左联”开展活动的一个大难题，宣侠父这一热情支持，真可谓雪中送炭，使阳翰笙深受感动。他立即将这个问题提到“左联”党团会议上讨论，参加会议的冯雪峰、夏衍、阿英、田汉等，都同意宣侠父的倡议。

宣侠父回到清江浦，便对梁冠英说：“我在上海有些朋友，他们都是文化人，写写小说、诗歌，但是没有钱，出书相当困难。我们是否筹资开办一家书店，帮助他们出书，对我们也有好处，这也是一桩利国利民之举。”梁冠英那时把宣侠父待如上宾，听完宣侠父的话，立即表示同意，下令由部队拨给三万元钱，委托宣侠父全权负责办理。宣侠父将老同学周濂卿和内侄金树望介绍给“左联”，负责具体筹建。经过半年奔走，书店终于在七浦路开张，定名湖风书局，周濂卿任经理，金树望和另一同乡马彦宁当店员，负责卖书、运书、校对等工作。这样，“左联”又有了自己的出版机关。

在白色恐怖的严重时刻，湖风书局的开办为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和冯雪峰、楼适夷主编的文化总同盟党团机关刊物《文学导报》（先

为《前哨》)等报刊,都相继得以创办和刊行,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湖风书局还为“左联”作家出版了不少著作和译作,如鲁迅的《小约翰》,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丁玲的《水》,华汉的《大学生日记》、《地泉》,以及阿英、夏衍、穆木天等人的译作等。高尔基著作《夜店》和《母亲》的中译本也由湖风书局出版,因此反动派把它叫作“高尔基书店”,对它极端恐惧和仇视。

宣侠父按照阳翰笙的意见,将他的小说《入伍前后》,自费在湖风书局印了二百本,赠送给“左联”成员和一些革命同志。阳翰笙仔细读了《入伍前后》,认为“是一本好书”,“具有炽热的革命内容、强烈的革命精神,文笔很好,鼓动性很强,这在当时的革命文学中也是少见的”,曾“赢得了同志们的普遍赞扬”。他说:“后来我一直想再版重印,以为纪念,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找到这本书。”^①

七浦路上的湖风书局,还是“左联”和文化总同盟的一个活动据点。左翼作家和革命同志,常在这里接头会晤,转递信件。据金树望回忆,宋庆龄、鲁迅、茅盾和史沫特莱,就曾在湖风书局的二楼上,作过会晤交谈。

宣侠父非常想和“左联”作家们见见面,并渴望加入“左联”。他曾对阳翰笙说:“我很喜欢文学,也写了两本书,还想继续写,从事左翼文学活动,我是不是可以和‘左联’发生个关系?”阳翰笙明白他是要求加入“左联”,就对他说:“你是一个老同志,为‘左联’做了很多工作,你的两本书都写得很好,你的心情我很理解,我们很欢迎你。可是,你现在在那边

^①阳翰笙:《宣侠父与左联》。

军队里工作，我们还要慎重考虑一下，看究竟怎样解决才有利。”后来“左联”党团研究决定，接受宣侠父为“左联”的特别盟员。鉴于当时宣侠父在敌军中做地下工作，需要隐蔽，不公开他的“左联”盟员身份，这件事只有“左联”党团少数几个负责人知道。

几年以后，宣侠父曾自豪地告诉妻子说：“我是带着两部作品加入‘左联’的”；并且津津有味地向亲人讲述自己参加“左联”活动的情景。可见，他是多么珍惜这段光荣历史啊！

(八)

宣侠父离开二十五路军以后，以国民党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的身份，在南京住了几个月。这期间，他同一直与自己保持联系的一些冯玉祥旧部将领接触，秘密进行抗日反蒋活动。

一九三二年秋，宣侠父带两名随员经郑州前往山西晋城孙殿英部。孙殿英亲率官员携五匹马出城五里迎候宣侠父。宣侠父在孙部活动半月，宣传了“九一八”以后形势的变化和我党的主张，劝孙殿英率部走上抗日前线，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战。接着，他又到北平，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商议支持冯玉祥建立同盟军的有关事宜。然后，宣侠父再去张家口，会见冯玉祥。

在此之前，由于我党的帮助，冯玉祥已认识和承认了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的错误，表示愿意再度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并于一九三〇年十月移居张家口，同吉鸿昌、方振武等开始筹建民众抗日同盟军。宣侠父在张家口见到冯玉祥，冯回顾

历史，痛悔不已，再次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团结民众共同抗日。宣侠父在谈话中肯定了冯玉祥思想上的重大进步，鼓励他担负起民族重任，在抗击日寇侵略的战争中争当民族英雄。冯玉祥听了深受教育和感动。他对共产党人不计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宽大胸襟，表示由衷的敬佩，对宣侠父高度的理论修养和精辟透彻的谈吐，也深为叹服。此后，冯玉祥曾对孙殿英等人说：“宣侠父的口才能顶二百门大炮。”他决心重整旗鼓，联络各路抗日队伍，建立抗日同盟军。

一九三三年初，宣侠父回到南京。五月，他受上海“抚慰会”之托，带慰问品北上慰劳宋哲元等抗日将领。他以此为掩护，四处奔走，联络部队，为筹建抗日同盟军而积极工作。其时，孙殿英的四十一军已由晋城移至沙城。宣侠父到沙城后，被孙殿英聘任为该军秘书长。他同孙的顾问李锡九一起，极力劝孙加入同盟军，孙表示赞同。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冯玉祥以总司令名义宣布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宣侠父是抗日同盟军中共前线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吉鸿昌的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兼主力先锋第五师师长。五师是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为骨干组成的，是我党前委掌握领导权的主要军事力量，是一支战斗力强、朝气蓬勃的部队。六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在张家口召开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选出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邓文、孙良诚等三十五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宣侠父还被选为常务委员。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推行比立三“左”倾错误更“左”的错误方针。他们看不到“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看

不到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反而认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这一错误观点也影响到同盟军中的中共前线委员会。前委错误地认为“冯玉祥始终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并把吉鸿昌混同于一般军阀看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同冯玉祥的统一战线关系。宣侠父坚持抵制这种“左”的错误，对冯玉祥、吉鸿昌等真诚团结，努力引导和耐心教育，作了许多工作，赢得了冯和吉的信任。他还站在“抗日反蒋”的立场上，对张慕陶、徐维烈等提出“联日反蒋”的托派口号，进行坚决地斗争。

六月二十一日，以吉鸿昌部为先锋的同盟军主力大举北征。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吉鸿昌身先士卒，勇猛过人。收复察北重镇多伦时，他亲率敢死队，肉袒冲锋，日寇伪军闻风丧胆。宣侠父率领的第五师，紧随吉鸿昌，打了许多胜仗。经过一个多月的血战，同盟军相继收复了康保、宝昌、多伦等重镇和察省全境，歼灭大量日伪军，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以沉重打击。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生怕同盟军的行动破坏了他们消灭共产党，对日屈辱妥协的宗旨，便一面派人频频向冯施加压力；一面调集大军，勾结日寇，企图以武力消灭同盟军，还千方百计瓦解和收买同盟军各部。当时，孙殿英部有五万余众，分布在康保、新保安、沙城等地百余华里的铁路上，阻挡了国民党军队开往张家口的去路。何应钦派人劝孙殿英攻打张家口同盟军，以察省主席和一项巨款为交换条件。孙十分动心，便找李锡九、宣侠父、韩麟符等商议。宣侠父第一个表示坚决反对。他对孙殿英说：“我军打过日本，是抗日军队，怎么能反过脸来打抗日弟兄呢？何况蒋、何之目的是消灭华北地区的杂牌队伍，我们若替蒋打冯，明天说不定又挨蒋打，

千万不要落入蒋的圈套。头脑若不清醒，恐日后要吃大亏”。李锡九也极力劝阻孙殿英勿上蒋、何的当。在这种情况下，孙殿英不得不拒绝了何应钦的要求。

七月二十八日，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向冯玉祥发出最后通牒，逼其放弃抗日，并先后派遣十六个师的兵力入察，在空军配合下，围攻同盟军。与此同时，日军也对同盟军发动猛烈进攻。同盟军腹背受敌，内部发生分裂，几支军阀队伍叛离而去。冯玉祥看实力大大削弱，遂通电下野。

八月二十四日，中共同盟军前线委员会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七人常委会，宣侠父是常委之一。冯下野后同盟军应怎么办？留下的主要将领们讨论时，有人主张服从国民党中央的命令，也有人要拉队伍去热河，莫衷一是。宣侠父说：抗日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半途而废实非全国人民所望，我们爱国军人，决应抗战到底，成败不计。这一席激烈慷慨的言词，把众将领的抗日热情又鼓舞了起来。方振武遂发通电，宣布代理同盟军总司令，继续抗日。

按照前委决定，各部队向西会合于商都。受阻后，前委又决定南下，到河北南部建立根据地。九月上旬，部队到达独石口时，张慕陶散布“联日反蒋”言论，企图影响吉鸿昌等将领。前委决定，宣侠父将五师工作暂交副师长代理，命他集中精力到吉鸿昌处，揭露张慕陶“联日反蒋”口号的汉奸性质。宣侠父派遣吉的秘书谢和赓（中共党员），去监视张的行动。经过一段斗争，前委召开了以师为单位的党员会议，报告了政治形势，并宣布开除张慕陶党籍；决定不取消抗日同盟军旗帜，协同出山，往河北省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与农民革命武装汇合，保持和发展这支经过战火考验的抗日力量。

独石口会议后，吉鸿昌、宣侠父率部与方振武部配合作战，攻克了北平郊外的怀柔、密云两座县城。但是，在攻打昌平时，部队受到严重挫折；最后在小汤山和顺义县牛栏山一带，被国民党十几万部队团团包围。十月中旬，在日寇与国民党夹击下，同盟军终于失败。党组织在小汤山召开党员会议，决定把党员秘密分散到西北和平津等地，进行地下工作。

宣侠父是一个立场坚定、意志顽强的共产党员。在同盟军被强敌包围，临近覆灭的危险关头，他的指挥所曾几次被敌人的炮弹炸毁，但他毫无惧色，继续指挥部队与敌人拼杀。正当他在前线与敌人浴血战斗的时候，他的怀孕七个月的妻子金铃，在北平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宪兵三团抓进了监狱。

同盟军失败后，宣侠父带领十几骑人马冲出重围。他化装成一个败兵，混在人流中，步行三天，粒米未进，加之胃病复发，在路上又染上了伤寒症，终于病倒在庞各庄一位友人家中。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才逐渐康复。后经党组织派人把他接到天津，住在吉鸿昌家中，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这时候，金铃也被党组织保释出狱，生了一个女儿。

(九)

一九三三年底，宣侠父秘密到达天津后，立即开始组织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

一九三四年三月，党指示宣侠父陪同吉鸿昌从天津专程赴上海。吉鸿昌在上海履行了入党手续。他们接受了党交给的新任务，两星期后，就又回到天津，继续进行组织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准备工作。

四月二十日，由中共中央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签名，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号召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在这种形势下，经宣侠父、南汉宸、吉鸿昌的积极筹备，中国反法西斯大同盟正式成立，吉鸿昌担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任，宣侠父、南汉宸和任应岐等当选为委员。宣侠父等还创办了同盟机关刊物《民族战旗》。反法西斯大同盟的任务是，重点进行上层统战工作，联络各地方武装力量，力图组建抗日军队。它成立后，对全国抗日运动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国民党投降派对这个组织又怕又恨，在各种破坏阴谋遭到失败以后，便采取了最无耻的暗杀手段。一九三四年夏，党先后调宣侠父和南汉宸到上海工作，也为吉鸿昌在上海找好了房子，准备调他到上海从事地下斗争。十一月九日，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大批特务，勾结法国帝国主义，在天津法租界逮捕了吉鸿昌和任应岐，并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北平将这两位将军杀害。

噩耗传到上海，宣侠父与南汉宸抱头痛哭。为了痛悼自己的战友，宣侠父写了下面这首诗：

面对敌枪弹，
屹然似泰山。
以死报国家，
名垂宇宙间。

(十)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党的白区工作受到严重破坏。一九三四年夏，在白色恐怖的严重时期，宣侠父被调到上

海中央特科，成为特科的负责人之一，与王世英、王学文等一起开展工作；宣侠父化名杨永清，公开职业是《申报》特派记者。那时，金铃已由王世英介绍入党，与金树望一起，担任特科的交通联络工作。

宣侠父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搜集和撰写军事情报，上报上海临时中央局；二是联系上海实业、金融、文化界上层人士，进行反蒋抗日联络工作。他白天在家分析、研究材料，写文章；夜晚到社会上活动，工作开展得很有成绩。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经常制造谣言，说红军在某省某地已被“消灭”，用以欺骗人民。宣侠父从敌人的报纸和各种情报资料中分析鉴别，写了一份长达二万三万字的关于长征红军英勇北上的报告，受到临时中央局的赞扬。党通过各种渠道将这份报告的内容传播出去，使人民了解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受到很大鼓舞。

宣侠父和上海许多社会名流都有联系，如银行家章乃器，教育家张志让，名律师潘震亚，生活书店主编邹韬奋、总经理毕云程，东北实业家杜重远，文化界名人戈公振、胡愈之等等。宣侠父在与他们交往中，积极宣传抗日反蒋思想，揭露蒋介石卖国投降的言行，对这些人有深刻影响。他们在他们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些人士反映，他们不仅信服中共中央正确的政治主张，表示愿意与中共合作；而且也敬佩侠父个人的真知灼见，一致认为他是一位难得的革命活动家。

一九三四年底到一九三五年春，上海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我地下党员几乎处在特务、密探的包围之中。加之叛徒出卖，党的组织屡遭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逮捕、杀害。敌人非常毒辣，发现一个线索，并不马上下手，而是跟踪盯梢，企图找

到更多线索，一网打尽。在这种情况下，宣侠父和全家人的活动都特别谨慎。有一天，他去约会阳翰笙，结果，盯阳的“尾巴”就盯上了他。他发觉后，到繁华闹市转了几圈，以为把“尾巴”甩掉了，便回了家。谁知“尾巴”并没有甩掉。第二天，发现有特务在住宅周围活动。家里决定由金树望将特务引到闹市区，掩护宣侠父撤离。金树望把特务吸引到闹市区后，又转身逼视特务，来了个反“盯梢”，直到他估计宣侠父已经脱险，才把特务放掉。金铃在家中经过几天观察，发现每天从半夜十二时至早上七时这段时间无人监视，便在一天大清早起来，抱着孩子逃到旅馆里，住了二十多天。之后，他们又搬了几次家，才算安定下来。

还有一天晚上，宣侠父去参加在田汉家举行的会议，因事迟到，打算从田家后门进去。但这时田汉家已被敌人破坏，开会的十几个同志已被敌人抓走。田家保姆远远望见还向这里走来的宣侠父，急忙对他摇手示意。宣侠父会意，便立即离开。当晚，他跑到胡愈之家对胡说：“今天晚上党的会议被破坏了，抓了很多人，恐怕是一次严重破坏。你暂时不要出去活动，千万小心。”

宣侠父被敌人注意，在上海活动更困难了，党决定调他去香港开展工作。

(十一)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宣侠父化名宣古渔，在香港进行半公开革命活动。他根据党的指示，争取原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和十九路军将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

成立民族革命同盟，并通过他们推动两广地方势力抗日反蒋，打开南方抗战局面。

一九三五年五月，日本制造华北事端。七月，“何梅协定”签字，日本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主权，妄图进而把中国由被几个帝国主义瓜分侵略的半殖民地，逐步变为日帝独霸的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国内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国民党营垒发生分裂，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有了和我党联合的可能性。国民党内胡汉民派及两广派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在“收复失地”、“焦土抗战”的口号下，一度反蒋。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宣侠父在香港和饶樟枫（浦德）、苏惠、姚锋、何思敬等同志一起，一面进行上层统战工作，一面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宣侠父和当时在香港的梅龚彬、陈希周等，都分别去找李济深、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等了解情况，讲明形势，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宣侠父对李济深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同党失掉了关系。我没有忘记在黄埔时您是我们的老师，……目前日军长驱直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我希望能在校长（李曾任黄埔军校副校长）领导之下，做一点抗日工作。将来我找到了党的关系，还是要回到党的队伍中去的。”李久闻宣侠父的大名，又见其态度真诚恳切，便请宣侠父协助自己筹建民族革命同盟。

宣侠父清醒地分析了民族革命同盟建立前的情况，认为：想参加同盟的党派很复杂，除国民党外，还有第三党、新国民党、托洛茨基派等。李、陈、蒋、蔡的思想也不尽一致，他们虽都参加了我党通过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组织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表示拥护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

但各有各的打算：李、陈想组织政府，抓政权；蔡想恢复十九路军，抓军权。他们赞成抗日和反蒋，但在对共产党的态度上又有分歧，陈较左，主张联苏、联共（后来曾率代表团赴苏访问）；蔡主张走英美路线，曾赴美考察；李和蒋取中间态度。四人中李济深威望最高。情况虽然复杂，但从总体来讲，左派力量稍占优势，加之一批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同盟，情况将更为有利。根据这种形势和认识，宣侠父决定，首先在抗日和反蒋这两点上促进其联合，再进一步联合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及西南、西北的地方势力，孤立蒋介石，扩大抗日阵线。经过一段工作，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抗日和反蒋的旗帜下成立了。共产党员宣侠父、梅龚彬和陈希周，分别担任了同盟的不管部长、宣传部长和群运部长，在同盟中起了重要作用。

接着，宣侠父等共产党员开始进行第二步工作：促使李、陈、蒋、蔡逐步实行联苏、联共抗日。经过努力，同盟主要成员接受了我党提出的三个原则：第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第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包括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请愿等权利；第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抗日义勇军，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

宣侠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影响，联络同盟内的詹天籟、翁照垣等和未入同盟的叶挺、邹韬奋等，共同为实现党的主张而努力。他还通过同盟与国民党内的各种反蒋地方势力、在野失意军人进行广泛联系，孤立蒋介石，扩大抗日阵线。特别是影响和推动两广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了“六一”事变。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宣侠父等共产党员的出色工作，香港、广州、南宁等地抗日救亡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

来。

宣侠父对何思敬领导的华南救国会的工作也十分关注，一些抗日组织和广州学生运动领袖，还定期到香港向宣侠父、梅龚彬等汇报和请示工作。后来陈济棠下令镇压群众运动，逮捕了何思敬等。宣侠父等通过陈铭枢出面，营救何思敬等逃到了香港。他见到脱险后的何思敬时，十分欣喜地说：“广州的学生运动很好，影响很大，有些过左的行动，这也是难免的。总的来讲，搞得很好。”

这期间，宣侠父还同张慕陶、徐维烈等人的破坏活动，继续进行斗争。

宣侠父在繁忙地作联络、统战工作的同时，还为同盟机关刊物《民族战线》和其它报刊撰写文章，宣传我党反蒋抗日的主张。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出版的《民族战线》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一·二八”战争的回顾与十九路军将领今后的任务》一文。这篇文章首先论述了“一·二八”抗战的意义，指出：“一·二八”战争爆发后，十九路军从蒋介石的御用工具，转变成中国人民大众的武力，“从民众敌人阵地投奔到民族革命阵线”。经过福建反蒋运动，“十九路军这个名称已经不是一个普通军队的番号，而成为‘抗日倒蒋’武力的名称了”。文章最后指明了十九路军将领今后的任务，希望他们负起抗日倒蒋的使命。具体地说，一是武装民众，扩大抗日倒蒋的力量；二是联合一切反日倒蒋的武力；三是号召全国爱国军人，停止内战，走向抗日前线；四是联合中国红军和东北反日军队。

三月十五日出版的《民族战线》第三期上，又发表了宣侠父的《民族危机中的内战问题》一文和宣侠父为十九路军将领

翁照垣代写的《“一·二八”的经验与教训》一文。他在《民族危机中的内战问题》一文中指出：“就中国现势而论，剿共和抗日，显然成为两条不能并立的战线，要抗日必须停止剿共，要剿共即是等于降日。”当时，宣侠父和党的南方工作委员会还没有同已经胜利到达陕北的党中央取得联系，没有听到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但他的文章却与党中央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据王学文和胡愈之回忆，宣侠父在上海工作时，就直接、间接地通过杨虎城、张学良的亲属、秘书、友人，联络张、杨两将军，争取他们反蒋抗日。宣侠父到香港后，胡愈之曾长时间联系东北实业家、张学良的秘书杜重远先生。那时张学良刚从意大利回国，胡愈之和杜重远一起做张的工作，鼓动他停止“剿共”，走上抗日前线，打回东北老家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当胡愈之得知张学良有意和我党接触时，同胡愈之联系的党员已经被捕，他和党也失去了联系，于是，他便离开上海，到香港去找宣侠父。

胡愈之到香港向宣侠父报告了张学良的意愿。宣侠父认为这个情况很重要。由于当时和党中央还没有恢复电台联系，宣侠父使用密电向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汇报，并请求指示。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复电要胡愈之赴莫斯科面谈，并要宣侠父设法通知鲁迅，请他到苏联治病、疗养。于是，宣侠父派胡愈之先秘密返沪，邀请鲁迅赴苏。鲁迅表示不愿离开祖国的战斗岗位。胡愈之遂返香港，又乘轮船经法国赴莫斯科。这时，民族革命同盟也派陈铭枢率代表团赴苏联，争取苏联援华抗日。

可是，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王明和康生听了胡愈之的

汇报之后，认为我党力量太小，中国抗日要靠蒋介石。他们怕张学良、李宗仁、白崇禧等反蒋，反对联合大资产阶级中的地方势力抗日，并全盘否定了宣侠父的工作，污蔑宣侠父是“政客”。后来，潘汉年从莫斯科到香港，取代了宣侠父对南方党的领导工作，并不准侠父和胡愈之再继续同张学良进行接触。所幸的是，王明的这些“指示”五月传到香港，张学良已通过其它渠道于四月与周恩来在延安举行了谈判。这一重要情况宣侠父当时虽然还不知晓，因而心情一度沉重。但当他仔细研读了潘汉年带来的《八一宣言》之后，他深信自己没有错误，便又振作精神，继续进行民族革命同盟的工作。

（十二）

两广地方势力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一九三六年发动“六一事变”后，李宗仁和白崇禧等提出要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邀请民族革命同盟参加。同盟派出李济深为团长的五十多人组成的代表团，蔡廷锴、宣侠父为主要成员，奔赴南宁。在广西半年多的活动，主要是支持桂系反蒋抗日；致力于恢复十九路军、建立抗日武装和组织领导梧州地区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

南宁地区斗争环境十分复杂，亲蒋右派分子极力煽动李、白继续反共，与蒋妥协。在一次南宁各界人士参加的大会上，李、白先后讲话，中心意思还是“焦土抗战，反蒋抗日”。李济深当即表示支持，并讲述了成立联合政府的意义。而亲国民党的刘庐隐和广西大学一名右派学生却大讲反共，说什么国民党政权是用血换来的，谁要参加联合政府，必须用血来换

取。坚持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宣侠父当时坐在主席台上，他意识到这是李、白、刘合演的双簧戏：李、白口头上喊反蒋抗日，又默许右派发表反共言论，给蒋介石暗送秋波。宣侠父决定待机反击。当夜，李、白举行盛大宴会，人们频频举杯为李、白捧场。宣侠父也应邀出席，并即席发表了讲话。他说：“现在国难当头，理应团结各阶级、各党派的一切爱国力量，结成抗日阵线，以局部抗战推动全面抗战。在今天，谁反对建立联合政府，坚持一党专政，谁坚持反共剿共，谁就是反对抗日。反共口号，就是汉奸口号！”几句话言简意赅，义正辞严，在宴会大厅里引起很大震动。宴会散场后，有人问宣侠父：在这样的场合讲这样的话，是否太厉害了？宣侠父说：“不，一点也不算厉害。我们没有更多的话，讲一句就要有一句的份量！”

张慕陶、杜畏之、王公度、李一尘等，也在广西四处活动，兜售托派理论。宣侠父在许多场合，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组建抗日军队，特别是组建新十九路军，宣侠父四出奔忙。李济深将宣侠父推荐给李、白，李、白委任他作参议。宣侠父以这个身份在李、白面前活动，鼓励他们以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十九路军留广西干部团为基础，重建新军。经过一段工作，李、白同意建立新的十九路军，并委翁照垣任军长，宣侠父任政治部主任。新十九路军先组建六十一师，丘少琛任师长，宣侠父兼师参谋长。新军刚组建起来，发生了北海事件，日本人中村被打死，日舰开到北海海面，炮口对准了北海市。六十一师官兵在北海海岸严阵以待，准备迎击。

“六一事变”后，蒋介石一边密调其嫡系部队威逼两广，一边采用种种阴谋手段。他首先收买了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使

陈济棠因空军和两艘军舰的倒戈而垮台；接着又通过桂系中的右派拉拢李、白，给李、白一笔巨款，并答应允许桂系保存实力，使李、白终于妥协。李、白与蒋妥协后，联合政府遂化为泡影，左派又被驱逐。宣侠父等被迫离开南宁，李济深回到了故乡梧州。

宣侠父带领方可勿等二十余人到北海前线，劝丘少琛打击日本入侵军舰，促使华南抗日武装力量的联合，打开抗日局面。他希望丘少琛保持十九路军的抗日爱国传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建立功勋。宣侠父说：抗日战争必将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一定会胜利；但是也会有暂时的、局部的失利。一旦作战失败，就将队伍拉到十万大山去，坚持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争取与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地方势力联合，与红军联合，以局部抗战推动全面抗战。丘少琛表示要赴南宁请示李、白，宣侠父便派方可勿同车前往。方于中秋节到梧州戎墟李济深家中，向李讲明宣侠父的军事意图。李表示他本人完全支持。不过，他又告方可勿说：丘少琛从南宁来电，已接受李、白旨意，命令六十一师向北撤退。原来，丘到南宁后，被李、白用金钱收买了。

宣侠父离开丘部后，来到梧州市，领导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在李济深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梧州市委，宣侠父任主任委员，方可勿任组织部长。他们通过同盟组织，联系大、中学校学生和工人、市民，集会、讲演，宣传抗日，很快形成了运动。这年冬天，由同盟梧州市委和广西大学学生会共同组织发起开了三千人的大会，声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要求政府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对日作战，收复失地。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这一时期，还有两件事情很值得一提。

第一件是，宣侠父在天津工作时，就秘密派遣共产党员谢和赓潜回广西，利用其与白崇禧家的世交关系，打入桂系。宣侠父到广西后，又给谢许多具体指导和帮助，让谢充分显示才能，消除李、白及其左右对谢的戒心，取得了白的信任，被任命为机要秘书。谢和赓在白崇禧身边一直待到一九四二年，为党作了许多工作。

第二件是，两广“六一事变”发生后，中央派云广英以代表身份到广西工作。云广英从陕北动身时，周恩来亲自向他交代任务，说：“你到南方，在香港、广州或南宁一带，一定要找到宣侠父先生，你可同他谈工作，请他谈当地抗日斗争情况，他是进步人士，他会帮助你进行工作的。”周恩来当时没有向云公开宣侠父的党员身份。云广英到南宁后，宣侠父向他详细叙述了“两广事变”的经过，并介绍云广英与李济深进行了会谈。李表示衷心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亲笔写信给毛泽东，托云广英带回陕北。不久，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王世英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后由陕北来南宁。当时，宣侠父患病，发高烧住在医院，听说王世英来了，便派方可纫去接头。宣侠父对方可纫说：你告诉世英，侠父一退烧，立即就来看他；胡鄂公在南宁冒充中央代表，在李、白面前招摇撞骗，应当向中央汇报这一情况。但是，当方可纫到旅馆时，才知王世英已离开南宁。不久，李、白与蒋妥协，云广英也离去了。全国解放后，王世英对金城说：那年在南宁，胡鄂公对我说，宣侠父有意称病，不愿见你；南宁不安全，你应尽速离去；对李、白工作，由胡某承担。至此才知道，由于胡鄂公的离间破坏，使宣侠父未能与王世英取得联系，还造成他们之间的一段误会。

(十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协商国共合作事宜，西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亟待有一位得力的同志承担。

一九三七年二月下旬，宣侠父奉周恩来、叶剑英“速来西安”的电示，风尘扑扑，赶到西安。

在七贤庄一号红军联络处内，宣侠父见到了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周恩来风趣地对宣侠父说：“黄埔军校一别十多年，我们是殊途同归，革命的洪流又把我们涌到一起来了。你来得正好，西安的斗争形势越来越复杂了。”接着，他们向宣侠父介绍了西安各方面的情况。

初到西安时，宣侠父的任务是协助周恩来工作。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宣侠父很快地结识了西安抗日救亡团体的主要领导人杜斌丞、车向忱、杨明轩、马德涵以及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谢华、徐彬如等，与他们商议稳定民众中因蒋介石反目、张学良被扣、杨虎城隐退而出现的波动情绪，重新调动各族各界的抗日救亡积极性。在工作中，大家彼此加深了解，增进了友情。宣侠父还拜会了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以及黄埔同学宋希濂、曾扩情等人，为以后的工作铺设道路。

不久，宣侠父北上延安，出席了五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党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实现方针、路线、政策转变的一次重要会议。它使宣侠父的思想认识发生了一个飞跃。他认真总结了过去多年间在敌军和白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决心响应党中央“重新学习”的号召，充分掌握新

的国共合作时期“合法斗争”的特点，开拓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

五月底，刚刚开完会，宣侠父就回到西安。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将宣侠父介绍给西安的党政军民各族各界代表，把他推到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线。

这时，金铃也带着孩子来到西安，在距离七贤庄不远的新民街安了家。

“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围绕着抗战的领导权问题，在西安的国共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争论和政治争夺。顾祝同、曾扩情、宋希濂等人囿于传统的封建观念，拉拢宣侠父归回“蒋校长”麾下，同他们携手并肩，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宣侠父则宣传鼓动他们要有民族气节，要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大家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他对他的老同学们说：在伟大的民族战争中，我们要对得起四万万父老兄弟姐妹。只有抗战，才有出路，才有前途，蒋介石也只有在坚持抗战中去建立威信。他们都想改变对方的政治信念，但一个人政治上的信念不是一下子可以改变的。于是，每次争论都是各持己见，各说其理，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根据党组织和周恩来的安排，黄埔毕业生中的共产党员陈赓、曾希圣也常来西安，住在宣侠父处，同宣侠父一道会见国民党方面的老同学，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黄埔毕业生左权来西安时，亦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国民党方面也鼓动关麟征、董钊、冯钦哉、郭紫峻等黄埔学生到宣侠父家里来游说。你来我往，唇枪舌戟，争论十分激烈。

后来，蒋介石派遣蒋鼎文、杭毅来到西安，委以行营主任、警察局长之职，取代了顾祝同等人，旨在控制部属，防止

“赤化”。宣侠父等人锲而不舍，充分利用这种合法的有利时机，不懈地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宣传全民族全面抗战的前途和意义，不断地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抗战积极性。

在进行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同时，宣侠父还在广大民众中积极开展救亡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西安有一些过去与宣侠父在冯玉祥部队共事的失意军人。他们虽然不得意而闲居，爱国之心终未泯灭。宣侠父建议他们组织起来，学习座谈，群策群力，共谋报国之计。不久，他们就组织了一个抗日问题座谈会。宣侠父给他们送去了学习的书刊，帮他们制订了学习办法，除委托专人代为联络外，他自己也不定期地参加他们的学习讨论，解答疑问。抗日问题座谈会把这些“散兵游勇”团结起来了，重新点燃起他们心中救亡抗日、报效国家的火焰。

宣侠父很快就以卓越的统一战线宣传者闻名西安，不时有人登门拜访。甘肃的青年军官任谦，在大革命时期曾在兰州听过宣侠父讲授新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十分仰慕。一次途经西安，特意向宣侠父求教。任谦对当时国共合作又不时出现摩擦表示担心，宣侠父对他说：“国共两党好象一家两兄弟，兄弟之间闹点矛盾，老大欺侮老二是常有的事，但在对外时，还是能够团结一致的。”形象的比喻，寓意十分深刻，任谦听了心扉豁然，茅塞顿开。

由于周恩来忙于在西安或赴南京、杭州、庐山等地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党联系西安各阶层代表的工作，主要由宣侠父来承担。每逢周恩来经过西安时，他总是详尽地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和出现的问题，听取其指示。只要时间许可，他就安排周恩来

进行公开讲演或单独会见有关人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前往武汉，经过西安，宣侠父根据当时西安接连发生两次封闭《解放》周刊分销处事件等情况，建议周恩来结合政治局会议有关精神公开演讲一次。时间紧迫，上午决定，下午就要开会，大家都担心会能不能开成功。宣侠父把准备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所有请柬由他签名，动员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分片包干专程去送。对行营、省党部、省政府等重要单位，由他亲自送去。结果，演讲会开得很成功，所请宾客全都到会，会场秩序井然，讲演不时被掌声打断。周恩来和大家都十分满意。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林伯渠来西安工作，担任中共驻陕代表。宣侠父对林老十分敬重，每天都要到七贤庄向林老请示汇报工作，主动取得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领导和支持。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陕西地方名流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虽然未居执政地位，但在民众中影响很深，能量很大，宣侠父特别注意搞好同他们的关系，发挥他们的作用。过去他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中认识一些陕籍名流，此时他又以平易的作风，渊博的知识，敏锐的见解，受到了这部分人的敬佩和信任，与他们交成了好友。他和孙蔚如、赵寿山、杨晓初、韩兆鹗、孔从洲等军界人物，你来我往，过从甚密，共同分析敌情军机，互相通融情报消息。他和杜斌丞、杨明轩、张之道、苏资琛、罗明等文人交际，商议抗日救亡运动公务，切磋习文治学之道，吟诗题词，关系更深一层。

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一度滞留西安，同宣侠父交为知己。侯外庐接受党中央交给他翻译《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任务，正在积极准备中。宣侠父这时也在旧书摊买了一套日

文版《资本论》潜心阅读。两个人到一起，除了畅叙抗日救亡的认识外，更多的时间则是探讨《资本论》翻译中的问题。宣侠父鼓励侯外庐说：“《资本论》的翻译，是一件对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大有裨益的工作，应当很快搞出来。你如果需要，我当尽微薄之力。”

宣侠父团结了这样一批知名人士，促进了抗日救亡民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各阶层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异常高涨，救亡团体遍及各行各业及各族各界，救亡工作一呼百应，募捐活动成绩显著。广大民众的救亡热情又促进了上层人士，连顽固分子蒋鼎文等人也表示愿为抗战出钱出力。

青年运动是统一战线的重要方面之一。宣侠父是爱国青年的良师益友。他的住处和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民先”西北分队部以及《青年战线》社，同在平民坊五号院内，这是他及时指导青年运动的极好条件。青年救亡组织的负责人冯文彬、胡乔木、黄华、陆平、李昌、蒋南翔、严佑民、李连璧等，来来往往，常住在平民坊五号。有时开会，来人多了，就在宣侠父家里铺几张苇席，席地而睡。宣侠父知识渊博，阅历丰富，而且性格开朗活跃，有青年的特点，常和青年们共同娱乐，促膝谈心。青年干部们对他十分推崇，乐意听取他的意见，请他当他们工作的顾问。

一九三八年五月，西安当局下令解散十三个抗日救亡团体，“西青救”、“民先”的活动被视为非法。这时，宣侠父的家，就成了它们的避护所。他利用自己较高的合法身份，尽力保护这些组织的工作干部。一次，李昌被特务跟踪，情况十分危急，匆忙中躲进宣侠父家里。宣侠父让李躺在床上，放下蚊帐。特务闯进来时，他镇定自如，行若无事，周旋了一会，便

把特务支走了。

大批有志青年为了救国抗日，纷纷要求到延安去，许多人找宣侠父当介绍人。宣侠父介绍了许多人，陈慕华就是其中的一位。

一九三七年八月，陕西省主席孙蔚如的夫人李定荫效法宋美龄，筹建陕西的“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宣侠父深谋远虑，推荐了西安高中的进步女学生曹冠群去当“妇慰会”的常委，又安排金铃和徐彬如的爱人韩钟秀到“妇慰会”中做具体工作。在以“阔太太”、“贵夫人”为主的“妇慰会”机构中，曹冠群等几位实干家，就无形中成为实权派，对改变“妇慰会”的面貌起了很大作用。金铃在“妇慰会”工作，宣侠父的家实际上成为“妇慰会”的联络点。

“妇慰会”成立初期，工作局面一时打不开，金铃的情绪有些低沉。宣侠父开导她说：“几千年来形成的妇女无权的陋俗，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不能责怪广大女同胞。她们也是爱国的，只要我们工作得当，方法多样，相信她们是会尽力支援抗战的。”又给她介绍了一些做群众工作的方法。按照宣侠父的意见，“妇慰会”重新部署了工作，区别对象，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广大妇女很快就发动起来，纷纷投入救亡运动行列，为前方将士捐款捐衣，积极参加妇女战时训练班学习。

“妇慰会”将妇女们募捐和慰问的物品，送到八路军办事处，请他们代转前方将士。

国民党西安当局取缔十三个救亡团体时，“妇慰会”虽因省主席庇护得以幸免，但活动却受到种种限制。宣侠父指导她们利用合法权利，积极开展救亡运动。一九三八年夏朱德来西安时，“妇慰会”派韩钟秀等为代表，把她们亲手绣制的“为

国干城”锦旗，敬献给这位人民抗日武装的领袖，表达广大妇女同胞对英勇抗战的八路军将士的敬慕和慰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稳定以后，遵照党的指示，宣侠父又南北奔走，从事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

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宣侠父由西安到达徐州，推动胡宗南积极抗日。宣、胡二人是浙江同乡，黄埔同窗。胡宗南时任第一军军长，因深知宣侠父是文武全才，亟欲得之，便多次邀请宣侠父。宣侠父乃有此行。在徐州，胡待宣侠父为上宾，朝夕陪伴，视察部队防地，畅叙别来沧桑。应胡宗南请求，宣侠父阐述了对提高部队军事政治素质的见解，提出了对付蓄谋已久、锐气正旺的日本侵略军必须采用游击战争的建议，得到了胡宗南的称赞。胡宗南请宣侠父写一篇游击战专论，以资教育部队。宣侠父知道胡宗南只以蒋介石之命是听，并无真心贯彻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但又觉得能让他和他的部下注意这个在中日战争中我方必须采用的战术，于国家民族也不无好处，便欣然同意了。宣侠父对游击战争问题思虑已久，因而只用了一个通宵，就交出了《游击战争概述》一稿。胡宗南阅后，当即批准印发部属阅读。后来，西安的《救亡》周刊在第五期上发表了这篇文稿，引起了军事界的称道和文化界的注目。一些刊物陆续向宣侠父约稿，他都尽量予以满足。据初步掌握，宣侠父先后应约写了《论政党的排他性》、《目前敌人增进山西的企图》、《对青年军训工作的一些意见》等，还参加了有朱德、贺龙、肖克等八路军将领执笔的《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的编写工作，成为西安文化出版界很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游击战争概述》一文，使胡宗南赞叹不已，更感到宣侠父是

不可多得的人材，便策动宣侠父辅佐他治军，许以高官厚禄。宣侠父婉言谢绝。他对胡宗南说，在日寇大举侵犯国土、民族存亡危在旦夕的时刻，自己因为久未领兵，无意当官。他劝胡宗南：“当官就应该象林则徐那样，领兵就应该像关天培那样，为的是民族，对得起百姓。”

同年九月，胡宗南升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上海、南京抗战，失败后，于同年底退到西安整补。为了扩充势力，胡宗南在西安筹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又鼓动宣侠父辅助，被宣侠父再次拒绝。胡宗南以为宣侠父看不上“军校”这类单位薄职，便吹嘘他可以向蒋介石推荐让宣侠父出任国民党的“军队政治工作厅”厅长。宣侠父严峻地指出：“只要不附任何条件，我干什么都乐意，拿枪杆子上前方打仗也可以！”胡宗南碰了个软钉子，从此再不拉宣侠父到国民党去做官了。

还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宣侠父就被党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这对他是一个重任。如何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尽职尽责，有所作为，多做些与国与民有益的事，是他经常思考的课题。同月，他和南汉宸等人跟随周恩来赴山西太原，与阎锡山交涉我十八集团军开赴山西前线作战的有关事宜。行前，宣侠父专程去三原八路军总指挥部领命，遇到了故交高岚溪。他写了一首诗赠高岚溪的五言诗，表达了他对抗日游击战争的必胜信念：

重整旧河山，男儿万万儿。
广大战场中，异军看崛起。
奇师出代幽，义旗指辽蓟。
攻敌于不备，出敌于不意。

如虎常闻声，似龙不见尾。
使敌疲奔波，辟易千百里。
胜报频相传，料君闻亦喜。

结束山西之行后，宣侠父又奉命去南京，鼓动李宗仁、白崇禧积极抗日。南京失陷前夕，他又来到武汉，参与了长江局的工作。在武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进行了争取冯玉祥等上层人物和黄埔系军官的统战工作。他和其他同志来到冯玉祥的住处时，受到了冯将军倍加热情的接待。当时，冯玉祥备受蒋介石的冷落与胁迫，进退维谷，心情郁闷沉重。宣侠父向冯玉祥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和关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愿意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和抗战到底的决心。他希望冯玉祥振作起来，整饬旧部，在伟大的民族战争中贡献力量。冯玉祥衷心感谢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的关心，表示决不辜负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希望。那天，冯玉祥破例地将宣侠父送出很远。离别时，宣侠父对冯玉祥说：“如果你什么时候需要我，我还会再来的。”一句话，勾起了冯玉祥对往事的回忆，一个走南闯北几十年的钢铁大汉，禁不住洒下了热泪。

后来，冯玉祥写信给宣侠父，要求介绍他的随从副官和随从参谋周茂藩、赵力钧到延安去学习。宣侠父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周、赵二人学习结束后，仍回冯玉祥处工作。

在武汉，宣侠父还在繁忙的统战工作之余，设法为我军搞到了二节车皮的汽油，又借国民党军队军需官韩俊生回西安的机会，托韩押汽油车送回西安，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也派一名副官送这批汽油。当时，汽油奇缺，这些汽油送到西安，给我们的交通运输帮了大忙。

一九三七年冬，国民党西安当局置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于不顾，接连导演了两次查封《解放》周刊西安分销处的事件。宣侠父多方会见当局有关部门负责人，交涉解决这一事件。行营主任蒋鼎文推说不知此事，是下面人干的。但是宣侠父事先已经作了调查，得到了确切的情报。蒋鼎文的谎言，被宣侠父当场揭穿：“外界传闻是蒋主任下的手令……。”蒋鼎文吱吱吾吾，如梗在喉，最后只好答应找有关方面商量解决。不久，当局即释放了分销处被捕的工作人员，归还了没收的七千多份杂志，分销处恢复了营业，还扩大了若干订户。《解放》周刊终于在西安站住了脚跟，占领了一块坚实的阵地。

蒋鼎文被宣侠父出色的工作弄得挠首抓耳，遂示意军统特务对宣侠父严密监视，同时又采用种种手段进行拉拢宣侠父。他曾以请宣侠父吃饭为名，给宣介绍女朋友，企图拉其下水，遭到宣侠父拒绝。此计落空后，蒋鼎文又施一计，建议宣侠父去“德国留学，深造提高”，想把宣侠父挤出西安。宣侠父谢过这位以“黄埔长辈”自诩的行营主任的“关心”后说：“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正值用人之际，本人不敢奢求个人的前途，置民族利益于脑后，还是等胜利以后再提此事吧！”心照不宣。蒋鼎文只好哼哈称是。

一九三八年三月，女作家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由山西前线来到西安演出。宣侠父十分关心“西战团”的同志，常去他们的住所聊天，帮他们干活，了解大家的反映和困难。他和丁玲早在“左联”相识，是老朋友，但在团员们看来，他和所有的团员都是可亲近的朋友，像是“西战团”的一名普通团员，而不像一位领导者。

“西战团”在西安顺利地宣传演出了一个月，其中公演的

两场话剧影响很大，轰动了古城。对此，国民党当局极为恐惧。他们蛋中挑骨，说“西战团”刷写的标语是“穿靴戴帽”，有政治问题，借口“战地”服务团应当上战地去，送来了一纸通令，限期离开西安。党组织派人同丁玲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论理，不得要领，悻悻而归。这时，宣侠父到“西战团”给丁玲他们出谋献策，一盘困棋又下活了。

首先，“西战团”化整为零，深入基层，既缩小了目标，又扩大了宣传效果。其次，在刷标语时，“旧瓶装新酒”，以官方操纵的“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出现，内容不变，省党部不便涂抹，也不好再挑刺。此外，在宣侠父的建议、说服和安排下，丁玲去会见了蒋鼎文和胡宗南。蒋鼎文给“西战团”募捐了二百元，胡宗南还请丁玲和宣侠父吃了饭。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这样，“西战团”既拿到了蒋鼎文的“护身符”，又取得了胡宗南的“关防护照”，使“西战团”巧妙地制约了省党部。

“西战团”在西安又坚持战斗了四个月，对加强西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日民族救亡运动，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经过一番准备，又举行了声势较前更大的第三次公演，演出了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秦腔和京剧，受到了各界同胞和朋友的一致赞扬。“西战团”圆满地完成了在西安的宣传任务后，凯旋返回延安。

(十四)

宣侠父在西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卓有成效。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受到各族各界仁人志士的热烈欢迎和拥护，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但是，以蒋介石

石为头子的国民党顽固派却深感惶恐不安。军统局秘密指示陕西特务头子张毅夫：“八路军办事处宣侠父、伍云甫在西安的活动，应严行监视。”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也感到宣侠父十分棘手，想借“军统”之手“剪除异端”。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蒋鼎文对张毅夫说：“宣侠父狡猾得很，共产党派他到西安来不简单。你们要特别注意他！”随后，张毅夫便苦心布置了一个秘密监视网：

十一月，由行营第二厅厅长谷正鼎主持，吸收西安当局有关部门参加，组织了“特种联席汇报”，定期汇报宣侠父、八路军办事处和西安地区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情况；蒋鼎文的秘书、总务处长等人和警察局长杭毅、警备司令董钊等可以与宣侠父接触的人，都奉密令随时向谷正鼎、张毅夫汇报宣侠父的活动情况。

年底，由警察局出面，在后宰门设立了一个专门监视宣侠父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派出所。

张毅夫、谷正鼎又秘密指示杨虎城部三十八军参谋长陈子坚侦察宣侠父与杨虎城部属杜斌丞、孙蔚如、赵寿山、杨晓初、韩兆鹗、孔从洲等人接触的情况；张毅夫甚至定期与派在胡宗南部的特务组织取得联系，了解胡宗南与宣侠父的来往情况。

此外，张毅夫还利用自己掌握的军统特务队，对宣侠父进行跟踪监视，掌握宣侠父的活动规律、生活嗜好和特殊动作等。

尽管特务组织纪律森严，特务的行动狡猾诡密，但是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地下工作、警觉十分灵敏的宣侠父，仍然很快察觉到敌人在暗中监视自己。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也得到了

军统特务在对宣侠父采取行动的情报。但宣侠父毫无惧色，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一次，他在会晤黄埔军校时的老师、时任西安警察局局长杭毅时，开玩笑地放了个风：“学生我现在际遇不错，义务保护的人不少哩！”杭毅听了，十分窘迫。过后，他埋怨张毅夫，对宣侠父这样的人物，不该那样露骨地盯梢。

一九三八年三月，宣侠父为了迎接更复杂的战斗，把金铃和孩子送到延安。

军统特务张毅夫根据各种渠道搜集的情报，给宣侠父罗列了“八条罪状”，汇报给军统局和蒋介石：一，与杨虎城旧部杜斌丞、赵寿山、杨晓初等“勾结”，唆使其反中央、反蒋；二，以黄埔同学关系与机关、部队的军政人员来往勾搭，散布共产主义思想，影响所及，势将引起其思想动摇，部队叛变；三，捏造八路军的抗日战果，在西安宣传鼓动；四，公开攻击中央政治腐败，抗战不力，诽谤委员长独裁，限制言论自由；五，散布共产党、八路军和杂牌军队被歧视，待遇不平等，不给补充武器军用品；六，与西安各方面左倾人物广泛接触，打着抗日救亡的招牌，煽动西安学生和流亡青年去延安，引起西安各校学生思想混乱，学风败坏；七，向蒋鼎文要挟吵闹，拉拢胡宗南图谋不轨；八，宣侠父是中共西安地下组织的最高负责人，指挥地下党组织进行阴谋破坏活动。

蒋介石对于宣侠父这样一个在历次反蒋激流中都站在风口浪尖上的老共产党员，早已仇恨在心，看到这“八条罪状”，更如尖刀扎胸，便恶狠狠地说：“每一次都有他！”遂手谕“将宣侠父秘密制裁！”

接到蒋介石的手谕，张毅夫即秘密安排暗杀行动。首先由

军统西北区直属组（即特务队）派遣三名精干特务埋伏监视，认识“目标”。特务们还以户警查户口为名，闯入宣侠父的住宅，近距离熟悉“目标”。

由于宣侠父行踪无常，特务们屡屡不能得手。特务头子戴笠催得火急，遂又派了军委会西安别动队的两名刺客，加强暗杀力量。

我地下工作人员将敌特要谋杀宣侠父的紧急情报及时向上级作了汇报。八路军办事处连夜将宣侠父从平民坊五号接回办事处院内居住。不几天，宣侠父觉得住在机关对开展统战工作多有不便，自己尚有高级参议的公开身份，只要注意，不会发生大的问题，便又迁回平民坊五号，置身于统一战线的繁忙工作之中。

杜斌丞得到敌人欲对宣侠父、侯外庐等人加害的消息，劝侯迅速离开西安。侯外庐找宣侠父商量，问道：“你怎么办呢？”宣侠父说：“我和你不同，我的战斗岗位在这里，你的战斗岗位在四方，你还是快走吧，你把《资本论》翻译出来就是战斗。”侯外庐激动不已，挥泪向宣侠父告别。

党组织十分关心宣侠父的安全，决定让他暂时回避，同林伯渠一道返回延安。七月三十日起程的那天早晨，宣侠父已将行李装上汽车。林伯渠又把他叫去，十分惋惜而又充满信任地说：“昨天晚上李初犁同志被警方传去，一夜未归。看来西安有情况，这可能是个前兆，以后不知道还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你还是先留一段时间，主持这里的工作。”既然林老让他留下，那就是工作需要他非留不可。他毫不犹豫地 from 车上把行李又搬下来，继续留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西安。

次日下午，八路军办事处与铁路局在革命公园运动场进行

篮球比赛，宣侠父担任裁判。六时许，比赛结束，宣侠父骑着自行车离开革命公园，顺崇礼路向西行至西京医院门口，被特务暴徒拦住去路，夺走自行车。宣侠父厉声喝斥：“你们要干什么？我是十八集团军的……”不等他说完，几个暴徒已经将他推拉到停在路旁的汽车边，其中一个狡诈地说：“知道，蒋主任请你！”说着，便强行将宣侠父架上汽车。汽车开动后，暴徒们一齐下手，用绳索将宣侠父缢杀。随后，将遗体投入下马陵一带的一口枯井里。由于我党追究得很紧，敌人怕马脚绽露，又于某夜移埋于城郊野外。

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下，一位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呼号的忠诚战士，竟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是可忍，孰不可忍！

宣侠父被难的最初几天，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和办事处的其他同志四处寻找。为了扩大影响，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还在报纸上发表了寻人启事。但始终杳无音讯。

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八路军办事处根据种种迹象，很快得知宣侠父是被国民党反动派绑架暗杀的。周恩来三次要求蒋介石追查宣侠父的下落，逼得蒋介石无法，只好招认：“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命令杀掉的。”

由于宣侠父是被敌特秘密暗杀的，党组织得到他蒙难的确切消息很迟。所以，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召开时，才为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宣侠父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朝气蓬勃战斗的一生。他是我们党的一位优秀党员，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党在白区的优秀战士。他的功绩将载入史册，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作者附记：

1. 本文参考了烈士夫人金铃整理的《宣侠父传》，在搜集材料过程中，曾得到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诸暨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中共温岭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甘肃省档案馆，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党史组，甘肃师大政教系，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西安市公安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北京图书馆，中央档案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烈士的女儿宣平和阳翰笙、丁玲、张克侠、陈天秩、张公干、谢和赓、王黎昌、韩俊生、高兰溪、方仲如、郝宇新、朱其文、吴奚如、李连璧、徐彬如、谢华、黄正清、刘贯一、云广英、张友渔、胡愈之、常黎夫、侯外庐、罗青长、马产宁、刘涓迅、叶炳南、张小民、陈慕华、王学文、钱之光、刘绍文、白坚、张协和、吴成方、李世军、陈世璋、王崇仁、李文田、任谦、马文彦、金炳禄、宣归父、金树望、金城、陈更生、张知道等同志，都积极提供了许多情况和宝贵资料。
2. 本文1—2节由鲍小牛执笔，3—12节由金戈执笔，13—14节由刘彤璧、奥存才执笔。

朱 瑞

郑建英

寻求真理 确立信仰

朱瑞一九〇五年生于江苏省宿迁县朱大兴庄一个“书香门第三代的地主家庭”。他的父亲早年学武不成，后来当了农村的业余郎中（中医），母亲是家庭妇女。由于“宗支繁衍，亲疏析离”，到他出生时，家道已中落。

朱瑞幼年体弱多病，十岁才入邻村私立小学读书。校中有一位姓孙的教师，“曾与孙文共过奔走，带来不少有关革命党的消息……我年幼无知，每觉新奇。”^①十二岁入县立高小，该校图书馆有很多藏书，朱瑞利用课余时间，“几乎遍读了许多小说、童话、故事”。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有《岳飞传》、《七侠五义》和《水浒传》。“‘岳传’增益我以热烈的民族思想，《七侠五义》赋予我对屈辱以崇高的同情心，《水浒传》给我以朦胧的社会思想及应该捣乱的念头”^②。他还通过“读报，当时已知道所谓欧战，并第一次听到关于劳农俄国……李宁（即列宁）等革命说法”。他把这些与“新奇”的“革命党”联系

①②朱瑞：《自传》。

在一起，逐渐使他由仰慕古代行侠尚义的侠士转而仰慕解民于倒悬的“革命党”。正当朱瑞思想急剧变化的时候，伟大的五四运动的洪流也波及到了朱瑞所在的苏北小镇。他“以一个激烈的突出的狂热的爱国主义分子第一次参加了学校及城镇的反日政治斗争”^①，和同学一起到各商号检查商品，搜查日货。

一九二〇年秋，朱瑞入徐州培心中学就读。这是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学校的教育完全是为着灌输奴化思想和宗教迷信，对学生的思想控制很严。朱瑞入学不久，就在同学中宣称自己不信教。每逢被迫参加做礼拜时，他“常偕同一部分进步同学捣蛋”（他们吃圣酒，我们则吃烧酒，他们啖圣饼，我们则齿烧饼）。这期间，他受到了一些进步青年的影响，读了“更多的新书籍……《向导》、《新青年》、《孙文主义学说》、《独秀文存》、《三叶集》……”^②，粗知一些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列宁生平等新知识。

一九二二年六月，一位低年级学生因星期天没有请假，遭到了校方的毒打。朱瑞立即发动本班同学起来罢课，风潮很快波及全校。学校当局害怕事态扩大，遂宣布提前放假，并开除了朱瑞等六十名罢课学生。

这年秋天，朱瑞在同学的帮助下，到南京钟英中学上高中。这是一所私立中学，商业色彩很浓。学生中大多为春试落第者或行为浪荡、不喜读书的纨绔子弟。朱瑞是一个立志报国、诚心求学的青年，不为环境所左右，在同班同学中，他的学业成绩就更加显得优异了。在全市性的统考中，他多次名列前茅，为学校争了光。所以，不但学校和科任教师喜欢他，

①②朱瑞，〈自传〉。

同学对他也格外敬重。

当时南京还处在直系军阀齐燮元统治之下，政治黑暗，革命势力受压抑。朱瑞却象一只初生牛犊，无所畏惧地抨击时政。他曾自拟一篇题为《拟孙文讨贼檄》的文章，仿唐代文人骆宾王《讨武曌檄》的笔调，痛快淋漓地斥责北洋军阀的暴政，深得进步国文教师的赞许。他在校刊上发表的一篇小说，通过一个青年的不幸遭遇，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北洋军阀的腐朽无能，并通过这个青年之口大声疾呼：“所谓民国，只有招牌，没有内容”，要建立名符其实的民国，“还要革命。”^①

一九二四年六月，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朱瑞代表毕业生致词。他当着督军代表的面，猛烈抨击时政，言词之激烈，校方及教员都为他捏把汗。不过，这时的朱瑞，仍然徘徊在各种新思潮的十字路上，“除了共妻主义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孙文主义，我均赞成”^②。

高中毕业后，朱瑞即赴上海报考国立广东大学，结果如愿以偿。在上海复习考试期间，他经当时在上海大学的原徐州同学马汝良的介绍，加入了CY（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马还告诉他，到广州后，可找罗章龙接转组织关系（后来找到罗）。

一九二四年秋，朱瑞“抱着无限希望”到了广东大学，被编在法学院预科学习。作为当时全国革命中心的广州，社会上斗争轰轰烈烈，而广东大学在校长、国民党右派邹鲁的控制下，却死气沉沉，有些功课“比中学还低”，“学校组织松

^{①②}朱瑞：《自传》。

懈，既无新事物，亦无新思想”^①，使他深感失望。于是，他改变了“认真学一学”的初衷，转而“尽自己所有，搜求进步书籍，自行研读”^②。他查阅了图书馆的有关书目，拟定了读书计划，经过一年学习、钻研，思想有了新的飞跃。过去他对社会主义的了解还处于朦胧状态，这时，他已从扑朔迷离中解脱出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信仰。

随着认识的提高，他开始更加自觉的靠拢党组织，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学校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入学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共领导的新学生社，并被班上的同学选为新学生社的负责人。一九二五年，法学院的右派学生也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与黄埔军校的孙文主义学会一唱一和，在邹鲁的亲信谢赢洲的支持下，妄图夺取法学院学生运动的领导权。但他们的这一阴谋很快被新学生社粉碎了。朱瑞带领本班新学生社成员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他还受党组织的委托，专程到黄埔军校通过同乡了解该校革命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情况，向进步学生作介绍，提高大家对这一斗争的认识。

一九二五年冬，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在中共粤区学委的领导下，广大新学生社成员和民权社左派分子联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驱邹运动，要求撤换校长，改组文理学院、法学院的领导，把邹鲁的右派势力驱逐出去。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粤区学委和学校党支部的负责同志曾要朱瑞通过私人关系，了解孙文主义学会和民权社右派组织内部动向和行动计划。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因而得到了学委负责同志的好

^{①②}朱瑞，〈自传〉。

评，说他是“斗争的中坚分子”^①。

正在这时，莫斯科中山大学到广州招生。朱瑞立即报名，并顺利通过了笔试和口试。在中共粤区学委的推荐下，经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批准，他以左派青年的名义，获准第一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十二月四日，朱瑞怀着兴奋的心情，从珠江码头乘船离开广州至海参崴，又转乘火车，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农历正月十二）抵达莫斯科，开始了留学生的生涯。

留学苏联 壮业发轫

朱瑞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们一行二十二人，被单独编为一个班，补习俄语。此后，他改名叫西尼（Сильный，强有力的意思）^②。朱瑞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对于学习，他“自始至终是认真的，用功的，发挥了从来未有的自觉与智慧”^③。开学不到两个月，他就能把胡汉民的《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一书译成英文，然后再译成俄文。任教的俄语教师看了他的译稿，惊喜交加，大为赞赏，立刻推荐给有关领导，并提议将他升入俄语第一班（即当时中大第十一班）直接听讲，这一提议立刻获得了批准。朱瑞在第一班学了三个月后，又向学校提出要求转入第七班。除了翻译班之外，第七班是中大的俄语水平最高的一个班，他的要求又获得批准。

朱瑞升入第一班不久，“即以活动分子之一被选入学生公

①1981年6月10日访问徐彬如记录。

②1982年4月22日访问师哲记录。

③朱瑞：《自传》。

社（即学生会）”^①。一九二六年三、四月间，因为他“努力学习，富有正义感，看到不合理的事情敢于面对面地进行斗争，关心国家、民族兴亡”^②，遂由丁祝华等介绍，加入了苏联少共（即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在记述这件事时写道：“这是我一生的共产主义奋斗生活之始……其实际意义是我已具体、明确地确定了人生奋斗的方向。”^③

国内国、共两党日益尖锐的斗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国、共两党学生中也有反映，主要表现在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同孙文主义学会成员之间的斗争上。第七班在当时的中大被称为“理论班”，是国、共两党人才最集中的一个班，国、共两党后来许多有名的人物都在这个班学习过，共产党方面有左权、邓小平、俞秀松、傅钟、李卓然、朱瑞等，国民党方面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康泽、李秉中、郑介民等，因而斗争也最为激烈。朱瑞多次在辩论会上作专题演讲，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孙文主义学会，不过是一部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打着孙中山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而已。他的雄辩口才和高强的活动能力，使他成了这场斗争中射向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箭头子”。

朱瑞在中大学了一年半，于一九二七年夏天毕业。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国内斗争急需军事人才，他便按照共产国际的决定，继续留在苏联学习军事。当年秋天，朱瑞进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他智力聪颖，又刻苦用功，因而学习成绩突出，成为炮校中国留学生中的高才生，得到了炮校东方部主

①③朱瑞：《自传》。

②丁祝华延安整风时给朱瑞写的证明材料。

任更巴赤的赏识和同学们的普遍称赞^①，入炮校不久，便被提拔为班长、副排长，后又任中国连的司务长，主持全连行政管理工作。他对于全连的公务总是“辛辛苦苦，想方设法把事情办好”。同学们有什么困难问题去找他，他就象大哥一样热情地为之出主意、想办法，排忧解难。大家背地里议论到他时，都不约而同地称他为“我们的指挥员”^②。

一九二八年春，朱瑞当选为炮校苏联少共委员会委员。同年六、七月间，经联共党员米夫（中大校长）、阿哥尔（中大教员）、波古烈也夫（中大职员）、求古诺夫（中国同志）、瓦悉烈夫（炮校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和炮校党委书记六人介绍，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朱瑞在炮校学习期间，还积极地参加了反托派的斗争。当时，在炮校的中国学生中，有少数人同苏联的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明目张胆地反对共产国际，攻击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在校内，他们不遵守制度，还专门打击那些努力学习、积极工作、遵守纪律的进步同学，谩骂拥护斯大林的中国学生是“俄国人的走狗”。朱瑞组织进步学生同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后来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在炮校“我是反托派最积极的一个”。通过反托派斗争，使他“不仅明确党外有斗争，而且认识了党内斗争”^③。

一九二九年七月，朱瑞在毕业考试和实弹射击中均获得了第一名，受到了炮兵学校领导的嘉奖^④。毕业后，朱瑞急欲回国，投身国内火热的斗争，但学校领导却安排他到苏联陆军大

^{①②④}1982年4月22日访问师哲记录。

^③朱瑞：《自传》。

学深造。正在为难之际，适中东路战事扩大，党中央决定从苏联抽调一批熟悉军事的人才去东北筹建军委，开辟革命根据地。经共产国际研究，决定派遣朱瑞回国。

地下斗争 以身许党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八日，朱瑞离开莫斯科动身回国，途经德国、意大利、新加坡、香港，于次年一月到达上海。与他同行的还有陈家齐、滕功成二人。为了领取护照，他们在德国柏林停留了三个月。

回国时，共产国际告诉他们，到上海后住先施公司东亚酒楼，组织上会派人去接头。但一连住了半个多月，没有人前来联系。他们归国时所领旅费有限，而且旅馆的房租很贵，经商量决定，彼此分头活动，设法与组织取得联系。朱瑞第二天即动身乘火车去徐州找中学同学马汝良，不料这位当年曾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老同学，听到朱瑞说明来意后，却吞吞吐吐。朱瑞见此情景，敏锐地察觉到，对方不是叛变，便已消极。本来约定第二天再见面，为了防止意外，他当即乘夜班车赶回上海。

朱瑞的家乡就在徐州附近，他本想这次去徐州顺路回家探望一下日夜想念的年迈母亲。自从他到广东上学，除了一九二五年暑假回过一趟家，就再也没有同家人见过面；到苏联后，连音讯也断了，一别就是五年。但是，在徐州的遭遇，使他再也无心回家了。

朱瑞由徐州返回上海后，继续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党组织。这期间，他确实也碰到过不少过去的同学、朋友，其中有些人在

大革命期间也曾活跃过一阵，但随着革命从高潮走向低潮，这些当年的活跃分子大都沉沦、消极了。他们害怕斗争的残酷，对革命失去了信心。有的朋友对他说：自从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一蹶不振；现在是国民党掌权，天下大势已定，再斗争也没用了，何必去干那种没有希望的冒险事情呢？有的劝他放弃政治，改行经商，甚至约他合伙做生意。正当他奔走街头，为找不到党的组织而忧心如焚的时候，托派组织却想乘机拉他入伙。对于这一切，他从心底里感到厌恶。朱瑞矢志找党。但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每遇熟人他便佯称自己早已从苏联回国，在家乡当教员，这次来上海是为了“散散心”。三月下旬的一天，朱瑞正漫步在街头，突然望见邓颖超正陪着她妈妈散步。他欣喜若狂，立即迎上前去说明自己的情况，托她代为转告组织。在邓颖超的帮助下，中央组织部很快就派方英把他们接到了军委机关。朱瑞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自莫斯科动身，到找到党，先后六个月，这中间是我们最孤零、苦闷的时候……在找到党以前，我们都象失去母亲的孤儿”^①。这时的朱瑞，已作为“一个自觉的共产党员在斗争及工作中站起来，行动了！”^②

党组织根据朱瑞的情况，分配他到中央军委参谋科担任参谋。一九三〇年五月，朱瑞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担任会议的秘书兼记录。这次会议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决议案，决定整编各地区的红军，命令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以期实现一省数省的胜利。会上，李立三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关于发展农村游击战争的正确主张，坚

①②朱瑞，〈自传〉。

持无条件集中人员、集中枪枝，以充实编制正规红军。朱瑞等当时虽不理解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从而给予积极的支持，但也不同意李立三的“无条件集中主义”，而主张“采取一面发展、一面集中”的方针。就是这样一个折中方案，也没有被会议采纳。

红军代表大会结束后，朱瑞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传达会议的精神。他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月，按照中央的指示，将当地红军编为红一军，下辖一、二、三师，并推动三个师的红军向武汉发展。当红一军九月初出发去攻打广水时，朱瑞从黄安之小河溪出苏区，行至三岔埠，为当地地主民团所怀疑。他佯称自己是汉口怡和蛋坊的执事，到花园一带收帐，机智地应付了民团的搜查和盘问，于九月底回到上海。

十月，长江局军委秘书长张金刃（即张慕陶）“于被捕中动摇逃脱，被侦缉队击伤，没人接替工作”^①。适关向应路过上海回武汉，要求中央派干部前往接替。当时，由于李立三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军事计划的暴露，武汉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因而在被派往武汉工作的同志中流传着一句口头语：“我是扛着棺材去的”。本来，朱瑞才回国半年，地下斗争的经验还不丰富，中央在考虑人选时，并没有想到他。但当他看到被指定前去的同志面有难色、犹豫不决时，便自告奋勇，要求到武汉工作。关向应对他这种知难而进的精神十分满意，立即接受了他的要求。朱瑞这次是抱定牺牲的决心去武汉的。临行前，他给长兄写了一封与家人诀别的信：“我到远方，生死难卜，以后不再向家中通信了。”^②

①②朱瑞，〈自传〉。

朱瑞于十月底到达武汉，任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隐蔽在法租界一家日本人开设的照相馆内，协助关向应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这时，由于宋惠和的叛变，武汉的“形势更加严重，破坏屡屡，牺牲接踵”。党中央鉴于武汉形势日益恶化，党的干部接连被捕、牺牲，于十二月中旬作出了将武汉长江局工作人员全部撤出，只留外交科、军委交通科与交通站的决定，并指名要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尽快离开武汉返回上海。但他们因工作紧张，一时还不能脱身。十二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等长江局领导同志正在开会，敌人在叛徒的指引下，直接向长江局的驻地奔袭而来。大家闻讯，急速从后门撤走，不到五分钟，搜捕的敌人就从前门闯入会场，多险呀！在这种情况下，长江局的主要领导人只好立即撤离武汉。他们临走前，把长江局和武汉市委的工作悉交朱瑞负责。

敌人自从破获了长江局机关后，气焰更加嚣张；同时由于叛徒的告密，敌人暗探的触角也伸进了军委系统。朱瑞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军委下属一些秘密据点相继被敌人破坏，后来连他的秘书叶福民也被捕了。处此险境，他随时都有被敌人逮捕的可能。但在他看来，自己能在敌人的夹缝中与其周旋，正是一个革命者的乐趣所在，即使遭到不幸，也是一个革命者光荣的归宿。所以，他对于随时都有可能降临的死神，毫不畏惧。有一天夜里，他同另一位同志在分析敌我斗争形势时，彼此开玩笑说：“看来下一步该轮到我們头上了！”这位同志第二天出去给湖北省委送款时，在路上被敌人跟踪，在同敌人搏斗中壮烈牺牲。朱瑞仍坚守自己的岗位，镇定自若地进行指挥，将军委系统联系的秘密党员和统战对象分期分批地撤出，使他们

安全离开了险境^①。后来，关向应考虑到武汉白色恐怖严重，工作一时难于开展，为避免干部牺牲，决定调朱瑞回上海。朱瑞接到指示后，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回到上海。

回上海后，中央分配他到军委兵运科主持兵暴训练班工作。这个训练班的地点就在上海中国旅馆地下室和四马路中华旅馆，任务主要是培养训练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的骨干，训练的内容分政治、业务两方面，朱瑞负责政治课程。由于他知识渊博，口才又好，能按照学员的不同程度开展教学，因而效果很好。一位当年在训练班听过朱瑞讲课的老同志深有感触地说：“算起来，时间都过去五十年了，可是他讲的内容和前后次序，我还记得清清楚楚。”^②

朱瑞在训练班工作了十个月，先后培训了数百名兵运工作骨干，其中直接由他派到国民党各部队和兵工厂做兵运工作的有六七十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发动有名的宁都暴动的王超、袁血卒、李肃等，就是由朱瑞派出的。袁血卒回忆说：“五月的一天，有一个高个子，头带台湾式草帽，身穿纺绸大衫，脚上皮鞋净亮，腋下挟着把洋伞，大摇大摆地走到中华旅馆来。看外表，完全是一位大学教授的派头，同我们这些人的大学生打扮是很相称的。……看他那谈笑自如的风度，便知道他是一位善于应付环境的能手。他一边用手搓着麻将，一边给我们上课，布置任务。在我们临走的前一天，他又来找王超同志，嘱咐说：‘如果情况紧急，需要红军配合，你们可以直接去找红军联系，就说是朱瑞派你们去的，如有情况需要向中央请示汇

^①1982年9月2日访问刘立轻记录。

^②1981年7月13日访问袁血卒记录。

报，可写信寄复旦大学袁风渊收。’并给我们发了活动经费和秘密联络暗号。”①

这期间，他还根据中央的指示，同国民党部队将领孙蔚如、孙殿英等驻上海的代表联络，对他们进行统战工作；有时也到基层，协助区委开展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为了安全起见，中央和周恩来决定将一批无法在上海立足的同志，撤退到中央苏区。朱瑞奉命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离开上海。

朱瑞从苏联回国后，在白区工作了两年。两年来工作“是努力的，有些成绩的。”这也是他“锻炼、考验以及从思想、行为、组织上最后巩固的年代”②。

军团统帅 功在闽赣

一九三二年一月八日，朱瑞来到了仰慕已久的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科长、五军团训练队政委、红军学校教员等职。一九三二年春，红一军团的三、四军和五军团的十五军组成东征军，由毛泽东率领向福建的闽西南挺进，先后占领了龙岩、漳州等城市。这时，原宁都起义的十五军军长黄中岳，因在部队中进行策反被指战员揭露，中央遂决定十五军政委左权改任军长，任命朱瑞为政治委员。

朱瑞就任十五军政委后，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同左权带领部队深入到天宝、南靖一带的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打土

①1981年7月13日访问袁血卒记录。

②朱瑞，《自传》。

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并在斗争中扩大红军力量。

六月，朱瑞奉命到五军团任红三军政治委员，不久即参加了水口战斗。八月十五日，朱瑞和军长徐彦刚率领红三军参加攻打乐安县城战斗。十六日清晨，红军发起总攻，红三军攻打东门，红四军攻打南门。敌人居高临下，凭险固守，激战数小时未果。次日拂晓，我军再次发起强攻。敌人在空中飞机的支援下，不时组织反击，企图突围。朱瑞亲临前沿阵地，观察敌情，鼓舞士气，指挥战斗，并组织突击队逼进敌人，同敌进行白刃格斗，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层层防线，攻进北门。在红四军的密切配合、协助下，守敌全军覆没，俘虏敌人旅、团长以下三千多人。

攻占乐安后，朱瑞和徐彦刚立即率领红三军向宜黄挺进。在红三军团一部和红十二军十三师的配合下，经过两个昼夜的激战，攻克了宜黄。国民党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为了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急急忙忙率领残部向抚州溃逃。红三军指战员乘胜追击，在龙骨渡又重创逃敌，生俘敌军一千七百余。抗战初期，高树勋在同朱瑞的一次会见中曾经感慨地说：今天我们是朋友了，江西那一战，你把我们打得好苦啊！另一个知情的国民党将领补充说：抚州追击那一战，你把他（指高）打得连鞋子都跑掉了。说完彼此哈哈大笑。宜黄战斗，由于指挥得当，不仅缴获多，而且伤亡少。据统计，这一仗红三军仅牺牲六人，伤十四人。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朱瑞调红五军团任政治委员。次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红五军团是由宁都暴动的原国民党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

军改编的。一年来，在原政委肖劲光、军团长董振堂、副军团长赵博生、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领导下，经过龙岩、漳州、水口等战役的锻炼，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都有很大提高。但由于战斗频繁，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还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各级指挥员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军阀主义的残余作风。朱瑞到任后，首先抓党的建设。他注意物色干部，充实各级政治工作机关，以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善于利用战斗间隙，组织各级指挥员学习红军的政治工作条例，批判军阀主义的残余作风，号召大家树立平等待人的思想和民主作风，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并在全军团内重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新旧军队的对比活动，以激发战士的主人翁思想。他还经常给指战员作政治动员和形势报告，鼓励大家为苏维埃事业而奋斗。在他的领导和带动下，五军团的政治思想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干部间的团结增强了，部队的纪律加强了，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也提高了，在战斗中“建立了不少战功”。

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蒋介石调集了五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分兵三路，企图合击我南丰、广昌一线的红军主力。周恩来、朱德洞察敌人的战略意图，立即将围攻南丰的三、五军团撤出，埋伏在乐安到宜黄路上的黄陂一带大山中，只以地方武装与敌周旋，迷惑敌人。二月二十七日，当陈诚第五军的第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从乐安出发路过黄陂时，我军突然发起攻击，一举歼灭了蒋介石嫡系的两个师，活捉了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因重伤，被俘后毙命）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这一仗打得蒋介石叫苦不迭，使他不得不承认：“此役挫失，悽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沉痛”。

朱瑞和董振堂是这次战役中右翼部队的最高指挥员，担负着消灭敌五十九师的任务。战前，朱瑞亲自向各级指挥员进行政治动员，布置战斗任务，要求指战员发扬红军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去争取战役的胜利。二十七日下午战斗打响后，他和董振堂亲临第一线坐镇指挥。当他发现突击部队因故未能如期赶到指定地点时，便当机立断，调整部署，指挥后续部队抢占有利地形，投入战斗。战斗过程中，他和刘伯坚又亲自组织政工人员，开展火线政治工作。在军团指挥员的带动下，广大指战员“不顾一切牺牲，冲锋陷阵，同敌人肉搏血战”，负伤的战士“卧在血泊中”，仍“鼓励战友奋勇前进！”全军上下，同仇敌忾，奋力作战，终将顽敌五十九师全部歼灭。

三月二十一日，朱瑞和董振堂又指挥五军团在草岗台配合一、三军团，消灭了被称为蒋介石的“冠军”部队第十一师和第九师的一个营。

经过黄陂、草岗台两次战役，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又集中了一百万兵力，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向各根据地发动了新的进攻。他以五十万的兵力，采取步步为营，碉堡推进的战术，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红三军团和五军团在黎川东北部的洵口同敌人打了一个遭遇战，三军团的三、四两个师消灭了赵观涛所部第十八旅的三个团；五军团十三师击溃了前来增援的周浑元部第三十六旅，夺得了第五次反“围剿”第一个战役的胜利。但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是在“左”倾错误负责者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下，打的是“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的所谓正规战，红军擅长的游击战的战术优势得不

到发挥。尽管红军广大指战员勇猛战斗，战争形势却日益逆转。

朱瑞和董振堂根据过去反“围剿”战争的成功经验，在敌人的优势兵力和强大炮火的攻击面前，曾提出要“避免正面作战和阵地战，应于运动中侧击敌人和消灭敌人”^①的战术，但遭到了坚持“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拒绝。十二月十五、十六两日，他们命令红五军团在黎川通往太宁的要冲德胜关，同敌人的优势兵力展开“堡垒阵地战”。红军的所谓“堡垒”，不过是一种临时性的掩体，自然经不起敌人重炮的猛烈轰击；况且，红军的弹药、物资补给又多取自于敌，由于战斗接连失利，弹药器材不能得到及时补充，“全部轻重机枪、自动步枪俱因无弹停用，步枪每支平均子弹不过五粒”。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许多红军战士虽一天半没有吃饭，还是异常兴奋、毫无怨言”，“受敌机炮弹及一切集团火力的压迫犹毫不动摇地坚持抗战”^②，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五军团也受到了相当大的伤亡，被迫放弃了阵地。

不久，红五军团退守建宁。建宁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屏障，蒋介石把他的嫡系精锐陈诚部队调来进攻，后来又加入了汤恩伯的部队。他们使用堡垒战术，步步为营，逐步向我红色区域推进。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势下，五军团顽强阻击敌人达半年之久。朱瑞亲自起草了《五军团关于保卫建宁的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必须用一切力量保障这一战略基地……即使

①董振堂、朱瑞：《关于运动中侧击敌人的指示》（1933年11月12日）。

②董振堂、朱瑞：《红五军团德胜关战斗详报》。

战斗的一分一刻时间，也要进行战斗的宣传鼓动，煽起全体指战员高度的顽强抗战，消灭敌人的决心”。在保卫建宁的日子里，据当时新调到五军团任参谋长的曹里怀回忆，朱瑞的工作是极其紧张、繁重的，“每天天朦朦亮就要带领部队上山占领阵地，构筑工事，防止敌军的偷袭和敌机轰炸；白天，同军团长董振堂一起指挥战斗，领导开展政治工作；晚上，要了解各部队当天的战斗情况，听取参谋人员的汇报，查看地图，确定第二天的阻击阵地、各部队的撤退路线和宿营地，给各师、团起草命令。他的工作很深入，很具体，各种指示、命令都是亲自动手写……”^①。建宁防线被敌人突破后，五军团又奉命退守泰宁、广昌。

朱瑞在五军团工作了二十个月，这是指挥千军万马，鏖战沙场，出生入死的二十个月。当年与朱瑞同生死、共患难的曹里怀、莫文骅、苏进、王永励、李毅、耿万福等，都怀着敬重的心情追忆说：“朱瑞政治理论水平高，工作能力强，有魄力，不但政治工作有办法，而且能打仗，是一位文武兼备的红军指挥员。”莫文骅还特别指出：“五军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是很艰苦的，……但是全体指战员的情绪始终是高昂的，很有战斗力，立了不少战功，这与朱瑞的艰苦工作和以身作则的模范带头行动是分不开的。”^②

万里长征 紧跟中央

一九三四年八月，根据朱瑞本人的请求，中央调他到一军

^{①②}1980年6月5日访问莫文骅记录。

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九月，他参加了兴国保卫战。随着兴国保卫战的失利，红一方面军被迫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撤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伟大长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朱瑞十分振奋。

三月九日上午，党中央在遵义中学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首先由朱瑞作遵义战斗的总结报告。他指出：这次遵义战斗，我英勇红军打垮了贵州军阀王家烈两个师，紧接着又击溃了周浑元、吴奇伟纵队三个师二十个团的进攻，共消灭敌人七千多，缴获枪枝四千多支。这次遵义战斗，扭转了红军出征以来的被动局面，实践证明了毛泽东领导的正确^①。

六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决定红军继续北上，以便推进和领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然而张国焘却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同时自恃人多、枪多，公然向中央伸手要权，挑起了一场严重的斗争。朱瑞一开始就站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等的正确立场上，同张国焘的错误方针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先后向一军团的广大干部详细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的决定，多次在他主持的各种会议上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应是集中力量向北进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苏区，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扩大的基础上，以争取西北各省以至全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

^①1981年3月9日访问肖锋记录。

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前的倾向。这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的主要危险。”^①他还指出：“只有北上，才能使红军得到发展，推动抗日高潮的到来。”大家听后“很振奋，一致拥护党中央的路线。并表示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向甘南前进。”^②由于聂荣臻、朱瑞等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进一步统一了一军团广大干部和战士的思想，使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顺利完成长征，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反张国焘斗争是对我一个考验，开始即确定，明确坚定地为中心路线而斗争。……我个人自始至终不但坚持党的路线，而且一开始便自觉的从思想上及经验中洞察张国焘之奸恶，拥护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工作上捍卫党的路线，从思想上巩固及团结了群众”^③。

八月十七日，朱瑞在一军团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过草地的动员报告。在草地的日子里，朱瑞的马不是让给伤、病员骑，就是给战士们扛枪、驮背包。行军休息时，他总是到处查看，找干部、战士谈心。他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过草地，受这么大的苦呢？是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为了苏维埃事业。……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跟着朱、毛走出去”^④。指战员们听了都很受感动，他们眼含泪花说：“首长，您别只顾我们了，您不是和我们一样行军、作战、吃苦吗？您也该休息一下呀！”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粮食。过草地前，朱瑞在动员中曾传达命令要求每人准备好七天的粮食，实际上搜集不了这么多，有好

①②转引自肖锋日记。

③朱瑞，《自传》。

④1981年3月9日访问肖锋记录。

些同志在行军中又把仅有的一点粮食丢了。他动员有粮食的同志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彼此匀着吃；同时发动大家采蘑菇、野菜。吃饭时，他一边端着碗，一边大声诙谐地说：“同志们，蘑菇可是好东西啊，营养价值高的很呢，吃了有劲，好走出草地。”有的同志饿得走不动了，他就鼓励说：“再加把劲吧！听说前面就有粮食了。”其实前面究竟有没有粮食，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但在那种情况下，用“画饼充饥”的办法，也会给人带来一种希望，使那些饥肠辘辘、疲惫不堪的同志产生一种前进的力量。

朱瑞长期患有胃病，长征路上由于伙食极差，胃病经常发作，并且每次都很厉害。但他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从来不搞特殊化，即使偶尔碰到改善伙食的机会，也总是多方推脱，把这种难得的机会让给别的同志。肖锋回忆说：“走出草地不久，军团直属队在一个山沟里打土豪，搞到了四头肥猪、十几只鸡，还有许多纸烟。大家为了照顾首长的健康，分别给他们送了一份。他们估计朱瑞一定不会接受，便决定请他同大伙儿一起‘吃小灶’。当炊事员把饭菜做好，派人去请他时，他说同志们一路上很艰苦，难得有这么个机会，应该好好在一起高兴高兴。但他随之又借口有事情要急于处理，谢绝了大家的好意。”

朱瑞是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协助聂荣臻主管全军团的政治思想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但在行军作战时，他为了掌握第一线的情况，经常同先头部队一起行动，帮助前线指挥员筹谋划策，指挥战斗。九月十七日，一军团二师先锋团行进到天险腊子口时，被敌挡住去路。敌人凭险固守，给红军前进造成了很大困难。为了尽快攻下腊子口，同时减少部队的伤亡，朱瑞亲自赶到前沿观察地形，同四团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一起

研究进攻路线，发动群众献计献策，组织部队从右岸的悬崖绝壁攀登上去，绕到敌人的左侧后发起突然攻击。敌军在我猝然打击下，以为神兵天降，狼狈溃逃，很快攻下了天险腊子口，为全军扫清了前进的道路。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后，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立即组织了五个师的兵力，企图乘我立足未稳，向我大举进攻。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在直罗镇给来犯的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十一月十三日，朱瑞向一军团直属队作战前动员。他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和力量对比，指出这是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后的第一仗，要求大家鼓足勇气，发扬红军猛冲猛打的作风，打一个漂亮仗。在从驻地向柳青岸行军的路上，朱瑞仍不断向大家讲解直罗镇战役的有利形势以及我军必胜的各种因素，鼓舞指战员的战斗士气。二十一日上午，红军突然由两侧山头向刚刚进入直罗镇的东北军一〇九师发起猛烈进攻。正当军团预备队第二师向山下敌人冲锋时，突然从另一条山沟里冒出一股敌人向军团部冲来，而军团部身边已无作战部队，情况十分紧急。聂荣臻、朱瑞、左权等立即组织警卫连和机关干部进行阻击。敌人企图夺路而逃，不断发起冲锋，但他们一次又一次被打垮了。后在二团的回援下，终于将这股敌人围歼。这一仗，光军团直属队就俘虏了五六百敌人。

直罗镇战役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在胜利的凯歌声中，迎来了一九三六年。朱瑞在《战士报》“新年献辞”一栏里发表了《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一文，全面总结了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艰苦历程和所取得的伟大战绩，特别是遵义会议以来，红军在毛泽东指挥、领导下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胜利。文章最后指出：“这一年，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

席领导下，越过了巍巍雪山，跨过了茫茫草地。我们战胜了困难，也战胜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我们以一双脚，一支枪，百战的身躯，完成了人类空前伟大、艰苦、神圣的远征！”

西征路上 谱写新篇

一九三六年二月，朱瑞随同一军团东征。五月，红军东征凯旋归来后，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编为西征军，由彭德怀统一指挥，分左右两路西进，一面扩大抗日根据地，同时迎接二、四方面军出草地。六月上旬，红一军团进驻固原、海原和同心城一带。为了顺利打开西征的通道，同时团结广大东北军官兵参加到抗日的行列中来，朱瑞遵照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指示，同邓小平一起，带领四师到七营川地区向东北军进行统战工作。

东北军广大官兵由于家乡沦陷，妻离子散，备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因而抗日情绪相当强烈。自从被蒋介石驱赶到西北与红军作战，遭到了接二连三的打击，这使他们深刻认识到，跟着蒋介石亦步亦趋，不但国恨家仇报不了，而且自己还有被消灭的危险。因此，在东北军中反蒋的情绪也很强烈。正是在这个时候，红四师奉命来到七营川地区向何柱国的骑兵军开展统战工作，因而在东北军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然而，争取东北军工作的重大意义，初时并没有为广大的基层干部和战士所了解。多少年来，我们同国民党军队之间，一直处于刀光剑影之中，使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认为，凡是国民党军队，必然是我们的冤家对头，怎能去同他们讲团结、讲统一战

线呢？为了提高广大干部和战士的认识，朱瑞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亲自起草宣传动员提纲，召开干部会议，介绍东北军的情况以及中央关于争取东北军共同抗日的重大意义；还在部队中开展争取东北军参加抗日的政策教育，发动全军上下，人人都来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为了提高东北军广大官兵的觉悟，引导他们走上抗日的道路，朱瑞还多次到东北军驻地作报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肖锋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六月二十七日晚，他陪朱瑞主任和刘源部长到东北军阵地前，向东北军士兵讲解我党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主张。朱瑞说：“东北军弟兄们，这里没有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在哪里？在东北，在你们老家。你们要打回东北去，千万不要为蒋介石卖命……。”^①肖锋回忆说，朱瑞的演讲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的心，听着，听着，许多人情不自禁地喊出“坚决不打红军”、“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口号。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东北军官兵的民族意识日益提高，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把他们调到西北来同红军作战的险恶用心，于是，纷纷与红军疏通关系。遇到上头强行要他们向红军进攻时，他们就事先派人给红军送信，让红军事先做好准备，双方交锋时，朝天上放枪，以此来敷衍、搪塞他们的上司。这样，两军对峙的前线，就不再以兵戎相见，而是笑脸相迎，彼此往来拜访，做客谈心，有时，双方还在一起开联欢会。

与此同时，朱瑞还积极做东北军上层的统战工作，到他们驻地与之联络感情，解除他们对红军的疑虑。“九一八”事变

^①1981年3月9日访问肖锋记录。

五周年这一天，他带领军团政治部联络部长刘源和三团政委肖锋，前往东北军驻地与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祥的代表汪庸、刘继尧谈判，签订了“中国工农红军与东北军骑兵第六师的停战协定”。协定指出：“停战抗日为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的丝毫不可躲避与推迟的天职，尤其是东北军与红军的天职。因此，骑兵六师与红军不管过去及现在主张有何不同，不管过去及现在尚有何种隔阂，但为抗日救国，均有绝对理由，结成亲密的联合，并从今日起，即一致确定这一联合。”协定还规定了以下具体内容：“一、不受命进攻红军，不打枪；二、万一须敷衍命令的，不作杀伤性的射击，不前进；三、事先向红军通知行动及骑兵六师的位置，以免误会；四、在可能需要时，经过互相协议，可作友谊的让步，但以不违抗日利益为原则。”^①

彭德怀在《自述》中写道：八月初，一军团进驻固原、海原及同心城之间，东北军何柱国率一个师和军直属队驻固原城，一个师驻海原，一个师驻同心城及固原线。我军插驻其间，使其隔离。“我写信给何柱国军长，说明抗日救国大道理，要他让出海原、同心城，……在他的军队移动时，我军给予方便及决不进攻的保证。何开始不相信，以后相信了，我军派朱瑞和他进行谈判，彼此遵守协议，他实行了”^②。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具体主持下，一九三六年四月，我党与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已秘密达成了抗日停战协定，随后红军各部队也分别与驻地附近的东北军签订停战协定，这就从根本

^①肖锋日记。

^②《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上粉碎了蒋介石利用东北军打内战、企图借红军之手削弱、消灭东北军的阴谋，推动他们逐步走上抗日救国道路，为后来的西安事变和国内停战抗日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朱瑞后来回顾说：“西征工作时代，在邓小平同志参加及协助之下，这是我在二军团工作改进和发展时代，也是我此后一个时期进步的基础。”^①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向党中央提出要求，希望从中央红军派得力干部到二方面军加强部队建设和政治工作。党中央同意贺龙的要求，任命朱瑞为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朱瑞在二方面军工作了半年，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基层党支部的建设以及促进内部团结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得到了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人的好评。据当时二方面军政治部的金如柏说：“他一来就抓思想整顿，抓基层支部的建设工作，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号召大家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他工作魄力大，雷厉风行，抓得很紧，……经他这么一抓，部队大有起色，思想稳定，情绪高涨。大家对这件事反映很好，觉得他有办法，有能力，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②

创办“华干” 培育英才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后，朱瑞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离开红军，就任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他于七月下旬到达太原，同中央代表刘少奇、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以及彭真、李大章

^①朱瑞：《自传》。

^②1981年10月12日访问金如柏记录。

等商量后，决定去邢台、邯郸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此行因路途受阻，被迫停留在保定。这时，日军已占领北平，国民党军队纷纷南逃，许多高级将领都聚集在保定。朱瑞拿着毛泽东主席的名片，去拜访刘肖南、高树勋、孙殿英等，代表中国共产党同他们举行会谈，向他们解释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鼓励他们尽量招收流亡学生和进步青年，坚持抗战。这期间，他还向保定地下党的负责同志作了抗日战争形势的报告，帮助他们拟定了在白洋淀、任邱地区发动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的计划。八月上旬，朱瑞回到太原，接到了毛泽东从延安给他发来的电报：“北方局的军事工作很重要，你要仔细的去布置。”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自己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迅速草拟了一份军事计划草案提交北方局讨论。

九月初，朱瑞受周恩来的派遣，赴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政训处工作：由于国民党执行的是片面的抗战路线，并不想真心实意发动群众抗战，军队的政工人员又十分腐败，因此，所谓政治工作，不过是徒有虚名。朱瑞目睹这种情况，决心离开政训处。十月，程潜的部队撤退到新乡，朱瑞便应张轸之邀，趁机脱离政训处，就任豫北师管区游击训练班教官。

张轸政治上属于第三党，据说颇有才干，蒋介石不敢让他带兵，只给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师管区主任空衔。他想利用抗战时机发展个人实力，程潜也极力从旁支持，就在新乡办起了游击训练班。在张轸看来，请朱瑞给他办班，可以借重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招来青年，罗织人才。朱瑞则想利用张轸的“帽子”，训练班的讲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培养抗日干部。所以当张轸派人前去聘请他时，他明确表示：请我讲课可以，薪金分文不要；“我是从八路军来的，只能讲八路军那

一套。”^①张轸表示同意。朱瑞在训练班主要担任“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术”课程的讲授。“他所讲的课程内容，既有很强的理论性，又有丰富的实际知识，加之他言教和身教一致，所以更加生动感人，大部分学员纷纷向他靠拢，使那些国民党教官显得相形见绌”^②。他还极力向学员灌输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阐述毛泽东关于持久战、游击战的战略思想，揭露国民党在华北战场的失败和溃退情况，启发学员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觉悟。当时，新乡集中了许多来自河南各地以及河北、山西一带的进步青年。他们都是慕名抗战而到前线效命的爱国学生，其中有些还是民先队员，经朱瑞介绍，先后都进入了张轸的训练班。这些刚出校门的青年学生，爱国热情高，思想单纯，听了朱瑞的讲课后，“就象突然长大了似的，懂得了许多道理”。彼此私下交谈时常说：“在我们刚迈出学校门槛走向社会的时候，就遇上这么个好老师，真是太幸运了。”^③经过朱瑞的教育，在第一期毕业的二三百名学员中，“除了八、九个最顽固的外，其他的一律加入民先”^④，有些人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些学员在国民党部队向黄河以南撤退时，都按照朱瑞的指示，留在豫北地区，坚持敌后抗日斗争。

朱瑞离开程潜的政训处后，曾派王志强给周恩来送去一个报告，汇报他退出政训处的原因以及到张轸训练班的工作情况。周恩来在给他的回信中指出：“你退出程潜部队是对的”^⑤，并充分肯定了他在训练班的工作。为了帮助朱瑞进一

①朱瑞在延安整风时的发言记录。

②④⑤唐铁田：《忆朱瑞在晋东南》。

③1981年6月12日访问戈明记录。

步打开工作局面，周恩来还特地为他配备了一部电台和有关的工作人员。

不久，朱瑞被程潜委任为第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络处长。他利用这个合法身份，主动同一些国民党将领联络，商谈抗日大计，劝说他们就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邀集社会人士举行座谈；向流亡在新乡的青年学生发表演说等等。他指出：“现在正是我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关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赴汤蹈火，奋起自卫。我们共产党、八路军，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①他号召有志青年，奔赴抗日前线，或到敌人的后方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敌后斗争。朱瑞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不断对他进行造谣、诬蔑和恐吓。对于这一切，他都义正词严地予以揭露。十一月间，新乡举行了一次万人集会，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专门派出了以刘震寰为首的宣传队参加。会上，他们大肆贩卖“一党专政”、“焦土抗战”、“调和民众生活”等谬论。朱瑞则针锋相对地讲了“政治民主化”、“游击战与运动战”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他的演说事实充分，道理透彻，“好象舌战群儒的诸葛亮一样，把反动分子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赢得了群众雷动的掌声。”^②

朱瑞在新乡的三个多月，通过各种活动，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当地群众中的威信，他本人也赢得了广大青年和社会进步人士的信赖。一些热心于抗日

^①1981年6月12日访问戈明记录。

^②唐铁田：《忆朱瑞在晋东南》。

事业的绅士，听说他要创办抗日干部学校，慷慨解囊，集资相助。新乡地方出版社还把他在新乡的活动，以及他的《游击战术》讲授提纲收集在一起，汇编成册，取名叫《朱瑞与新乡》，出版发行^①。

这期间，朱瑞还通过内部关系，同直南、豫北两个特委取得联系，直接领导他们进行抗日斗争。

国民党军队撤过黄河时，程潜和张轸都要朱瑞和他们一块走。朱瑞借口要处理善后工作，留在原地，继续以联络处长的名义，进行抗日活动。在当地社会人士的资助下，他以豫北师管区训练班培训的学员为骨干，办起了华北军政干部学校。

“华干”校址初时设在河南辉县，后来迁到山西晋城，晋城沦陷后又迁到阳城。他借用当时河北民军总司令的名义，招收晋东南、豫北、直南一带流亡学生和进步青年，对他们进行抗日的政治、军事教育和训练；结业后，按照统一战线的原则，把他们分配到八路军、牺盟会和国民党的一些部队工作。

朱瑞深知培养这些青年的重要性。为了把他们引导上革命的道路，他倾注了大量心力。当年曾在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学习过的李尔重追忆说：“他对青年有着一种超常的热力，引导你向党靠拢，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皮，而不感到疼痛。……他一到大家面前，男的女的都围过去，一边喊着朱先生，一边把他们的花生、核桃、糖也递过去了：‘朱先生，你来了？你吃不？’实际上这些天真的青年们，谁也未把他当成那种‘敬而远之’的先生，而是当成亲切的同志了……。朱瑞同志来了，经常是小的拉着，大的围着。”

^①1981年5月15日访问张赛洲记录。

经过朱瑞的苦心经营和精心培育，华北军政干校先后培养了两千多名学员，成为我党在华北坚持敌后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一部分按照统一战线原则分配到国民党军队工作的学员，在国民党走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后，绝大多数人站在我党立场上，同国民党反动政策作了坚决斗争，重新回到敌后根据地坚持抗战。许多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部分成长为我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干部。

朱瑞认为这个时期是他的“工作最有成绩的时代之一。……在许多友军中建立了联系……，主办了张轸之干训班，自己创立了华干，在这一工作中争取了、改造了、培养了数目甚大的青年干部，尤其扩大我党信仰，争取许多国民党影响下青年到我们方面来，这对于太行区及周围地区工作的开展，有着重大意义；找到了、整理了、发展了几个地区的党，创造了及发展了地方武装，打下了我党我军在直南、豫北，晋南坚持游击战的基础。在这些工作中也改造了自己作风……锻炼了自己独立工作、决定方向、克服困难的能力。有了这一时期的工作考验，我才在实际工作上开始向全面领导才能去发展”^①。

一九三八年八月，朱瑞调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九月，中央和北方局任命朱瑞为八路军驻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处代表，负责处理八路军与河北国民党省政府之间的关系，并指导地方党的工作。出发前，彭德怀向他作了两条指示：一是坚持阵地；二是准备让步。他本着这两句话的精神，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斗争，终于做到了“坚持阵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①朱瑞：《自传》。

转战齐鲁 迭挫敌顽

一九三九年五月，第十八集团军总部为了进一步统一和加强山东敌后抗战力量的领导，决定建立八路军第一纵队，任命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前往山东统一指挥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八月九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了山东分局七月三十一日关于建立山东军政委员会的报告，任命朱瑞、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陈光、黎玉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朱瑞任书记，并指示：军政委员会为统一该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机关。十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赴延安，中央和北方局决定由朱瑞任山东分局书记。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朱瑞一直是山东敌后抗战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于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朱瑞和徐向前于六月下旬到达鲁中山区，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政治委员黎玉等会合，并当即召开会议，向他们传达党中央、中央军委、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山东工作的指示。会议还没有结束，就遇上了日寇对山东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扫荡”。敌人集中了两个师团的兵力，由华北敌酋植田大将亲自指挥，采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我鲁中山区扑来，妄图一举围歼我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首脑机关。朱瑞、徐向前和山东纵队的领导同志采取避免同敌人正面作战、发动群众广泛开展分散性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指挥我军主力多次灵活避开敌人合击，运用内外线互相配合的战术，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战斗，歼灭敌军一千多人，粉碎了日寇的大

“扫荡”。

一九四〇年，日寇又在山东周围集结了两个师团和四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兵力，以及八万多伪军，以所谓军事、政治、经济等联合手段，不断向我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分局和军政委员会及时提出了扩大与巩固山区根据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打通山东各区及山东与华中的联系，打破敌人“囚笼”政策的战略方针。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我军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内线、外线结合，积极捕捉战机，不断打击和消灭敌人，先后粉碎了日寇二十多次“扫荡”，并利用敌人“扫荡”的间隙，积极开展攻势，扩大我占区，缩小敌占区，恢复和发展根据地。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共开辟、扩大了鲁南、鲁中、鲁西、冀鲁边、清河、胶东、滨海等十个抗日民主根据地。

国民党为巩固其在山东的统治地位，也在积极调整部署。早在一九三九年初，他们就建立了鲁苏战区，任命于学忠和沈鸿烈为正、副总司令。五月，又调东北军五十一军和五十七军入鲁，抢占了沂、鲁山区和莒（县）日（照）临（沂）费（县）等重要地区。以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还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千方百计限制我党我军的发展。这样，在山东战场上就出现了敌我友三角斗争的复杂局面。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按照党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斗争策略，联系山东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对于（学忠）拥护，对沈（鸿烈）不理，打击沈之部属，斩除其手脚，孤立沈鸿烈”^①和“拥护于

^①朱瑞：《关于山东工作（向中央的）报告》（1940年11月）。

学忠，打击沈鸿烈，联合东北军，消灭顽固投降派”^①的政策。朱瑞亲自负责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他通过联席会议、互通情报、交换代表等方式，增强我军与东北军的联系；在反“扫荡”中给予东北军在作战、交通等方面提供方便条件，必要时还予以主动配合。从而“对东北军的广大官兵产生了强烈影响，都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真心实意抗日的，每当提起共产党、八路军的时候，都翘起大姆指”^②。在我方的团结争取下，于学忠和东北军的许多高级将领多次向我表示，他们决不打八路军。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东北军不顾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力，始终保持中立。一九四〇年后，东北军的少数将领在国民党当局的胁迫和顽固派的挑唆下，一度参与了反共摩擦。分局和朱瑞继续把他们同顽固派区别对待，一方面劝其顾全大局，同时作适当让步，以示友谊；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给以还击，促其醒悟。因此，我方与东北军的关系，尽管也发生过曲折，但总的情况还是好的。这对我山东敌后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对于以沈鸿烈为代表的山东顽固派，则予以坚决的打击。一九三九年七、八月间，当秦启荣在淄河流域向我进攻时，徐向前和朱瑞等遵照中央关于“我们的态度应是攻势防御的，在政治上占上风”的指示，向社会各界和于学忠发出呼吁，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同时，抓住顽固派向我进攻的“有利时机、有利口实”，作出了“打击及消灭秦部，……以迎头打开山东统战局面”^③的决策，集中山东纵队一、四支队主力，组织了

①朱瑞：《抗战的山东，统战的山东》。

②1980年6月访问郭维城记录。

③徐向前、朱瑞：《对顽秦斗争的部署》（1939年8月20日）。

淄河战役，缴获秦部二千余枪枝，使顽方受到了一次惩罚。

一九四〇年后，山东顽固派为准备向日寇投降，反共气焰更加嚣张。他们打着所谓国民党的正统旗号，诬蔑我方破坏统一战线，攻击我党我军，借以煽动、挑拨地方封建势力和中间力量同我对立。在军事上，他们纠集各地土顽武装，向我发动全面进攻，甚至不惜勾结日寇，对我实行夹击，妄图消灭人民的抗日力量。

朱瑞首先从政治上同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孙中山手创的国民党及三民主义，早已被“中国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为着实现背叛革命的行为时完全把它当作一个阶级的私物而歪曲篡改了”。不论是“过去，今天，还是将来，中国资产阶级还会以自己各个时期中的不同目的来接待国民党及三民主义的招牌，去实现旷古未闻的叛卖勾当，如同汪精卫正掬着国民党与三民主义一样。”^①他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最忠实、最彻底的执行者和领导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抗日统一战线”^②。从而揭穿了顽固派的所谓“正统”招牌和对我党的攻击、诬蔑，澄清了舆论是非。他还在各种报告和文章中对沈鸿烈、秦启荣之流反共反人民的倒行逆施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斥责他们“使抗日政策完全颠倒，使中国武装枪口对内，使民众解体，……抗战在不幸的情况下遭到投降、分裂与倒退的厄运”，号召人们“在投降、分裂、倒退还未成为完全事实的今天，给以迎头的打击”^③。

①朱瑞：《论国民党》。

②朱瑞：《论共产党与统一战线》。

③朱瑞：《纪念今年的“四一二”》。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军政委员会还从军事上做了严密部署，组织各地区对顽固派连续发动武装反击。在徐向前、朱瑞和黎玉等的领导下，清河、鲁中、滨海、胶东等地区，从一月至三月，仅山东纵队就歼灭顽军四千五百人^①。由河北逃窜到冀南、鲁西一带的石友三第三十九集团军与沈鸿烈部东西呼应，成了山东反共、反八路军的两支反动主力军。徐向前和朱瑞及时建议，“应乘其初到鲁西南稍息未定立足未稳之际，迅速……彻底予以歼灭”^②之。我鲁西、冀鲁豫、冀南三大主力部队先后在程子华、宋任穷、肖华等指挥下，从三月到八月，发动了三次反击战，歼灭石逆二万余人（包括逃亡在内），解放了十几座县城。鲁中地区，继春季攻势之后，朱瑞和黎玉^③又于七月拟定了“公然与省府进行局部摩擦”的作战计划，集结山东纵队一、二、四支队主力，在一一五师六八六团一个营的配合下，于八月十日发起反击，当天就收复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鲁村战役使沈鸿烈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在给重庆当局的报告中承认，他的部队已“损失过半”。

一九四一年春，为了策应华中的新四军，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山东军民在分局和朱瑞、罗荣桓、黎玉等领导下，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自卫反击战。这次自卫反击战以胶东为中心，集中山东纵队五旅、五支队及三旅一部，由许世友、林浩、吴克华等直接指挥，自三月十五日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攻势，一举收复牙山，会师桃村；蔡晋康所部大部为我

①徐向前、朱瑞、黎玉：《对山东反摩擦的补充指示》。

②徐向前、朱瑞、黎玉：《由于鲁南战略形势的重要决定消灭石逆》。

③徐向前已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回延安。

歼灭。我军乘胜南攻莱阳、海阳，对胶东投降派的头子赵保元的老巢——发城展开了围攻战。分局派黎玉到胶东坐镇。此役前后不到一个月，歼敌五千余人。四月十五日，朱瑞在《对付胶东反投降的意见及指示》中，又及时指出：“应迅速集中优势兵力乘投降派内部大动摇并纷乱之际，确实对赵保元之主力作周密计划以猛烈痛击来歼灭其全部或大部，以彻底开辟南海及掌握全胶东之历史任务”，并要他们在军事胜利的同时，实行“正确的政策与模范的纪律，……团结广大群众与抗日进步的各阶层，共同促进和巩固军事胜利。”这次胶东反对顽固派的反击战持续了五个月，使当地的顽固投降势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在分局和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我冀鲁边、清河、鲁中、滨海、湖西各区也都先后对顽固派展开了自卫反击战，并取得了胜利。

这个时期，朱瑞和徐向前等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在党、军队、政权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迅速恢复了夏季“扫荡”中受到破坏的各级党的组织；随后又按照中央关于山东党“可以继续发展，但应求精不求多”^①的指示，代表分局提出了“一面发展，一面巩固”的方针，要求各地党组织通过各种抗日活动，及时把先进分子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做到“发展一个，巩固一个”。一九四〇年，分局还先后对区党委、地、县、区和基层党的组织进行了普遍的整顿，清除了混进党内的极少数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在加强组织工作的过程中，朱瑞十分关心党员的思想

^① 《中央给北方局、山东分局的指示》（1939年9月20日）。

教育和干部的理论学习。根据当时的抗日环境和大量新党员的实际情况，他要求在党内普遍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对敌斗争教育、党的历史教育、统战政策教育、党员气节教育，肃清“思想上的唯心论与机械观点；政治上把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混同和调和的倾向；工作中的雇佣、虚荣……个人主义”^①等等。

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山东党的组织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先后成立了冀鲁边、鲁西、湖西、鲁南、鲁中、清河、胶东七个区党委，党的地、县、分区组织也在逐步健全中。党的基层组织遍布广大农村，就是敌人控制严密的青岛、济南等城市，党的地下组织也有发展。在当时的山东，哪里有日本帝国主义，哪里就有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山东人民坚持敌后抗战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军队建设方面，分局和朱瑞根据中央提出的“努力扩大，加强军政工作，使主力部队党军化、正规化”的要求，利用每年青纱帐和秋冬季节，对山东纵队进行了认真的整训。当年八路军第一纵队和山东纵队组织部长谢友发回忆说：朱瑞“在建立地方武装，发展人民军队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每年从军事、政治、组织上搞两次整训。一九四〇年后，山东纵队由原来的游击队逐步走向正规化，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打了不少胜仗。”^②这年十二月，毛泽东、王稼祥等在给山东分局的电报中指出：“山东工作在同志们的艰苦创造中，已获得巨大成绩。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单独已经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

^①朱瑞：《山东党的建设》。

^②1981年1月28日访问谢友发记录。

规化的军队，它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①

政权建设方面，朱瑞和徐向前到山东后，就立即着手改造原有的民主政权；同时利用日寇“扫荡”、国民党政权崩溃的机会，委任我们的县、区政权，一九三九年夏季鲁中反“扫荡”中，分局一下子就建立了八个县的民主政权。在历次反顽斗争中，朱瑞、徐向前等分局领导人都对政权建设提出明确任务，要求“开辟新区工作自一县、一区直至一乡、一村，不管大小（原文如此——引者）做起”^②。当时的清河区党委书记景晓村说：“游击战争初期，我们党注意组织部队，忽略了政权工作。朱瑞他们来后，这个工作就抓紧了，利用日寇‘扫荡’、国民党政权垮台的机会，委派我们的县长、区长，组织地方武装保卫政权。我们清河区的县政权，都是在这个时期搞起来的。”^③随着反“扫荡”、对顽反击战的胜利，抗日民主政权也不断发展，至一九四〇年八月召开山东联合大会时，已建立了七十九个县政府、八个专署，民主选举了四十一个县参议会。这次联合大会选举产生了敌后第一个省参议会，成立了山东战时工作推动委员会（简称“战工会”，即山东省人民政府前身），作为省政权的最高执行机构。民主政权初步贯彻了“三三制”政策，组织人民发展生产，动员群众参军、参战，优抚军、烈属，实行合理负担，推行民主教育，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这对坚持敌后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①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谭政：《对山东工作的指示》（1940年12月16日）。

②徐向前、朱瑞、黎玉：《对山东反摩擦工作补充指示》（1940年4月12日）。

③1982年5月31日访问景晓林记录。

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是山东敌后民主根据地的大发展时期，根据地由原来的星星点点逐步扩大并联成了几个大的战略区，占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人口占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八十的县份建立了民主政权，拥有党员十五万，正规武装十多万。山东敌后根据地和晋察冀、晋冀鲁豫一样，成为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敌伪军集结了五万多人马，由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直接指挥，分五路向我沂蒙山区合围而来，朱瑞和罗荣桓等率领的分局机关与一一五师师部在留田附近被敌人包围。当时，随同分局、师部行动的干部、群众有两三千人，而负责掩护的部队只有一个警卫营，情况万分危急。但是，敌人的阴谋并没有得逞。在朱瑞、罗荣桓等的正确判断、果断决策和指挥下，我领导机关的全体人员终于顺利安全地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在这次反“扫荡”中，由于敌人出动的兵力多，持续的时间长，又是多路进攻，反复“围剿”，因而使我方受到了较大损失，“战工会”秘书长陈明等不幸牺牲，分局妇女委员、朱瑞的爱人陈若克连同他们还未满月的儿子，也都惨死在敌人的刺刀下。反“扫荡”结束后，朱瑞立即召集干部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号召大家从挫折中吸取教训，从悲痛中振作精神，“一直斗争到最后胜利！”^①

一九四二年是山东敌后抗战最困难的一年，根据地缩小，武装减员，群众的积极性也受到挫折。正在这关键的时刻，刘少奇于三月受中央委托，在返回延安途中，由苏北来到山东检查工作。他首先肯定了山东工作的巨大成绩：使我党、我军在

^①朱瑞：《结束一九四一年迎接一九四二年》。

山东站稳了脚跟，为今后持久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指出了领导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主要是未能完成中央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指示山东党“应争取我们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的任务，群众没有充分发动，根据地和政权建设还不够巩固。为了指导山东的工作，他在山东住了四个多月，帮助分局开展工作，并向干部作了《群众运动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论党内斗争》等报告，为山东党指明了斗争方向。

遵照刘少奇指示，分局负责人彼此思想见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朱瑞首先作了自我检查。他说：没有认真、切实、普遍地组织与发动广大群众，并改善他们的生活，这是造成根据地不够巩固的根本原因，这不仅是工作上的缺点，而且是个严重的群众观念问题，也是阶级观念薄弱的表现；在统一战线政策上，注意了尽量争取朋友，但对中间势力的动摇认识不够，因而过多地强调了联合，对于必要的斗争强调不够；在除奸工作中，虽然按照中央的指示，处理了“湖西事件”，但没有从这一事件中认真吸取教训，以致后来在某些部队和地区又出现了扩大化的现象。他还检查了自己的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并对分局工作中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其他同志也都各自作了自我批评，开诚布公交换了意见。在这个基础上，朱瑞代表分局作了《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号召全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起来，争取优势，争取最后胜利！

五月中旬，分局通过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抽调三百多名干部组成工作团，由朱瑞亲自带领，分赴临沂、日照两县九个中心区三十个村进行减租减息和增资试点工作。当时，滨海地区正闹春荒，许多贫苦

农民忍饥挨饿，生活非常困难。工作团急群众所急，发动群众从借粮入手，从而解决了群众生产自救的燃眉之急，也使群众经受了初步的斗争锻炼。试点中，朱瑞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及时克服了部分干部中急躁冒进、不从实际出发、包办代替的错误倾向，保证了试点工作的健康发展。六月下旬，朱瑞作了《滨海区农民一个月减租减息增资运动的检讨》，为在全区和全山东开展“双减”运动作出了示范。接着，就在全山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广大农民从运动中切身感受到了共产党和抗日政府的好处，因而更加拥护党和民主政权，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在群众的经济要求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分局又及时引导他们提出政治要求，建立抗日武装，整顿、扩大各种群众性的救国会组织，发动群众参军参战，不断把斗争引向深入，为扭转敌后斗争形势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山东分局还根据中央的指示，组织干部联系“三风”的具体表现，开展整风学习，进行工作总结。为了取得经验，在分局、一一五师和省“战工会”的主要领导干部中建立学习中心组；分局还成立了学习委员会，作为引导、检查、督促中心组学习的领导机构，朱瑞亲自兼任学习委员会主任。分局和朱瑞还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整风学习，转变工作作风。他自己经常深入基层区、乡，检查工作，调查研究。《大众日报》曾对他这种深入实际的工作精神作了专门报道。这期间，他通过蹲点调查，先后作了《群众工作领导问题》、《滨海区群众工作总结》等报告，有力指导了减租减息和各项群众运动的开展。

分局还认真检查了执行中央精兵简政方针的情况。分局机关在朱瑞的直接领导下，由原来的一百八十多人精简到四十多人，为下属单位做出了表率。一九四二年全山东共精简了三万

多人，脱产人员只占根据地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四，低于中央提出的百分之三的要求。一九四三年党政军民机关共节约了三千多万元，比一九四二年少征购公粮五千多万斤。通过精兵简政，甩掉了庞大的机关包袱，减轻了群众的负担，进一步调动了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在根据地建设方面，分局进一步落实了“三三制”政策，通过合理负担，调整了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同时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动员党政机关自力更生，厉行节约，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为了战胜困难，朱瑞十分重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形势、政策的教育，使干部、群众不被一时一地的困难所吓倒，随时心明眼亮，精神振奋。一些老同志在回忆中风趣地说：“那时处在敌后斗争环境，物质条件非常困难，但在精神上是很愉快的。朱瑞经常给我们讲形势，做报告，他每作一次形势报告，都给我们极大鼓舞，甚至激动半年”^①。

“一九四二年是摩擦较小的一年，过去反我之最厉害之地方友军，已逐渐改变态度”。这是“由于我党我军疏通工作的推动。”^②就是对那些顽固派，只要他们还抗日，我们就积极支持他们的抗日行动，必要时还给予主动配合。我军与部分东北军的关系，由于顽固派的挑唆，曾一度比较紧张，这时亦已好转。八月三日，驻甲子山的东北军一一一师在师长常恩多与苏鲁战区驻该师代表、战区政务处长郭维城（常、郭二人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宣布起义。事前，朱瑞对该师的领导

^①1981年7月24日访问杨东升记录。

^②《少奇同志走后山东各方面情况的变化》。

人和地下党组织曾做了大量工作；起义的第二天，他就立即赶到驻地，同领导起义的郭维城等会晤，帮助他们解决了内部意见的分歧，并对部队的行动方针作了明确的指示：起义部队继续保持一一一师的番号，开往根据地整训。但该师旅长孙焕彩等反动军官率部叛变，重组一一一师，并乘我换防机会，抢占了甲子山区。十二月十七日，我军以一一一师名义，组织了三个旅的兵力，在朱瑞和罗荣桓的直接指挥下，向盘踞甲子山的孙焕彩匪军发动了第三次反击，歼灭孙部两千多人，收复了甲子山区，使长期被分割的日照、莒县和泰（安）石（臼）公路以南地区的根据地联成一片。“八三”起义是在我敌后根据地最困难的情况下发生的，它不仅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共政策，而且对我控制甲子山区和进一步发展滨海根据地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对敌斗争方面，分局和朱瑞、罗荣桓根据中央“隐蔽发展，分散活动，积蓄力量”的指示，针对日寇的所谓“总力战”方针，适时改变了对敌斗争策略，提出了“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为辅”的战略指导方针，以分散的游击战争和全面的政治攻势，对付敌人的军事“扫荡”和全面蚕食，领导军民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伪化斗争，运用挤、钻、打、赖等战术，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动政治攻势，利用日伪间日益暴露的矛盾，大力加强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运用各种有效方式，促使伪军立功赎罪，弃暗投明。

一九四三年三月，朱瑞在山东军政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九四二年敌我斗争形势与对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总结了过去一年对敌斗争的经验。报告要求“巩固扩大已有的工作成绩”，“打破地区性、部门性的限制，建立经济、文化、除奸部门的

对敌斗争工作，把对敌斗争发展为全面的工作与群众性运动。”这个报告和罗荣桓的《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报告，成为指导山东军民在新形势下进行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

一九四三年五月，东北军经过一九四二年夏季和一九四三年春季日寇两次大“扫荡”，损失惨重，要求撤离山东。蒋介石对于学忠及其所指挥的东北军不积极反共早怀不满，从一九四一年起，就要李仙洲的九十二军准备进驻山东，所以很快就批准了于学忠的要求。分局和朱瑞、罗荣桓等“及时接受了过去的经验教训，灵活地密切地掌握时机及斗争策略，尤其是动员各阶层，依靠群众，荫蔽自己，争取友军，首先是利用于李矛盾空隙，乘于出鲁，拒李深入，因而得以乘机掌握沂、鲁等山区，接着又打退了李仙洲，终于打开与改变了山东多年来三角斗争中我党我军的劣势局面。”^①经过这场斗争，长期被分割的沂蒙山区根据地终于连成一片，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胶东、清河、鲁中、滨海等主要战略区的联结。正如朱瑞自己所说的：“这些发展与转变，已光辉的完成中央指示之任务，并更好地创造了今后山东的巩固、坚持及发展的有利基础。”^②

朱瑞主持山东工作的四年，正是华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处境最艰难的四年，不但要对付敌人的“扫荡、蚕食、封锁、分割”，还要应付所谓友党友军的“不明大义，风波横生，交相煎迫”^③。在敌我友矛盾错综复杂，斗争极其尖锐的环境中，朱瑞统筹全局，坚持敌后抗战，历尽了艰辛。当年的山东

①②朱瑞：《自传》。

③朱瑞：《保卫山东的英雄》序言。

分局委员、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说：“他在坚持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党和军队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是有成绩的；他特别善于统战工作，直接用电台同东北军联系，也很注意做敌、伪军内部的分化瓦解工作；对顽固派的斗争一般也是正确的。刘少奇同志指示后，他知道自己和群众工作方面错了，亲自到滨海区去发动群众，减租减息，表示改正错误。”^①原分局委员江华认为：“评价山东工作，不但要看当时，还应当联系解放战争。山东在三年解放战争中的贡献是突出的，……基础是抗日战争时期打下的，这个基础是同朱瑞在山东的四年工作分不开的。”^②

延安整风 严于责己

一九四三年九月，朱瑞奉命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由罗荣桓接任。

“七大”召开之前，先后到延安的各地代表，都集中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两条路线斗争史，进行整风。当时，党校建立了十一个学员支部，其中三、六两个属于高干支部，地方省委书记和部队旅以上干部编入这两个支部学习。朱瑞于一九四四年二月进入党校，和马文瑞、贺炳炎、韩先楚、郭鹏、陈先瑞、邓克明、韩东三、任志远等编在六支部。对于学习，朱瑞一向抓得很紧，不论是在烽火连天的苏区年代、披荆斩棘的长征路上，还是在戎马倥偬的敌后反“扫荡”岁月里，从没有放松

①1981年3月访问黎玉记录。

②1981年4月访问江华记录。

过。他时常提醒自己：“应当学习，应当时刻学习。在每一步斗争过程中，在自由和在监狱里，都要学习；只有学习，才能斗争。”^①这次能有机会让他脱离工作，到党校集中学习，他感到“机不可失”。一开学，他就给自己提出了“三个必须”的要求，即必须提高、必须苦练一番、必须重新更始。

这时，中央正组织干部学习“六大”文件，结合学习，总结“六大”以来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学习内容非常丰富。朱瑞由于工作上的原因，进党校的时间比别人晚了许多。为了在学习进度上与早来的同学取齐，他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每天夜里，他都事先准备好一盆凉水，深夜别人都熟睡了，他还在聚精会神地学习，困倦时，就把头放在凉水里泡一泡，待头脑清醒后，又继续看书、写笔记^②。除了学习中央规定的文献外，他还挤出许多时间，广泛阅读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有关著作。

朱瑞说：“我不是主观主义的埋头书本学习，而是尽量照顾到从书本到工作，从校内到校外，从领导到同志、到边区、到各地，到时事政策。”这种学习方法，“大大启示了我，增益了我的学习和进步，……而每一步都是经过思想上的斗争。”^③这说明，学习中他很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尤其是通过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从中找出经验教训，不断提高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鉴别能力。

^①朱瑞学习笔记。

^{②③}1980年6月4日访问毛鹏云记录。

一九四四年七月，朱瑞担任第六支部书记。由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康生等掀起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审干肃反扩大化，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朱瑞按照党中央的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禁止逼供信的审干方针，先后主持了第六支部和党校二部一些支部的纠正肃反扩大化的甄别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得到党和同志们的好评。

一九四四年冬，党校整风学习进入了联系实际、检查思想、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的阶段。

朱瑞认为：“总结的目的不是为了眩人，而是为了改造自己；不是为了说明，乃在实行。”^①在思想小结中，他联系自己的斗争经历，对照二十二个整风文件，从思想、政治、组织以及党性等方面，作了全面检查。他对自己的功劳、成绩，轻描淡写，而对缺点、错误，则是不厌其烦，反复检查，总感到自己“有负于党的重托”，“内心抱愧”得很^②。正如别的同志所说的：“那怕是很细小的问题”，他“也绝不轻易放过。”^③整风学习小组早在五月的鉴定中就已经指出：朱瑞“在中央苏区工作有成绩；虽为教条主义提拔，而不在教条宗派之内。”^④但他认为，这只是说明了“没有什么”，没有说明“有什么”，即“为什么会被教条主义所提拔？”他自我解剖道：“除了有莫斯科留学生的标号，有一定工作能力，做了许多工作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我的思想方法是教条的，颇投他们的口味。”^⑤接着，他就从阶级出身、社会影响、斗争经历等方面，检查了自己产生主观、教条的原因。

①②朱瑞：《整风学习思想小结》。

③④⑤党校第六支部对朱瑞的鉴定。

在整风中，朱瑞既能严格自我解剖，又能虚心接受意见，那怕是不正确的意见，也能本着“对己严，对人宽”的态度，正确对待。与朱瑞共过事的一位同志，当时也在党校学习，朱瑞总认为自己过去对他是“诚心诚意帮助的”，而这位同志则说朱瑞“一贯打击他”。这件事在学员中有一定影响，对朱瑞更是一个“震动”。许多知情的同志都认为那位同志对朱瑞的批评不公正，希望朱瑞能出来澄清是非。然而朱瑞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反躬自问：“即使你是正确的，对方为什么竟会如此误会呢？”“当着你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但不能解决问题，那么，这样的东西究竟又有何用处呢？”^①

一九四四年春，朱瑞在山东工作时的秘书毛鹏云也到党校学习。朱瑞分配工作前，专门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与毛鹏云促膝谈心，主动向他介绍学习的心得体会、山东工作时期的问题，以及自己的缺点错误。他语重心长地对毛鹏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过去都觉得我很了不起，甚至崇拜过我。……有些地方本来是我的缺点，反被你们误认为是优点了，这就可能影响你们的进步。我希望你们能用今天整风的眼光，重新认识我，从中吸取教训，放下肩上的包袱，轻装前进。”^②

一九四五年春，朱瑞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任山东代表团团长（开会前林彪列入山东代表团任团长，朱瑞改任副团长）。四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朱瑞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山东敌后抗战的专题发言。

①以上引文均见朱瑞：《整风学习思想小结》。

②1980年6月4日、11日访问毛鹏云记录。

建设炮兵 功勋卓著

“七大”闭幕后，中央决定朱瑞担任副总参谋长，协助叶剑英负责同美方和国民党的谈判工作^①。朱瑞当即去找毛泽东主席，表示自己过去在苏联学过炮兵，可以在炮兵建设方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起一个桥梁作用；副总长一职，请中央、主席考虑更适合的人选。他还向毛泽东汇报了如何根据我军实际情况，建设人民炮兵的初步设想。毛泽东对他这种主动考虑革命需要，以及在炮兵建设上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十分赞赏，鼓励他“放手做，做一个桥头堡。”^②不久，他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当时炮校的物质条件很不好，连上课用的粉笔都时常供应不上，只好用白土。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朱瑞和炮校政委邱创成等带领全校师生克服了重重困难，保证了教学、训练的正常进行。第一期学员一千多名于一九四五年九月毕业，成为后来我军炮兵的重要骨干。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延安炮校奉命迁往东北。按原计划，是接收日军的装备，招兵买马，组建一支新式的人民炮兵。但是，当十月下旬炮校师生抵达沈阳时，情况已发生了变化。这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调兵遣将，大举向东北进攻，我军即将撤离沈阳，炮校无法招生、开学。更出人意料的是，日本关东军留下的火炮，已被人运走或丢失。延安出发前，盛传日本关东军投降后的所有装备都留在东北，号称

^①1982年8月6日访问蒋天然记录。

^②朱瑞：《给刘亚楼的信》。

“大炮六千，车辆骡马无数，弹药器材堆积成山”，师生听了都恨不能肋生两翅，飞往东北。朱瑞临走时，朱德总司令还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他面交苏军远东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说明我军正在建设炮兵，请他大力协助^①。朱瑞到达沈阳后，立即向马利诺夫斯基转达了朱德的问候，递交了信件。但苏军方面只把一些破旧的没有运走的火炮移交我方，我方没有得到好的大炮。

朱瑞立即召集领导干部会议，告诉大家，由于情况的变化，原来的计划已经无法实现了。但是，中央关于“抓紧时机，获取敌人武器装备自己”的指示还要坚决贯彻执行；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我们更不能坐守等待，无所作为。他还说，日本关东军遗弃的武器装备，绝大部分还散落在各地，只要我们想办法把它收集起来，前途还是满光明的，问题在于我们要下决心去克服各种困难^②。经他这一指点，会场顿时活跃起来，与会同志纷纷出主意想办法，最后由朱瑞将大家的意见归纳为“分散部队，收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业”^③四句话，并把它作为炮校当时工作的指导方针。

在炮校党委和朱瑞的组织领导下，师生们分别组成小分队，奔赴东北各地收集武器。朱瑞先后两次亲自带车向苏联远东方面军交涉，索回了他们从东北拉走的部分火炮和弹药^④。他还通过当年莫斯科克拉辛炮校的同学、校友关系，从苏联一

^①1981年4月30日访问郭道同记录。

^{②④}1981年1月17日访问宋承志记录。

^③《炮兵战史》。

些部队弄回了十几门大炮^①。在炮校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共收集各种火炮七百多门，炮弹五十万发，坦克十二辆，汽车二十三辆，以及一大批器材、零件，从而为东北人民炮兵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依靠这些装备，东北我军迅速组建了六个乙种团、四个丙种团、六个炮兵营、二十个独立炮兵连，共计八十多个炮兵连；还组建了我军的第一个高炮大队、两个坦克队和一个修械所。

历史已经证明，朱瑞审时度势所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正如他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所说的：“历史时机，稍纵即逝（指国民党军队大举深入后就不能收集——引者），在那种形势下，如果强调集中等待，便会大大害着我们自己，坏了大事。”^②

一九四六年五月，炮校由通化迁往牡丹江。朱瑞估计到随着武器的收集，我军炮兵将会有有一个大的发展。他根据东北局“发动群众，建设壮大部队”的总方针，在组织炮校师生收集武器的同时，及时提出了“变学校为部队，拿部队当学校”的建议，将学校五百多名干部分散到东满、西满、南满、北满以及一纵和总部炮兵旅等单位，以开办学校的精神，对部队进行训练，培养了一批炮兵骨干，从而为炮兵的发展准备了干部条件^③。夏季以后，炮兵需要的骨干越来越多。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朱瑞请示东北军区后，将延安炮兵学校改名为东北军区炮兵学校（一九四九年为纪念朱瑞改名为朱瑞炮校），于一

^①1981年4月30日访问郭道同记录。

^②转引自《炮兵战史》。

^③1981年1月17日炮兵领导干部座谈会记录。

九四六年六月开学，并亲自为学校规定了“学与用结合”的教学方针。第一期招收学员二百八十名，编成一个重炮队、两个野炮队、两个山炮队。炮校限于设备，当时还无法培训高射炮、迫击炮和坦克的干部，他就分别责成有关部队进行培训。一九四八年辽沈战役前夕，东北军区炮校共培养了二千多名干部，不但满足了东北炮兵的发展需要，还为各兄弟军区输送了几百名的炮兵干部。

一九四六年七月，东北军区根据朱瑞的建议，及时成立了炮兵调整处，并任命朱瑞为处长，负责全军炮兵的调整工作。朱瑞随之代表军区颁发了炮字第一号命令。这项命令从我军炮兵初具规模，同敌人相比仍处弱势这一实际出发，提出了炮兵建设应贯彻“广泛普遍的发展和适当集中使用”的方针。据此，除立即着手建立军区预备炮兵外，要求各军区、纵队、师尽快成立炮兵团，在旅、团尽可能建立炮兵连。十月，他又代表军区颁发了第二号命令，决定撤销炮兵调整处，成立炮兵领导机构，任命朱瑞为司令员，邱创成为炮兵政治委员兼炮校政委，贾陶为副司令员兼炮校副校长，匡裕民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随后又正式成立了炮兵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并相继在各军区、纵队、师一级单位设立炮兵主任，军分区和炮兵旅设立炮兵参谋，专司炮兵的作战、训练、组织、装备等工作，使我军炮兵从上到下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指挥系统。一九四七年后，军区又先后颁布了第三、第四号命令，对部队的扩建、训练、作战等一系列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在发展炮兵过程中，朱瑞从战局的形势发展和需要以及“适当集中”的原则出发，着重抓了军区预备炮兵的重点装备工作。他将现有的火炮、器材重点装备炮司直属的四个预备炮

兵团，使有限的炮兵火力集中使用，最大限度地提高我军的攻坚作战能力。由于实施重点装备的计划需要相当一笔经费，仅靠炮兵自身的物力、财力是无法解决的，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决心和计划在东北局的会议上提出，并保证经费问题解决后在三个月内装备、训练出四个炮兵团开赴前方打仗。东北局的领导同志听了他的汇报后都大力支持，表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朱瑞也当场向东北局领导立下了“军令状”^①。会后，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专门给炮兵拨了六千多万东北币，作为实施重点装备的经费。

这以后，朱瑞一边抓装备，一边抓部队训练，工作十分认真。在制定装备方案时，他接连几天几夜同负责这项工作的郭道同等一起，拟定了几个方案，进行比较，甚至一个炮口帽需要几寸皮、几寸帆布，都作了精密的计算，从中选择出既省钱，又适用的最佳方案。当时部队驻地分散，各团之间相距数百里。为了搞好部队的训练，朱瑞经常深入到各团巡回检查、指导、督促部队的训练工作。在巡回检查中，他发现有不符合要求的地方，有时就亲自示范，亲自纠正。许多炮手，为了掌握夜间瞄准的本领，深更半夜还约同战友偷着到火炮旁练习操作。这年的中秋节，朱瑞又在基层检查工作。这一天，恰好是他和潘彩琴结婚四周年纪念日。他们俩于一九四二年九月结婚，由于斗争的需要，半年后即分开，直到不久前，潘彩琴才从华东到东北来。朱瑞为了工作，又没有顾得上回家和爱人、孩子团聚。他在当天给潘彩琴的信中解释了不能回去的理由之后写道：“为了人民的事业，就是这样有意义的过吧！因为

^①1981年4月24日访问黄登保记录。

——万万千千的人民不能团圆，万万千千的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中，万万千千的战士正在前线啊！以我们的分别来纪念他们的苦难及奋斗！”朱瑞这种公而忘私、一心为了炮兵建设的精神，对指战员鼓舞很大。在他的领导与部署下，广大指战员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训练，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了东北军区领导的好评。

一九四七年一月至四月，东北我军为了粉碎敌人先南后北的阴谋，改变东北战场的局面，先后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这次战役中，炮兵先后派出了七十多个连队参战。战役结束后，东北炮兵在双城召开了首次炮兵会议，对一年来的炮兵建设和作战进行总结。朱瑞在会上根据我军的历史环境、作战特点，结合广大指战员的实践和自己的体会，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我军当时情况的战术原则，主要是：集中使用火力，快、准、猛，攻坚作战，步炮协同以及直接瞄准、抵近射击^①。

朱瑞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总结出这些适合于我军作战的战术原则，首先在于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很注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三下江南时，他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有时甚至还深入到前沿指挥所和阵地上了解情况，观察敌情。其次，他善于吸收群众的经验和智慧，“就是在他分管后勤工作的时间里，他也总是利用战役间隙，把前线指挥员找去，听取历次战斗汇报，并多次找一些路过哈尔滨的营连干部谈话，开座谈会，了解前方作战情况和问题。”^② 另一方面，朱瑞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早

^①1981年1月17日炮兵领导干部座谈会记录和《炮兵战史》。

^②1981年6月22日访问张志毅记录。

在莫斯科炮校的时候，他就是出名的高材生，一到东北，他就尽可能广泛地收集有关炮兵的书籍，每次出发打仗，他宁可少带生活用品，但马列著作和炮兵专业书籍总是不离身。正如伍修权所说的：“他有无限学习新事物的进取心，他有埋头苦干钻一行的精神。”^①

由于朱瑞有丰富的实践，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又博采了前人、外人的经验，所以他才能从我军所处的历史条件，作战任务、特点，以及敌、我、友几方面的具体情况出发，清醒地指出：“我们炮兵战术不能全学苏联，又不能全学国民党，也不能照搬日本”，而必须从“我们人民的炮兵、劣势的炮兵，自然乃是中国的炮兵”这一实际出发，“创造中国的、劣势的、人民的炮兵自己一套既适合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炮兵战术，又不违背作为炮兵兵种古今中外作战的一般法则”的战术原则。

这些战术原则的提出，大大提高了炮兵的作战能力。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势中，东北我军在炮兵的强有力配合下，横扫拉（法）吉（林），攻占梅河口，进取昌图，包围四平，先后歼敌八万余人，收复县城四十二座，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场的形势。

一九四八年四月，东北炮兵经过一九四七年夏、秋、冬三大攻势后，又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二次炮兵会议。朱瑞在会上做了《一年来炮兵建设与作战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根据我炮兵一年来新的发展和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了炮兵战术原则。这些战术原则，对于我军的炮兵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其中如“快、准、猛”，步炮协同，集中使用火力等战术原则，直到今

^①伍修权：《悼念》，1948年10月23日《东北日报》。

天，仍然是我军炮兵火力运用的基本原则。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随着战争的发展，炮兵所承担的任务越来越重，前方的需求与后方的供应矛盾日益突出。有时，在战斗的关键时刻，由于后方的弹药供不上，本来稳操胜券的战斗，不得不中途被迫撤出。朱瑞看到这一情况后，深深感到只有加强后方建设，“才能对前方有所补益”，否则，“前方就会成为无米之炊”。于是他就留在后方，亲自着手解决后勤物资供应问题。他还提出了“团结一条心，主动办事情”^①的口号，号召大家动脑筋、想办法，群策群力，做好后勤工作。在朱瑞的直接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努力下，这一年的后勤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先后组建了迫击炮团、战车团、高炮团、炮五团和新兵团^②。一九四八年八月，东北炮兵已发展到十六个团，共有山炮、重迫击炮等各种火炮四千七百余门。

一九四八年七月，朱瑞参加军区讨论关于发动辽沈战役的计划和准备工作。会上，军区负责人决定留他在哈尔滨主持后方工作。他说：我是炮兵司令员，理应在前方指挥作战，前一个时期，由于后勤供应困难，我不得不到后方操持，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他表示要在解放东北的最后决定性战役中，到前方总结炮兵在大规模运动战和攻坚战中的作战经验。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八月，他到炮兵当时的集训地点烟筒山主持召开党委扩大会，对炮兵两年来的作战训练工作进行了初步小结；向到会同志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先从锦州下手的重大战略部署；并就打下锦州、沈阳后，部队的发展趋势以

^①1981年1月28日访问丁本纯记录。

^②1981年1月17日炮兵领导干部座谈会记录。

及如何做好进关准备等问题，向到会的同志交了底。

九月十二日，我军首先包围了义县。为了打好这一仗，炮兵进入阵地前，朱瑞亲自领着负责主攻的几个炮兵团长到前沿察看地形。由于距离敌人的据点很近，他们的一切活动，对方一目了然，走到那里，敌人的炮弹就尾随到那里，大家都为司令员的安全担心，而他却一路谈笑风生，边查看，边指点部署。直到察看完了全部阵地，他才回过头来对黄登保团长说：

“这些家伙也太猖狂了，你明天先拉两个连来，把那几门炮给我敲掉，先给他们来个下马威。”^①

十月一日上午，朱瑞下令发炮。第一颗炮弹呼啸一声划破长空，落在义县城墙上，随之各种口径的火炮一齐发射。顷刻间，城墙就被撕开一道四十多米宽的裂口。朱瑞见此兴奋无比，果断地下令炮火延伸射击。敌人经营多时的工事，全部崩溃。我三纵勇士在韩先楚司令员和罗舜初政委的指挥下，争先恐后沿着炮兵轰开的突破口，冲向城里同敌人展开巷战，不到六个小时，就将守敌全部歼灭，活捉了敌师长王世高，胜利揭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义县战斗在朱瑞的精心组织和亲自指挥下，炮兵在运用火力，步炮协同，开拓突破口方面，都取得新的成功经验，同时还建立了比较完整、系统的炮兵战斗程序。这次攻城战斗，炮兵使用了从敌人手里缴获的美国榴弹炮。朱瑞为了及时了解和总结炮兵开拓突破口的情况和经验在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就从指挥所出来，身先士卒向突破口跑去，不幸触雷牺牲。

^①1981年4月24日访问黄登保记录。

中共中央获悉朱瑞牺牲的消息后，立刻给东北军区发了唁电，电文指出：“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今日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中央特致深切悼念，望转告全军，继续为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以纪念朱瑞同志永垂不朽。”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一、中央组织部保存的朱瑞档案；中央、中央军委给朱瑞的电报以及朱瑞给中央、中央军委的报告。

二、朱瑞著述。

(一) 在《大众日报》上发表的：

1. 《相持阶段与统一战线》，1939年12月2日。
2. 《又是一种扫荡》，1940年2月22日。
3. 《纪念今年的“四一二”》，1940年4月10日。
4. 《山东青年的任务》，1940年5月4日。
5. 《抗战与干部》（抗大四周年纪念特刊），1940年6月1日。
6. 《巩固全国抗日军的团结争取最后胜利》，1940年7月16日。
7. 《联合大会闭幕后我们的任务》，1940年8月29日。
8. 《在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第一次行政会议上的政治报告》，1940年11月16日。
9. 《在山东各界庆祝十月革命节、纪念孙中山诞辰大会上的讲话》，1940年11月13日。
10. 《在“三八”妇女节筹备会上的讲话》，1942年2月18日。
11. 《在姐妹剧团成立会上的讲话》，1941年3月22日。
12. 《在省文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1941年5月10日。
13. 《中共山东分局号召全省人民开展十大建设运动》，1941年7月4日。

14. 《在国民党抗协、抗敌自卫军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1941年7月8日。
15. 《新战争、新形势、新任务》，1941年7月28日。
16. 《论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国际斗争的一致》，1941年8月1日。
17. 《纪念一一五师的十四年》，1941年8月1日。
18. 《扩大和拥护八路军，为建设山东而奋斗——在八一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19. 《悼陈若克同志》，1942年8月1日。
20. 《在山东分局整风学习中心小组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2年7月25日。
21. 《保卫山东的英雄》序言，1943年7月。

(二) 在《斗争生活》上发表的：

1. 《山东党的建设》，1940年第1期，
2. 《山东工作的新阶段》，1940年第5期。
3. 《山东党的建设问题》，1941年第1期。
4. 《抗战的山东，统战的山东》，1941年第11期。
5. 《一切为着消灭敌人》，1942年第14期。
6. 《关于改造支部工作的意见》，1943年第20期。
7. 《一九四二年敌我斗争形势的检讨及今后一年敌我斗争形势与对敌斗争的任务》，1943年第21期。
8. 《群众工作的领导问题》，1943年第24、25期。
9. 《论国民党——在山纵直属队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1940年。

(三) 在《军政杂志》上发表的：

1. 《论山东纵队的巩固》，第3卷中册第8期。
2. 《建设山东纵队中模范的团结的党和政治工作》，第3卷下册第9期。

(四) 其他：

1. 《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
2. 《滨海区十个月工作总结》。

三、朱瑞家属保存的材料。

- (一) 朱瑞延安整风时写的《自传》。
- (二) 朱瑞山东工作时期的四本日记。
- (三) 朱瑞给他爱人潘彩琴的 21 封信，给他母亲、哥哥的信。
- (四) 贺龙、关向应、甘泗淇等的题词。

四、回忆材料。

- (一) 洛甫：《忆朱瑞同志》；
- (二) 林枫：《忆朱瑞同志》；
- (三) 伍修权：《悼念》；
- (四) 刘居英：《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五) 贾陶：《悼念我们的司令朱瑞同志》；
- (六) 黄逸峰：《回忆朱瑞同志》；
- (七) 李尔重：《我失掉了一个教员》；
- (八) 朱丹：《永不磨灭的记忆》；
- (九) 顾绍雄：《祭文》；
- (十) 潘彩琴：《前进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 (十一) 唐铁田：《忆朱瑞在晋东南》；
- (十二) 张维汉：《忆民族英雄范筑先》；
- (十三) 徐运北：《国民党反动派怎样破坏鲁西北抗战》；
- (十四) 《彭德怀自述》第 215 页；
- (十五) 宋祥门：《血染沙场》。

五、其他材料。

- (一) 炮兵司令部：《炮兵战史》（有关部分）。
- (二) 济南军区：《山东军区战史》。
- (三) 肖锋日记（包括未发表的部分）。

六、访问。

徐彬如（回忆朱瑞童年时期）；
丁祝华、师哲、王智涛、王辩（回忆朱瑞在苏联学习时期）；
袁血卒、刘立轻、李挺（回忆朱瑞在地下斗争时期）；
莫文骅、曹里怀、肖锋、苏进、金如柏、李毅、王永励、耿万福（回忆朱瑞在红军时期）；

张赛洲、戈明（回忆朱瑞在“华干”时期）；
黎玉、江华、谢友发、刘居英、景晓村、郭维城、赵易亚、王建
新、毛鹏云、苏展、廖东升、仲星机、张建华（回忆朱瑞在山东
时期）；
马文瑞、杨枫、毛鹏云（回忆朱瑞在延安整风时期）；
宋承志、黄登保、苏进、丁本纯、郭道同、蒋天然、张志毅、杜
子舜、高克（回忆朱瑞在东北时期）的记录。

李 慰 农

青島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李慰农》编写组

李慰农于赴法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特派员、山东省委负责人、青島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他是一九二五年四月至七月青島日本纱厂工人三次大罢工的领导者，同年七月被反动派逮捕杀害。

(一)

李慰农，原名李尔珍，又名李味农，化名锄斧、王伦。一八九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生于安徽省巢县油坊郑村的一个雇农家庭。

油坊郑村座落在桴槎山东侧，只有十一户人家，四周池塘环绕，土地肥沃，堪称“鱼米之乡”。但是，在帝国主义掠夺和清政府的统治下，这里也同各地农村一样，陷于贫困境地。

李慰农的祖籍江苏省句容县，迁安徽油坊郑村定居已久。祖父李春林地无一垅，房无一间，全靠帮工养家，中年亡故。父亲李树泉早年奔波于芜湖一带打短工谋生，后与邻村韦氏女完婚，生四子、二女，李慰农居长。

李慰农刚满两岁时，父母就把他送到外婆家寄养。稍长，因敏而好学，博得外婆全家喜爱。外公读过几年私塾，常常教

他念书识字。

一九〇四年，九岁的李慰农到十里外杨旺村韦树恒先生的门馆就读。

先生知道他家境贫寒，求学不易，就为他起了个“李尔珍”的学名，意思是要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李慰农没有辜负先生的希望，每日刻苦攻读。到快放年假的时候，他就成了杨旺村学馆的“学长”。

第二年春，李慰农转入山周村李福宜老先生的门馆，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一九〇七年，安徽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那年夏天，革命党人、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和秋瑾女士共同秘密组织了“光复军”，准备在皖、浙两地同时起事。七月六日，徐锡麟在安徽省会安庆枪杀了安徽巡抚恩铭，散发《光复军告示》，并亲率安徽巡警学堂学生攻打军械局。不幸寡不敌众，起义失败，徐锡麟被当局杀害。

这时，李慰农已考入设在拓皋镇的县立高等小学。徐锡麟被杀的消息传到拓皋后，这个小学的老师和学生无不义愤填膺。一天，他们在街头举行了一个讲演大会，四乡来镇赶集的上千群众都聚集到台下听讲。当首先登台讲演的郑畅初先生说到反动当局杀害徐锡麟后又挖出心肝“祭奠”恩铭的情景，禁不住声泪俱下，语言哽塞，再也讲不下去时，李慰农悲愤地跳上讲台，朝着听众拱了拱手，然后大声说：“父老兄弟们！同胞们！郑先生体力不支，请诸位听我讲几句。”他用激烈的言词抨击了祸国殃民的清政府，把徐锡麟比作文天祥而大加赞赏，还朗诵了徐锡麟的爱国诗：“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只解杀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一个十三岁的

孩子，在千人之众的集会上慷慨陈词，使听者大为惊讶和振奋。“李尔珍”的名字从此传遍了拓皋镇。

一九〇八年李慰农高小毕业，考入了全县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在这里，他除努力完成各科功课外，还阅读了许多新书，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康有为的《戊戌奏稿》、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谭嗣同的《仁学》和严复的《天演论》。这些书籍对他当时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九一一年，李慰农结了婚。妻子姓邱，是大邱村一个纯朴、温顺的农家女儿，同当时封建礼教束缚下的许多中国妇女一样，连个名字都没有。李慰农认为此理不公。他对妻子说：“你应当同我一样，也有一个自己的名字。你在娘家行辈是‘以’字，我的名字叫‘尔珍’，我俩同用一个‘珍’字，你就叫‘邱以珍’吧。”这件事虽小，但可以看出李慰农倡导男女平权的进步思想。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巢县时，李慰农非常兴奋。他和同学们高唱着“革命，革命，剪掉辫子反朝廷”的歌谣，带头剪掉了头上的辫子，走上街头，宣讲革命，宣讲共和。

就在这一年，李慰农中学毕业了。他回到家乡油坊郑村担任小学教师，白天到学校给学生讲课，晚上回家教妻子识字、念书。

一九一三年夏天，传来了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校招生的消息。李慰农自小生长在农村，热爱农民，热爱农业，儿时外公教他的“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农家诗，一直记在心田。此时，他毅然决定去芜湖投考农校，并将自己“李尔珍”的名字改为李慰农。

李慰农入省立第二甲种农校后，勤奋学习各门功课。第二年春天，他随同学由芜湖乘江轮往采石矶春游。望着雄伟东流的

江水，李慰农感到襟怀为之大开，遂吟成一首言志诗：

浩浩长江天际流，
风吹乐奏送行舟。
问谁敢击中流楫？
舍却吾侪孰与俦！

一九一八年，李慰农在第二甲种农校毕业。因学习成绩优异，被校方聘为管理员。

五四运动爆发后，李慰农在进步校长王谒儒的支持下，积极参加了芜湖地区的反帝爱国斗争。暑假期间，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著名的北方学界领袖马骏和韩致祥来到芜湖。李慰农虚心向他们学习，并一起交流了开展学生运动的经验。在马骏等的协助下，李慰农多方奔走，成立了芜湖各界联合会，领导工、商、学界举行罢市、罢课。

这时候，江西宜丰农民为反抗地主劣绅的残酷压榨，举行了著名的“芳溪暴动”。李慰农出于对农民的同情和关心，参加了声援活动。事后，他写了一份有关“芳溪暴动”的文稿，详细记述了这次农民暴动的始末。这件事，使他加深了对农民问题的认识。

不久，李慰农返回巢县家乡，担任小学教师，一边教书，一边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了对学生进行五四爱国主义教育，他用“三字经”的形式，编写了一份新教材，内容有：

卖国贼，曹陆章^①，

^①曹陆张指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

定密约，卖鲁矿，
关青岛，济潍张，
媚日本，国权丧，
君思想，更感伤。
愿同胞，细思量，
头可断，忠不让。

这篇只有二百余字的“新三字经”，启迪了少年儿童的爱国思想，使人经久不忘，油坊郑村一带的高龄老人至今仍能琅琅背诵。

一九一九年秋，华法教育会在省会安庆招考赴法勤工俭学生。李慰农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踊跃报名应考，并以安徽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他说服了父母妻子，很快赶到上海，准备出国。

(二)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时，李慰农一行乘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离开上海黄埔码头，经过三十五昼夜的航行抵马赛港后，又乘车向北，于一九二〇年二月二日晚到达巴黎。

巴黎这座世界名城，既是巴黎公社的故乡、革命者向往的地方，也是资产阶级享乐的天堂。李慰农来到这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法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历历在目。

经过多方奔走，李慰农总算在一家制造鞋刷子的工厂里，找到了一个临时工作的机会。他十分珍惜这个工资微薄的工

作,衣食住行无不从简。一天的紧张劳作之后,他抓紧时间补习法语,靠自己的勤奋学习,很快就能阅读法文版的《人道报》和其它介绍革命理论的小册子。他对革命导师马克思和列宁极为敬仰。为了能直接阅读和研究马列的原著,他又潜心自修了德语和俄语。

一九二〇年的七月五日,以先来法国勤工俭学的李富春、李维汉、张昆弟等湖南新民学会会员为主组织的工学励进会,在巴黎南郊蒙达尼公学的一间教室里,召开了为期五天的学术谈话会。李慰农以外省工学励进会会员的身份,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李慰农参加了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领导的要求“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抗议驻法公使陈篆等侵吞国内一些团体募捐的资助勤工俭学款项的“二·二八”运动^①。这次运动迫使陈篆不得不答应“借款维持”勤工俭学生的生活。

六月十四日,在离巴黎不过百里之遥的避暑胜地——枫丹白露的旅馆、饭店、学校和马路上,出现了一份由王若飞、李慰农、张增益等二十三人签名的传单,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派来一个代表团,向法国政府秘密借款的事件^②。传单说,他们名义上说是借款“救灾”,其实是购买军火打内战。

丑闻一经揭露,立刻在勤工俭学生和华侨中引起强烈反

① 《法国勤工俭学运动》(1)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1921年5月,北洋军阀政府派朱启铃来法,声称代表徐世昌接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实则来法完成借款之秘密使命。由于法国大银行家之间分摊借款不均,发生激烈争吵。消息传出后,引起爱国华人之强烈反对。

响。六月三十日和八月十三日，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及旅法各界侨胞，在巴黎著名的哲人大厅两次召开拒款大会，表示强烈抗议。在一片反对声浪中，愤怒的群众痛打了公使馆一等秘书王曾思。法国政府怕事态扩大难以收拾，被迫宣布暂缓贷款。拒款斗争的胜利，粉碎了中法两国政府的阴谋，这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斗争史上的一曲胜利凯歌。

一九二一年，可说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波澜突起的一年。还在拒款斗争之前的五月二十日，王若飞、邓小平、陈毅、刘伯坚、李慰农等二百四十三名勤工俭学生，就联名写信给陈策和国内的蔡元培，要求将筹办中的里昂中法大学改办为半工半读的工学院，以解决勤工俭学生的生活和求学问题。但是，这一正当要求却久久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到了九月中旬，突然传来了一个令人气愤的消息：原为勤工俭学生筹办的中法大学，却被校长吴稚晖玩了一个偷天换日的手法，暗地另从国内招来一批军阀、官僚和有钱人家的子弟，准备悄悄入学。这一倒行逆施，引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无比愤怒。在蔡和森、周恩来和李慰农等人的奔走呼号下，九月十七日，二百多名各地勤工俭学生组成联合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誓死争取里昂大学的决议。

当得知吴稚晖悄悄从国内招来的那帮富豪子弟预计于九月二十四日到达马赛、二十五日进入里昂中法大学时，联合会立即组织了二批“先发队”共一百二十五人，在蔡和森、陈毅和王若飞、赵世炎、李立三等率领下，于二十一日晨四时四十二分和七时先后到达里昂，准备抢先进入中法大学。但是，由于吴稚晖、陈策和法国当局对事态发展早就作了布置，致使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先发队员全部被法国警察拘捕，囚禁于芒特吕克炮

台的一个兵营中。

李慰农没有参加先发队，留在巴黎和向警予等人一起负责宣传联络工作。先发队员被拘禁后，他们赶印传单，在巴黎各处散发。李慰农在街头演说，控诉北洋卖国政府勾结法国当局对勤工俭学生的种种迫害，赢得了广大法国工人和市民的同情和支持。不少法国进步报刊报道了中国留学生的正义行动，有的还加印“号外”，给予有力地声援。

争夺里昂大学的斗争僵持到十月十三日。法国当局在陈篆和吴稚晖等的唆使、默许下，悍然武装驱逐被囚的先发队。蔡和森、陈毅等一百零四人被遣送回国。

事后，以四川留法同学会为首，发起为被遣送回国学友的募捐活动。李慰农以省吃俭用节约下的法朗慷慨相赠，是捐款数目最多的同学之一^①。

通过上述三次斗争，使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认识到建立一个严密的战斗性强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时刻来到了。

一九二二年六月三日，旅法、旅德、旅比的勤工俭学生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刘伯坚、余立亚、陈乔年、袁庆云、博钟、李慰农、王灵汉，肖朴生、肖子璋、汪泽楷、郑超麟、尹宽和任卓宣等十八人，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个小广场上，召开了旅欧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团组织定名为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三年秋冬间，中共旅欧支部成立，李慰农被批准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①四川留法同学在法出版的《工学月刊》第2期，1922年5月。

中共旅欧支部设立在巴黎南部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大街十七号。李慰农经常来这里与陈延年、周恩来等讨论问题，并请他们帮助修改他给团的机关刊物《少年》撰写的文章^①。李慰农在这些文章中，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有力地批判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等反动思潮，表现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与此同时，李慰农还同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在华工中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帮助华工们摆脱行会和帮口的束缚，建立起自己的统一组织——华工总会，出版了《工人旬报》和《新工人》等刊物。华工领袖袁子贞和马志远在他们的帮助教育下，先后加入了共产党。这些活动锻炼和提高了李慰农的组织才能，为他以后回国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提供了不少经验。

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李慰农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他说：“共产主义是一种极精辟的科学，不是容易懂得的。我们既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应当将这种主义的根本观念弄清楚，方略弄明了，制度弄熟悉，最重要的是根本观念——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马克思经济学说——然后才能固定他的思想，保持他的行动，虽然万苦千辛，不致中途变节。”^②

李慰农根据自己的这种认识，不仅大量阅读了马列主义著作，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虽然他这时对某些理论问题的认识还难免有些幼稚，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却是相当深刻的。

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他指出：“并不是说共产社会一定

^①罗章龙：《黄海帅旗李慰农》，原件存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②转引自〔日〕森时彦：《留法勤工俭学小史》。

要在资本主义制度发达之后才可能产生的，否则俄国革命并不应成功。”在经济落后的中国，“革命正轨也只有共产主义这条路”。“因为他是不背社会进化，合乎中国人民需要的。除此之外，不是错误，便是梦想”。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李慰农认为应该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他指出：由于“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外“就是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由于封建军阀横行，闹得“鸡犬不宁，生灵涂炭”，对内就是“打倒军阀”。李慰农还初步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他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半独立国家”里，在进行“共产革命之先，还有扶助民主革命的必要，因为他是政治上比较进步的革命，可以号召全国人民，可以合力打倒军阀，可以合力图谋独立。”

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李慰农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他说，工人阶级“人数虽不十分占多数，〔但〕他们的力量是最容易集中的，是可以直接与有产阶级交锋的，所以他们是共产革命的先锋军。”“中国是农业国家，农民人口占最大多数”，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他还把农民分成不同的阶层，提出要把农工、佃户和贫农都组织在农会之中。因为“农会是无产农民的保护机关与团结的基础，可以把农民引入政治斗争，可以用它来抵抗地主的剥削与官僚的压迫。”^①

李慰农的这些认识，在当时的旅法共产主义者中间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受到了周恩来等的高度评价和支持^②。特别是由于他对农民问题有较多的研究和深刻的论述，曾被同志们亲切

^①以上所引李慰农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述，均见《共产主义研究会通讯》第2—3期。

^②转引自〔日〕森时彦：《留法勤工俭学小史》。

地称为“农民博士”①。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李慰农和一些同志，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由周恩来从巴黎护送到柏林，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深造。在这里学习的，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十三期的同志，共一百二十三人，分为二十二个小组，李慰农担任第一组组长②，并取名厄尔曼。

李慰农到东方大学后，克服俄文基础差的重重困难，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和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等必修课程，他的成绩都得了优秀。课余，他还多次精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恩和列宁的经典著作，写下了一本本学习笔记。

当时苏联由于国内战争，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生活用品和食物极端短缺。东方大学的学员们，吃的是掺了糠菜的黑面包，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欧洲工人们捐赠的。为了御寒，晚上大家就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睡。李慰农的学习成绩，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取得的。

国共合作后，国内革命斗争需要大批干部，一九二五年，李慰农奉党的指示，离开莫斯科返回祖国。

(三)

李慰农回国后，党中央派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山东工

①罗章龙：《黄海帅旗李慰农》。

②聂荣臻的回忆，原件存青岛革命烈士纪念馆。

作。一九二五年春节，他由上海乘火车北上济南。列车通过安徽地境，窗外不时传来人们欢渡新春佳节的鞭炮声，李慰农不由得想起阔别五载的父母妻子。海外求学期间，他曾写过三十六封家书，倾吐他思念祖国和亲人的情怀。如今已经到了家门口，他多么想回去看望他们一眼呀。但他肩负重任，不能中途下车与亲人团聚，只好凭窗远眺，并反复吟诵南社诗人马君武的名句：“生儿奉祖国，岂为家室谋？”藉以自慰。

李慰农到济南，很快与中共山东省委接上了关系。他向省委机关的同志们传达了刚刚闭幕的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精神，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他还向大家介绍了苏联工人阶级为执行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而英勇奋斗的情况，使同志们深受鼓舞^①。接着，李慰农同山东省委的同志们一起，为贯彻党的“四大”决议，进一步开展工农群众运动而努力工作。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亲日派军阀张宗昌进入山东，整天忙于争夺地盘，一时无力顾及对工农运动的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为了加强对青岛工人运动的领导，于四月派李慰农去青岛，参加市委的领导工作。

李慰农到青岛后，在党的地下交通员陪同下，见到了市委书记邓恩铭。邓恩铭热情地欢迎李慰农，并向他详细地介绍了一九二三年以来青岛市党的组织建设、工人运动、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情况。李慰农对邓恩铭和市委前一段的工作，特别是对团结知识分子和争取新闻界的工作，深为赞赏，并表示要马

^①侯志：《回忆李慰农同志》（未刊稿），原件存青岛革命烈士纪念馆。

上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青岛的工业中心在四方、沧口一带。李慰农按照市委的决定，以胶济铁路总工会宣传指导员的身份，化名王伦，前往四方工业区。他平易近人，温和谦恭，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吃饭，很快就赢得了工人人们的信任。每逢下班，大家都往他的屋子跑，听他讲述革命道理；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也愿意向他倾谈。几天功夫，他就成了工人人们的知心朋友。

在调查研究、掌握情况的基础上，李慰农分别召开了四方机厂、水道局和大康、内外棉、隆兴等日本纱厂的党团员、工人积极分子会议，听取大家对今后工作的意见。不久，在四方机厂西公司的工人宿舍里，建立了四方村党支部，李慰农任支部书记。他重视党团组织的建设工作，每次听取各厂工运活动的汇报时，总要询问积极分子的培养情况。对于党支部确定的党员发展对象，他都要亲自审查、谈话，向其进行党的纲领、路线和纪律教育。大康纱厂的工人王中鹏^①，就是在李慰农的培养教育下吸收入党的，后来在罢工斗争中成了领导骨干。

李慰农十分注意对工人的教育，曾亲自向有文化的先进工人推荐《向导》、《中国工人》和《中国青年》等刊物。为了提高工人的觉悟和文化水平，在他的倡导下，四方、沧口和阎家山等地办起了多处工人夜校；水道局工人同乐会也改成了工人俱乐部和夜校，组织没有文化的工人学文化、学政治，他自己也经常到夜校为工人讲课。有些工人对罢工能否胜利信心不足。他先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说：从前，深山里有一只猛兽，经常出来伤人。开始，人们心不齐，一见猛兽来了，只顾

^①王中鹏即王云九，解放后曾任青岛市副市长。

各自逃命，跑得慢的就被猛兽叼去了。后来，他们看到这样不行，便团结起来操起棍棒刀矛，进山同猛兽搏斗，终于把猛兽打死了^①。讲到这里，他把话头一转，说：“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就好比这种猛兽。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够将他们打倒。”这番话对工人很有启发，原先认为工人斗不过资本家、罢工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人也说：“日本资本家所以敢欺负我们，就因为我们心不齐，是‘属小猪的，提溜谁，谁叫唤。’今后照王先生的话做，厂主准得害怕我们。”

李慰农生活十分简朴。山东省委每月发给他十四元的生活补贴，他舍不得花，节省下一大半帮助生活困难的工人。他关心工人，工人们也关心他。因为他安徽口音很重，工人们怕他在外面吃饭不安全，就主动把饭菜送到他住的工棚里。晚上他出去给夜校上课，工人们也争着保护他。

青岛市委书记邓恩铭自领导胶济铁路“二八”大罢工后，引起了敌人的注意，被迫离开青岛。邓恩铭走后，市委的领导重担，就落在了李慰农的身上。

(四)

当时青岛日本纱厂的工人，生活极端困苦。他们每天劳动十二小时以上，喝不到一点开水；一天挣的一角钱工资，只能买五、六个窝窝头，别说养家，连自己也吃不饱。把头、监工还肆无忌惮地摧残工人，稍不顺他们的眼，或是出了次布，轻

^①罗章龙：《黄海帅旗李慰农》。

则罚款，重则鞭子抽、棍子打，不少工人因此得病，而生病十天不到厂就被开除；童工、女工更为痛苦，干一样的活工资最低。为了争取工人自身的权利，在党的领导下，各厂先后成立了工会。一天，大康纱厂秘密工会的会员名册被军警搜出交给了日本资本家，资本家就逮捕了三名工人代表，并开除了工会的发起人。青岛反动当局对日本人这种非法行为不但不加制止，反而为虎作伥，派遣军警封锁了工人住处。全厂工人面对日本资本家及其走狗的残暴行为，奋起抵抗，提前停车收工，找日本厂主讲理，强烈要求释放工人代表。气焰嚣张的日本资本家根本不理工人的要求，还扬言要武力镇压。

李慰农听了大康纱厂工人代表、共产党员司明章的汇报后，对形势做了认真的分析。他认为奉皖两系军阀仍在加紧争夺山东，无暇顾及工人运动；日本资本家的野蛮暴行，已经从反面把工人动员起来了，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立即举行罢工。他说，罢工一开始就要针锋相对，不达胜利目的决不罢休^①。

司明章按照李慰农的指示，立即返回工厂，动员工人，准备罢工。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九日，大康纱厂工人吹响了青岛日本纱厂第一次大罢工的号角！罢工开始后，李慰农置身于工人中间，密切注视着日本资本家的动向。当天晚上，他就召开会议，研究和撰写《青岛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告书》，并派人油印散发，争取社会各个阶层的同情和支援。李慰农还组织了厂罢工领导机关，分设秘书、交际、会计、庶务、组织、宣传、交通、纠察、

^①丁菊畦回忆材料，存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讲演、捐款分配、军警接待等十一个部门。他对大家说：“一个厂的罢工胜败与否，关系到全市，影响到全国，不能有丝毫马虎。”

罢工领导机关向日本资本家提出了承认工会、增加工资、对工人一律平等等十六项要求。日本资本家不但拒不接受工人的合理要求，反而勾结青岛反动当局，调来大批警察和保安队包围了大康纱厂，强迫工人复工。接着，日本资本家又采取了断绝罢工工人伙食、封闭工人宿舍等恶毒手段，企图迫使工人屈服。但是，工人们毫不畏惧。他们在李慰农和罢工领导机关的领导下，虽然一天只能吃到六个铜板的食品，夜间露宿街头，仍然坚持罢工斗争。

日本资本家看到动硬的不行，又施展收买利诱、分化瓦解的伎俩。他们扬言：“凡在罢工期间内，照常上工者，每日加工资六成；在风潮开始后上工者，加赏工资八成；风潮将息先上工者，永久增加工资四成”^①。工人们看穿了日本资本家的阴谋诡计，没有人上他们的当。大家一个心眼，坚决跟他们斗，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

为了扩大罢工声势，李慰农派纪子瑞等去联络各厂工人，支援大康纱厂的罢工斗争，实现同盟罢工。经过串连、动员，内外棉、隆兴两个纱厂发表了《誓为大康纱厂工人的后援》的宣言。四月二十三日（农历四月初一）、二十四日，这两个纱厂的工友们，在共产党员阎思栋的带领下，高唱“乙丑年，大家起义，同盟罢工，四月初一。工友们，同心协力，建设团体，不受鬼子气”的“同盟罢工歌”，宣布罢工。

^①1925年4月30日《民国日报》。

接着，铃木丝厂和沧口的钟渊、富士等日本纱厂，也在共产党员王星五（后任青岛支联书记）的领导下，相继举行罢工。短短六天时间，参加罢工的总数已达一万八千余人。

罢工一开始，李慰农即派四方机厂党支部书记傅书堂，去拜访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吁请社会舆论支持罢工斗争。胡信之是国民党左派人士，在邓恩铭的帮助下，过去就为宣传国共合作和反帝斗争做过不少工作。他听了傅书堂的反映后，当即表示要站在中国工人一边，运用报纸这块阵地，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斗争。在胡信之的主持下，《公民报》专门在第一版开辟《工潮专载》栏，连续报道工人罢工消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反动军阀残酷镇压工人的罪行，给罢工工人以有力支持。《公民报》也因此引起各阶层人士的广泛重视，销量大增，由原来的每天只发行百余份，猛增到上万份。

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罢工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工人纷纷声援。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发表了联合宣言；全国铁路总工会也号召铁路工人“以实力相助”。

日本资本家怕罢工继续下去在经济上造成更大损失，要求青岛反动当局出兵镇压。四月二十五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也要北洋军阀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扑灭”青岛罢工风潮^①。但是，全市工人在市委和李慰农的领导以及全国工人的声援下，紧紧抱成一团，不畏强暴，英勇斗争。反动当局怕事态扩大，再不敢轻易采取武力镇压手段，罢工继续坚持着。日本资本家见镇压不能，自己的损失越来越大，只好在罢工的第二十二天，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改善工人待遇”、“抚恤受

^①参阅《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第4期。

伤工人”等九项复工条件。至此，大康、内外棉、隆兴等日本纱厂工人的第一次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

为了进一步显示工人阶级的力量，提高广大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勇气，李慰农通过大康、内外棉和隆兴三个厂的工会，于五月十日下午在四方召开庆祝罢工胜利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一万多人，会后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大长了工人阶级的志气。瞿秋白在《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中，对青岛日本纱厂第一次大罢工评论说：“这次青岛工运史上史无前例的大罢工，给日本帝国主义重大的打击！不但对于日本，并且对于各国帝国主义者都是很可骇惧的势力！”^①

（五）

五月中旬，刘少奇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之后，由青岛出席会议的代表傅书堂和伦克忠陪同，前来青岛视察工运工作。李慰农详细地向刘少奇汇报了青岛建党、工运和日本纱厂工人第一次大罢工等情况。刘少奇对于日本纱厂工人罢工斗争取得的胜利，给予很高的评价，而且对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青岛工人，表示十分关怀。他说：青岛的工人阶级经受两代帝国主义的压榨剥削，生活格外苦，应该团结起来，成立工会，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拳头，这样才有伟大的力量^②。对于党和工会的

^① 《向导》第119期，1925年6月22日。

^② 傅书堂、丁菊畦等的回忆材料，存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工作，刘少奇也作了指示：党的活动要严些，必须把工会工作抓起来。工会是工人的台柱子，工会要把全体工人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动，大家一起动；停，大家一齐停，有领导有组织地向反动势力作斗争^①。他还对李慰农等说：你们的工作做的很好。这次纱厂罢工虽然取得胜利，但你们一刻也不能忘记面前的帝国主义是只恶狼，反动军阀是条疯狗。我看纱厂很可能发生第二次罢工^②！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李慰农连续召开几次会议，对日本纱厂工人第一次罢工作了认真的总结。大家认为：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第一次罢工的胜利是暂时的，日本资本家决不会甘心失败。因为第一次罢工斗争持续的时间长、规模大，日本厂主在经济上损失极重，他们才被迫承认工人提出的某些条件。但这不过是他们的“缓兵之计”，是为了赢得时间，伺机向工人进行报复。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③。

事实证明这个估计完全正确。工人们复工以后，日本厂主不但不履行复工条件，反而制造种种借口向工人挑衅，并用收买拉拢等手段对付工人。对于领导大罢工的工会组织，日本厂主则十分仇视，极力造谣诬蔑。更有甚者，他们竟用手枪打伤数名工人，勾结军阀扣押了工会办事人员，还开除了工人代表五十余人。

日本资本家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工人们的极大愤怒。他们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全力支持工会开展的各项活动，各厂的工会组织不但没有被日本资本家压垮，反而更加强大和巩固了。李慰农在领导工人进行斗争的同时，预感到更大的风暴将要来

①②③傅书堂、丁菊畦等的回忆材料，存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临。日本资本家用经济和政治两种手段都没有能够使工人屈服，下一步很可能用武力镇压。因为亲日派军阀张宗昌在山东已经站稳了脚跟，日本帝国主义可以借用他的手，来对纱厂罢工工人进行屠杀。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李慰农所料。五月二十五日，青岛反动当局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决定先解散大康等三个纱厂的工会。李慰农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召开党支部会议，决定：工会文件一律收藏好，停止办公一日，派出纠察队传递消息，如果工会牌子被摘，一得到工会的命令，大康、内外棉、隆兴三个厂同时停车不出厂，直至牌子归还为止。

当天下午，青岛市警察厅厅长陈韬亲率大批军警包围了大康纱厂，摘去工会牌子；各纱厂的日本资本家也不断向工人开枪示威。这时，工人们忍无可忍。

大康等三个纱厂的工人，按照李慰农的指示，在陈韬摘去工会牌子不到一小时，就全部停车罢工，抗议日本厂主勾结警察厅镇压工人的罪行。当陈韬窜到车间向工人“训话”时，工人异口同声地对其进行斥责：“你陈韬是不是中国人？”“你得了日本人多少钱，跑来压迫我们？！”“工会是我们的第二生命，摘工会牌子就是要我们的命！”“不还工会牌子决不开工！”陈韬无论讲什么，工人们一概不听，坚决要求归还工会牌子。这个警察厅长被工人们围在厂里，一直到晚上九点多钟他下令归还了工会牌子，才让他溜走了。

第二次罢工使日本帝国主义大为惊慌。五月二十七日，日本驻中国公使芳泽约见北洋军阀政府外交总长，请求“急派在济南之山东督办张宗昌之军队”，去青岛“保护”日本纱厂。同时又威胁说：“如果中国不能取缔不法之暴动，则日本出于

自卫手段，实属势所当然^①。五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迫不及待地由旅顺口派出“樱”、“桦”两艘驱逐舰到达青岛；另由佐世保派“管内”、“点呼”两艘巡洋舰及“龙田”军舰，装载军需品及陆战队二百人，整装待发，准备随时开往青岛进行屠杀^②。卖国贼张宗昌也急忙给胶澳督办温树德（青岛市长）下达命令：“地方官究有维持治安的权力，有必要即可开枪”^③。五月二十九日拂晓，温树德调动军警和骑兵三千多人，包围了四方三个纱厂厂区和工人住处，封锁了交通要道。接着，便强行封闭三个纱厂的工会，勒令工人出厂。英勇顽强的工人手持铁棍，与反动军警展开了搏斗。此时，包围内外棉、隆兴纱厂的海军陆战队，接到了温树德口授的“打死人不要紧”^④的命令，便对工人开始了血腥大屠杀；日本人也躲在楼上，向人群开了枪，鲜血染红了工厂门前的草坪。在这次屠杀中，有八人牺牲，十七人受重伤，七十五人被捕，三千余人被押解回原籍；被日本人暗杀的和不知下落的不计其数^④。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反动军阀制造的震惊中外的“五二九”青岛惨案。

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第二次罢工斗争被反动派残酷镇压下去了。为了积蓄力量，以利再战，李慰农和罢工委员会经过研究，决定忍痛复工。

（六）

青岛惨案发生的第二天，英、日等帝国主义又在上海制造

①②1923年5月29日《申报》。

③④《山东省志资料》1962年第2期。

了屠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这两大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无比仇恨，在全国范围内很快掀起了反帝爱国斗争的高潮。

李慰农及时给刘少奇写信，向中华全国总工会汇报了青岛惨案发生的情况。针对有些人在惨案发生后一时出现的消沉情绪，他指出：敌人对我们工人的镇压和屠杀，并不能说明他们的强大，而是一种虚弱的表现。鼓励大家的斗争勇气。在实际工作中，他则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改变了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以避免无谓的牺牲。在他的领导下，青岛市成立了青沪惨案后援会，并以四方机厂工人积极分子为主，组成募捐宣传队，分赴青岛各区和胶县、高密、坊子、张店、济南等地宣传，揭露惨案真象，控诉帝国主义勾结反动军阀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这些宣传活动提高了工人、学生和农民的爱国热情，增强了各界群众的团结，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援。贫苦农民听了宣传后，纷纷挥泪捐款捐粮，援助受难的工人兄弟。当时在青岛大学读书的罗荣桓等，发动学生义演募捐，劝销戏票，收入一千二百多银元，全部接济了死难工人家属。罗荣桓还受学生自治会派遣，赴上海报告青岛惨案经过，得到上海工人、市民的大力支援。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也汇来捐款二千二百元，救济失业工人。全国各地各界人民的声援和救助，对正处在困难之中的青岛日本纱厂工人，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在李慰农的鼓励和帮助下，胡信之主持的青岛《公民报》，继续以大量篇幅报道全市和全国人民支援罢工工人和罢工工人同日本资本家顽强斗争的消息。在罢工受挫、白色恐怖笼罩青岛的时刻，《公民报》竟冒最大风险，连载发表了《共产党宣

言》。这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鼓舞工人斗志，起了重大的作用。为此，胡信之曾多次受到当局“警告”，他却毫不在乎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之后，中共青岛市地方执行委员会和李慰农又领导青岛工人，从六月五日起，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进行了新的斗争。六月五日那天，四方机厂的一千七百多名工人，沿着青岛市各主要街道，举行游行示威。他们冲破军警的阻拦，冲向青岛警察厅和胶澳督办公署，强烈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沿途围观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等都深受感动，纷纷自动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显示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反帝决心。八日，青岛地委发起成立上海事件后援会，并发表了四项决议^①。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响应党的号召，为实现四项决议举行了罢课示威。十日，举行青岛市民大会。十一日，全市七千多名学生再次示威游行。十六日，全市各界三万多人召开雪耻大会，强烈要求胶澳督办公署对日、英严正交涉，立即释放被捕工人；并号召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英货物。青岛职业学校的学生还编排了《五卅血》等话剧在街头演出。十七日，青岛总商会召开各界联合会，工人、学生代表在会上提出“对日经济绝交”的严正声明。这个声明遭到同日本纱厂资本家在经济上有联系的青岛纱布商业资本家的反对，他们提出经济绝交“只对英不对日”的荒谬主张。工人、学生代表根据李慰农预先的

^①四项决议是：（一）誓死援助上海工商学界；（二）对英、日实行经济绝交；（三）为促进同胞的觉醒，召开国民大会；（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

指示，严正驳斥了这一奇谈怪论。争论一直继续到深夜十二点，这些商业资本家才被迫接受了对日经济绝交的主张。六月三十日，青岛各界三十余个团体一万多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追悼青沪汉粤各处死难烈士大会。上述这些斗争的胜利开展，充分显示了李慰农的组织才能。

如火如荼的反帝爱国斗争，在经济上、政治上给日、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日本资本家施展种种诡计，对青岛市各界联合会进行分化瓦解。他们利用联合会内部的资产阶级亲日派代表人物进行捣乱破坏，并派青岛警察厅督察长以“政界代表”身份打入联合会，妄想加以操纵。为了有利于斗争，中共青岛市地方执行委员会研究决定：我党立即退出该会，由李慰农和傅书堂等另行筹备青岛市各界外交促进会。青岛市各界外交促进会成立后，团结了广大群众，但规定“不准买办资产阶级参加”。从此，原来的“联合会”成了空架子，失去了作用。与此同时，李慰农等又以胶济铁路总工会和各纱厂工会为基础，联合另外一些工厂的工会，成立了青岛市总工会。这个组织的建立，使青岛各方面的反帝爱国力量都汇集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向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势力猛烈冲去。

(七)

青岛惨案发生后，青岛的日本资本家反动气焰更加嚣张，对工人的剥削、压迫更为残暴。他们规定，在厂内不准两人偶语，上厕所必须有人跟随，取消每天工间的三十分吃饭时间，还经常无故打骂、开除工人，造成工人大批失业，生活无着。经过两次罢工斗争锻炼的青岛工人，怎能忍受外国资本家

这种欺压和凌辱？他们“虽明知刀钯在前，但除此实无求生之路，只有拚命作一最后的斗争^①”。青岛地委和李慰农决定，组织发动日本纱厂工人举行第三次罢工。七月二十三日大康纱厂罢工开始后，李慰农又派人联络内外棉、隆兴两个纱厂。这两个厂的工人于二十四日奋起响应，并发表联合宣言，提出如下十条复工要求：一，承认工会为代表工人的机关；二，厚恤死伤者家庭，死者每人三十万元，重伤者一万元，轻伤者五千元；三，恢复一切失业工人的工作；四，增加工资，日工加薪百分之二十，包工每人加薪百分之二十五；五，实行上次罢工所承认的条件；六，休工工资照发；七，罢工工资照发；八，不得开除工人代表及工人；九，房费一律免收；十，承认条件须由厂主、工会及证人签字盖章。

日本纱厂工人第三次罢工刚刚兴起，李慰农得知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张宗昌要到青岛来的消息。他认为：张宗昌此时来青，决非游山玩水，很可能要对青岛工人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于是，他立即指示党的各级组织和工会，要作好应付事变的准备。七月二十五日，张宗昌窜到青岛。当天晚上，日本驻青领事、日本纱厂资本家和青岛买办资本家等，花了六千元（当时每袋面粉价为一元九角），在东莱银行客厅盛宴张宗昌，并以三十万元巨款作为张宗昌镇压青岛工潮和杀害李慰农的“订金”。胡信之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在七月二十六日的青岛《公民报》上予以揭露，搞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狼狈不堪。敌人恼羞成怒，扬言要立即逮捕胡信之。胡信之毫不畏惧，又在《公民报》上发表了《胡信之紧要声明》，略谓：

^① 《工人之路》第53期，1925年8月16日。

“鄙人以一介书生，与帝国主义下之资本家战，为争社会之正义死，在鄙人死得其所。然光脚不怕穿鞋的，我不得其死，彼又安得其生。此后如衅自彼开，或阴谋暗算，鄙人亦唯有与之周旋而已，幸各界其垂察之”。这份声明表达了我党这位朋友“不为势强”、“不为利诱”，誓与青岛工人团结战斗的决心。

张宗昌接受了帝国主义和中外资本家的收买，当即指使爪牙派出大批军警和保安队，对罢工工人进行严密的监视，使工人们失去行动的自由。

事态危急。李慰农于七月二十六日晚在小鲍岛秘密召开会议，听取有关方面的汇报，部署应付事变的对策。会议进行中，傅书堂发现敌警活动异常，劝李慰农要小心提防。李慰农说：“不用考虑我，目前刻不容缓的是大家都要警惕起来，保卫工会！”就在这天夜晚，便衣军警已将四方村河西岸一带严密包围，并挨门逐户搜查。李慰农在会议结束返回住处的途中，看到了这一紧急情况，判断敌人是为抓他而来的。当时，敌人并没有发现他，如果要躲避，还完全来得及。但是，他想到家中还有党的一些机密文件没有处理，便冒着生命危险赶回住处，用桌子将门顶紧，然后把所有的文件点火烧掉。当反动军警拥进他家时，地上只剩下一堆灰烬。李慰农被捕了。

七月二十七日，张宗昌又命令他的后防司令任锡吾，率领大批军队和保安队包围大康、内外棉、隆兴三个纱厂，封闭了胶济铁路总工会、胶济铁路沪青惨案后援会和青岛市总工会，捣毁了四方机厂和各纱厂工会；并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的除李慰农外，还有胡信之、赵石恪等三十八人。

李慰农被捕的当天深夜，被敌人押往泰安路军法处办公大

楼审讯。敌军法处长袁致和开头就说：“你可知道，毁了日本人的买卖，张督办（张宗昌）是不答应的！”又问李慰农到青岛的目的是什么？李慰农斩钉截铁地回答：“青岛是中国的青岛，是山东的咽喉。我要和青岛人民一道，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袁致和以死来威胁李慰农，说：“看你长了几个脑袋！”李慰农毫不示弱地说：“我只有头一颗，然而革命党是斩不尽杀不绝的。”袁致和要李慰农供出在青岛的“同党”。李慰农说：“青岛的工人全是我的同党。”这时，敌人把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胡信之用大竹筐抬了进来，企图吓唬李慰农。李慰农走上前去，轻轻扶起胡信之的头，一边呼唤他的名字，一边用衣袖擦拭他那苍白脸上的血迹。胡信之睁开眼睛，认出是李慰农，就用双手紧紧抱住李慰农的胳膊。李慰农压抑不住心中怒火，转身向敌人喝道：“你们在胡先生身上得不到的东西，也休想从我这里得到！”

敌人无计可施，就把李慰农拖到地下室，用浸透水的皮鞭轮番毒打，昏死过去，用凉水泼醒再打，最后连臀部的肌肉也打脱了。但是，这位身体消瘦、意志却无比坚强的共产党人，始终没有呼喊，没有流泪，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

敌人害怕公开处决李慰农会引起新的罢工怒潮。于是便在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凌晨，将李慰农秘密押赴刑场。李慰农是青岛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和他一起遇难的，还有党的忠实朋友、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

一九二五年八月初，李慰农牺牲的消息传到上海，正在参加中共中央常委会议的同志们，全体起立向李慰农默哀致敬，并决定宣传他的事迹。中共北方区委曾秘密召开追悼大会，表彰李慰农对革命的贡献。党的刊物上发表了纪念他的文章。全

国铁路总工会出版的《革命战士集》中，也为李慰农立传，永示悼念。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巢县人民革命斗争史》。
2. [日] 森时彦：《留法勤工俭学小史》。
3. 《李氏宗谱》第1—2卷。
4. 《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
5. 罗章龙：《黄海帅旗李慰农》。
6. 《中国工运史料》第1、2、3、4期。
7.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8.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1）、（2），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编。
9. 青岛市委党史编办印：《1925年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
10. 张云汉、张伯英编：《青岛工人运动简史》。
11. 《山东省志资料》第3、4期。
12. 胡汉本、田克琛：《五卅运动在山东青岛地区的爆发及其历史经验》。

周文雍

甄硕欽 温佩兰 夏琼琼

头可断，肢可折，
革命精神不可灭。
壮士头颅为党落，
好汉身躯为群裂。

这是广州起义的英雄周文雍一九二八年初被反动派杀害前写在监狱墙壁上的一首不朽诗篇。

周文雍以这首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诗，表达了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表现出他在手执屠刀的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

积极上进 追求真理

周文雍，乳名光宏，一九〇五年八月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茅冈下洞凤凰里（又名宝顶村）的一个贫穷塾师的家庭里。

周文雍的父亲名叫俸成，读过几年书，在茅冈的一个村上的私塾执教；母亲关氏，养了二男三女。一家七口，靠周俸成的微薄收入维持，衣食十分粗淡。关氏是一位慈善贤良的妇女，日夜操劳，替别人纺纱缝衣，弥补家用。尽管这样，仍然

难以度日，三个女儿年纪很轻便出嫁了；大儿子卖身当“猪仔”去外洋，后积劳成疾，丧生于异国的荒野。

周文雍七岁时，就跟着父亲到私塾去识字、读书。他爱听父亲讲《三国演义》和文天祥的事迹，常为生动的故事情节所感动，立志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人。

辛亥革命后，到处兴办新学。茅冈南面的横石乡办起一所新式小学。父母亲为了周文雍的成长，一定要让他去接受新学问。于是，他就进了横石乡小学读书。

茅冈与横石之间，有潭江相隔，路程较远，上学较困难。但周文雍从不误课，从不偷懒。他学习成绩优异，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两年时间，他就读完了初小四年的课程，升入了高小。可是，家里生活越来越困难，已无力供他继续上学。他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开学前跑到茅冈墟，找到开小杂货店的一位同村叔叔，恳求收容自己当一名“伙头仔”。那位叔叔平日很了解周文雍，同情他家里的景况，便满口答应了他。从此，周文雍白天到茅冈墟小杂货店做工，以弥补家庭收入的不足；晚上返回家中，在灯下勤奋自学。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岭南，周文雍开始接受新思潮的影响，向学校提出请求复学。学校校长同意了他的要求，并决定免收他的学费，让他帮学校伙房做杂务，以便解决他的吃饭、住宿问题。他虽然停学大半年，但在高小毕业考试中，仍然获得全校第一名^①。

这时，周俸成受聘到宝兴村去教村学。高小毕业后的周文

^①周文雍故乡老人回忆周文雍烈士少年时代的情况记录，存开平县委党史办。

雍，就跟随父亲到宝兴村当了小先生。村学的课程实行新旧结合。周文雍除了搞好课堂教学外，还带领学生开展课外活动，学习时事新闻，进行文娱体育活动，培养学生的多种兴趣。他带头剪掉辫子，又动员学生剪掉，终于使整个村学没有留辫子的男学生，气象焕然一新。这时，周文雍更加关心时事，他的一点零用钱，全都用在订报刊、买新书上，还经常和学生一同唱反帝爱国歌曲^①。

“五四”以后不久，周文雍得到亲友们的资助，离开家乡到广州谋求出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自学，他于一九二二年秋，以中学同等程度学历，考入了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②。

省立“甲工”学校是一所富有革命传统的学校，被誉为“红色甲工”。“五四”运动期间，广州学生运动的领袖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铭等，就是“甲工”学校第一、二届的学生。周文雍是第三届学生，入学之初，为了争取优异成绩，他一心攻读功课，很少参加其他活动。但是，“红色甲工”的革命风暴，很快就使他投入了革命洪流之中。

不久，“甲工”第一届学生、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等毕业了。他们离校后，在组织团体、宣传马列主义的时候，把自己油印的《共产主义ABC》、《阶级斗争浅说》等书籍和《向导》等刊物送回了母校。周文雍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刊，逐渐懂得了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

^①访问周文雍故乡老人和周文雍侄女周美凤、继子周荣植的记录材料，存开平县委党史办。

^②周文雍的同乡、“甲工”同学邓湖秋、司徒慧敏的回忆材料，存开平县委党史办。

的不合理现象，使大家有饭吃，有书读，有工做，有田耕，过幸福的日子，就必须消灭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阶级的统治。

“甲工”的第一、二届毕业生为了推动校内外革命活动，创办了《甲工校友专刊》。周文雍积极给这个刊物投稿，阐述自己求上进的抱负^①。学校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发现周文雍是个有理想的青年，指定蒋世明对他进行培养和教育。他积极靠拢团组织，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②；同年暑假期间，又担任“甲工”的团支部书记^③，在革命的道路上迈开了有意义的一步。

周文雍在校内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很得同学们的信任和拥护。一九二四年春，他又担任了“甲工”学校学生会主席，并被推选为广州学生联合会的文书部副主任^④。在追悼世界革命导师列宁逝世、纪念“二七”惨案一周年、反对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的收回关余运动、援助广东公医医科大学择师运动和发起组织广州各界非基督教大同盟、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一系列革命斗争中，周文雍和他领导的广州学联文书部，承担着起草宣言、通电，印发传单，编辑《会刊》等繁重的宣传鼓动任务，每一项活动都完成得很出色，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在一九二四年十月五日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粤区代表会议上，周文雍和杨石魂、刘尔崧等七人，被选为团的粤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

①②③周文雍在“甲工”时的同学邓湖秋、司徒慧敏和蒋世明的回忆材料，分别存开平县党史办和广州市民政局。

④陈志文：《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运动》，广州文史资料第18辑。

周文雍参加的社会活动虽然很多，但他一直没有放松自己的学习。有时因开会或工作缺了课，他一定想方设法请老师或同学补课。因此，他的学业成绩一直保持优良，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

“甲工”的校长萧冠英是一个顽固守旧分子。他利用职权，强调“学生要守法”，压制校内的革命运动。周文雍团结进步师生，多次与萧冠英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五年夏天，广州的选举市长活动，被一些反动政客操纵。周文雍在群众集会上演讲，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这场丑剧内幕。萧冠英乘机报复。在学校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他为市长候选人大吹大擂，指责周文雍是“胡闹”。周文雍毫不示弱，当即跳上讲台予以驳斥，并要求把选票当场发给师生，让师生选举自己信任的人。萧冠英恼羞成怒，便在这年暑假贴出告示，以“参加社会活动过多，旷课严重”、“无心向学”为理由，开除了周文雍的学籍^①。

激流勇进 斗志昂扬

周文雍离开“甲工”以后，组织上安排他到新学生社工作。

新学生社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两广区委员会成立后，在广州建立的团的外围组织，有社员五、六千人，遍布粤、桂、闽三省各地，阮啸仙任执行委员会书记，社址与团的两广区委一起，

^①邓湖秋、林增华、蒋世明的回忆材料，访问司徒慧敏的记录，均存开平县委党史办和广州市民政局。

同设在广州司后街（现越华路）的一幢楼房内。周文雍到新学生社后，与阮啸仙、刘尔崧等同住在这幢楼房里。

当时，中共广东区委的谭平山、彭湃、杨殷、谭植棠等，常到新学生社来活动。周文雍得以与他们结识，特别是与年轻的共产党员阮啸仙朝夕相处，对他的进一步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二三年十月，周文雍以青年代表身份参加了阮啸仙组织的以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新学生社社员为核心的青年慰劳队，赴石龙镇前线慰劳反击军阀陈炯明的军队。当慰劳队到达石龙铁桥的时候，敌人以机枪封锁了通道。周文雍等在阮啸仙指挥下，机智勇敢地冲过铁桥，进入镇内，还夺得了敌军的一挺机关枪。这次慰劳，对前线将士鼓舞很大，也使周文雍受到了锻炼^①。一九二五年，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旋被选为党的区委工委委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委员、学生部主任、广东区委委员、工农主任、经委书记，并担负新学生社内团组织的领导工作^②。

为了大力开展群众工作，青年团和新学生社发起搞平民教育运动，在广州办起了三、四十所平民夜校，吸收工人子弟和贫苦失学的青少年参加学习。周文雍带领广州市女师、一中学生在西村工人宿舍附近办的一所平民夜校，吸收了自来水管的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青年船工共几十人参加学习，对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帮助他们增长文化科学知识，动员他们积极

①陈志文：《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运动》。

②《团广东区委选举结果》（1925年10月27日—29日）、《团广东区委书记杨善集的报告》（1925年12月27日）、《团广东区委组织部报告》（1925年1月1日—2月1日、4月25日），存广东省档案馆。

参加各项政治运动，起了很好的作用^①。

针对青年的特点，新学生社组织了剧社，通过演新剧开展宣传活动。周文雍带头参加剧社的排练演出，经常带领剧社到中央公园、西瓜园、广东大学礼堂去公开演出，受到群众的欢迎。周文雍还积极为新学生社办的《新学生社半月刊》撰写文章，并参与编辑工作^②。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的消息传到广州，周文雍在《新学生半月刊》上发表文章，大力宣扬孙中山的功绩，号召大家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

周文雍在领导学生运动的同时，还积极投身工人运动。一九二四年秋，他协助杨石魂主持手车夫工会的工作^③。手车夫日夜奔波，收入微薄，过着“吃无定着，宿无定处”的悲惨生活。周文雍十分同情他们的境遇，认为要把这个行业的工友们组织起来，必须设法帮助他们改善居住条件。于是，他和杨石魂找工会骨干一起商量，提议发动手车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互助互济，修建工人宿舍，得到大家的拥护。没用多长时间，就在东堤二马路侨高街手车夫工人俱乐部后面，建造了一批住房，使一百多名手车夫有了住宿的地方，大家深深感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确实是为工人谋利益的组织。此后，他们更积极地参加工会的活动，使手车夫工会成为广州工人队伍中一支比较坚强的革命力量^④。

①②陈志文：《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运动》；张婉华的回忆材料。

③④林增华、蒋世明的回忆材料，存广州市民政局；《忠肝铁胆——周文雍烈士革命斗争史实片断》，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一九二五年省港工人大罢工之前，周文雍被派到沙面洋务工会担任领导职务。洋务工人一般都住在外国人的领事馆或办事机构内。省港大罢工爆发以后，沙面洋务工人率先参加，他们的住宿就成了问题。周文雍动员大家以俱乐部为家，解除了罢工工人的后顾之忧。不久，他奉调到石井兵工厂，协助沈厚堃、梁子兴等领导那里的工人运动。石井兵工厂的厂长马超俊对工人严密控制，给工人运动制造重重障碍。周文雍等采取了多种办法，巩固和扩大了兵工厂的工人组织，很快打开了斗争局面。此后，他又被调去主持金属业工会的工作。省港大罢工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周文雍经受了很好的锻炼。罢工期间，他被选为中共广州市委委员和中共广东区委工人运动委员会的成员，成为当时广州工人运动领袖刘尔崧的得力助手^①。

周文雍十分关心农民运动。他利用回乡的机会，宣传广东各地工农运动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号召大家组织起来，反对地主豪绅的剥削和压迫。在他的启发和推荐下，凤凰村青年周金屏、周寿金进入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②。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我党决定联合国民党左派，给右派以坚决打击。第二天，周文雍根据党的指示，召集新学生社社员在广东大学礼堂举行特别大会，强烈谴责国民党右派的罪恶行径，表示要继承廖仲恺的遗志，为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奋斗。

会后，周文雍带领社员列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为廖仲恺致

① 《团广东区委改选结果》（1925年10月27日—29日）、《团广东区委书记杨善集报告》（1925年12月16日）、《团广东区委给团中央的报告》（1926年1月21日），存广东省档案馆。

② 《中国农民》第2期“学员姓名一览表”。

哀，并派女社员去慰问廖仲恺夫人何香凝。

一九二六年夏，周文雍担任了共青团广州地委书记。七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时，他把青年工人组织起来，成立担架队、运输队，在学生中还成立了宣传队、卫生队，与省港罢工工人一起，给北伐军以有力援助。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周文雍先后担任多种领导职务，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经常是日以继夜地埋头苦干。但他始终精神饱满，不仅自己尽可能挤时间读书看报，还热情帮助周围文化低的同志学习文化，为他们修改讲演稿和各种宣传品，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得吃。这种忘我的战斗不息的革命精神，和他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至今仍然记忆犹新^①。

革命先锋 起义英雄

一九二七年四月，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广东的反动派也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中共广东区委、省港罢工委员会等我党和工会的领导机关均遭破坏，著名的共产党员肖楚女、熊雄、熊锐、刘尔崧、李森、邓培、何耀全、毕磊等，不幸被捕或被杀害。周文雍也受到通缉。但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仍然机警地坚持战斗，并受党的委托，接替刘尔崧，担任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主席。

四月十八日，即广州反革命大搜捕、大屠杀发生后的第三天，周文雍按照中共广东区委的通知，到西堤东桥一个同志的住处去出席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当时留在广州的广

^①张婉华的回忆材料。

东区委领导人穆青、杨殷、冯菊坡、赖先声、任卓宣、吴毅等。会上，大家针对当时的局势作了分析研究，决定成立新的中共广州市委，指派吴毅任书记，周文雍任组织部长，徐文雅任宣传部长。周文雍负责联系广州市各工会党支部的工作。

周文雍召集广州工代会所属工会的领导人举行会议，贯彻紧急会议精神，制订了对付敌人猖狂进攻的斗争方案；并以区党委、区团委、联合罢工委员会、省革命工会、广州工代会、省、市农民协会、省妇女解放协会、广东新学生总社等组织的名义，共同发表了《反抗国民党反动军阀残暴大屠杀的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和一切新军阀”、“释放一切政治犯”、“反对摧残工会”、“反对雇主的进攻”等口号。^①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党和工会的工作由公开转入秘密。周文雍遵照党的指示，与其他同志一起，把各工会的工人纠察队和会员秘密组织起来，建立广州工人的地下武装，如手车夫中的剑仔队，海员中的工人自救队、义勇团，省港罢工工人中的工人利益维持队等等。参加这些地下武装组织的达数千人，他们武器虽然不多，但组织严密，勇敢顽强。

六月十九日，是省港大罢工两周年纪念日。已经转入秘密活动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周文雍、罗登贤等组织下，召集了两万罢工工人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六月二十三日，广州工代会特别委员会在周文雍的主持下，又召开了有三万群众参加的大会，纪念沙基惨案两周年。这两次大会，使广东的反革命派十分震惊。他们立即以“第二次清党”的名义，包围搜查原省港罢工工人宿舍，捕去工人两百多名。当周文雍等获知这些工人

^①赖先声的回忆录，存广东省委党校。

的被捕，都同工人内部的“改组委员”^①的告发有关时，便带领工人秘密武装组织开展驱逐“改组委员”的斗争，并处死了好几个作恶多端的“改组委员”。这期间，他还指挥洋务和手车夫这两个工会的青年工人武装，先后袭击了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及市党部工人部长、工贼曾西盛的住处，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

根据斗争需要，中共广东省委派陈铁军来协助周文雍工作。周文雍与陈铁军假扮夫妻，在拱日路租了一间房子^②，建立秘密机关，重新组织工人，开展新的斗争。他们深入工厂，走家串户，教育工人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团结起来继续战斗。经过一段深入的发动，一些工会逐步恢复起来。周文雍又在龙藏街太邱书院、水关桥木屋里多次召集工会骨干会议，传达省委、市委关于组织工人群众抗议反动派大屠杀的暴行、建立地下武装准备暴动的决定，引导各行各业的工人群众起来开展斗争。在他和各工会骨干成员的努力下，印刷工人举行罢工，把“改组委员”统统逐出工会，煤油业工人组织起来袭击改组了的“工会”，五金工人、洋务工人、运输工人也都行动起来，赶走或处死了派进工会的“改组委员”。工会的大权重新回到工人的手上。

九月间，反动头子张发奎从江西率领余部回到广东。他的兵力很少，为了夺取桂系军阀在广东的地盘，暂时缓和了对工人群众的压迫，企图骗取工人的好感和支持。在这个新的形势

①当时，在广东的反革命派为了装点门面，欺骗工人，没有封闭一切革命的职工会，而是指定亲信和工贼用所谓“改组委员会”的名义，没收工会财物和占据工会的会址。那些“改组委员”都是反革命派直接委派的。

②陈功武、梁梅枝的回忆材料，存广州市民政局。

下，周文雍根据党的决定，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重新打出旗号，鼓舞工人群众的斗志。

十月十七日，周文雍主持召开了有一百多个工会组织代表参加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议决向政府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工会与农会的自由、驱逐一切“改组委员”、“四·一五”前工人与雇主所定的协约一概有效、保持省港罢工工人的一切权利等五项要求，十月二十四日举行总罢工，同时夺回被“改组委员”强占了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接着召集会议，决定支持广州工人代表会提出的五项要求，并参加总罢工、大示威。

张发奎闻知工人将举行总罢工，当即撕下了假革命的面具。十月十九日，他派出军警逮捕了海员工会委员四十五人，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三十人，并解散了保留下来的四百名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他还在全市的重要地点加岗加哨，警察宪兵日夜戒严、搜查行人，到处张贴禁止罢工的“公告”。广州又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面对这种情况，周文雍等同工会骨干反复研究，决定改变总罢工的计划，采取巧妙的斗争策略：组织一支大约一千人的工人队伍，分成一百个小组，每组十个人，隐蔽分布在城内各处，事前不动声色，给反动军警一个“罢工已经取消”、“平安无事”的错觉，到时按统一号令集中游行。这个办法确实迷惑了敌人，十月二十三日那天，反动派竟无任何防范。深夜两点钟，预定的时间到了。周文雍一声令下，一千名工人立即从一百个地方涌上街头，很快汇集到一块，散发传单，高呼口号，进行游行示威。反动军警此时才大吃一惊，乱成一团，不

知所措。周文雍领导的这次机智灵活斗争，在广州工人中影响很大^①。

正在这个时候，汪精卫与陈公博等到了广州，准备把张发奎再打扮成“国民党新左派”，以欺骗群众。省、市委召开会议，决定彻底揭露汪精卫、陈公博和张发奎等的伪装，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周文雍。十一月一日，周文雍按照省、市委的指示，把在“四·一五”时被反革命派驱逐了的二千名铁路工人和裁撤了的五百名火柴工人组织起来，在东较场集合后，由他亲自带领，到东山葵园汪精卫公馆请愿。请愿队伍提出了释放政治犯、恢复工人的工作、恢复工会活动等严正要求，叫汪精卫出来当面回答。汪精卫惧怕工人运动，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周文雍抓住这个机会，以广州工人代表会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表演说，当众揭露汪精卫的右派嘴脸，指出他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完全是一副伪装，是他为争权夺利、抢夺地盘而施展的阴谋伎俩。最后，周文雍带领请愿队伍在一片“打倒新军阀”的口号声中，开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

这时，汪精卫、张发奎正在调集军警，要围捕游行队伍中的工人骨干。省委肃反委员会负责人杨殷得到消息，当即命令陈铁军等马上赶去通知周文雍设法掩护群众撤退。但是，反动军警抢先了一步。他们在东皋大道口围住游行队伍，大打出手。周文雍为掩护群众撤退，受了重伤。撤退的群众冲到接近文德路口时，又被迎面开来的大批军警截住。工人与军警发生激烈搏斗，周文雍再度负伤，与三十多名工人一起不幸被捕。

^①黄平：《广州暴动及其准备》，原载《广州公社》，无产阶级书店1930年出版。

党决定营救周文雍。首先派人通过监狱看守了解周文雍被关押的情况。得知他受刑很重，狱中戒备很严，劫狱很难奏效，遂制定了设法让他监外就医，然后再从医院营救脱险的方案。按照组织的安排，周文雍吃了由狱外送来的用生姜和辣椒煎炒的食物。负伤、受刑，加上这些食物，周文雍很快发起高烧，不停地高声呻吟，甚至发狂地喊叫。难友们纷纷要求把他送医院治疗。反动当局迫于公愤难平，只好同意将周文雍送进市立医院犯人留医处医治，但却在医院大门口特设了一个警哨，日夜监视。一天中午，一位扮作探望病人模样的同志机智地缴了哨兵的枪，预先埋伏在医院附近的同志立即冲进医院，将周文雍接出，抬进事先准备好的一辆无牌小汽车，从永汉路朝东经过红花岗，直向沙河奔去^①。

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在城市和农村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②。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广东省委作出了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号召暴动宣言》^③。担任了广州市委工委书记的周文雍，被选为起义政纲起草委员会委员，在省委书记张太雷的直接领导下，参加起草起义的政纲和口号。由于他对广州工人组织的各方面情况比较熟悉，广州起义行动委员会分工他担

①徐惠东（营救周文雍的汽车司机）：《志士头颅为党落》，1962年7月30日《羊城晚报》。梁国志（参加营救者）：《周文雍烈士的回忆》，存广州市民政局。陈添（参加营救者）：《谈营救周文雍情况》，存广州市民政局。

②《中央致南方局转广东省委信（1927年8月22日）》、《中央致南方局暨广东省委信》（1927年9月），均存广东省档案馆。

③原载《布尔塞维克》第9期。

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

周文雍按照市委的决定，把前一个时期分散建立的剑仔队、工人自救队、工人利益维持队等工人秘密武装组织统一了起来，按工作或居住地点编成工人赤卫队。全市十一个区，分别成立十一个工人赤卫队委员会，受市的工人赤卫队委员会统一指挥。但由于各工会的工人武装组织在秘密条件下不容易集中，以区为单位组织赤卫队不好落实。周文雍等又重新研究，决定按照地段，结合行业，将全市各工会的赤卫队迅速整编成七个联队；还成立有由六十名汽车司机组成的独立汽车队、由五十名铁路和市政工人组成的破坏交通队、由军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省港罢工工人骨干组成的消息局、由三十名罢工工人纠察队组成的红色恐怖队等。这支有三千人的工人赤卫队编成后，根据周文雍的建议，起义总指挥部派出徐向前、沈青等一批军政人员，担任各联队的联队长和大队政治指导员，加紧进行军事训练。

为了解决武器问题，起义总指挥部决定由周文雍负责，依靠工人的力量，建立地下兵工厂。这些地下兵工厂有的设在郊区的树林中间，有的就在市区的商业铺户里面，工人们在周文雍领导下，利用简陋的设备，自己动手，赶制炸药、手榴弹。周文雍还同省、市委的领导同志到石井兵工厂，动员党员和工会骨干积极想办法，为工人赤卫队提供武器。石井兵工厂的工人们积极行动，按要求提前三天制造出一千支标枪头，分送到赤卫队员的手上。赤卫队员还把“四·一五”后埋藏起来的“六八”、“七九”、毛瑟枪、手枪挖了出来。这些武器仍然不敷分配，许多队员就用大刀、棍棒、长矛、禾叉、短剑、板手和火药枪作武器。大家认真进行训练，积极作好起义的准

备。

广州武装起义的日期原定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晚上^①。但是，由于时在上海的汪精卫得到风声，策划了一个解除教导团武装、驱逐工人赤卫队、搜查秘密工会、实行全城戒严的破坏起义的行动计划，并派他的老婆陈璧君急回广州，向张发奎传达布置。张发奎马上电令他的第四军军长黄琪翔赶回广州执行汪精卫的计划。在这紧急关头，起义总指挥部当机立断，决定将发动起义的时间提前。

根据这个决定，周文雍于十二月十日在龙藏街太邱书院召开了工人赤卫队各级领导人会议，检查各联队的准备工作，下达各联队的进攻目标，宣布起义标志和当日口令，并推选出十位代表，准备起义后参加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省委书记、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向大家作了动员讲话。

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三时三十分，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广州工人阶级和革命士兵举行的震撼中外的武装起义爆发了。驻在广州市东郊的教导团，首先枪毙了张发奎派来的特务和反动军官，宣布正式起义，然后高举起义旗帜，按照原定的战斗部署，迅猛地奔向市内各个攻击目标。

三千名赤卫队员分成几路，袭击反动军警驻地和政府机关。周文雍直接指挥的第一联队，从太邱书院冲出来后分成两股，一股由四牌楼（今解放中路）向北，经惠爱路（今中山路）到维新路（今起义路）北面；另一股由四牌楼向南，自惠福路到维新路南面，形成一把铁钳，把广州公安局夹在中间。预先

^① 《广东省委对参加广州暴动决议案》（1928年1月23日）。

埋伏在第一公园（今中央公园）的第三联队敢死队，冲过惠爱路，直扑公安局。霎时间，公安局周围，杀声震天，人如潮涌。

广州公安局里面的敌人，被起义队伍的喊杀声从睡梦中惊醒，一边开出铁甲车抵抗，一边架起两挺机关枪，交叉扫射。冲在最前面的赤卫队员中弹倒下，赤卫队的进攻被阻。周文雍为避免牺牲，急忙指挥队员们向明星戏院（今新星戏院）门前和附近的骑楼底下分散隐蔽。

在这紧要的关头，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赶到了。他们迅猛地用火力压住了顽抗的敌人，并炸毁了敌人的铁甲车。赤卫队员很快集中起来，同教导团的革命士兵一起再次扑向公安局。但是，院子里疯狂吼叫的机关枪，仍然使起义队伍无法接近大门。周文雍指挥一部分敢死队员摸到公安局后侧墙下，用人骑人的办法攀上围墙，向院子里投掷手榴弹。借着手榴弹爆炸的硝烟，几名队员跃身翻进院子里，打哑了敌人的机关枪，使大门外面的教导团士兵和赤卫队员顺利冲到大门前。与此同时，事先打入敌保安队作内应的同志，击毙了保安队总队长，用重机关枪从保安队驻地向对面的公安局院内扫射，打得敌人抬不起头。赤卫队员乘势奋勇冲杀，终于砸开了紧闭的大门，冲进了公安局。敌公安局长朱晖日看大势已去，在十多个卫兵保护下爬墙逃命，战斗很快结束。周文雍打开被占领的公安局军械库，拿出朱晖日收藏的三千多支枪，发给参加起义的工人群众，又继续投入战斗。两小时后，广州大部分地区已被起义军占领。

天亮之后，起义总指挥部移进广州市公安局。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黄锦辉、陈郁

等领导人陆续来到这里，指挥广州的革命士兵、革命工农，继续同残余的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激战。一面铁锤、镰刀大红旗高高飘扬在起义总指挥部的楼顶上。周文雍把一幅红布横额挂上大门楼，横额上面是他亲手书写的七个大字：“广州苏维埃政府”^①。

广州苏维埃政府在战斗中成立了。当天早上，周文雍出席了张太雷在起义总指挥部主持的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选举了政府委员十六人，通过了政府领导人名单，苏兆征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因病未到职，张太雷代理），周文雍任人民劳动委员兼教育部长。

苏维埃政府发出通知，十一日中午在第一公园前召开庆祝大会。时间将到，兴高采烈的各界群众，从四面八方会场涌来。正在这时，传来了敌军越过观音山（今越秀山）、冲到吉祥路（今教育北路）附近的消息。第一公园附近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决定将庆祝大会改在十二日中午举行。周文雍等立即指挥起义军和主动参战的工农群众迎击来犯之敌，把敌人从吉祥路一直赶到观音山脚，并在那里进行了一场激战，打死敌军一百多人，其余敌军狼狈逃跑，起义军夺回了观音山。

十二日中午，工农兵大会如期在西瓜园举行，到会群众达一万人。周文雍与苏维埃政府的其他领导人一起登上主席台，张太雷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演说。

这时候，反革命的各种力量，包括帝国主义在广州的海军、陆军，已经勾结起来，准备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反扑。下

^①访问林增华记录。

午二时，群众大会结束后，张太雷从西瓜园返回总指挥部，途中突然遭到从大北门窜来的一队敌军的袭击，不幸中弹牺牲。

这一天，敌军多次向起义军阵地反扑。起义军战士在工农群众的支援下英勇抗击，大多数阵地仍在我手。至晚，敌人各路援兵纷纷开来，起义军虽拚死杀敌，但因众寡悬殊，已处于守势。

十二月十三日，情况更加紧张。敌人继续大量增兵，从水上、陆地，向起义军疯狂进逼。起义军总指挥部紧急命令撤出广州。周文雍带领一支赤卫队，与十多倍于自己的敌人短兵相接，顽强拚搏，为保卫广州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敌公安局原址，不怕牺牲，奋勇死战，直到下午三时，弹尽援绝，然后杀出一条血路，撤离广州^①。

坚贞不屈 壮烈牺牲

从广州撤出的起义队伍，一部分转移到农村，与当地农民结合开展斗争；一部分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开往海陆丰与红二师会合，坚持海陆丰地区的革命斗争。周文雍与一部分队伍到了东江后，又奉党的指示辗转到香港，负责联络和安置撤到香港的同志。他没有因革命遭到暂时的挫折而气馁，而是以更加饱满的热情顽强工作，还多方鼓励身边的同志坚定信心，坚持斗争。

起义失败后的广州，革命组织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几

^①黄平：《广州起义》，载《广东文史资料》第17辑；《广州起义》，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编印。

乎全部陷于瘫痪状态。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同志们认为要把广州党的工作重新恢复起来，必须派一个坚强的领导干部回去。有的人提出：周文雍长期在广州搞工运，熟悉情况，在工人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做秘密工作又很有经验，他回广州比较合适。也有人担心他在广州被捕过，反动军警中不少人认得他，广州起义中他又是领导者之一，目标很大，回去有危险。周文雍以革命利益为重，勇敢地承担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一九二八年一月，周文雍打扮成刚从南洋回来的华侨商人，在海员的掩护下，返回广州。提前从香港回到广州的陈铁军，把他从西濠口码头接到“家”里。

这个“家”还和以前一样，实际上是党的联络机关。周文雍和陈铁军仍然假扮夫妻，陈铁军的妹妹铁儿，她嫂嫂的妹妹李淑媛，跟他俩住在一起，掩护和帮助他们开展工作。

在白色恐怖下的广州，周文雍和陈铁军勇敢机智地避过敌人的耳目，在市内跑了许多地方，找寻失掉联系的同志，重新建立秘密联络点。在安乐坊，他们找到交通员李姐，通过她联系了不少同志。周文雍还化装成苦力工人，到工人区找工会骨干研究如何重新组织工人、继续进行斗争等问题。

一次，周文雍在玉华坊的联络点召集秘密会议。会议开始之前，在敌公安局搞地下工作的一位同志急匆匆跑来报告：会议地点暴露，暗探马上要来捉人。陈铁军从容不迫地撤去信号，和周文雍一起离开了玉华坊。来开会的同志不见信号，连忙撤退，使敌人扑了一个空^①。

^①《忠肝铁胆——周文雍烈士革命斗争史实片断》，访问林增华记录。

根据上级的指示，周文雍、陈铁军和曾国钧等，在广泛联系党团员，深入发动工人群众的基础上，准备在春节期间发动一次政治攻势，叫做“春节骚动”。他们印发了大量革命传单，告诉广州市的群众：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没有终止，共产党人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在继续战斗。传单最后号召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将革命进行到底^①。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农历正月初五），由于叛徒向敌人告密，周文雍与陈铁军不幸同时被捕。

反动派怕周文雍再次被抢出去，便给他加上沉重的脚镣手铐，还用粗大的铁链锁着，关在公安局特别监狱的单人牢房里，派大批军警日夜监视，并把他与陈铁军隔绝开来。

敌公安局长朱晖日亲自出马，严刑审讯周文雍，施用了“放飞机”、“坐老虎凳”、“插指心”等种种酷刑。周文雍多次昏了过去，但始终坚贞不屈。敌人见硬的不行，又改用高官厚禄诱惑。周文雍严词拒绝，毫不动摇。敌人强迫周文雍写“自首书”。他接过笔来，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反动派的滔天罪行。他在监狱的墙壁上，留下了篇首引用的那首“革命精神不可灭”的不朽诗作。

陈铁军在狱中表现得同周文雍一样坚强。反动派无计可施，便决定判处他们死刑。法官在宣判之前，问周文雍有什么要求。他想到自己在与陈铁军互相配合的工作过程中，曾经彼此相爱，但是为了革命事业却一直保持纯洁的同志关系。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应该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便提出

^①陈功武：《回忆周文雍烈士》，存广州市民政局。

要与陈铁军合照一幅照片^①。

在牢房的一个空处，周文雍与陈铁军并肩而立，神态自若，大义凛然，拍下了一幅临刑前的双人合影^②。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农历正月十五)^③，周文雍和陈铁军被分别装在手拉车上，押赴红花岗刑场。

随着刽子手的罪恶枪声，两位英雄倒下了。周文雍临终前，仍用尽最后的力气呼喊道：“同——志——们——革——命——到——底！”^④

①蒋世明、陈功武的回忆材料，存广州市民政局。

②齐怀：《刑场上的婚礼》，见1978年4月2日《人民日报》第6版。

③根据陈铁军的嫂嫂珍藏的家族族谱记载。

④林增华：《两个英勇不屈的战士》，载1957年12月11日《羊城晚报》。《忠肝铁胆——周文雍烈士革命斗争史实片断》。

陈 铁 军

温 佩 兰

叛 逆 闺 秀

陈铁军原名陈燮君，一九〇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农历二月二十三），出生在广东省佛山市一个归侨富商之家。祖父陈贤超，原籍广东省台山县黎洞（现三合公社）汇洞里村，后因生活贫困，携全家迁到佛山，靠做豆腐谋生。父亲陈帮楠，少年时只身飘洋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做工、当店员、会计等，一九〇四年回国定居。他把积攒下来的钱，在佛山购置了一批产业，还在香港合股经营百货店，成为佛山有名的归侨富商。

陈铁军从小过着富家闺秀的优裕生活。由于佛山没有女校，她不能上学读书，每天在母亲身边学针线刺绣。十三四岁时，她已经练就一手飞针走线的好手艺，不仅自缝自穿的衣服，做得称身适体，而且绣出的各式花卉鸟兽活灵活现，因而很受父母的钟爱。但她自己从懂事开始，就不满这种幽居深闺、孤闻寡识的生活。佛山在全国民主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办起女私塾后，有些女孩子摆脱了不许女子上学的陈规，陆续入塾读书。铁军和妹妹铁儿，便要求父亲送她们上学，像大哥、三哥一样读书。她的父亲觉得女儿勤奋好学，加上自己侨居国外

时经历过没有文化受外国人歧视欺侮的苦楚，很想有一个出众“才女”，以扬名显亲，便答应了。

一九一八年春，铁军和铁儿被送入佛山有名的女书馆——坤贤私塾读书。从闺房来到书馆，与一群女友同堂共学，陈铁军十分高兴。但是，塾师所教的全是“幼而学，壮而行，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垂于后”和《女四书》^①那一套，又使她大失所望。在铁军入坤贤私塾读书的第二年，父母便把她许配给佛山盲公饼铺的何合记大老板为孙媳妇。不管铁军对这门包办婚姻如何悲伤、申诉、抗辩，都无法改变父母的成命，使铁军陷入哀伤迷惘和绝望之中。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浪潮席卷全国。广州学生组成的演讲队、宣传队纷纷来到佛山，怒斥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使佛山很快也沸腾了起来。广州女子师范学校的佛山籍女学生郭鉴冰带领的一支演讲队，在坤贤私塾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陈铁军听后，象在绝望中找到了生路，心情无比振奋。她急忙拉着妹妹铁儿上街听演讲、看演出，听着看着，她自己也接过传单去散发，走进游行队伍跟着呼口号。从此，陈铁军的脑海里翻滚起新的波澜，开始了新的觉醒。

郭鉴冰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佛山，于一九二〇年创办了佛山第一所新学——季华两等女子小学。招生简章贴出后，舆论哗然。那些思想守旧的人看了摇头，认为是标新立异。陈铁军听到这一消息，对妹妹说：“耳闻不如眼见，我们亲自去看看去。”于是，她带着铁儿，又邀约坤贤私塾几个女

^①清人王相辑《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合称《女四书》。

友，走进季华小学一看，校长和老师都是去年来佛山坤贤私塾的女演讲者。她高兴地说：“这才是我们所要进的学校。”回家后，她坚决要求转入季华小学上学。父亲被她纠缠得无法，就同意了。不久，陈铁军便成为季华小学高小部的头一批学生。铁儿和她的亲戚、同窗好友李淑媛^①也转入季华小学。在季华小学，有两件事曾引起思想守旧人们的反对：一是穿白衣黑裙的校服，被认为是标新立异，有失闺秀的“体统”；二是上体育课，被认为是女子操兵，蹦蹦跳跳，有失“美德”。有的家长还担心把女儿的皮肤晒黑了，将来不好出嫁。校方在这些舆论压力下，感到有点为难。陈铁军则用实际行动支持学校。她和妹妹带头穿校服，带头上体育课。后来，人们看到这群女学生朝气蓬勃，知书达理，渐渐改变了看法，还赞扬她们“象男孩子一样”，“比男孩子还强”。

陈铁军学习努力，成绩优异，尤其作文和刺绣两门功课，常受老师夸奖。她还经常借阅郭鉴冰订的《新潮》杂志，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她的许多篇作文，都谈到反帝反封建问题，有的还用自已的亲身体会，论述争取妇女解放的重要。从这时起，陈铁军就和郭鉴冰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后来在革命道路上又一直互相激励，成为终生挚友^②。

“过门冲喜”

一九一九年农历腊月，陈铁军的父亲因病去世；不久，母

^①李淑媛，陈铁军大嫂的妹妹，中共党员，1931年在香港被捕，后来在广州牺牲。

^②郭鉴冰：《回忆铁军》，原件藏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亲也相继病故。父母临终前给两个儿子留下遗嘱：铁军出嫁时，要用几千元（白银）办嫁妆，让婢女阿美和两个女佣人陪嫁。两位老人以为这样就可以抚慰女儿对婚事的不满，他们却根本不理解女儿所承受的精神痛苦，更不理解女儿的志向。

祸事和压迫接踵而至。“何合记”大老板因患重病，要娶孙媳妇“过门冲喜”。这对于陈铁军来说，真是“大祸临头”。按照她的志愿，是继续读书求得学问，在社会上谋得一份职业，自食其力，不做寄生虫。现在出嫁去做“少奶奶”，自己的理想就全成泡影。她不能再走二姐阿笑被封建婚姻埋葬的老路，便去找大哥商量，企求得到支持。但大哥已作主答应了何家的要求，他对铁军说：“要秉承父母遗嘱。”她又找三哥商量，三哥说：“父母的遗嘱不应抗拒”，“要按照大哥的主意去做”^①。陈铁军跑到学校，向郭鉴冰诉说了自己的痛苦。郭鉴冰既同情又愤慨，但却无能为力。她思忖了一下劝铁军道：“可以和对方见见面，……如果对方是一个有志气的青年，大家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还是可以慢慢建立感情的”^②。陈铁军反复考虑，认为也只能按郭鉴冰的主意办。她回家去对大哥说：“第一，父母重孝在身，只能拜堂，不能同房；第二，拜堂后要回家继续读书，直至读中学、大学。何家如果答应这两个条件，我才肯‘出嫁’。”^③标榜封建伦理的何家，拿不出理由拒绝这两个条件，只好答应。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陈铁军满怀哀伤、惆怅，上了大红花轿。

①③陈铁军的三嫂黄汉兴：《忆妹妹铁军》，原件藏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访黄汉兴的谈话记录。

②郭鉴冰：《回忆铁军》。

嫁妆是完全按照父母的遗嘱办的。何家迎娶时，彩棚八音，大摆筵席，宾客盈门。但是，陈铁军想的，不是去受用这些荣华富贵。她决心从封建罗网中挣脱出来，争取自由解放。因此，洞房之夜，她就落落大方和对方交谈，问对方在哪里读书，打算将来做什么？通过交谈，陈铁军发现对方是一个安于享乐、毫无进取之心的人，和自己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因此，她就按照原先讲明的条件，拜堂之后便立即返回家里，继续在季华小学读书。此后，只在逢年过节才去婆家，给公婆斟茶行礼完毕，便又返回娘家。

一九二二年春，陈铁军在季华小学毕业。校长为扩大新学制的影响，举行盛大的毕业典礼。会后，全校师生列队逐个欢送毕业同学回家。何家十分盼望“孝服三年不落家”的媳妇归落何家，做少奶奶，生男育女，享受天伦之乐。哥嫂也盛情迎接铁军回娘家，但按旧规事先申明，不再供给她这个已经出嫁的妹妹继续读书的费用。如何抉择自己的前途问题：是就范于封建礼教，到何家去做少奶奶；还是冲出牢笼，做一个封建叛逆的新女性？在郭鉴冰和当时的进步刊物《新潮》的帮助、启示下，“她决心克服困难，到广州升学，走自己的路，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妇女”^①。

追 求 真 理

一九二二年春，陈铁军几经周折，来到广州，考入坤维女子中学初中部。

^①郭鉴冰：《回忆铁军》。

坤维女子中学的学生，多数是富裕人家的小姐。校长马某提倡“三从四德”，禁止学生参加校外的社会活动。陈铁军对学校的管束非常不满。她关心的是妇女的“自由、平等、独立”问题，觉得这些问题和自己的前途命运密切相关，于是便广泛阅读有关妇女问题的书刊。她曾经十分赞赏过罗兰夫人说“不自由，毋宁死”的格言；也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个人极端自由”很痛快；读了康有为《大同书》论述妇女种种“不得自由”所造成的“妇女之苦”，亦深有感触；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又认为甚有道理。正当陈铁军苦恼于对马列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理论和主张不能辨别真谬，对各种论争不能识别是非的时候，她的国文老师谭天度（原名谭夏声）给她引了路。

陈铁军爱好国文。谭天度在讲课时插入许多时事新闻，还常常讲到妇女解放的问题，尤能引起她的兴趣。在一次课前，她给老师递了一张条子，上写：“先生：请述妇女独立、自由、男女平等之真谛，如何实现大同，妇女解放？”谭天度平时就觉得陈铁军是一个思想活跃的青年，现在又能把世界“大同”和妇女“解放”联在一起，就更加引起他的注意。课后，他回答陈铁军说：从《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到陶渊明的“桃花源”，以至康有为的“大同书”，都贯穿着“乌托邦”的幻想。还说：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一部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马列主义的指导，革命就不能成功，妇女也就不能独立和解放。陈铁军听了很受启发。此后，课前课后，她总是向老师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还与同班同学区梦觉（原名区泽生）、冯妙贞等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一起，到谭天度宿舍请教学问，讨论时事政治，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有时还随老师与同学去荔枝湾

（现荔湾公园）散步谈心。谭天度对于陈铁军等提出的问题，都深入浅出地给以解答，并鼓励她们发表意见，帮助她们学习马列主义。后来，校长马某察觉了师生们的进步活动，便放出风说：谭天度不是造福于青年的。一天，谭天度对陈铁军说：

“我是老师，有责任帮助你们上进，但你们和老师一起谈话散步，人们会议论的，如果学校刁难怎么办？我不怕被解聘，但你们是学生，被开除就麻烦了。”陈铁军听后，对学校当局十分不满，她说：“我不怕，如果校长这样做，就揭露她，假使无理开除我，我也不怕，也要斗争。”^①表现了陈铁军渴求真理、不畏强暴的性格。

一九二三年春，区梦觉、陈铁军、周蕴卿^②等约十个同学，组织时事研究社，经常阅读《向导》、《新青年》、《前锋》等理论刊物，还阅读了《共产主义ABC》等小册子；在一起议论列宁和孙中山，讨论“中国适宜走欧美式的革命道路，还是走俄国式的十月革命道路”等问题。陈铁军从这些进步书刊中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敬仰和向往着中国共产党。一天，她问谭天度老师：“你是不是共产党？我能不能参加共产党？”谭天度说他是共产党员，并说：“你参加党是可以的，不过要努力学习，提高对共产党的认识，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工作，在实践中锻炼提高。”^③后来，谭天度经常鼓励陈铁军多学习，勤思考，努力创造入党条件。一九二五年春，谭天度介绍陈铁军认识蔡畅和邓颖超，由广东区委妇委对她进行考察培养。

在党的教育下，陈铁军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假期返回家乡

^{①③}访问谭天度记录。

^②据宋维静回忆，周蕴卿是中共党员，于1929年春被捕牺牲。

时，她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第一件事是一九二三年春，她把妹妹铁儿带到广州读书，考入坤维女子中学，并引导她逐步走向进步。第二件事，她知道给她陪嫁的婢女阿美同一个工人相爱，不仅支持阿美，还送给阿美衣物，而且打破“婢女出嫁，男方给回身价银”的封建陈规，无条件让阿美“自由结合”，成全了这一对青年夫妻，在佛山曾一时传为美谈。第三件事，她通过同情自己遭遇的三嫂转告何家，解除婚约，断绝关系，挣脱了前进的羁绊。

铁 心 跟 党

一九二四年秋，陈铁军在坤维女中初中毕业后，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

当时，广东大学新旧思想斗争激烈。广东革命政府聘请了一些著名学者来校任教，郭沫若、鲁迅都先后在该校担任要职，对宣传民主革命、培养革命人才作了大量工作；多数教职员都拥护民主革命，拥护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校内民主气氛较好。但校内也隐藏着一股国民党右派势力，反对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有的教授跟着他们跑，提倡“尊孔读经”，鼓吹反动思潮。

在学生中，代表左派学生的组织有共青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代表中间派学生的组织有民权社、民社、知用社等；代表右派学生的组织有国家主义派、孙文主义学会；代表进步妇女的组织有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中大分会；代表资产阶级妇女的组织有女权运动大同盟。右派学生的组织人数虽然不多，但有后台，不时向进步学生挑衅。因而双方常常展开激烈

的辩论和斗争。陈铁军面对校内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主动请教共产党员谭天度、区梦觉，经常听他们分析各种派别的动态和性质，和他们一起参加辩论会。在党的教育、影响下，陈铁军分清了好坏是非，坚决站在左派一边。她说：“共产主义好，能够解放全人类，妇女也能彻底解放。”^①不久，她参加了新学生社和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并且成为这两个组织的积极分子。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于六月六日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②。“省港工界随即响应，特举行总同盟罢工。香港罢工工人络绎回国”^③。当时，广州有些大中学校为了阻挠学生和工人结合参加罢工活动，提前考试放假，限令学生离校。铁军抗拒学校的错误指令，和进步同学一起，坚决配合工人的罢工活动。六月二十三日，她带着铁儿，和区梦觉、杜君慧等同学参加了由周恩来、陈延年等率领的广州政治大示威游行。她手挥红旗，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为五卅牺牲的烈士报仇”等口号。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路时，遭到英法帝国主义的开枪扫射，当场死亡五十多人，伤一百多人，制造了沙基惨案。陈铁军目睹烈士们的淋淋鲜血，更加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更加仇恨侵略者。同时，她也进一步认识到人民反帝爱国的伟大力量，认识到民族

①郭鉴冰：《纪念铁军》。

②《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
《向导》第117期。

③《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启事》，1925年9月25日广州《现象报》。

要真正解放，人民要真正幸福，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从此，她在党的领导下，更加积极投身各种革命活动。

一九二五年间，陈铁军积极参加了广东大学的各种辩论会。她以“新颖而富于说服力的话语”^①，坚决反对有人提倡尊孔读经的主张，批驳鼓吹中国革命效法日本和西欧道路的谬论，热情地宣传中国革命要走俄国式的道路。她的讲话，“吸引着同学们昂首谛听”^②。

有一次，女权运动大同盟的成员陈逸云，在女生中散播：“现在不要提妇女解放了”，因为“造成妇女痛苦的原因是男子的压迫”，如果“妇女参加了政权，就可以男女平等”。对于这些谬论，陈铁军和一些进步同学均进行了批驳。陈铁军严厉地指出：“现在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参政就是参加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政’，根本不能达到男女平等。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推翻旧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妇女才能彻底解放。”她还揭露女权运动大同盟和孙文主义学会、国家主义派沆瀣一气、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在这场交锋中，陈逸云等理屈词穷，狼狈地败下阵去。

一九二五年十月，广东大学在选举全国国民外交后援会代表、选举出席全国学联会的广州学联（当时广州学联设在广东大学内）代表时，右派学生都蛮横地进行捣乱，在会场上用手杖殴打不同意选他们做代表的人。一天，学生会改选，他们手拿手杖进场，还勾结几个侦缉到场监视。当宣布选举结果是新学生社成员得票最多时，他们竟大声咒骂，要求宣布选举无

^{①②}杜君慧：《回忆同学陈铁军》（1978年），原件存佛山市民政局。

效，还挥动手杖乱打。女权运动大同盟一个主帅带头冲向主席台，窃取铃钟，妄图摇铃宣布散会，破坏选举。陈铁军很气愤，立即带领几个进步女同学进行反击，把他们赶出会场。陈铁军被他们打伤脸部，眼眶瘀血成块。事后，“士的党”^①小头目沈鸿慈（法科学生）在《醒狮》小报上发表文章，叫嚣要“高举‘士的’从广东大学打遍广州，打遍中国，把共产党打垮。”经过这场斗争的锻炼和考验，陈铁军斗志更坚，认为对“打垮共产党”的叫嚣和暴行绝不能示弱和退缩。她在养伤期间曾坚定地表示：“你要‘打垮共产党’吗？”“我就要铁心跟党走，同反动派斗争到底！”并决定把原名燮君改为铁军。她的妹妹也把原名燮元改为铁儿。这时，谭天度来探望她，见她不大说话，便和她到校园散步。谭天度知道她喜欢诗词，便指着月亮对她说：“你看月色多好啊，古人讲花好月圆人寿……”，话未说完，陈铁军接上说：“什么花好月圆人寿，花残月缺人亡是真，这才是今天社会现实的写照。”接着她告诉老师说：“我改名为铁军了。”谭天度问：“为什么要改名呢？”她气愤地说：“本来我也没有想到改名的。但那些‘士的党’不讲道理，经常捣乱，拿棍子打人。”她指着脸上的伤口继续说：“你看，打得我好厉害呀！他们以为这样打我，我就会害怕，不敢出来活动，想打倒我。但我决不屈服，要和他们斗争到底，所以，我就改名铁军。”^②

① “士的”是英文 stick 的音译，即手杖，俗称“文明棍”。由于当时右派学生爱拿“文明棍”，装出洋绅士的派头，故被称为“士的党”。

② 访问谭天度记录。

“贴心姐妹”

一九二六年四月，陈铁军由区梦觉介绍，中共广东大学文、理学院总支书记徐文雅（即徐彬如）签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铁军入党后，被党派到“工代会”做妇女工作，还担任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长。五月，她被选为第三届妇女协会执行委员，任常委和副主任。陈铁军认真执行中央有关妇女运动的指示，把妇女工作重点放在深入发动群众，巩固革命统一战线，加强党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反击国民党右派的篡权活动，支援北伐战争上。一九二六年冬，陈铁军还担任中共中大文学院支部委员，负责校内的女工工作。一九二七年春，陈铁军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委员，在邓颖超领导下进行工作。她工作很出色，经常到工厂去，到工人家里去，到省港罢工工人临时住棚间去，活动在女工和妇女群众之中。

起初，陈铁军到女工中去不习惯，也不顺利。女工们见她白衣黑裙，时兴发式，言谈举止彬彬有礼，以为她是“贵小姐”或“少奶奶”，对她不够亲切。后来，她听说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到手车夫工会做工作时，和工友们一起拉车，工友们热情地称呼他“老陈”。于是，她脱下白衣黑裙，穿上大襟衫，阔脚裤，头发改梳成劳动妇女的式样，一到工人家里，就帮忙做家务，扫地、擦桌椅、烧饭、抱小孩，把工人的家当自己的家。这样一来，工人也把她当作自己人，心里的话肯对她说，工人的困难和痛苦，她心中有数。此后，工人群众就对她很亲切，称赞她是个“好人事”的“贴心姐妹”。

陈铁军还组织女工们到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和广东妇女解放

协会主办的草鞋厂、缝纫厂去打草鞋、缝被服，支援国民革命军北伐。为了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她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募捐，劝人“义购”红旗。为了解决罢工工人和工人子女学文化的问题，她协助有关方面办起妇女识字班、儿童识字班，并亲自教他们唱《少年先锋队》歌、《国际歌》和国民革命等歌曲；还在劳工学校、劳工子弟学校担任文化教员。为了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阴谋诡计，她参加了演讲队、演出队，编演街头话剧，参加反帝示威游行。

一九二六年冬至一九二七年春，中共两广区委妇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培养妇女运动人才的指示^①，派陈铁军主持办了两期广东妇女干部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利用中大教室举办的，每期一个月，训练对象是来自广州和各地的青年妇女，主要是为党在农村开展工作培养妇女工作干部。陈铁军尽心竭力办好这个训练班。她亲自上课，用通俗的语言讲解“没有广大工农妇女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革命就不会成功”的道理，讲解发动农村妇女参加革命斗争的重要性。有一次，她给学员们出了一道有趣的题目：“你心里最敬仰的是什么人？”课堂上顿时活跃起来，有的说最敬仰岳飞和关羽，有的说最敬仰孙中山，有的说最敬仰列宁，……各抒己见。陈铁军最后发言说：“一个革命者应该学习古今中外伟大人物的高尚品质和英雄气概。”她特意介绍了列宁的生平，讲述列宁对世界革命的伟大贡献。这场生动活泼的讨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还向学员们介绍自己做妇女工作的经验，告诉大家要有真正同情

^① 《妇女运动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案》。

农村妇女疾苦的思想感情，随时随地虚心向农村妇女学习，穿着打扮也要大众化。陈铁军也做好了下农村去工作的准备，因而把头发留得长长的。学员们见她讲课时不大方便，都劝她把头发剪短些，她说：“不要紧，我要争取到农村工作，剪短头发做农村妇女工作很不方便的。”学员们学习期满下乡时，她再三叮嘱说：“要关心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的疾苦，要放下架子和农民交朋友。”

虎 口 脱 险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四月十五日，蒋介石又与广东军阀共谋，在广州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这天凌晨，反动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学生宿舍，搜捕进步学生。当时，陈铁军和妹妹铁儿正在女生宿舍就寝，幸得常驻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机关的中共党员、中山大学女工沈卓清^①报信，才乔装离开学校，脱离虎口。

脱险后，陈铁军首先想到了因分娩住在长寿路一家医院里的中共广东区委妇委负责人邓颖超。她不知道邓颖超是否转移，心里十分焦急，便立即装扮成一个“穿旗袍带耳环”的“贵妇人”，由沈卓清乔装佣人陪同赶往医院。她们巧妙地避过了敌人设在医院门口的岗哨进入医院见邓颖超还住在病房里，就赶忙向她报告了外边的情况，并“代表党组织来通知她快离开广州”^②。这时，敌人仍在到处搜捕共产党人，风声很

^①沈卓清于1929年春被捕牺牲。

^②邓颖超的回忆材料，转引自少舟：《一直不忘……》，1980年9月7日《光明日报》。

紧。邓颖超的住处也被搜查过。侥幸的是，周恩来拍来要邓颖超即去上海的一份电报，敌人没有发现。陈铁军设法买到船票，在医院院长的掩护下，才把邓颖超送上了船，抵达香港，安然脱险。邓颖超一直不忘此事，并且认为“若不是陈铁军冒着极大危险及时通知并送走她，那将是不堪设想的。”^①

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已转入地下。陈铁军在工人的掩护下，时常变换住处，暗中打听同志们的下落，寻找党的组织。她打听到“四·一五”事变当天，中山大学有四十多个学生被捕，鲁迅先生为营救他们，据理力争没有结果，愤然辞去了中山大学教务长等所有职务时，心中十分敬佩。陈铁军还听到自己已被学校开除，但她并不介意。她所惦记、焦急的是没有找到党组织和不知道被捕的、失散的同志们情况，又听不到妹妹铁儿的消息，加上她陪嫁的衣物已变卖典当得差不多了，在经济上也发生了很大困难。

为了解决经济问题，顺便探听铁儿的消息，陈铁军返回佛山。一到家，果然见到了铁儿。她们对国民党的暴行，十分愤慨，而对白色恐怖下的险恶处境，却毫不畏惧。她的三哥见她回来，便劝她说：“你成天搞工会工作，吃不饱，住不安，如果被警察捉去了，连命都没有呀！”“你要读书，我供你去香港或出洋留学都可以，你要为自己的前途、幸福着想呀！”陈铁军觉得三哥是好意，但却不知道自己的革命决心，便回答说：“国家不独立，革命未成功，人民无幸福，个人哪里会有幸福？环境险恶，就要斗争，为人民幸福而牺牲，也是个人的

^①邓颖超的回忆材料，转引自少舟：《一直不忘……》，1980年9月7日《光明日报》。

幸福。”^①三哥见劝铁军不从，又去劝铁儿说：“你年纪小，又有病，何必这样受苦，你没有姐姐这样露面，在家休养，避开风险再说吧！”铁儿答道：“我的路子早就选定了，和姐姐一样，跟着共产党走，革命到底！”^②铁军的说理，铁儿的真情，打动了三嫂，当她们决定重返广州时，三嫂设法为她们筹措了一笔钱。

陈铁军回到广州后，仍隐蔽在工人家里，坚持革命工作。她一面继续寻找党的组织，一面揭穿敌人散布的谣言，鼓励工人们要有坚定的信念和斗志。她说：“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灰心丧气，在革命受到挫折时，更要保持沉着、镇静，要有和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要耐心地等待时机，争取有利条件，胜利终有一天会到来的。”她还典当变卖自己的衣物，接济同志，并把三嫂给她姐妹使用的二百多元钱，作为党的活动费用，用来解决一些同志准备撤退香港而没有旅费的困难。

抢救成功

一九二七年五月，陈铁军接中共广东省委的通知，到达已转移到香港的省委机关，和区梦觉住在一起。八月间，陈铁军接受了中共广东省委分配她回广州，协助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主席、广州市委工委书记周文雍建立秘密机关，积聚革命力量，准备暴动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大屠杀政策的新任务。

陈铁军回广州后，按党的指示，和周文雍假扮夫妻，租了

^{①②}访问陈铁军的三嫂黄汉兴的谈话记录，原件存佛山市民政局。

一间房子，建立党的秘密机关；铁儿也驻机关，当他们的助手。

陈铁军协助周文雍把失散的工人组织和革命同志聚拢回来，恢复组织，开展活动。她经常探望牺牲同志的家属，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鼓励他们化悲痛为力量，坚持斗争。她不辞辛劳，不怕危险，化装成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很快就建立起党的联络点和交通线。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她协助周文雍把原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下属组织重新划分为六个区，组成秘密的区委员会，领导工人开展新的斗争。

九月，张发奎率部到达广州。他一面叫嚣“肃清共产党”，铲除叶、贺起义军；一面又大喊“民主、自由”，假装革命，欺骗民众。当他获悉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决定向广州当局提出释放被捕工人、恢复群众团体的政治活动等几项政治要求和举行总罢工的消息时，便撕下假革命的面具，立即下令镇压，派兵搜捕工人，制造白色恐怖。

不久，汪精卫、陈公博抵达广州。他们看到张发奎处境不妙，便扮成“新左派”，大吹“民主、自由”，以收买人心，缓和矛盾。

为了揭穿张、汪的假革命面目，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十月间，陈铁军和宋维真（原名宋志杰）等在东皋大道的广场上召开妇女群众大会。陈铁军在会上痛斥“四·一五”广州反革命政变以来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的罪行，号召群众坚持斗争，博得全场不断鼓掌。突然，特务分子冲入会场，把大会主席拉到场外拳打脚踢致死。陈铁军乘会场秩序大乱之时，在工人群众的掩护下，离开会场脱险。十一月一日，周文雍率领数千名失业工人，在东山龟岗集会，包围汪精卫的官邸“葵园”，要

求释放被捕工人等，最后游行示威，遭反动军警镇压，周文雍受伤被捕，被关押在监狱里。

当时，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下达的“广州城内，即需准备暴动”^①的指示，正在积极组织广州起义。周文雍是广州起义的组织者之一。他被逮捕，对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影响很大，工人群众坚决要求把周文雍从敌人的监狱里抢救出来。为此，省委选派梁桂华、沈青和陈铁军等成立营救小组，由杨殷负责领导。

由于敌人监狱戒备森严，强行劫狱很困难。省委指示不能硬拚，只能智取。陈铁军住在一个工人家里，和营救小组的其他同志一起，制定营救计划。她首先派一个忠实机警的同志去和监狱看守逛大街、上茶楼、交朋友，从而获知周文雍被捕后受刑很重、看管很严等情况；然后，根据此情况制定智取方案：第一步是把煎炒辣的食物给周文雍吃，叫他不饮茶水，借以引起“发高烧”，说是患了严重的伤寒“传染病”，同时发动狱中难友起哄、骚动，迫使敌人将周文雍从监狱转送医院留医；第二步是便衣武装智闯医院，把周文雍抢救出来，由事先准备好的小汽车送至安全地点。当这个妙计秘密传进监狱后，周文雍立即和难友们采取措施，积极配合行动。陈铁军通过党的关系，派洋务工人小陈冒充周文雍的家属，每天去探病送饭，把生姜炒饭、酥炸鱼、辣椒排骨等送给他吃，他坚持不喝茶水。几天后，周文雍便“发高烧”，装成重病状态，讲“胡话”，并大声叫喊、呻吟，要求送医院就医。同狱的难友则乘机发动一次骚动，不分昼夜叫嚷：“他是患伤寒病呀！会传染

^① 《中央致南方局暨广东省委信》（1927年9月）。

的，我们都要陪死啦！”“病得这样厉害还不送医院，太不人道啦！”一天，监狱长来巡查，周文雍正在咳嗽、气喘，大家便嚷起来：“我们在这里坐牢，害了病难道就等死吗？”纷纷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把危重病人送进医院治疗。与此同时，陈铁军也加紧在外面活动。她在群众的帮助下，认识监狱一个医生，向他晓之以理，并送给他一张大新公司一百元的礼单，请他设法让周文雍到公立医院留医。于是，这个狱医给周文雍看病时，就证明他确患传染病，病情严重，必须立即住院治疗。监狱长听到周文雍患伤寒重病，怕蔓延开了责任难负，又怕他死了无法得到共产党的重要情报，同时也怕公愤难平，便无可奈何地同意把周文雍送进广州市公立医院犯人留医处留医^①。但却在医院大门口特别派了警岗，日夜监视。

第一步营救计划实现后，即按预订方案开始执行第二步营救计划。周文雍入院的当天，营救小组就派模范汽车公司一位姓邓的司机去了解犯人留医处的详细情况。这位司机以同行之便和医院的救护车司机交谈，从中摸清情况；并进入医院与周文雍约好信号，以配合行动。又一天，营救小组准备行动，医院内外都布置有革命群众，并由汽车业区部书记袁松派司机徐惠东（即徐寿光）驾驶一辆已卸掉牌子的小汽车，停在医院大门前的马路旁边，“不熄火不离座”，等待着执行任务。中午十二时，当医院大门口的敌特警卫正在换班的时候，突然，街上鞭炮响声不断，扮作探病模样的手车夫工会主席沈青快步接近了哨位，抽出腋下藏着的手枪，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敏捷动

^①此部分引文均见梁国志：《周文雍烈士的回忆》（1960年12月18日），原件存广州市民政局。访问江涛的谈话记录。

作，缴了警卫的枪。预先埋伏在医院的同志闻声而动，立即冲进病房，“用白布被单把周文雍包裹着，由李源同志飞快地背出大门”，坐上停在医院门口的无牌小汽车。司机徐惠东按照营救小组的命令，驾驶着车子风驰电掣般地从永汉路转入惠爱东经红花岗，直奔沙河，抵达党的秘密联络点。当伪警察局发现情况有异，派出军警追上街去，只见街头巷尾炮仗残屑满地，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周文雍被抢救出来了。同志们兴高采烈，反动派则大惊失色^①。

参加广州起义

周文雍被抢救出来后，广东省委仍派陈铁军和他装扮夫妻驻秘密机关。这时工作的重点已是直接为广州起义进行准备了。周文雍不顾在狱中被折磨得严重伤痛，以惊人的毅力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陈铁军姐妹于紧张繁忙的工作中，细心护理周文雍的伤病。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作出《对广东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要“广东省委发表宣言，号召全省工农暴动，建立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政权”^②。十一月二十六日，广东省委在广州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广州暴动问题，决定立即暴动”^③。会后，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便分头进行准备。

^①徐惠东：《志士头颅为党落》，1962年7月30日《羊城晚报》。

梁国志：《周文雍烈士的回忆》（1960年12月16日），存广州市民政局。

^②《中央对广东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17日）。

^③《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各地状况及目前工作给中央报告》（1927年12月5日）。

陈铁军以饱满的热情和严谨的作风，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的各项指示和具体任务。她秘密联系工人印刷和散发宣传鼓动起义的文告和传单；组织妇女分头购买红布，缝制起义的标志“红领带”、“红袖章”、红旗和横额；还巧妙地给起义军运送武器弹药，为准备起义做了大量的工作。

敌人得到了我党将在广州举行起义的消息，遂于十二月十日宣布广州特别戒严，并加紧策划镇压行动。在紧急形势下，广东省委下令提前于十二月十一日三时三十分举行起义。这样，陈铁军的工作就更加繁忙紧张了。她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和周文雍一起草拟起义政纲和口号，书写横额、标语，印发传单和做好工人赤卫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十二月十日，陈铁军和周文雍、梁桂平、陈郁、沈青等，在龙藏街太邱书院听取了工人赤卫队各联队的情况汇报之后，又立即奉命秘密到警卫团去联络工作。晚上，她又奉命迅速通知工人赤卫队全体干部到白糖桥的糖面工会开会。她和同志们一样，充满必胜的信心，整装待发。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三时三十分，震撼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了。起义军按照原来的部署分头作战，天亮之前就占领了市内大部分地区。当天上午，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陈铁军看着飘扬的红旗，非常激动。她满怀豪情地站在广州苏维埃政府院内的空地上，把缴获敌人的枪枝，分发给前来领枪的新战士；还和一些女同志分头发动、组织妇女们给起义军、赤卫队送饭，分发面包、饼干，“看护受伤的革命兵士和工人”^①，看管俘虏和缴获的物资，散发《广州苏维埃宣言》、

^① 《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1928年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案。

《纪念死难烈士宣言》、《苏维埃政府告民众》等文告和传单。

此外，陈铁军还认真执行周文雍指派给她的任务。例如，驻在长堤八旗会馆的警卫团三营营长施恕之，因不懂广州话而向周文雍要翻译并请示有关驻防的事宜。周文雍派陈铁军去转达他的意见并当翻译，协助三营布防。因为三营士兵多数是在起义前从省港罢工工人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对周文雍和陈铁军都很熟悉。陈铁军很快就说服了对驻防有不同意见的士兵，协同三营迅速解决从东堤到大沙头一带的布防问题。

广州起义失败后，面对白色恐怖，陈铁军丝毫没有畏惧。她和妹妹铁儿，仍然坚守着党的秘密机关，并且迅速掩藏、转移、烧毁有关起义的机要文件和物品，随时准备着为革命献出生命。后来，广东省委命令她们“马上隐蔽”、“撤退”，她才带着铁儿乔装离开了党的秘密机关。

崇 高 情 操

陈铁军奉令撤退到香港广东省委机关驻地后，见到周文雍和参加广州起义的一些同志。当时，李立三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分析和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与教训，部署下一步工作。广东省委派周文雍重返广州，恢复党的工作，开展新的战斗；并且认为“陈铁军做地下工作很有经验，协助周文雍工作很有成绩”^①，故又派她重回广州，协助周文雍重建党的秘密机关等工作，仍由铁儿当他们的助手，同驻秘密机关

^①区梦觉：《忆念陈铁军》（1978年），存佛山市民政局。

里。陈铁军以革命利益为重，接受了党分配的新任务后，于一九二八年初，和妹妹铁儿又风尘仆仆地进入了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之下的广州。

陈铁军扮成雍容华贵的“金山少奶奶”，在广州拱日路租了一间洋房住下，迎接打扮成从南洋归来的“金山阔少”周文雍回到广州。

当时，反革命势力极端嚣张，革命活动非常艰险。但陈铁军勇敢、机智、沉着，经常变换乔装，巧妙地避开敌人的耳目，四处寻找失散的同志，很快就协助周文雍把联络网和交通线重新建立起来。陈铁军和周文雍经常打扮成巨商夫妇，以打牌作乐为掩护，和党的领导同志联系，部署新的战斗。陈铁军有时又扮成女佣人，手挽漆花瓮篮子；有时又扮成中学生，背着书包；把党的指示和传单、小报等，送到各个秘密联络点去。

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一九二八年春节期间要在广州发动一次政治攻势，叫做“春季骚动”。即在春节期间，在广州的公共场所、繁华的马路、街道，大量散发革命传单，告诉广州的群众，革命没有完结，号召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继续战斗。陈铁军为了协助周文雍组织好这次活动，积极进行联络和筹款等工作。春节前，她和妹妹铁儿冒着生命危险，扮成贵妇人回到佛山家里。此时，她们的三哥已家道中落，经济上并不富裕。但其哥嫂在铁军的教育和影响下，同情革命，所以，当她们说经济上有困难时，其“三嫂便把家里的现款和借来的一张银单，共约二百元给铁军，”^①支援革命活动。铁军姐妹俩

^①访问黄汉兴记录。

在佛山秘密活动了几天，于春节后的大年初二返回广州。不料，初五那天，由于叛徒告密，铁军和文雍一起在党的秘密机关被敌人逮捕^①。敌人围捕时，周文雍外出未归，铁儿在铁军的帮助下，通过凉台进入楼上的邻居家，在邻居的掩护下，才幸免被捕^②。可是，铁军还来不及摆出“危险讯号”，周文雍却回来了，于是同时被捕。临行时，伪警说：“你们到齐了，局长有请。”话毕便催迫上路。陈铁军嘲讽地说：“嘿！你们这些人办事也不是爽快的，还是让我穿件衣服再走吧！”话毕，她穿好衣服，披上大围巾，把房里的东西检查一番，才步出机关^③。

陈铁军和周文雍被捕后，被分别关押在伪警察局的死牢里。敌人对他们施用酷刑摧残，官禄引诱，金钱收买，都白费心机，便急忙进行审判。

在敌人的法庭上，周文雍和陈铁军严词痛斥反动派杀害革命群众的罪行，把法庭变成宣传革命的讲坛。当敌法官宣布周文雍、陈铁军是共产党，判处死刑，并问周文雍死前还有什么要求时，他提出要和陈铁军合影。敌人把摄影师带到监狱，周文雍和陈铁军并肩站在牢房的窗前照了幅临刑前的两人合影。这表明了“他们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④和对党对革命的忠贞。这是共产党人的崇高情操，这也是他们向党作的最后一次汇报。

①叛徒名字和被捕地点有多种说法，尚未查证落实，故未列出。

②访问铁军的亲侄陈英娘和区梦觉的谈话记录。

③访问陈英娘的谈话记录。

④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1962年2月17日）。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下午，敌警察局的监狱里来了一群刽子手，分头点名传令。陈铁军和周文雍昂首阔步走出牢房，被分别押上黄包车，解赴刑场。敌人害怕我党劫刑场，十分紧张，前面有骑马的警官开路，后面有大批持枪荷弹的警察押阵；马路两旁也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森严。但是，群众闻声而来，站满马路两旁。陈铁军和周文雍“神态自若，毫无惧色”，向沿途两旁观看的群众演说，并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许多群众被感动得流泪、饮泣，一直跟到红花岗畔刑场^①。

在刑场上，陈铁军和周文雍并肩屹立，视死如归，英勇就义。陈铁军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

^①林增华：《两个英勇不屈的战士》，1957年12月11日《羊城晚报》。陈功武、梁梅枝：《关于周文雍、陈铁军被杀害情况的回忆》，存广州市民政局。

唐 澍

董建中 张守宪 王少民

唐澍是我党早期的优秀军事指挥员，历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总教练兼模范大队大队长、国民联军军事政治学校主任教官、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委员、西北工农革命军总指挥等职务。是西北著名的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渭华起义失败后壮烈牺牲。

唐澍，字东园，一九〇三年出生于河北省易县南贾庄（现属徐水县瀑河公社）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易县是个依山傍水、雄伟壮观的丘陵山区。这里有著名的易水河，“易水河畔多壮士”，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唐澍的祖父唐湘云是前清秀才，后因年景不佳，土地陆续变卖，生活日益窘困，到其父辈，家境已贫穷。父亲唐衡三，上过私塾，当过学徒，后在一家商店当记账先生。因家中人口多，收入少，又将房子卖掉，全家住在本族的唐家祠庙中。唐澍兄弟三人，哥哥唐浩，弟弟唐治（思源）。母亲是农村妇女，早年去世。

唐澍少年时代先跟父亲读私塾，后到离本村十多里的东邵村读高级小学。他学习刻苦，经常在昏暗的棉油灯下学到深夜，考试成绩名列前茅，深得具有进步思想的校长吴伯卿先生的喜爱和器重，高小毕业后，学校留他任小学教师。后来，家乡南贾庄成立了小学，他回乡担任朝阳初级小学的教师。这所

学校有学生四五十人，分四个年级，所有的课程全部由他一人担任。他教课认真，对学生要求严格。在国文课中，常选些古代爱国者或有正义感的侠客的故事教育学生。如讲战国时期在易水河畔送荆轲前往秦国刺杀秦始皇的故事时，他绘声绘色地朗读“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已去兮不复还”的悲壮诗句，讲得生动形象，很有感情，给学生以深刻的印象。

一九二二年夏，唐澍考取了保定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通称保定二师）。二师学校学生享受公费，勿需家中负担。保定二师距北京较近，受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较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党组织，曾派人到该校进行革命活动，师生思想比较活跃，学生的反帝爱国活动也较多。唐澍从偏僻的乡村来到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感到一切都很新鲜，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他勤奋学习学校规定的各项课程，同时，还阅读各种书报杂志，增长知识，开阔视野。他艰苦朴素，尊敬老师，团结同学，热心为集体办事，得到师生的赞扬。在进步教师张湛明等的引导下，唐澍阅读了李大钊著的《史学概论》、《唯物史观》以及马列主义的通俗读物《共产主义ABC》等。他开始懂得了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道理，懂得了中国贫穷落后的根子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在进步思想的指引下，唐澍以崭新的姿态，积极投入了该校反对反动校长刘绪增迫害学生的罢课斗争。他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到天津向直隶督军王丞斌请愿，揭露刘绪增的种种丑事。王丞斌慑于广大学生的义愤和社会舆论，被迫撤了刘的校长职务。斗争胜利了，但校方担心再发生学潮，于是将唐澍等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开除出校。

唐澍被迫辍学，这对他是一次重大打击。保定二师的进步

师生，对唐澍深表同情，大家集体资助了二三十元，东邵学校校长吴伯卿也给予资助。一九二四年初，经保定二师张湛明老师介绍，唐澍绕道陕西前往上海，准备入上海大学学习。到上海后，得悉在广州建立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又决定前往广州，投考军校。

一九二四年初夏，唐澍考入黄埔军校，为该校第一期步兵科学员，与左权^①、王尔琢^②、徐向前、陈赓等是同期同科同学。在校期间，他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学习了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三月，唐澍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留校工作。此间，他曾在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兼任军事教官，讲授军事课，指挥军事操练。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十月，唐澍同黄埔军校学生军一起，两次参加东征讨伐叛逆陈炯明的战斗。他冲锋陷阵，不怕牺牲，在东江地区的一次战斗中，和几个战士冲入敌阵，与大部队失去联系，人们误以为他已牺牲，后来他带着杀敌的喜悦凯旋归队，受到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一九二五年秋，中共广东区委调唐澍从事工人运动，担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总教练^③，后又兼模范大队大队长^④。在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下，他将工人纠察队按军队编制组成，设总队、大队、支队、小队、班五级领导序列，共有

①左权，抗战时期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1942年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牺牲。

②王尔琢，曾跟随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参谋长，1928年8月牺牲在江西省崇义县。

③《工人之路特号》第136期，1925年11月9日。

④《工人之路特号》第269期，1926年3月24日。

两千余人的武装力量，由徐成章（纠察队常务委员兼总教练）、唐澍负责总队的训练教育任务。唐澍、徐成章仿效黄埔军校的训练方法，在纠察队中既进行军事操练，讲授军事常识和基本战术要领，又注重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教学形式灵活多样，经常组织队员参加有意义的社会活动。据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工人之路特号》报道：“纠察委员会各队自改编后，对于训练上特别注意，委员会为谋各队员精神奋发起见，特发起纠察队全体（徒步）旅行，并致祭黄花岗烈士之举”^①。在致祭活动的会上，徐成章、唐澍等相继讲话，指出：七十二烈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而英勇牺牲，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孙中山总理坚持革命，“改组国民党，联合我们工农阶级，认定革命事业向前奋斗，誓达到民族解放而后已”^②。他们勉励全体纠察队员学习烈士的革命精神，与帝国主义、军阀势力作坚决斗争，以取得省港大罢工之胜利。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广州各界十万余人举行集会，纪念二七大罢工三周年，唐澍担任大会指挥。他和纠察队其他负责人员一起，率领工人纠察队参加了大会，聆听了林伯渠、邓中夏、恽代英、何香凝等人的讲话。会后游行，“由总领队徐成章及唐澍指挥各团，次第鱼贯出门，先学界次工界，又次为军政界，各团体均派人沿途散发传单，并高呼口号”^③。他还经常组织或参加工人纠察队的集体活动，如参加纠察队青年工人大会发表演说；组织模范大队、特别大队和宣传队举行元旦联欢大会，加强对工人的教育。

^{①②} 《工人之路特号》第170期。

^③ 《工人之路特号》第226期，1926年2月8日。

唐澍重视教育纠察队员坚守工作岗位，严格履行《纠察队组织法》的规定^①。从一九二五年秋天起，纠察队的水陆侦察队，在铁甲车队（队长周士第，党代表廖乾五）的协助下，截获大批粮食和仇货。据报道：“铁甲车队出驻深圳各地，帮助纠察（队）截留粮食，数日来著卓成效。”^②在纠察队封锁港、澳期间，多次与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武装发生战斗，每遇紧急事情发生，唐澍总是亲临前线处理，并及时向罢工委员会报告。省港罢工委员会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五日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说：“纠察队总教练唐澍电称”，深圳纠察队及“铁甲车队六十余人，被匪四百人包围猛击”，“队员十余名殉难，被虏去二十余名”，纠察队“第十支队队长蔡林蒸身中三枪，现已殒命”，敌众我寡，我军不支，“恳请急速示以进退方略，否则火速派队来此。”^③在这枪林弹雨的战斗中，唐澍表现了勇敢作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没有命令绝不自由行动的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唐澍不仅在战场上驰骋杀敌，而且在政治理论上也有相当造诣。他能写文章，尤善于宣传鼓动，是青年军官中能文能武的佼佼者。

一九二六年五月，北伐战争前夕，唐澍根据复杂的斗争形势，发表了题为《国民革命的真实基础——工农商学大联合》^④

① 《纠察队组织法》规定了纠察队的任务是：“甲、维持秩序；乙、截留粮食；丙、严拿走狗；丁、拘捕工贼；戊、查缉仇货；己、封锁香港、澳门、沙面交通。”见《工人之路特号》第147期，1925年11月20日。

② 《工人之路特号》第135期，1925年11月8日。

③ 《工人之路特号》第136期，1925年11月9日。

④ 《工人之路特号》第333期，1926年5月28日。

一文。这篇文章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者与军阀”，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目前呻吟在双重压迫之下，而要求解放的中国人，不只工人农民，除了他们以外，还有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和一般穷苦的读书人”。“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只是为一个阶级谋利益，而是为工农商学等共同的幸福。同时这个国民革命，不是那一个阶级单独可以成功的，却是需要一个革命民众——工农商学——的团结。”^①

革命者应当怎样认识广东国民政府呢？国民政府应该怎样对待广大革命群众呢？他在文章中说：“广东是中国革命的根基，广州国民政府是革命的柱梁，欲求国民革命成功，须使这个柱梁稳固；而这个柱梁稳固与否，要看它是否放在磐石上面。什么是国民政府的磐石？这就是统一的民众势力。”^②他主张我们党在同国民党合作的同时，要重视对工农群众的领导，以壮大可靠的革命力量，从而巩固与扩大革命的统一战线。

唐澍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警惕着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破坏革命的罪恶阴谋。他说：现在“国民政府的基础”，“终不算十分稳固，里面存在着很多危险性质”，“反革命派受了帝国主义者指使”，制造谣言，挑拨离间，使革命内部“互相猜忌”，“自己分裂”，因此需要“工农商学联合起来”，回击反革命企图破坏革命的罪恶行径。在这里，他实际上已暗示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是分裂活动和阴谋夺权的勾当。唐澍充分利用工人纠察队总教练和模范大队大队长职务的有利条件，把阶级斗争的观点灌输到工人中去，以提高工人的阶级觉

^{①②} 《工人之路特号》第333期，1926年5月28日。

悟。这批两千多人的武装纠察队员，在一九二六年，除少量留下外，一部分随北伐军先遣队——叶挺独立团参加了北伐，大部分作为运输队员于同年七月随北伐军一起出征。

唐澍为了教育自己的哥哥（唐浩）和弟弟（唐治）参加革命，多次去信和寄进步书刊，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在他那穷乡僻壤、消息闭塞的家乡，唐浩兄弟经常看到唐澍寄来的《向导》、《新青年》、《资本论入门》和《人类进化史》等进步书刊，眼界为之一新。

一九二六年秋，北伐军进入两湖地区。此时，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召集旧部组织成了国民军联军，在绥远省的五原县誓师参加国民革命，并要求我党派军政人员到该部工作。唐澍奉命去冯部工作。在北上途中，他顺便回家看望了重病卧床的母亲和年迈的父亲，还对本村劳苦农民进行通俗的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半月后离家时，他把哥哥唐浩带到张家口，参加了革命。

唐澍到张家口以后，在冯部军官学校任教官兼队长，不久调到政治部工作。一九二六年冬，军官学校随冯部经绥远、宁夏、甘肃，于一九二七年初到达陕西。是年三月，军官学校改为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学校，续培模（范亭）为校长，王文彬为副校长^①，唐澍任主任教官^②，开始大量招收新生。唐澍以讲授军事课为主，同时也兼任政治课，主要讲授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他讲课条理清晰，感情豪放，很有鼓动性，深受学

^①1927年3月26日陕西《国民日报》。

^②1980年6月20日、1982年9月9日访问马云泽、黎民觉记录。

员欢迎。学生幽默地称他为“托拉斯”、“辛迪加”和“唐贯贯”。“唐贯贯”的由来，是他讲课中引用孔子的话“吾道一以贯之”，说明革命的道理要贯彻始终，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不能动摇对革命胜利的信念。为了加强与社会的联系，扩大革命宣传工作，学校成立了红色剧团，唐澍是剧团的主要负责人。他曾亲自带领剧团在西安著名的剧社——易俗社进行宣传演出，演出的节目大部是自编的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歌新戏，收到很好效果。

同年四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西安后，西安各界立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浪潮。五月五日，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唐澍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军事政治学校（国民军联军于五月一日宣布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军政学校随之改名）国民党特别支部负责人的身份，主持召开了该校国民党员大会。他首先报告了开会的意义，指出：“蒋介石背叛革命，阻挡不了向前发展的革命潮流。”号召“全体革命同志要不屈不挠的奋起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①大会通过了宣言和通电，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开除蒋介石”党籍、下令通缉归案^②的决定。不久，冯玉祥部东出潼关进军河南参加北伐，唐澍随军事政治学校先后移至洛阳、开封等地。

七月初，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和豫陕等省进行“清党”，唐澍被“礼送”出境。

七月中旬，唐澍由河南开封几经辗转回到西安，参加了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的领导工作。不久，受省委派遣和省委军委书记

^①黎民觉 1983 年 7 月 18 日的回忆。

^②1927 年 5 月 6 日陕西《国民日报》。

记魏野畴、军委成员白乐亭一起前往陕北，了解大革命失败前后各地党组织的状况，向党团干部讲解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要求党团组织迅速改变活动方法，转入地下斗争，保存革命力量，准备开展新的斗争。经延安时，他们与当地党团组织负责人一起开会，分析研究了时局的变化和新的斗争策略。然后，他们来到驻清涧的石谦旅，召集了该旅党组织会议，部署了斗争的任务和策略。根据省委决定，将唐澍留在石旅工作，担任该旅党团书记，除负责制定、实施石谦旅的军事行动计划外，还受省委委托，负责领导整个陕北的军运工作，积极进行武装反抗陕北军阀井岳秀的准备。唐澍在石旅李象九（中共党员）营先以李的朋友，后以营部军事教官的公开身份，掩护党的秘密工作。他熟悉操典，运用自如，指挥有术，训练得法，深得官兵钦佩。他还善于讲话，富有鼓动性，遇事沉着，处理问题有魄力，被誉为“组织和军事才能俱佳”^①的好指挥员，在官兵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八月下旬，同情革命的石谦旅长在榆林被井岳秀派刺客杀害，任命反动营长康子祥为代旅长。此时部队人心浮动，石谦的旧部下对井岳秀的谋杀行为表示愤慨，要为石旅长报仇。井岳秀怕石旅生变，遂授意其师长高双成下令，将李象九营开赴延安，准备将其改编；将谢子长连从安定（今子长县）开赴宜川“换防”，阴谋消灭这两支所谓“赤化”了的部队。在此紧要时刻，省委指示：我李、谢部队不能坐等敌人消灭，应立即举行起义^②。

①呼震西：《清涧起义漫忆》，载《革命英烈》1982年第1期。

②雷恩钧：《回忆清涧起义》（未刊稿），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按照省委“立即举行起义”的指示，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在讨论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时，李象九等主张借运送石谦灵柩回白水路经延安的机会，先派遣领款人员和护灵人员暗藏器械，埋伏城内，然后大军轻装袭取延安，得手后，再以延安为依据，联络陕北高志清旅，联合攻打榆林。唐澍主张坚决执行省委指示，把分散在清涧、延川、延长、宜川等地的部队集中起来，形成一股力量与井岳秀对抗。唐澍的这一主张为石旅党团员所接受。为了争取起义的准备时间，部队故意拖延对石谦遗体的发丧日期，待起义准备工作就绪后，利用“为石谦旅长报仇”、“打倒军阀井岳秀”的口号和借去宜川“换防”的名义举行起义。

起义前，唐澍、李象九主持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和排以上干部会议，向党员和干部传达了省委对起义的指示及部队党组织关于清涧起义的各项规定，要求党员和各级领导作好准备工作，确保起义的胜利。这次起义的行动计划是：驻清涧的四个连首先起义，然后会合延川县另一个连南下宜川，与宜川的三个连会师。同时，派代表联络驻神木县的高志清旅，约定在神木起义，共同夺取绥德、米脂，夹攻榆林，消灭井岳秀的反动武装。

按照这个计划，当即派党员吴锡昌先行出发，通知在宜川的三个连，要他们作好内应。还派出警戒部队，割断电话线，不准城内人员外出，查封了大商号的银柜，打开大商号的烟土（鸦片）库，没收了全部烟土。旋将伪县长和大绅士召集到起义指挥部，由李象九对他们讲话，说明借用他们的钱物，对人不加伤害。

十月十二日——预定起义的时间到了，唐澍、李象九、谢

子长等领导人先给陕北各地党组织派来参加起义的人分发弹药，检查了各项准备工作。傍晚，全体官兵集合，唐澍、李象九相继讲话，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罪行；介绍了南昌起义的情况，号召全体官兵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倒陕北军阀井岳秀，为石谦旅长报仇。广大官兵义愤填膺，严阵以待，听候起义号令。接着，唐澍宣布部队起义和南下命令，要求全体官兵为民除害，勇敢作战，严守纪律，秋毫无犯。还规定参加起义者每人臂上缠一红布袖条为标记，把准备好的标语四处张贴。

十月十三日黎明，起义指挥部和四个连以及二百驮辎重，浩浩荡荡开出清涧城南下。当天下午到达延川县城，会合了共产党员王有才领导的一个起义连队。夜晚，乘胜向延长前进，中途截获了高双成部正在驮运的烟土四十驮。部队到达延长后，出敌不意地一举歼灭了敌军两个连和一个营部，处决了反动营长祁梅卿。此时，驻宜川的敌代理旅长康子祥先发制人，向该县城准备起义的三个连发起围攻。这三个连的官兵在党的领导下勇敢还击，激战一昼夜，待十月十五日唐澍、李象九率起义部队赶到宜川城下时，康子祥率部仓惶逃跑，三支起义部队遂在宜川城胜利会师。附近许多农民赶来慰问起义部队，纷纷要求参军。至此，起义部队发展到一千余人，长短枪千余支，形成了一支相当可观的革命武装力量。

宜川会师后，起义的领导人在部队行动方向上发生了分歧意见：唐澍等主张立即打起革命红旗，整顿干部队伍，清洗不可靠的旧军官，由共产党员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然后率部主动进攻，相机消灭高双成部，扩大革命力量。李象九等则认为打红旗的条件尚不成熟，暂时延用旧番号比较妥当，对非党员的

旧军官不能清洗，应逐步改造，以免引起大的波动。在部队整编时，李象九任旅长，任命原旅部参谋孟激斋为参谋长，唐澍为参谋，将所属部队改编为三个营，任命谢子长、李瑞成，韩子丰为营长。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滞留宜川；唐澍带着为党组织筹备的一千五百块银元的经费，秘密赴西安，向省委请示汇报。

十月下旬，唐澍到西安，向省委军委书记李子洲汇报了起义情况和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意见。李子洲听取了唐澍的汇报后，对起义部队中党的工作及军事行动方向等均作了具体指示，并以省委名义作出了《陕北军事行动与决议案》。这个决议具体分析了陕北的政治形势、井岳秀所辖各部队的军事实力和他们之间的矛盾，要求起义部队联合与井岳秀矛盾最深的高志清部，从军事上打垮井岳秀，建立党在陕北的军事基础。为了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决议指出：“旅中一切皆须受党的指挥，由党团及支部分别决定，一切同志皆须改正个人意志，个人处决的恶倾向。”在人事安排上，指定唐澍在行政上担任旅参谋长，其他重要干部的任免，由旅党团讨论决定。同时，还要求起义部队与渭北的许权中（中共党员）旅取得联系，协商军事行动，互相策应。若许旅不能在关中立足时，可退往陕北，与李旅合编为陕西革命军。省委还要求唐澍去三原，与阎揆要、白志强等军事干部一起到宜川整顿起义部队，举办军事教导队培养军政干部。

唐澍、阎揆要、白志强一行在去宜川的途中，获悉起义部队由于遭到高双成部的攻击，损失严重，已被迫转移到韩城西庄镇。他们日夜兼程赶到部队。此时，部队已被韩城驻军王保民改编为独立旅，李象九任旅长。唐澍、阎揆要等在党内传

达了省委指示，总结这次起义的经验教训，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他们在部队成立了教导队（阎揆要任队长），培养基层干部，并加强了对部队的训练，“每日黎明即起，操练士兵。”^①

十二月中旬，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等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改组了军委（唐澍任书记、李象九、谢子长、阎揆要、白乐亭、白志强等任委员），决定在韩城再次发动起义。军委以谢子长营的一百多人为基础，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唐澍、谢子长任总副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军委还决定把新编的游击支队带到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一九二八年元月初，唐澍等率部离开韩城北上，向清涧、安定一带进发。途中由于轻信了“宜川城内只有敌军一个连”的传闻，冒然攻打宜川（宜川守敌有一营多人，且占据有利地形）。我军攻击半日不克，伤亡严重，只好撤出战斗向西北退去。行至延川与延长交界的交口时，又遭到敌人袭击。部队进至瓦窑堡附近，准备去洛河川的深山休整，不料驻瓦窑堡之敌崇保清骑兵团跟踪追来，部队未能进山休整，又向西北方向行进，经安塞、保安，到达陕甘交界的豹子川（属甘肃合水县）。这时，起义部队仅剩数十人，且处于粮尽弹绝、强敌追赶的险恶环境中。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唐澍、谢子长等决定部队暂时分散隐蔽起来，待机再起，清涧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清涧起义是我党领导西北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打响

^①李象九回忆清涧起义的材料（1959年，未刊），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的第一枪，是创建陕甘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前奏。它削弱了陕北军阀的力量，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得到了锻炼，为以后的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

一九二八年二月，唐澍历尽了艰险，辗转回到西安，向省委汇报了清涧起义失败的经过和教训，请求省委分配新的任务。在西安期间，他住在省委秘密机关涝巷顺义店，头上缚白羊肚手巾，穿着没有挂面的老羊皮袄，完全是陕北青年农民的打扮。不久，省委决定派唐澍去洛南三要司许权中旅任参谋长，参加旅党委的领导工作，并派党员周益三（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与唐澍同往。他们步行三天，到达三要司，见到了旅长许权中、旅党委书记高克林和早先到这里的刘志丹、谢子长、廉益民、吴浩然、杨晓初、李大德等旅党委成员。二月中旬，在三要司和寺坡之间的一片坡地上，召开了军人大会，许权中在会上讲了话，并宣布唐澍任旅参谋长职务。唐澍在讲话中，要求全旅官兵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刻苦进行军事训练；并表示自己一定要忠于职守，严格要求，与大家一齐齐心共进。

许旅当时属陕军李虎臣部，番号是新编第三旅，有官兵一千二百九十人，长短枪一千零二十支，机关枪三挺，迫击炮四门，装备良好。部队中党的力量很强，在全旅起主导作用，再加上许权中等军事指挥员久经战火，经验丰富，部队训练有素，是一支战斗力相当强的部队。唐澍到职后，协同许权中、高克林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和军事训练；就地建起了一个修械所，制造炮弹、手榴弹，修理枪炮，准备起义；在军队内部整顿组织，清洗反动分子，提拔优秀党团员担任基层领导，强调官兵一致，提高指战员的自觉革命精神。他们还发动

当地群众，成立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粮食，不断扩大革命影响。有一次，许权中和唐澍深入群众与老农谈心，征求他们对部队的意见。一位农民指着麦田里的一条小路告诉他们说：麦子已经返青了，请给战士们讲一下不要再从地里走了。这句话引起了唐澍的高度重视。第二天，他命令几个战士把麦田小路上的石子、瓦片都拣出来，把小路两端用刺梢堵住。从此，战士们再不走麦田的小路了。部队这一爱民行动，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

一九二八年三月，省委书记潘自力由上海带回党中央给许权中及旅党委的指示信，指出许旅的出路有三条：“第一，开赴陕中农运与党比较有基础的地方，去帮助并发动农民暴动，有可能时，可以形成一割据的局面；第二，开赴豫西帮助河南的农民暴动；第三，开赴鄂北，准备将来与两湖的革命势力联贯起来。至于究竟走哪条路，要看动作时的实际环境来决定——由陕西省委决定。”^①三月底，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成立了以刘继增为书记的陕东特委，负责领导渭（南）、华（县）地区的农民起义。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盘踞在洛南的李虎臣，趁冯玉祥主力出陕赴豫同奉系军阀混战之际，发动反冯战争，令许旅开赴潼关，阻挡冯玉祥的宋哲元部回陕。旅党委讨论这一问题时，唐澍等认为省委指示已成定案，应该坚决贯彻执行，主张脱离李虎臣，直接将部队拉到渭华地区参加农民暴动。许权中等则认为军阀混战的时机对我们有利，如果与李虎臣一起打下潼关，不但可以扩大部队，增强实力，也可以创造条件，扩大暴动区

^①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域，于革命有利。在起义地址的选择上，许权中认为渭华地区处渭河、秦岭之间，地区狭小，不利于我军的活动，主张向渭北一带发展。在这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时，旅党委决定一面派人请示省委；一面假意“执行”李虎臣的命令，向潼关前线移动；同时派许维善，雷天祥（许、雷均为中共党员）率教导营的近百人先去渭华参加农民暴动，由许权中、唐澍等率大部队集中灵口，出蒿岔峪去潼关。狡猾的李虎臣，在攻打潼关的战争中，把许旅夹在中间。一则让许旅替他“火中取栗”，削弱革命武装；二则阻击冯玉祥主力入陕，企图来个“一箭双雕”。战争打了几日后，冯玉祥部因豫西战事缓和，不断抽调重兵增援潼关，因而许旅在战场上久攻不克，部队伤亡甚大。在此情况下，唐澍、刘志丹、高克林等在战地研究，认为决不能在潼关继续死拼硬打，为军阀火中取栗，便果断地带着部队撤离战场，急行军一夜，从潼关沿山一带到达华县瓜坡镇。唐澍、刘志丹、高克林等经过研究和准备，在这里召开了军人大会，宣布许旅武装起义，成立共产党领导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军委常委、军党委委员，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王泰吉任参谋长，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吴浩然任军党委书记，许权中任总顾问，高克林任参谋主任。全军指战员群情激昂，把国民党军队的帽徽摘下来踩在脚下，举起红旗，激动的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共产党万岁！”工农革命军下设四个大队，一个警卫队（又称赤卫队），一个骑兵分队。经过整顿，全军上下斗志昂扬，直奔渭华参加农民暴动。

五月十四日，中共陕东特委和工农革命军司令部在高塘镇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军民联欢会，热烈庆祝西北工农革命军的诞

生。这一天高塘恰好逢集，起义部队和陕东赤卫队、各村赤卫队员、农民协会会员及各阶层群众近万人，高举红旗，敲锣打鼓，欢聚在会场。唐澍操着河北口音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镰刀、斧头是我们的武器，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团结起来，在工农革命军的配合下，就一定能把革命搞成功。他的讲话引起了群众的欢呼。刘志丹等也先后讲了话。随后，赤卫队员处决了几个劣绅和制造谣言、阻拦群众参加联欢大会的坏人。会后还举行了游行示威。

渭华起义后，工农革命军张贴布告^①，公布政纲，号召人民群众打倒土豪劣绅，摧毁地方反动政权，建立革命政权。工农革命军帮助渭华地区的党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捉劣绅，分浮财，分粮食，并着手准备进行分配土地给农民。在渭南崇凝镇和华县高塘镇一带建立了数十个乡村苏维埃政权。工农革命军还多次向渭南、华县县城和赤水镇一带出击，袭击敌人从西安到潼关的交通运输线和敌人的驻军据点，打得敌人到处紧张慌乱，不得安宁。很短时间内，便使南起秦岭、北至渭河之间的大片地区，形成了红色政权割据局面。农民踊跃参军，高兴地唱着：“不爱银子不爱财，光爱工农苏维埃；不爱金子不爱钱，光爱人民新政权”的歌曲。

渭华起义和红色政权的建立，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

^①由唐澍、刘志丹、刘继增署名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布告》内容如下：“土豪劣绅和财东，剥削穷人真个凶。加一放账驴打滚，卖儿卖女还不清。要账手提棍棍子，打人不分老和幼。如今穷人要翻身，大家团结来求生。西北工农革命军，他是咱的子弟兵。大家同心一齐干，铲除土豪和财东。贪官污吏都打倒，我们要作主人翁。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过上好光景。”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保存的文物照片，标点为编者所加。

陕西的反动统治。同时，由于工农革命军频频出击，还威胁到敌人沟通豫陕的交通大道，影响其在河南的地位。为了扑灭渭华暴动的烈火，敌人调集大批兵力，配备机枪火炮，在当地反动民团的配合下，由敌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亲自指挥，接连三次围攻革命军，镇压农民暴动。

六月上旬的一天拂晓前，宋哲元以一个旅的兵力，在渭南县保安团的配合下，从渭南县城向东进攻，妄图经龙尾坡攻占陕东赤卫队塔山军事据点。工农革命军第三大队一部和陕东赤卫队根据唐澍、刘志丹的指示，埋伏在龙尾坡南端前沿阵地的段家附近。当敌人刚到龙尾坡的南边时，革命军第三大队和赤卫队立即给敌人以突然袭击，敌人死伤甚重，被迫撤退。起义军民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攻。

六月十日左右，敌人以田金凯一个骑兵师为主力，从华县出发，经瓜坡镇、大明寺，妄图一举攻占工农革命军高塘司令部。敌人每到一村，杀人放火，高塘以北形成一片火海。此前，革命军第二、三大队已被派出袭击华县县城和到赤水公路一带进行游击活动，工农革命军司令部兵力空虚，前沿阵地上只有一个连和司令部的警卫队两支小部队；加上对敌情侦察不够，防范疏忽，致使东面敌军一直冲到司令部所在地高塘小学东北三里的骆驼渠村时，才被哨兵发觉。在此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唐澍指派司令部警卫队长张汉泉配合第二大队第五中队队长周益三，率领警卫队和二大队留守人员与敌激战。正在这战斗吃紧之际，出外执行任务的革命军第二、三大队赶回，从东西两面对敌形成夹攻之势，敌人误以为中计，仓皇逃走。革命军又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攻。

战斗结束后，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总结经验，

许权中提出渭华地区是豫陕两省的交通要道，距离中心城市西安较近，是敌人必争之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不能在此久留与敌人硬拚，应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又有回旋余地的渭北山区建立根据地。这个意见为唐澍、刘志丹等所接受，立即派人到渭北侦察地形，筹集弹药，为部队向北转移作好准备。后因北上道路强敌密布，渭河各渡口和交通要隘均被敌军占据，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六月二十日，敌人以魏凤楼、田金凯等三个师的兵力，由宋哲元亲自督战，分东、西、中三路，向我高塘和塔山据点进攻。战斗一开始，东、西、中三线都打得十分激烈。从赤水西川进攻的中路敌军，企图首先占领魏家塬，进而夺取箭峪口，切断工农革命军司令部与塔山军事据点的联络，并配合东川来的敌人进攻工农革命军司令部所在地高塘。魏家塬在高塘的西北面，是川外和高塘的要冲，素有“高塘门户”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唐澍指挥工农革命军一个中队和陕东赤卫队一部在这里修筑了隐蔽的工事，英勇地与十倍于我的敌人展开血战，打退了敌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的多次冲锋。敌人从正面进攻受挫后，把一个营的兵力换上便衣，悄悄地从魏家塬向革命军侧翼进攻。富有作战经验的唐澍立即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命令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动员群众，把这些冒牌农民轰回去！”薛自爽飞奔到三教堂村敲钟报警，立即有五、六百农民扛着土枪、锄头、阔斧赶来参战。在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把这股化了装的敌人压了回去。

经过半天苦战，革命军虽然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消灭了大量敌人，但自身伤亡也很大。为了保存实力，唐澍指挥革命军和赤卫队撤退到涧峪、牛峪、箭峪一线，司令部和总部人员

大部分退到牛峪。次日晚，唐澍等组织几个中队，趁敌人立足未稳，奇袭了敌人设在高塘的司令部和魏家塬阵地，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后，仍退回牛峪。二十二日拂晓，敌人从沿山阵地全面向我军发起进攻。唐澍令周益三带一个中队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向洛南县两岔河撤退。在进山三四十里的一个叫泽涛的村子，唐澍整顿了部队，并派人和由西路入山的许权中等联络。六月二十五日，革命军陆续撤到两岔河，司令部设在洛原，即派赵雅生带领第一大队进驻离两岔河三四十里的保安镇。此时，两岔河群众逃躲一空，唐澍积极动员群众回家照常生产，同时调查洛原周围的地形、道路和敌情。在端午节前后，唐澍还同王泰吉、王尚德等一起，慰问了革命军的伤病员，参加了军民联欢大会。

七月一日，驻洛南的李虎臣部七、八百人，在当地豪绅掌握的红枪会的配合下，向驻守在保安镇的革命军第一大队百余人发动围攻。唐澍闻讯后，亲率革命军近百人前去增援。黎明，唐澍率领的部队赶到保安，在镇外环山一带被敌人包围。战斗从早晨打到中午，我军虽英勇奋战，前仆后继，终因敌众我寡，我军弹药耗尽，力不能支，被敌军冲散，少数人突破重围，其余大部牺牲，有的被俘。唐澍仅带六名战士夺路冲到附近的碾子沟，不料又被当地地主武装陈彦策的民团挡住去路，后面又有敌军跟踪追击，情况万分危急。唐澍临危不惧，率警卫员与敌展开英勇战斗。在激战中，唐澍腹部多次中弹，仍坚持还击。最后，在一个小水池旁边以身殉职，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唐澍：《国民革命的真实基础——工农商学大联合》，载《工人

- 之路特号》第333期。
2.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3—7月)。
 3. 《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同学录》。
 4. 《工人之路特号》第136—333期。
 5.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陕北军事行动与决议案》(1927年11月)，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6. 《中央给许权中同志信》(1928年3月20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7. 《陕西省委临时通信》第2号(1928年8月1日)。
 8. 唐思源：《忆澍兄》(1982年9月)，原件存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
 9.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0. 高克林：《回忆参加渭华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载《党史研究资料》总第50期。
 11. 呼震西：《清涧起义漫忆》，载《革命英烈》1982年第1期。
 12. 雷恩钧：《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载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13. 《魏野畴传略·回忆·遗文》，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4. 《西北红军战史》。
 15.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6. 杨晓初：《渭华起义片断》，《星火燎原》选编之一，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
 17. 潘自力、刘继增、李象九、冯文江等同志写的回忆材料。
 18. 《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汇编》第一集及农讲所第三届学生冯兆朝、梁显云回忆。
 19. 访问唐思源、唐沛然、唐玺玉、唐润、唐瑞桐、阎揆要、高克林、马云泽、黎民觉、周益三、方仲如、刘贯一、王曙、李果、胡震、呼震西、马文彦、曹志麟、张归仁、王云、徐天杰、王蒂南、李瑞阳、赵和民、李波涛、易厚菴、李毓章、梁俊琪、郑殿华、贺智章等同志的记录。

谭 寿 林

李 业 安

热情如火吼如雷，
俘虏生还气不隳。
恨病折磨难杀敌，
回家探问亦招灾。
穗城喋血乌云堕，
沪渎逢春旧雨来。
两卷遗编容我读，
怅然怀念惜英才^①。

这是董必武一九六二年四月写下的怀念谭寿林烈士的一首七律。

谭寿林是广西早期党的主要领导人、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日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丈夫当以功济四海”

谭寿林于一八九六年出生在广西贵县三塘乡谭岭村一个农

^①董必武：《读谭寿林同志遗著〈俘虏的生还〉》，1962年8月24日《人民日报》。

民家庭。他在邻村的私塾念书很用功，会作文对诗，还经常帮助老师挑水、烧茶、扫地。

一九一六年秋冬，谭寿林在三塘区立小学补习时，对当地的公局（团防局）老爷们欺榨人民、中饱私囊的丑行，极为不满，曾偷偷地在三塘公局门口写过一副对联：“供（公）肥三只狗，焗（局）瘦一圩人。”巧妙地利用谐音揭露三塘公局贪官污吏的丑恶面目。

一九一七年，谭寿林考入贵县中学。他家离县城几十里，自己挑行李、担膳米到学校。他穿的是家里织的黑萱麻布衣服，用的是黄麻蚊帐，生活很简朴。一些公子哥儿曾讥笑他为“村巴佬”。他不理会这些，专心致意地攻读。在中学的四年里，他有七个学期在班上得第一名，一个学期得第二名。起初看不起谭寿林的人，后来也不得不敬佩他了。

谭寿林写的作文常常被老师拿来贴堂、做示范。他中学时期留下的一百十三篇作文，大部分是议论文，如“丈夫当以功济四海论”、“非德不交论”、“正人难进易退说”、“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论”等，三、五百字一篇，短小精悍，老师评语说他“笔势纵横”。他在《丈夫当以功济四海论》中写道：“今日之中国，正当多事之秋也，外有强邻之逼，内有剧寇之萌，使无人支柱其间，难保无陆沉之祸也”。他表示“天下有事，丈夫当以功济四海”，“出而拨乱反治于其间”，表明了挽救中华的抱负。“五四”运动期间，他写的“论鸦片之害”、“举贤用才为今日之要务论”、“国耻当雪论”、“外侮日逼论”、“爱国必先合群论”等短文，充满忧国忧民的思想情绪。他在《谈让》一文中写道：“当让则让，不当让则不让，现在帝国主义欺侮我们，侵略我们，则绝不应让！”理直气壮，

反帝爱国精神跃然纸上。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贵县中学接到了北京学生会的通电。谭寿林等团结贵县中小学的学生，积极筹备组织贵县学生联合会，带领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为了配合抵制日货，他在贵县《晨报》上发表了一首抵制日货的白话《儿歌》：“亚妈唉，你勿忧，儿今抵制有机谋，有钱勿买日人食，无衣不着东京绸。日货劣，国货要研究，待过几年儿长大，一定挺身报国仇。”许多中小学生和少年儿童学会唱这首儿歌，积极投入抵制日货的运动。

贵县学生联合会成立，谭寿林被选为学联合会会长和出席广西省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贵县学联合会积极领导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的斗争。谭寿林与学联合会另两个负责人李镇峰、高耀光，到贵县商会商量抵制日货的办法，订定三条协议：（一）现存店内日货，登记限期销清。（二）在途日货于即日算起，梧州运上在三天内到达的，广州运上在五天内到达的，准予提货销售。（三）超出第二条规定期限运到的，显然私运，查获即照协议没收焚毁。学联合会积极督促同学，日夜轮流值班检查日货。有一次，贵县商会会长蔡觐文开设的启昌号杂货铺，偷运日货红磷火柴（舞龙牌、舞狮牌）式百罐，收藏在船仓底下，私运抵贵县。学生们检查发现这批日货后，出动贵县中学全校同学，将日货缉回学校，轰动了贵县县城。当天晚上，蔡觐文假意请谭寿林和李镇峰（学联合会交际主任）到小酒楼宴饮，妄图交涉要回这批火柴。蔡先用笼络手段，送一百元作诱饵，遭到他们拒绝；接着便摆出凶横面孔，指骂学生查禁他的日货是强取豪夺行为，声言要派商团（当时每间较大商店均派伙计一人受军事训练，有步枪一支作自卫）取回被查禁的全部日货。

谭、李等同学不怕威胁，严词拒绝。蔡未得逞，就勾结县官刘天佑，想通过县官出面要回被没收的日货。次日，刘天佑坐着四人抬的大轿，传贴贵县中学，校长急忙大开中门，迎县官至客厅，即传谭寿林等三位学联合会负责人来“谈话”。县官说：

“学生爱国热情是可嘉的，商人初次误犯，情有可原，本县体恤发还，不准焚毁。”谭寿林说：“个人不能代表全体同学意见，待开会讨论后，再为奉告。”县官板起面孔说：“不行，马上要送还！否则，你们好好考虑！”谭寿林义正词严地说：

“这是我们学生的爱国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让日货进入贵县，就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强迫学生交还日货，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县官被驳斥得哑口无言。谭寿林等不辞而退，立即吹哨子集合全校同学，在操场上开大会。谭寿林宣布了与县官谈话经过情况，全体同学鼓噪起来，愤然地说：“我们不怕威胁，不受任何政令限制，依照协议，没收焚毁！”谭寿林说：“好的，大家负责吧！”大家齐说：

“负责！！”于是，九百个同学一齐动手，立即把这批火柴全数抬出示威游行，经过县府、商会和启昌号门前，然后运到县城郁江南岸河边，纵火焚毁，一时烟焰冲天，人心大快，民众隔江观看者二、三千人^①。

“我绝不会去当官铲地皮！”

一九二一年九月，谭寿林考入北京大学乙部预科英文一

^①高耀光：《谭寿林领导贵县五四运动抵制日货的情况》（1963年11月28日）。

班^①。在校期间，他经常同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黄日葵（北大学生、广西桂平人）和陈居玺（北大学生、共产党员、广西人）等人来往，一起打网球。在共产党人的教育影响下，他思想进步很快，参加了反宗教大同盟、民权运动等社会活动，是第二批加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之一。一九二二年谭寿林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他与黄日葵等广西籍同学在北京鑿庆胡同粤西会馆组织新广西期成会，出版《桂光》半月刊。该刊的社论，除黄日葵撰写外，多由编辑谭寿林执笔写稿。他们经常把《桂光》寄回广西贵县、桂平各地，传播马列主义，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以促进广西各族青年的觉醒。

一九二三年秋，谭寿林升入北大国文系。这年暑假，他曾返回广西贵县筹集学费。刚到县城，应贵县中学校长陈勉恕邀请，在贵中演讲。随后，又同陈勉恕一起到圩心街（县城最热闹的道路）演讲，公开宣传共产主义。他回到家里，刚好碰上祖母七十一岁寿辰，许多亲戚朋友来祝寿，并热情捐赠学费给谭寿林。他感激地对亲友们说：“大家这样慷慨支持我，我心里十分感谢，永远不忘。但是，不要以为我以后做了大官，大家能够沾光贴俸，我是绝不会去当官、铲地皮（即搜刮民财的意思）的，我已经打定了主意，几大的官都唔做（即不做的意思），一心只想干革命！”^②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谭寿林等爱好体育活动的同学，发起组织北京大学体育促进会，他主动担任文牍股干事。同月十

① 《北京大学日刊》影印本（8），民国11年10月10日第2版。

② 贵县档案馆：《谭寿林烈士传略》，1974年3月24日编。

五日，在李大钊等导师指导下，黄日葵、谭寿林等五十个同学开始编辑《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册》，后因经费短缺而告停^①。一九二四年秋，由黄日葵、陈居玺介绍，谭寿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②。入党后，他曾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工作，在《工人周刊》搞编辑，还和王尽美等到工人子弟学校上课。后来，因家庭经济困难，学费无法解决，谭寿林到北京一个女子师范兼课，半工半读。最后，连半工半读也难以维持，只得放弃学业，到女子师范教书。他以教书作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我们要努力训练我们自己”

一九二五年，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新桂系统一广西后，对广西各族人民严加控制。他们表面上接受广东的国民政府领导，实际上企图把广西搞成独立王国。

遵照中共“四大”会议的精神，中共两广区委积极开展广西的革命工作，省港大罢工开始以后，先后派党团员龙启焱、周济等到梧州办报纸，开展革命活动，创建了广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梧州支部。一九二五年秋，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亦从广州秘密到梧州，在大同酒店主持召开重要会议，指导广西的革命运动和建党工作。为了加速广西革命运动的发展，加强党的领导，同年冬，中共两广区委通过中共北

① 《北京大学日刊》影印本（11），民国13年1月10日、1月15日。

② 《陈居玺谈谭寿林情况》（1976年5月16日）。

方区委，把谭寿林从北京调来梧州担任党的领导人。一九二六年一月，广西第一个党的领导机构——中共梧州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梧州地委）成立，谭寿林即被任命为中共梧州地委书记^①。随后，他还兼任《梧州民国日报》主任、广西省党部驻梧登记员、广西宣传员养成所讲师、省立二中国文教员等职务。

当时，梧州情况非常复杂。根据上级党委的统一部署，地委书记谭寿林与地委委员们研究确定，在一九二六年元月下旬到二月中旬，全力抓了两项工作：

一是举办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演讲会。一九二六年元月二十一日，是革命导师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日，谭寿林、龙启焱（地委委员）等，在省立梧州二中理化教室举办“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演讲会”，从元月二十一日起到二月一日止，连续十一个晚上，进行公开宣传演讲，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演讲题目有《苏联革命成功的要点》、《列宁主义与中国民众》、《列宁的奋斗精神》、《列宁的成功在哪里》、《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帝国主义的末日》等等^②。每晚听众很多，座无虚席，很受群众欢迎。谭寿林讲《苏联革命成功的要点》时，详细介绍了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主要经验，宣传列宁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他热情称赞列宁“善于运用策略”，列宁的政策“一天一天的有实效”。他号召大家学习列宁的奋斗精神和工作方法，“我们

^①饶卫华：《关于谭寿林同志回广西工作情况》（1981年5月27日）。

^②1926年1月22日《梧州民国日报》

要努力，训练我们自己，……这是我革命青年的责任！”^①谭寿林、龙启焱等在《梧州民国日报》上创办《冲锋》副刊，专门宣传马列主义和国民革命言论，连续刊载《苏联革命成功的要点》等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的文章和讲话。同时，还在中共梧州地委秘密机关（今梧州市建设路兴仁巷四号）三楼上党课、团课。通过学习和宣传，许多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对马列主义、国民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二是举行援助省港罢工周。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中旬春节期间，我党通过梧州国民党市党部，领导梧州各界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援助省港罢工周，“作大规模之筹款与宣传运动”。参加的有梧州工联会、妇联会、学联会、对外协会、市党部、县党部、总商会、广西宣传所、民船工会等九个团体。“筹款方法分售章、游艺、募捐、演剧、报效货品等，所得捐款除临时开销外，悉数援助罢工工友。十五、十六日两天，大光公司非常热闹，市民购券入场者甚为踊跃，座至不能容人……沉寂之梧州至此而变为热烈庆闹之盛象”^②。十七日，梧州各界人民召开“破天荒的援助罢工周大会”，到会者一万多人，市党部、工学妇代表和驻军代表分别发表热情的演说，“最后为谭寿林先生演说，并提案：（一）罢工工友应负起国民革命先锋队之使命，强固组织，奋斗到底。（二）全国革命群众应一致拥护复工条件及予以充分之援助，以鼓励国民革命的先锋队，巩固革命阵线。（三）国民政府对于省港罢工工友，应善为爱护，以鼓励其革命勇气。宣布提案时，群众高呼表示热烈之赞

^①1926年1月29日《梧州民国日报》副刊《冲锋》。

^②1926年2月28日《工人之路》。

同”^①。大会根据谭寿林的提案，向全国发出通电，表示“本市各团体举行援助罢工周大会运动，冀作精神上物质上的援助……誓为罢工工友后援”^②。大会结束时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使支援省港大罢工的斗争在梧州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谭寿林身兼数职。白天，他到报社、宣传所、二中等单位工作，参加筹办苍梧书社，到梧州女师教唱《少年先锋队队歌》等革命歌曲。晚上，他在地委机关秘密召开会议，研究党的工作，或上党课，或写《梧州民国日报》社论和重要评论，指导梧州的革命运动。在他的带领下，各个地委委员和党团员们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都能起先锋、模范作用。

中共梧州地委周济、钟山两位委员分工领导梧州的工人运动，深入各行业发动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一九二六年六月七日，召开梧州工人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一百九十三人，代表有组织的工人九千六百五十人，代表工会二十一个。

在中共梧州地委的直接领导下，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发展很快。一九二六年春，成立了共青团梧州地方团，马英兼任梧州地方团团委书记（马英，四川人，上海大学学生，两广团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任湖南省共青团书记，一九二七年五月在长沙牺牲）。马英同谭寿林一起住在地委机关楼上，经常得到谭寿林的直接教育帮助，使地方团的工作顺利开展。梧州妇女联合会也积极开展工作，组织妇女宣传队，到市区和西江沿岸城镇宣传演出反帝反封建内容的节目，出版了《妇女之光》期刊，创办了妇女工读学校。

①1926年2月28日《工人之路》。

②1926年2月25日《工人之路》。

“象朱砂这样把水染红”

在广东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广西的农民运动亦逐渐开展起来，但一开始就遇到了极大的阻力。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县农民运动，遭到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出现了“东兰惨案”；怀集、平南等地的农民群众，积极筹备组织县农民协会，亦被黄绍竑下令阻止。

中共梧州地委成立后，积极领导梧州郊区及附近十几个县的农民运动。有一次，谭寿林和负责农运的地委委员龙启森等到苍梧县多贤区（今夏郢公社）召开农运骨干分子会议。谭寿林拿来一碗清水，放入一些朱砂，碗里的水逐渐变成朱红色。他指着这碗水，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要积极地开展农民运动，象朱砂这样把水染红！”^①在地委委员林培斌和当地农运骨干苏志才等人的努力下，多贤区的农民运动很快开展起来，并在次年春成立了多贤区农民协会。为了推动广大农民的反封建革命斗争，促进农民运动的开展，一九二六年春，谭寿林从贵县探亲回梧州后，在《梧州民国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牛鬼蛇神之桥圩团局》的锋利的短文，对反动腐朽的封建势力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该文写道：桥圩团局“那杨甫周以吹赌为生，包赌包娼，生财有道，公款变私财，年终结帐则布告消除，无人敢于过问；若莫得乎（莫德孚），优悠自安，岂孚众望？那刘尧楷，伴食宰相，确实清闲；而梁至隆，更是酒囊饭袋，便便大腹；该李相堂，挂名提督，奔走钻

^①广西通志馆调查资料：《苍梧县多贤区农民运动》（1965年夏）。

营，无非横床直竹。众皆尸位素餐，不尽其职。至于言及办盗，则猫鼠同眠，不分清浊，匪盗逍遥法外，良民受尽鱼肉。……彼等实则蛇蝎一窝，不外以团局当秦楼楚馆，日则追利逐禄，夜则娼妓同宿……呜乎！牛鬼蛇神之桥圩团局。”^①文章把封建统治阶级昏庸腐败、鱼肉百姓的丑行，揭露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此外，谭寿林还用《苏武牧羊调》填写了一首《农民歌》，歌云：“农民吃苦最可怜，炎天变冷天，穷愁不计年，被地主和豪绅，吃尽血与汗。尤恨恶政府，杂税与苛捐，穷得没饭吃，破衣没有穿，备尝剥削受尽摧残，提起心痛酸。革命已高潮，抓紧好时机，同胞们快起来，努力向前边，牺牲于革命，心如铁石坚，革命成功大家携手，走向安乐园。”^②这首歌谣曾在农民当中广泛流传，对推动当时的农民运动起了良好的教育鼓舞作用。

为了开展广西的农民运动，中共梧州地委分别派共产党员林培斌、黄启滔（二人均为地委委员）和李植华、谢铁民、罗瑞成、宁培英等到苍梧、岑溪、容县、平南、玉林、桂平、武宣、怀集（过去属广西管辖）等地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谭寿林、黄日葵等后来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桂平“农运是十五年才做起的，主持的是我们同志，农会成立不过三个月即与豪绅斗争（桂平北区），结果胜利，团防局总皆为农会领袖所占（冲突开始时，大湟江口工人得讯即与联系，有代表参加农民集会）。此时农民甚激烈，有武装数百，杀猪宰牛祭旗饮血，要与豪绅血战，经我们同志主张报县解决（恢复被解散农会），不达目的再打仗，群众始安静，后县长下乡，农民主张

^{①②}贵县档案馆：《谭寿林烈士传略》（1974年3月24日）。

完全胜利。经此之后，农民气焰大张”^①。报告还说：“十五年秋平南发生反对百货捐，起因为捐局打死一个卖‘番茹藤’的农民。一时农民蜂集者数千人，捣毁捐局，城中商人学生皆与农民一致主张撤消百货捐。其时政府方面，因梧州工潮、桂平农潮迭起，对之颇为惊骇。……当桂平农民斗争最险恶时，平南北江各区农会纷纷成立者七十余乡”^②。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广西省农民部苍梧道办事处在容县正式成立，办事处主任为地委委员林培斌，委员有黄启滔（地委委员）、李植华（共产党员）等人。中共梧州地委通过苍梧道农运办事处领导苍梧道属下的苍梧、岑溪、藤县、容县、平南、桂平等十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到一九二七年二月为止，苍梧道成立了五百二十三个乡农民协会，入会会员达四万三千多人。

随着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党组织也从梧州发展到广西各地。一九二六年春以后，中共梧州地委派出党员干部林培斌、黄启滔、罗少彦、罗如川、宁培英、陈洪涛、谢铁民、罗瑞成等到容县、桂平、南宁、玉林、桂林、柳州、东兰、贵县、武宣、田东、怀集等地建立党的基层组织，领导当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一九二六年十月，成立中共广西省委筹备小组，谭寿林是三个领导成员之一（另外两人，一是黄日葵，当时任第七军政治部副主任；一是陈勉恕，当时任广西省党部青年部长）。在广西地方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广西各地的革命运动空前高涨。谭寿林的“象朱砂这样把水染红”的愿望正在逐渐实现。

^{①②}黄日葵、谭寿林等：《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2月7日）。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黄绍竑兄弟开设的仁生号平码行勾结驻梧七军六旅，无理逮捕省港罢工工人凌二妹、李棠、吴循三人，九月二日横加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工人血案”。惨案发生后，谭寿林与地委委员们多次研究对策，领导梧州革命群众作了坚决的斗争。首先，在大校场召开三万人的追悼三工人大会，愤怒控诉反动派残杀三工人的血腥暴行。会后，三万多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经过敌警备司令部时，万分激愤的群众，蜂拥冲入司令部内，面斥司令王应瑜，要求他惩办凶手，抚恤无辜死难家属。接着，梧州二十五个工会一万多工人又召开大会，向全国发出示威通电：“誓死为三工友伸雪，即请政府于一星期内惩凶抚恤，并切实保障，以后再不有此种枉杀工人之事件发生……否则全体牺牲亦所不惜”^①。二十五个工会准备用总同盟罢工来对付反动派。这次斗争，得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和香港工团等革命团体的一再通电声援，全力支持。“三工人血案”轰动了整个华南。在工人阶级坚决斗争与强大舆论压力下，国民党中央不得不责成广西当局调查处理。七军六旅与仁生号被迫给死难工友家属赔偿抚恤金。围绕“三工人血案”的斗争，至此取得了基本胜利。这次斗争“确实给了广西统治阶级一个严重的影响”，给“黄绍竑之兄及一班要人和他们的亲戚”，“直接予以打击”^②。

一九二六年十月中旬，梧州警备司令王应瑜，在警备部礼堂摆下“鸿门宴”，假意邀请梧州各革命团体负责人赴宴，目的

^①1926年9月28日《工人之路》。

^②黄日葵、谭寿林等：《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2月7日）。

想借宴会使其爪牙侦缉、老乌（当时黑社会人物，军阀官僚的走狗、驳脚侦缉）等认识各革命团体的骨干分子，准备设置陷阱，一网打尽，把革命势力压下去。在开席前，司令王应瑜首先作威胁性发言：“近日梧州市劳资纠纷日多，时有罢工事情发生，殊于治安有碍，希望今后劳资纠纷问题多作商量解决。如有罢工事情发生，本司令治安有责，定当断然处置，勿谓言之不预。”这是制造新的“三工人血案”的借口，不少人敢怒不敢言，宴会上气氛紧张，充满杀机。这时，谭寿林突然站起来，以《梧州民国日报》主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驻梧登记员的公开身份，向王应瑜司令作针对性发言，他说：“孙中山先生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王司令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是革命军人，必能服膺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认真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保障工农运动。人民的武力应当保护人民。”他的话，说得王应瑜哑口无言。宴会不欢而散^①。

同年十二月上旬，梧州商民协会目睹梧州市民因捐税繁重，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不得不起而为民请命，联合工代联合会、郊区农民协会、妇联会、学联合会等准备召开群众大会，用合法斗争向当局请愿，要求撤销冥镪炮竹捐等苛捐杂税，以解民困。谭寿林和地委其他领导成员召开会议，提出“废除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的口号，并领导了梧州人民的抗捐运动。十二月十九日，梧州警备司令王应瑜竟在召开抗捐大会前夕，突然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分头包围了市党部、民国日报社、工代联合会等革命活动地点，非法逮捕了中共梧州地委

^①周济：《大革命时期梧州的两度鸿门宴》（1980年8月）。

书记谭寿林、工代联合会委员长钟山（地委委员）、轮船二分会委员长胡奕卿（共产党员）和民船工会委员长蔡美利（国民党左派）等四人，后又逮捕了揭露军警罪行的共青团员李锡彤。警备司令部捏造所谓“勾通刘震寰、私运枪械、图谋暴乱”等罪名，妄图杀害这五位同志。他们被关进死牢，带上手镣脚铐，不准说话，不准探监，天寒地冻不准送棉衣棉被，受到百般虐待。但谭寿林等毫不害怕，坚持斗争。由于脱险的地委委员周济、甘立申到广州政治分会、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控告梧州反动派的罪行，加上梧州农工商学妇女各革命团体发表紧急联合宣言，各界派出代表到广州等地，揭露反动派罪行。在国民党中央的责成下，梧州反动当局不得不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将谭寿林等五位同志解往广州释放。

“一生最快乐的事是战斗的工作”

谭寿林在自传体中篇小说《俘虏的生还》中写道：“一生最快乐的事，不是肉的纵欲和酒的沉缅，只是战斗的工作”^①。他用自己的行动，在实践自己的格言。

一九二七年三月，谭寿林等五位同志被押到广州释放。当时，广州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四月十五日，反动派开始在广州进行“清党”大屠杀，一批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白色恐怖笼罩着曾是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城。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谭寿林仍坚持工作。他和陈勉恕、李省群（共产党员，曾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的妇女部长）等改名换姓，租借广

^①谭勉予：《俘虏的生还》（1928年）。

州东山百子路前国民大学的旧房子居住，秘密设立中共广西特委驻广州办事处，坚持地下斗争。谭寿林的父亲从贵县来广州找他，想叫他回家隐蔽，免得家人为他在外面而时时担忧。他说：在现今的情况下，回家去不妥当，也避免不得恶势力。

“要战胜恶魔的势力，唯一的方法还是战斗”。他说服了父亲，没有回家。端午节后，家中祖母病重，来信催他回家，他便同陈勉恕一起化装成商人，避免经梧州这条危险路线，绕道广州湾，经湛江、玉林返回贵县，农历五月二十七才到家。他在家乡期间，仍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编写《土地革命山歌》，教唱《打倒国民党歌》等歌曲。谭寿林的革命活动被敌人发现，到处派人抓他。他又仓促离家，经玉林、湛江到香港、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委派他赴香港巡视工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举世闻名的广州起义爆发了，谭寿林加入了起义的战斗行列。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同陈勉恕一起匿居在广州市郊大石街陈勉恕爱人刘曼舒家中。十二月下旬，谭寿林经佛山、中山出香港，因香港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又转赴上海，化名覃树立，通讯地址由上海大马路大庆里邵纪云医师转。他同黄日葵、陈居玺、舒大楨一起，住在劳勃生路。

一九二八年二月初，由黄日葵发起召集广西赴沪的共产党员开广西同学谈话会，总结和讨论今后党在广西的工作。二月七日，黄日葵、谭寿林等八位广西同志联名给党中央写了《广西的组织情况，工农革命运动及对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向党中央全面汇报了广西党的工作，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六点建议，希望“南方局应有一个发展广西党和工作的具体计划，加紧进行”，“早日派人潜入东兰及鹏化一带切实调查，为恢复广西今后的党和建设工作计划之基础。”根据广西同志

的报告和建议，中共南方局在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先后派了几批党员领导干部潜回广西开展工作。六月，在贵县召开了中共广西特委扩大会议，使受到严重摧残的广西党组织，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一九二八年春，谭寿林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稍后，调任全国海员总工会秘书长。一九三一年初，又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

一九二九年，党要在上海召开全国工会代表会议，谭寿林委托陈勉恕夫妻俩租一独立院落两层楼的洋房供开会使用。陈勉恕自称是广州大商人之子，因广州乱，父母全家要来上海居住为由，买米千余斤，并雇一上海女佣人。将要开会时，刘曼舒说要往苏州游玩，就带婆妈一同前往。十余日后，全国工会代表大会开完会，她才回上海^①。

一九二八年，谭寿林和钱瑛在上海结婚。婚后不到三个月，钱瑛被组织上送去莫斯科学习。他完全支持爱人去学习，以后陆续写了一百三十余封信，鼓励她在学习中注意研究中国问题，不断上进。一九三一年钱瑛学习回来不久，又调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谭寿林与钱瑛结婚时间虽有三年多，但为了革命工作，各自一方，在一起“相处仅百余日”。他们把爱情和幸福全部献给了革命事业。

“为革命不怕牺牲”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清晨，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谭

^①陈居铨给陈铭三(陈勉恕、刘曼舒之子)的信(1983年1月17日)。

寿林，被国民党上海公安局会同老闸捕房逮捕，并在谭寿林处搜出全总工会组织系统表、附注说明书一份。敌人先把他押到老闸捕房拘留所，关在临街的一个大铁笼里，四周罩着铁丝网。全总秘书章夷白等也在同一天被捕，关押在这个大铁笼里。谭寿林与章夷白假装不认识。傍晚，谭寿林悄声告诉章夷白说：“组织上发现黄文华（即黄大霖）有叛变嫌疑，故通知你立即离开机关。现在，我们两人都被捕，肯定是黄文华出卖的。”这天晚上，寒气袭人，他们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每人发一条破毯子，根本不能御寒。谭寿林挨近章夷白说：“明天各向何方，实难预测，今晚我们紧挨着睡，亲热亲热吧！”^①

第二天，谭寿林被敌人“引渡”至上海公安局看守所，关押在该所第二个号子里。稍后，章夷白等也被“引渡”到这个看守所，关在第一个号子。隔着砖墙，通过小孔，谭寿林对章夷白等说：“不要怕，至多皮肉受点苦，没什么了不起，我已把我们被捕情况转告监外党组织。”^②章夷白后来回忆说：“他常以‘为革命不怕牺牲，必须保持共产党员的气节’来耐心热情地教育被捕的革命难友，他的这种革命精神，深为革命难友所感动和崇敬”^③。谭寿林对革命难友是这样希望 and 要求的，对自己要求则更严格。四月二十七日，敌公安局侦缉队审讯他。敌人始用欺骗利诱，继而施用严刑，将谭寿林“反上吊”两个小时，并用烧火的铁条烫他的胸部和腹部，烫出一道道红烙印，直到他痛极昏迷过去才放下来，一小时后始得回

①②章夷白、周砥、李沫英回忆谭寿林革命事迹（罗永平记录整理，1982年7月24日）。

③章夷白给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的信（1971年3月30日）。

生。敌人累得满头大汗，却捞不到半点口供。当他第二次被提审时，在候审室内适和章夷白等碰上，因被敌人严密监视，彼此不能交谈。“这时，他第一次受刑（反上吊）的伤痕未愈，但仍不忘对同志的教育，即用脚在地上偷偷地写了一个‘不’字，虽然是一个简单的‘不’字，里面却包含着深刻的内容，这就是告诉同志：在阶级敌人面前，不要恐惧，不要承认不利于党的口供，要至死不屈地坚持党的立场！这种危难中的教育精神是如何的重要与伟大呵！”^①

四月三十日上午，敌人审讯时改用“坐老虎凳”这种酷刑。谭寿林在老虎凳上顽强不屈，坚持“头可断，血可流，党的利益始终不能损害”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敌人把谭寿林折磨得又昏迷过去，仍捞不到什么口供。后来，敌人乃无耻地效法日本帝国主义的法术，在阴森可怕的土地庙内审讯谭寿林，妄图借助鬼神的偶像使谭寿林屈服。“在菩萨底面前还敢不讲真话吗！”敌人这样审问。谭寿林很诙谐地回答：“我在菩萨面前不讲假话，以上所讲的均属事实。”敌人仍得不到一句有用的口供。

五月二十三日，谭寿林被单独解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虽经再三审讯，但他始终坚贞不屈，被敌人“判处”死刑。在临刑前，监狱当局询问他有无家庭、有无朋友需要通信。他怕连累党组织和同志们，拒绝写最后通讯。五月三十日，谭寿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牺牲时仅三十五岁。

几度铁窗坚壮志，

^①章夷白写给钱瑛的材料（1956年6月18日）。

千番苦战表精忠，
丹心贯日情如海，
碧血雨花气若虹。”

谭寿林烈士的夫人钱瑛，用这首诗悼念和赞扬了烈士光辉战斗的一生。

郭 滴 人

郑学秋 陈仙海

张兆声 郭 翔

郭滴人，福建龙岩湖洋乡人，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曾任龙岩县委书记，闽西特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国家政治保卫局福建分局局长，福建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等职；长征后，任陕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央局干部科科长。一九三六年冬，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不幸逝世。

(一)

郭滴人，原名郭尚宾，生于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八日。其父郭荣章是个温厚勤俭的佃农，农闲时也帮人宰猪，所生几个子女，多因生活困苦而夭折，仅养活滴人、滴海^①兄弟二人。郭滴人上小学后，每天放学回来都要帮做家务，或下田做些农活。但他学习勤奋，在校成绩辄列前茅，为师友所器重。郭滴人能写一手隽秀遒劲的好字，村上每逢喜庆，常请他代书对联。

^①郭滴海原名德海，1920年生，曾是中央苏区中央剧团出色的小演员，后任新四军侦察排长，皖南事变时牺牲。

他从小看到贫苦农民遭欺压，自己和许多童年伙伴也备受富豪子弟的凌辱，屡感世道不平。父辈们以为他们经受的苦难是命里注定的，郭滴人则不以为然。他痛恨压迫者，说他们是人面兽心的“恶狗”，对“恶狗”不可退缩，要敢于斗争。郭滴人在小学四年级时，已能大量阅读侠义小说，经常给同伴讲打富济贫、扶危济困的故事。其时，凡是县长来乡里催粮征税，地主豪绅都在祠堂里设宴款待。郭滴人闻讯，总是邀集同伴，发动乡人闯入祠堂，抗租抗税，使他们无法畅饮。有一次，他还把烂污泥抹在大门外的官轿座位上，弄得县长狼狈不堪。在地主族长们摆席算帐时，郭滴人曾站出来揭穿他们的骗局，说他们的帐是“老爷们的酒肉帐”。族长们对此十分恼火，骂他是“滚地龙”，声言要“教训”他。亲人们都为他担心，而他却毫不畏惧地说：“他们说对了，我就是要做‘滚地龙’，要把咱乡土地翻滚过来，叫他们不得安身。”从此“滚地龙”的名声暗暗传开，乡里的穷人都盼望他有朝一日能破土翻腾，为大家出气。

小学毕业后，郭滴人因家穷上不了中学，就到漳州叔父郭涵波的小杂货铺里当学徒。后来，听说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师范学校可免费供给贫寒学生伙食及一些学习用品，他在叔父的资助下与同乡好友郑日晖、黄振椿（马宁）等人考入集美学校就学。在这里，郭滴人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许多进步书刊，也撰写了揭露现实、抨击时弊的文章，在校刊和报纸上发表。一年后，学校闹风潮停课，学生都散了，郭滴人也于一九二四年回乡任族办的新积山初级小学教师。

郭滴人在新积山初小任教期间，统治龙岩的北洋军阀赖世

璜与地方豪绅相勾结，强迫农民腾出一半土地种植鸦片烟，规定每亩征收鸦片捐大洋十二元，不种或歉收的，均不得减免，农民怨声载道。郭滴人挺身而出，组织各校教师，发动学生和农民，手持“种烟必拔，包捐必杀”的纸旗，在海洋、赤水、石碑前等乡进行抗烟示威。军阀赖世璜虽然到处张贴告示：“煽动抗种鸦片烟者，予以军法惩处”。但是，郭滴人和小学教师黄阁辉不怕威胁，坚持斗争。他们在龙门圩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义正辞严地指出鸦片的种种危害，揭露军阀豪绅狼狈为奸，迫害农民的罪行，号召大家奋起抗争，震动了整个龙岩县。这次斗争，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威力，各界人士也纷纷抗议种烟。龙岩进步青年创办的《岩声报》发表了题为《湖邦社反对种烟的声浪》一文，支持郭滴人等人的行动。赖世璜逼种鸦片的阴谋终于被人民群众的斗争所粉碎。

(二)

一九二六年春，郭滴人得到好友郭朝隆、郭友才的资助来到厦门中山中学，找到老同事陈庆隆。时值中共广东区委派罗明到厦门招收第六届农讲所学员。陈庆隆邀郭滴人一起去农讲所学习，他马上同意，二人便同赴广州。郭滴人到农讲所后，把尚宾的名字改为滴人。人们问他为何改名滴人，他回答说：“我要点点滴滴为人民”。

第六届农讲所的主要课务是毛泽东主持的，周恩来、肖楚女、林伯渠、恽代英和彭湃等也常到所讲课。他们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精辟阐明马列主义原理。农讲所还施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并组织学员们到海丰、陆丰实地参观考察彭湃领导的农

民运动。郭滴人在学习中，常把自己深思的问题提出来与同学商讨，并直接向毛泽东请教。同时，又深入农村，调查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的组织、活动情况，因而收获很大。

一九二六年六月，经李联星（一九二九年被军阀张贞杀害）、陈庆隆介绍，郭滴人在农讲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九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农讲所提前结业，三百多位学员奔赴全国各地。郭滴人与陈庆隆、李联星等八名闽西籍学员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到北伐军东路军总政治部工作。十月，东路军击溃北洋军阀周荫人所部，收复了闽西。郭滴人、陈庆隆、朱文昭同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福建汀漳龙办事处岩平宁分处工作，领导（龙）岩、漳（平）、宁（洋）三县的农民运动。他们在龙岩城郊创办了农民运动宣传人员养成所，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并吸收进步青年陈国华、谢宝萱、陈柏生、陈品三、罗怀盛、陈昆照等入党。一九二七年一月，中共龙岩县支部成立。陈庆隆任书记，郭滴人任组织委员。这是闽西较早成立的一个党支部。郭滴人与陈庆隆在考塘乡、湖洋乡建立农民协会，摸索出一些经验，然后陆续建立起各区乡的农民协会^①。

在一次湖邦区农协大会上，农友们在讨论减租减息问题时，国民党右派郑菊人竟然说：“你们的本分就是种田。地主租给你们田地，你们就老老实实地耕种，只要不妄动，有什么困难，地主是会怜悯你们的，也会帮助你们的。”郭滴人当场予以驳斥：“农民整天辛苦耕作，吃不饱，穿不暖，卖子借债

^①陈庆隆 1977 年《在龙岩地区革命史料座谈会上的发言》，龙岩革命纪念馆整理。

过日子。地主不劳动，手白脚嫩，作威作福，到底是地主养活农民，还是农民养活地主？”^①接着，郭滴人带领农会会员游行示威，地主惶恐不安。

他们又帮助城区各行各业建立了工会。省立第九中学是龙岩仅有的一所中学，郭滴人指导该校学生建立学生会，使这所学校后来成为暴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同时，郭滴人还和陈庆隆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支持国民党县党部左派青年陈国华、陈树槐、倪天长和国民党岩平宁政治监察署主任张旭高^②等人开展工作。当时的工作重点是宣传、组织群众，打击、摧毁地主豪绅的封建统治。他们召开了龙岩各界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农民代表最多，店员工人、学生和妇女代表也有一定席位。会议通过了限制封建剥削，实行“二五”减租、对半减息；废除不合理的学徒制度；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禁止纳妾，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反对封建迷信，严禁算命卜卦；坚决禁鸦片烟、禁赌、禁娼等决议。这些决议是在革命派与以大劣绅杜连茹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及地主豪绅的激烈斗争后才通过的。在针锋相对的斗争中，郭滴人辞锋锐利，说理透彻，往往使对方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从农讲所回到一九二七年三月这半年里，郭滴人不知疲倦地来往于城乡之间。他除了与党支部同志商讨工作，同国民党左派人士交换意见外，还在家乡的开明、积山小学兼教常识课。郭滴人办事从实际出发，深入细致，注意党的政策。在这期间，张旭高等人在工作中采取了一些“左”的行动，不顾群

^①《访问郭欣水同志》（1980年5月），龙岩革命纪念馆。

^②张旭高后逃亡海外，在菲律宾从事革命活动，1940年遭日军杀害。

众的觉悟程度，带人烧毁了城隍庙和天子庙的神象，在农民中引起抵触。有人来问郭滴人：“神象烧了，祖坟要不要挖掉？”郭滴人耐心启发道：“烧毁神象是有些过分了。祖坟当然不可挖。但是要想想，年年祭祖坟，土豪劣绅坐轿去，分的祭品特别多，农民赤脚走路，诚心敬祖宗，分的祭品才二两猪头皮，这不是太不公平吗？可见世上有什么神呢？”^①他还以农民的痛苦生活为题材，编写山歌在农村传唱；也常向乡人讲述古代农民起义故事，特别是介绍彭湃领导海、陆丰农民暴动的情况。他说：“石灰、泥和砂分开时没作用，用水拌和起来成三合土，砌墙建屋非它不可；一、二根筷子一拗就断，一把筷子任扭不断。”^②这些通俗的比喻，使农民领会到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农民们都说郭滴人讲的事理最容易听懂，称他为“我们的贴心人”。

由于党组织成立不久，缺乏实际斗争经验，陈庆隆、郭滴人等虽然到处奔波进行革命活动，但龙岩的农运在初期还存在一些缺点。如农协会有一哄而起的情况，停留在一般的宣传，没有形成核心力量，群众基础较弱，所以一旦国民党右派实行反革命政变，许多农会便自行解散。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十五日，龙岩杜连茹一伙也勾结反动军队，纠集流氓地痞，捣毁岩平宁政治监察署和国民党县党部，解散工会和农会，陈庆隆、郭滴人等革命者受到通缉，白色恐怖笼罩全县。此时，党开始把工作重点转入农村。郭滴人深入穷乡僻壤，与贫苦农民促膝谈心，渐渐在农村中扎下了根。

^{①②} 《访问魏金水同志》（1980年9月），龙岩革命纪念馆。

郭滴人有个婶母叫苏红爱，是位受尽欺凌的寡妇，同情、赞助郭滴人的革命工作。她家住在村边，附近全是朴实的农户，是个秘密活动的好据点。郭滴人就住在这里（以后省委书记罗明和邓子恢也曾到这里小住，与郭滴人一起商谈筹划闽西党的工作）。苏红爱和女儿做交通员，为郭滴人找来青年教师罗超和陈根元（都是党员）以及一些农民积极分子。郭滴人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各地农会多已瘫痪，许多农民感到恐惧，一些积极分子面临这种形势也不知所措，十分焦急。郭滴人便在夜间走乡串村，召集农协中觉悟较高，斗争坚决的积极分子谈心。仅两三个月时间，他就在东肖后田、曹溪董邦、石粉、西陂、黄竹坑、张白土、湖邦、小池、江山等地农村，先后建立了秘密农会。后田的陈锦辉，湖邦的郭益乾、郭炳林、郭义海，江山的郭金满、廖秀芳、林斯吉以及悠远的林营熙等，都是较早入党的农民。在这期间，郭滴人还与永定、上杭党的领导人张鼎丞、林心尧等密切联系，研究斗争策略，在工作上相互支援。

一九二七年七月，邓子恢从江西回到龙岩，党支部的领导力量得到加强，农运工作继续推向前进。八月，闽西出现了新的政治局面。苏庆云（国民党左派，以后也参加中共）被委为国民党龙岩县党部常务委员，邓子恢任县党部秘书，郭滴人任组织委员。他们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使龙岩除了溪口、雁石、内外山前等区外，农民协会遍地开花，全县农协会员近十万人。许多地区都建立了“党支部——秘密农会——公开农会”三套组织，党在群众中深深扎根，成为坚实的领导核心。

(三)

一九二七年秋，闽南著匪陈国辉部改编的省防军第一旅进驻龙岩。陈伪装开明，企图拉拢革命势力，一时还不敢张牙舞爪。于是，龙岩党组织趁这有利时机，加紧开展工作，恢复了工会和农会，实行了“二五”减租。陈国辉在地头蛇林尚轩（充任陈的营长）支持下，策划了一个一举扑灭革命势力的阴谋。党支部发现这一情况后，于十一月派邓子恢同自福州南下漳泉的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一军联系，要求派部队到龙岩支持革命势力，打击陈国辉及其爪牙。陈国辉闻讯，率部退驻漳平。郭滴人召集了四五千人的群众大会，准备欢迎十一军，但久等未到。他看到与会群众有些不耐烦，就上台揭露陈国辉的罪行，指出陈是外地人，来龙岩不久，人地生疏，竟然如此熟悉龙岩情况，穷凶极恶，是因为有林尚轩、林树宏等地头蛇作内应的缘故。于是愤怒的群众立即行动，把林尚轩、王梓阗、林树宏的住宅捣毁。次日，蒋、蔡部队只一个营到达龙岩，住了两三天就经永定到广东去了。陈国辉得到蒋、蔡部队撤走的消息，立即率部返回龙岩，对革命势力进行报复，并悬重赏通缉郭滴人、邓子恢等“重要分子”，白色恐怖再次笼罩龙岩。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及斗争的需要，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省委指示成立龙岩县委，罗怀盛^①为书记，郭滴人为组织部长，邓子恢为宣传部长，陈品三为军事部长；县委设在东肖的后田村。不久，省委派人来闽西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及福建

^①罗怀盛，龙岩湖邦人，1929年初派往漳州工作，遭敌逮捕杀害。

省委关于“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重要方针。龙岩县委立即作出决议，根据本县实际情况，加紧宣传组织工作，发动群众抗缴所有捐税，对地主、族长进行算帐斗争，公开宣传土地革命。郭滴人和罗怀盛、邓子恢等经常分头深入各区乡开展工作。尽管反动派到处侦察，企图捕捉他们，但乡村是农民的天地，许多觉醒了的农民（特别是秘密农会的积极分子）都严密地掩护他们，即使在大白天来往于山区乡村，也没有出事。

一九二七年冬，郭滴人、邓子恢、陈品三在后田领导农民向地主开展“二五”减租，向族长清算公帐款取得胜利后，又在村里开办青年夜校和青年国术馆，并亲自到馆里讲课作指导，使青年们获得一定的政治、军事常识。郭滴人还特别注意在贫雇农中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一九二七年冬，建立了闽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后田党支部，由陈锦辉任支部书记。

一九二八年春节过后，粮食不断涨价。后田党支部为保障群众生活，决定限制粮价，禁止地主运粮出境。地主们妄图压服农民，雇用了一批流氓、地痞，也设立一个“老人拳术馆”，并派爪牙陈北瑞企图暗杀陈锦辉等农会负责人。县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后田党支部的要求，决定实行武装暴动。一九二八年农历二月十三，后田村地主用公偿款买了几头猪，准备做“关帝福”。农会会员也挤进去，对地主大喊：“公偿款是公众的，我们也要分猪肉。”地主竟令其爪牙操起木棍殴打农会会员。群众怒不可遏，准备反击。县委罗怀盛、郭滴人、邓子恢认为暴动时机已经成熟，批准了后田党支部武装暴动的计划。当夜，陈锦辉带领“青年国术馆”的学员，杀死为非作歹的地主爪牙陈北瑞，冲进“老人拳术馆”，正在筵席上美餐的地主

豪绅闻风逃跑。农会武装缴获了地主的全部武器，连夜召开全村五六百人的群众大会，揭露地主的阴谋和陈北瑞的罪行，并责令地主交出田契借约，当众烧毁。郭滴人代表龙岩县委庄严宣布：“从此田租不交，旧债不还，田地由农民分配。”^①第二天，又将地主的粮食一千多桶分给贫苦农民，并没收了族长掌管的公款四五百元。五六天后，陈国辉派一营军队前来镇压，县委早作了准备，群众的物资多已搬藏背后大山，暴动队员与敌相持了几个小时，为避免无谓牺牲，根据县委决定，撤至隘头山。为了对付反动派的武装镇压，保卫革命成果，县委还迅速在永定大排公学成立了以陈锦辉为队长的闽西第一支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在郭滴人和邓子恢的直接领导下，不断袭击敌军，捕杀反动分子，逐渐发展壮大，成为闽西根据地的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

后田暴动打响了党领导龙岩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后田暴动是“闽西土地革命之先声”，它标志闽西革命从此走上武装斗争的新阶段。为了庆祝暴动后的第一个春节，郭滴人豪情满怀地给大家拟了一幅新春联：“欠租欠债用刀还尽，有枪有炮快乐过年”。

一九二八年四月，邓子恢调上杭县委工作，罗怀盛也调往漳州，年仅二十二岁的郭滴人要主持、领导全县的工作，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他虚心听取群众和干部的意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在他主持县委工作期间，农民运动仍不断开展，各区乡党支部及秘密农会日臻完善巩固，城区的工运也在发展，

^①邓子恢：《龙岩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第九中学建立了共青团组织，许多学生踊跃参与秘密活动。这期间，县委机关迁到董邦村。郭滴人仍象往常一样，抽空巡视各乡，深切关心每个基层组织，关心群众的生活。许多农村老人回忆说：那时滴人同志虽很年轻，但大家都把他看做是亲密的长者。他总是笑嘻嘻的，待人亲切真诚，讲话很有风趣，很会打比方，不啰嗦，句句在理，大家都听他的话。一九二八年七月，闽西特委成立。十一月，特委在永定合溪召开扩大会议，邓子恢、郭滴人都参加了会议，由省委书记罗明传达“六大”精神，指示各县加紧发动、组织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准备举行大暴动。

一九二九年二月，郭滴人在龙岩中甲乡附近的山村召开了第一次全县党员代表会，到会代表三十多人。回龙岩巡视工作的邓子恢向大会介绍了永定县溪南里的分田经验。会议讨论了党的“六大”路线，并通过了“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推翻陈国辉反动统治，实现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的决议。会后，郭滴人和邓子恢在县委所在地董邦村起草并印发了《为打倒陈国辉，实行土地革命告群众书》，还编写了数十首鼓舞人心、激励斗志的山歌，散发各区乡。

一九二九年三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入闽，歼灭了盘踞在长汀的省防军第二旅郭凤鸣部二千余人。这一震撼八闽的胜利消息，使龙岩革命群众得到极大鼓舞。根据特委的指示，郭滴人和县委的同志们紧张地进行全县总暴动的部署，准备迎接红军。他们还分头到大池、小池、江山、湖邦、红坊、东肖、西陂、曹溪、铁石洋等地，与各乡党支部研究扩大武装，组织暴动队等问题，对暴动前的准备工作，做了周密布置。五月二十一日深夜，县委接到红四军向龙岩进发的通知，郭滴人连夜赶往小池，向毛泽东、朱德汇报了龙岩各方面

的情况后，立即赶回县委驻地，做好攻城的一切准备。五月二十三日凌晨，红四军兵分两路攻打西、北两城门；郭滴人率领游击队和各乡镇农会会员一千多人，埋伏在城南，配合红军攻城。战斗很快结束，消灭陈国辉留守部队一个营（陈率主力参加广东军阀混战去了）。当天，爆发了全县农民武装暴动，以策应红军。城里到处贴着标语：“欢迎红四军来岩！”“消灭陈国辉！”毛泽东进城后，由郭滴人陪同到九中发表演说，学生极受鼓舞。下午，红军撤离龙岩，转攻永定。六月三日，为诱敌主力回援，红四军第三纵队与郭滴人、邓子恢率领的游击队发动了二占龙岩的战斗，第二次攻克龙岩城。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红军又绕道上杭至连城新泉。此时，陈国辉率主力由粤回岩。六月十九日，红四军兵分四路逼近龙岩城郊准备三打龙岩。郭滴人率领地方武装一千多人密切配合这次行动。战斗发起后，在数小时之内，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全歼盘踞在龙岩城的陈国辉主力二千余人。陈国辉只身化装逃脱。

龙岩解放后，闽西局面已经大定。一九二九年六月，龙岩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闽西特委颁布的土地革命斗争纲领。在开展纷繁艰巨的土地革命中，郭滴人根据永定溪南里的分田经验，制定了分田的原则和政策，并在后田村先作试点。他深入群众，征求意见，又与邓子恢共同反复研究，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由于分田的时候正是水稻抽穗时节，便只好分青苗，每人大致分十一桶谷子，仅十多天就分配完毕。在后田取得经验后，即向全县推广，前后不到一个月，全县各区乡都完成了土地分配任务。

一九二九年九月，龙岩各区乡苏维埃政府都建立起来了，召开了第一次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郭滴人被选为县首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党团工作、干部培养、财政经济、文化教

育、军事建设等许多具体问题，都需要解决。郭滴人总是认真负责地带领干部研究处理。他不集大权于一身，从不自己说了算，常教育干部不要老坐在机关里，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他也关心少先队和儿童团，有空时就同少年们一起游戏、讲故事；对共青团的要求是严格的，经常到团县委指导工作。

郭滴人处处坚持革命原则，对那些蜕化变质分子，最深恶痛绝。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郭江文接受三百元的贿赂，偷开路条放走了民愤极大的在押土劣。郭滴人知道后，非常生气。虽然郭江文是他的堂兄弟，从小又一起读书，一起成长，情同手足，但他仍然严肃地在县委和县苏执行委员会上提出处郭江文以死刑的建议。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得到了全县人民的赞扬。

一九二九年底，蒋介石发动闽粤赣三省“会剿”。敌五十六师刘和鼎部进占龙岩，但只盘踞城区，四周乡村仍在我党控制之下。由于红四军在江西打击敌军后路，闽粤两路敌军又有内部矛盾，在我闽西军民的不断反击下，敌人终于一九三〇年一月间撤退。刘和鼎部临撤退时抓走了三十多位革命同志，拘押在厦门监狱。关在这所监狱里的还有厦门地下工作同志十多人（其中有团省委书记陈柏生和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省委决定组织劫狱，并令郭滴人配合行动。声震全国的“五·二五”劫狱胜利后，出狱的同志安全转移到龙岩。

（四）

一九二九年底至一九三〇年初，闽西苏区已拥有龙岩、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漳平、平和等县，纵横三百里，近百万人口的红色区域。不幸的是，这种有利的革命形势很快就遭

到“左”倾错误的破坏。一九三〇年六月，李立三“左”倾错误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七月，闽西党在龙岩列宁学校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由出席过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筹备会的郭滴人作政治报告。会议在当时已经滋长起来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下，主观地夸大了闽西的有利形势，通过了“左”的错误决定。省委派王海萍来闽西苏区贯彻立三“左”倾错误指示。九月、十月，闽西刚刚创建的二十一军连续两次出击东江，使部队受到损失。以后，又将部队拉去打上杭、平和、连城，连遭失败，军力大大削弱。在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闽西特委书记的郭滴人，也一度执行了立三“左”倾错误，给闽西革命带来了损失。不过，当革命遭到挫折时，郭滴人敢于正视现实，很快就纠正过来。

一九三〇年冬，蒋介石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闽南军阀张贞部也向闽西进攻，苏区周围民团匪帮又趁机骚扰，闽西苏区内情况日益严重。十二月，闽粤赣边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共闽粤赣边特委，邓发任书记，郭滴人为宣传部长。会议纠正了作为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主要特征的那些冒险错误，但对其思想实质，却没有加以清算。这些“左”倾思想的余毒，导致了一九三一年春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的一起重大错案。

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在永定虎岗召开了以林一株^①为主审的闽西苏区工农兵审判“反革命社会民主党

^①林一株，福建龙岩县曹溪人，集美师范学校毕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裁判部长，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等职。因在闽西“肃社党”事件中犯严重罪行，民愤极大，1931年9月被镇压。

分子”大会，开始了闽西根据地内部“肃清社会民主党”这一错案的严重事件。四月四日，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下的党中央就关于“肃反”工作致信中共闽粤赣边特委，提出“右倾在党内，在群众中要看成最主要的危险”，“对一切消沉、悲观、保守、失望、逃跑等现象要无情的打击，要坚决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①，使闽西根据地内“肃社党”这一错案进一步发展。五月十四日，中共闽粤赣边特委根据党中央指示信，作了《关于彻底肃清社会民主党、AB团的决议》，提出“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口号，致使五、六、七月间，“肃社党”事件在闽西根据地酿成很大恶果，数以千计的苏区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蒙冤致死，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

在这错综复杂的斗争面前，郭滴人一开始也曾轻信了关于“社党”活动耸人听闻的报告，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肃反”斗争。同时，在“左”倾气氛十分浓厚的情况下，郭滴人未能完全摆脱党内“左”倾错误的羁绊，在“肃反”初期曾经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但随着斗争的展开，他发现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党员相继被害，连他亲自培养入党的早期暴动领导人，也蒙冤受屈，他感到运动被引入歧途。这一想法，得到了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的赞同。

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接受党中央发来的指示，撤消了闽西肃反委员会和林一株的主席职务，另行成立了以郭滴人为处长的闽西政治保卫处。为了及时制止肃反错误继续蔓延，九月底，闽西政治保卫处首先采取断然措施，严

^①1931年4月4日中共中央给闽粤赣边特委信：《闽粤赣目前形势和任务》。

厉制裁了在“肃社党”事件中滥用职权，肆意杀害了大批革命同志的林一株等，随即郭滴人和张鼎丞决定直接向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反映这一严重问题。一九三一年秋，他们到瑞金向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汇报了闽西“肃社党”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听了汇报后，严肃地批评了闽西肃反工作中乱抓乱杀的严重错误，十分沉痛地指出：“这样搞法，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垮台。”^①毛泽东指示他们立即返回闽西，进一步纠正错误。郭滴人和张鼎丞回到闽西后，传达了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的指示，释放了一大批被关押的同志，从而基本上稳定了闽西苏区的局面。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郭滴人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福建分局局长。他在国家专政机关工作，十分注意党的政策，经常教育干部不要打骂虐待犯人，更不准搞逼、供、信。干部有过失，他从不大声呵斥，而是充分地说明道理，使人口服心服。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八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汀召开，成立省苏维埃政府，郭滴人当选为省苏执行委员并担任文化部长。不久，中共闽粤赣省委召开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共福建省委，郭滴人被选为省委常委。一九三二年四月二日，红军东路军总部在长汀召开关于攻打漳州的军事会议，郭滴人与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其他领导人罗明、张鼎丞、李明光等出席了会议。四月十日，东路军攻克龙岩，郭滴人随军回到龙岩。二十日东路军进占漳州，地方工作亟待开

^①转引自张鼎丞、谭震林：《红旗跃过汀江》，载1979年7月12日《福建日报》。

展。龙岩群众一向热爱党，拥护红军，但是由于“肃社党”的严重错误，许多革命青年被杀害，坚贞、干练的中、下层干部大批含冤而死。龙岩的广大群众对党只是敬而远之，情绪十分低沉。重整龙岩的担子很重。郭滴人回到龙岩后，不避艰辛，毅然主持党政领导工作，路过湖洋乡也没有踏进家门，一到城里就立刻召集干部研究工作。接着，他带领干部下乡宣传发动群众，重建工会、农会，恢复区、乡政权，组织游击队，消灭民团、土匪。人们看到郭滴人回来了，听了他的讲话，心头又燃起热火，各方面工作顺利展开起来。红军攻下漳州后，缴获了千担以上的军用物资需要抢运。郭滴人发动群众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农民支前队伍，赶往漳州搬运。从漳州运往连城、长汀，再转送瑞金，全要肩挑步行。在郭滴人、曾心田（县委委员）、郑德生（县苏副主席）、魏金水（县苏秘书）等人的努力工作下，全县生产秩序很快恢复，获得了丰收，农民生活趋于安定，又出现了农民积极支援红军的热潮。

一九三二年十月，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进占龙岩，郭滴人回到省委，先后担任了省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和地方工作部部长^①。

一九三三年一月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二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为了推行王明“左”倾错误，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在福建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撤消了罗明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和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职务。

郭滴人始终认为，罗明深入群众，对闽西的情况比较熟

^①《悼郭滴人同志》，载《红色中华》第312期，1936年11月2日。

悉，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工作上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正确的。王明“左”倾错误的追随者指责他是“罗明路线”的积极拥护者，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撤消他的职务，把他调到省委宣传部。不久，又加以打击，再次调到军区宣传部；最后调到一个地方去监督几十个人修筑工事。在此期间，还逼他写“声明书”，但他一个字也不写。在这样的逆境里，郭滴人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始终没有动摇，他坚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澄清。他仍然拿起笔杆，积极宣传党的扩军政策，在《红色中华》上发表题为《为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而奋斗》的文章中，指出：扩红是当前粉碎敌人进攻，保卫苏区，进行长期斗争的有效办法。但是，地方赤卫队武装同扩红一样重要，不能因扩红而削弱了地方苏维埃政权的保卫工作。一九三四年四月，郭滴人进入瑞金沙州坝中央党校第二期高级班学习，任党支部宣传委员。六月毕业，被分配到宁都参加红军的扩红宣传工作。

(五)

王明“左”倾错误给党和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失利，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郭滴人将要离开多年来哺育他成长的中央苏区，告别朝夕相处的革命根据地父老兄弟，心情沉重，依依不舍。临出发前，他把亲生骨肉——唯一的稚儿郭壮友交给老乡张清海，深情地说：“你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我相信你胜于我的老婆。我将要离开瑞金了，为国不能为家，请你把我的骨肉抱回龙岩抚

养吧，就像你亲生儿子一样。”^①说罢，掏出仅有的五块银元交给张清海。他又找到婶母苏红爱，说：“看来我这块木头还可以用做小器具。我就要随军出发了，不管要去多少年月，革命一定要胜利。你们回家乡去要保重，要坚信红军会回来！”^②

在长征路上，郭滴人被分配在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做宣传鼓动及地方工作。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党和红军。郭滴人更是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尽管他患了肺病和痢疾，但无比坚强的革命意志使他战胜了病痛和征途上的艰难险阻。他带领干部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一路上深入细致地做好团结少数民族的工作。长征胜利后，党中央委派郭滴人担任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随后又调到中央局组织部任干部科长^③。

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六年，整整十年紧张、艰苦的革命斗争生活，把他磨炼得心红志坚。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不知休息，不顾病痛，终于大量咯血，病倒在床。但他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还利用一息尚存的时刻，赶写《红军长征记》，但只写了一个篇章——《广西瑶民回忆录》，便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人们无不感到沉痛。几天后，党中央在陕北保安县隆重举行郭滴人追悼会，称赞郭滴人是“中国农民运动的优秀干部”^④。黄亚光代表中央致悼词，高度评价了郭滴人光辉的一生：

“……滴人同志在他一生的工作过程中，能够亲近群众，

①② 《访问郭德山同志》（1980年8月2日），龙岩革命纪念馆。

③ 《悼郭滴人同志》，载《红色中华》第312期，1936年11月2日。

④ 黄荣发：《追悼郭滴人同志》（1957年10月）。

倾听群众的意见，能把党的策略、口号深入到群众中去，组织他们，领导他们，使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党的路线与任务而奋斗。他不怕单独负责，当他接到党的任务时，他是勇往直前地干，非到任务完成总不放手”。

“他对待同志，对待干部能细心说服、教育，没有以不好的态度去对待同志”。

“因此他在地方上，在红军中，在各机关团体中，都使人感到他是党的最好的干部之一。”^①

一九五六年十月，郭滴人烈士的骨灰从陕北运回龙岩，移葬在闽西革命烈士纪念碑的左侧。在移葬仪式上，邓子恢作了《纪念闽西的伟大革命者郭滴人》的讲话。他说：“……郭滴人同志，他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走完了他的光辉一生。他战斗的一生为闽西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榜样，永远受到闽西人民的尊敬和纪念。”

郭滴人，以他一生的革命实践履行了他生前“点点滴滴为人民”的誓言。

^① 《悼郭滴人同志》，载《红色中华》第312期1936年11月2日。

王 根 英

穆 欣

在河北邯郸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里，长眠着一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女党员王根英。在青松掩映的墓碑上，简要地记载着她那一生短暂而英雄的革命斗争事迹。

根英同志，上海申新纱厂^①女工，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五卅”运动积极参加者，领导上海女工罢工，在广州被选为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②，上海市政府委员。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六月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出席太平洋劳动会议，是年与陈赓将军结婚。历任全国总工会委员、女工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长，一九三一年^③在上海被捕，直到抗战开始方出狱到延安新华报社^④工作，后又派到冀南军区供给部任指导员。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著名的香城古（固）战斗胜利结束后，日寇对冀南平原大举扫荡，根

①应为恒丰、怡和纱厂。

②她没有到广州出席这次会议。

③应为一九三三年。

④应为新中华报社。

英同志冒险抢救公款，与敌遭遇，壮烈牺牲。

如今，王根英壮烈牺牲已经四十多年了，她那虽然短促却是异常壮丽的一生革命事迹仍然铭刻在人们心里，她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她在革命斗争中的英勇顽强，她那战斗不息、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前进。

(一)

王根英原名王庶心，一九〇六年出生在上海郊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自幼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她的父亲为生计所迫而当道士，母亲做过纱厂工人，她与姐姐、妹妹和一个嫂嫂都是纱厂工人。关于她的身世，她自己曾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间写道：“在我小的时候，家里还种些田，田是有点自己的，有点租人家的，另外我父亲（现已死）是当道士去找点钱（这种钱是不正当），十几口人在生活上就这样（母亲过去也是纱厂女工），我认为我是出身于贫民的家庭。我的家庭虽然贫寒，可是我的祖母总是要学富贵人家的模样，重男轻女的观念很浓厚，一直是禁止女孩子不要多说话，不要多笑，笑的时候不要露出牙来，再不要跑到外面去玩等等的束缚。所以，我小时常常见到大姨母来我家时，总要跟着她去她家住。她是最爱护我的，但是不久她就要把我送回家。在家里时，我也不愿看他们对我象是恶狠狠的，所以也就整天外出，和小朋友一起玩，那也就不免挨骂呢。这时我已八岁了，家里娶了个嫂子，她是个纱厂女工，于是我自己愿意跟着嫂子去学做工，一同还有我的一个姐姐。”

王根英在还不懂得忧愁的幼年，最爱听母亲自述童年的故事。母亲家里也很穷困，在她十一岁的时候，在家没法生活，就到纱厂里当了童工。因为年纪小，开始接纱头慢，时常挨工头的打。后来经过勤学苦练，成为熟练的纺纱工。

在反动统治下的旧社会，王根英同样逃不过母亲经历过的苦难生涯。八岁那年，她就跟着刚进门的在纱厂做工的嫂嫂，偷偷地到厂里练习接纱头。母亲知道了王根英想到纱厂里当童工的心思，就告诉她：想作纺纱工，先得学会接纱头。接头接得快，才能成为一个纺纱的好手。王根英把妈妈的嘱咐记在心里，在厂里苦练接纱头，进步很快。第二年，她和十一岁的姐姐王根妹，一起进了日商在上海开的恒丰纱厂当童工。一九二三年，她又顶替姨娘的名额，跟姐姐转到英商开办的怡和纱厂继续当童工。

这些纱厂的外国老板规定，每天早晨六点上工，工人必须准时进厂；迟到者就扣发工资，严重的收掉工牌，甚至马上开除出厂。这些苛刻的规矩，弄得所有的工人整天忐忑不安。王根英和姐姐进厂后，每天不等天亮就得起床，喝一碗稀粥，便摸黑上路。雨季到来的时候，踏着满街的泥泞，一步一滑地走到工厂门口，经常被淋得象落汤鸡一样。到了寒风刺骨的冬天，身上穿着破烂的衣衫，又被冻得发抖。每天要干十几小时的活，还常挨工头的打骂。她就这样在两头不见太阳的黑暗中，年复一年地度过了悲惨的童年。

那时候的上海，被称作“冒险家的乐园”，是外国侵略者横行的世界。纱厂门口，站着穿制服的全副武装的巡捕——人们送给他们各种的绰号：在怡和纱厂的印度巡捕是“红头阿三”，在恒丰纱厂的日本巡捕是“垃圾鬼子”，他们的“神圣

职责”就是严防罢工，镇压“骚动”。而在那破旧、阴暗，棉花絮和灰尘不断腾成云雾的车间里面，手里拿着棒子的监工——不论是日本领班或是洋大班（外国经理）豢养的华籍走狗，不停地来往巡行，防止任何工作的停顿，如果发现有人打瞌睡或稍有疏懒，棒子就会劈头盖脑地打落下来。

王根英从清晨一走进纺纱车间，就累死累活地连续操作十二个钟头。她在装满纱锭的机器前面巡回移动着，整日神情紧张地盯着飞转的纱锭，装上空的，取掉满的，发现纱线纠结了或是断了的时候，马上用那灵活的小手指重新结好。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纱锭也一刻不停止转动，纱线还在继续伸展，绒毛和尘芥落在筷子上，粘和在饭粒里面。就是这样，王根英成年累月地在这里忍受着难耐的饥饿和极度的疲困，直到精疲力竭，骨头架子简直要散了的时候，才能拖着沉重的双腿离开工厂，回到家里喘息一会儿。

在外国资本家开办的地狱般的工厂里的囚犯式童工生活，使王根英幼小的心灵，逐渐产生了一连串难以解答的疑问：为什么洋老板、包工头这样凶残狠毒？为什么我们工人这样命苦？什么时候才能过点象样的日子？……

(二)

因为家里贫穷，王根英小时候没有念过书。她在恒丰纱厂作了两年童工，渐渐感到不识字有许多不方便。在同资本家作斗争的时候，也感到读书识字的需要。那时候，因为工头虐待童工，不顾她们的死活，每天象牛马般做工，还经常随意打骂。在她们幼小的心里，种下了对资本家及其走狗们的仇恨。

每逢遇到天下雨时，纱特别容易断，小姐妹们就齐心行动让它断光，然后去找工头，要求他们把纱轮子换粗或换慢。大家都这样要求，他们也不能不给换。可是，外国资本家对工人心狠手辣，对工人的剥削越来越苛刻，运用的手段也越来越恶毒。有时遇到洋老板把工资压低，将工作时间延长，她们提出意见，资本家也不理睬。大家心里很气愤，又不晓得怎样同洋老板作斗争。这个时候，王根英越发增长了读书识字、学文化，长知识的愿望。

厂里有些年岁比较大的工友，遇到王根英的时候，也常诉说不识字的痛苦。经常这么提起，越发勾起王根英想识字的心事。但是，她又转念一想，每天不停点地连续做苦工十二小时，哪有机会去读书呢？“要读书就不能做工，也就是不能生活，只好叹口气算了。”

她的父亲是识字的，本来也可以向他学识字。但因重男轻女的旧思想作怪，父亲对她的态度总是恶狠狠的，使她没有心思去问。后来，有天她忽然听人说，恒和纱厂附近有个义和夜校，工人可以去读书，每天上课两三点钟，并且不要学费。她一听到这个消息，真是要高兴得跳起来。可是，她家离这所夜校太远了，自己年纪小，社会秩序又乱，夜里单独不敢出来，只有轮到做夜工时，白天去读两个钟头的书。这是在一九一九年，王根英十三岁那年的事。她的时间不多，但是学习的劲头很大，进步还是挺快的。

一九二三年，王根英转到怡和纱厂做工。这一年，上海党组织发展很快，各区都建立了党的区部委。地处上海杨树浦区的老怡和纱厂，正是沪东区部委活动的重点。因此，在接近杨树浦一带的工厂区和工人居住区里，很快办起了一批平民夜

校，其中一座校舍就座落在韬朋路（今通北路）、培凯尔路（今惠民路）后思恩教堂边上的一幢两开间门面的小平房里，门口挂着“思恩义务夜校”的牌子。这是党组织利用教会的名义，以新、老怡和纱厂、恒丰纱厂的工人为主要对象，以普及平民文化为由而开办的夜校。王根英、王根妹姐妹俩和她们周围的十多个小姐妹，都是这所夜校的第一批学生。

夜校开学后，王根英和这群小姐妹，一直风雨无阻地坚持上学，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她们每天干完十二小时的活儿，晚上就赶到夜校上课；遇到上夜班做工的时候，就在上班前去上课，然后再去工厂。她们的睡眠时间因为上学虽然比以前更少了，但是大家的精神更比以前振奋。她们在这里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还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通过革命老师的讲课，她们开始懂得了工人、农民为什么世世代代当牛做马，受穷受欺，资本家、地主怎样靠着剥削起家，欺压人民；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掠夺中国人民的财产，以及当时政府的反动腐败。同时，教师还向她们讲解苏联十月革命的历史，苏联人民怎样推翻沙皇统治，建立起苏维埃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国家当家做主的情景。

在这里，通过革命教师的讲课，使王根英晓得了怡和纱厂老板发家的丑恶历史：这个纱厂开办于一八九五年，是《马关条约》签订后第一家在华投资百万元以上的外商厂。它的创办人查理顿和马地臣，是英国的两个流氓、鸦片走私贩，曾在中英鸦片战争中给英国侵略军提供过大量的情报。他们依靠伦敦某些金融寡头做后台，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每年获取暴利达百万元以上，几乎能重新开办一个象怡和纱厂这样规模的厂。怡和纱厂本身，开始投产只有棉纺，以后扩充为棉纺织

厂、染色棉纺——一个综合性的纺织厂，并且在厂内又新开办了怡和毛纺织厂，吞并了杨树浦纱厂，于一九二一年成立了怡和纱厂股份有限公司。

在揭露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掠夺及中外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制度的同时，夜校的革命教师还通过讲课，告诉工人阶级应该如何进行斗争，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王根英在夜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带来的严重危害，以及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是自己一切苦难的根源，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逐渐地有了一定的认识，提高了思想觉悟，启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在她心里点燃起反抗的怒火，增强了进行斗争的决心和勇气。一九二四年，地下党沪东区部根据上级指示：在具备了条件的地方开始着手发展党、团员，建立基层党、团支部。经过一个时期的考察和培养，老怡和纱厂诞生了第一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王根英首先被吸收入团，并且担任了这个团支部的书记。当时这个厂尚未成立党的支部，团支部成立后，担任团支部书记的王根英肩负起领导全厂工人与英国资本家进行斗争的艰巨任务。根据上级党团组织的指示，她深入群众，采取各种形式开展革命活动，教育和团结了许多工人群众。从此，工人有了自己的组织和依靠，在共青团支部领导下，亲密地团结起来，机智勇敢地同英国资本家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九二四年五月，英国资本家为了加重剥削工人，对于工人的微薄工资进行克扣。这事引起全厂工人的愤慨，在车间里议论纷纷，一致反对。王根英和其他几个团支部委员开会研究，分析了当时厂内的状况，认为时机已到，决定广泛发动群众，举行罢工斗争，反对厂方克扣工资。会后，她们把计划汇

报给沪东区部委，得到区部委的支持，马上批准了她们的要求。这样，在中共沪东区部委的直接指导下，为了反对克扣工资事件，由共青团支部组织老怡和纱厂工人，举行了第一次全厂工人参加的罢工斗争。

对于这次罢工斗争，团支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各支委深入车间，做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对于一些胆小怕事的工友，耐心地启发她们的觉悟，鼓励她们起来斗争；另一方面，她们深入工人群众，反复宣传这次罢工斗争的重要意义、具体要求，以及斗争的策略，反复强调在斗争中工友们必须保持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预先作了统一的安排。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准备工作，六月间才开始罢工。这场罢工斗争共有六、七千人参加，在老怡和纱厂历史上是空前的壮举。英国老板慌忙开会研究对策，决定采取高压手段，逮捕这次罢工的领导人，然后威胁工人复工。但当他们逮捕王根英等人以后，激起工友们的更大愤慨。全厂工人接连几天坐地罢工，坚决要求释放被捕工人，要厂方答应这次罢工所提出的要求。全厂工人在共青团支部领导下紧密团结，坚决斗争，迫使哈尔波的阴谋宣告失败，被迫放出王根英等几位工人领袖，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的要求。

这次罢工取得胜利，对于资本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而对工人则是极大的鼓舞，提高了大家同资本家斗争的信心。王根英在这场斗争中勇敢机智，充分表现了她的革命精神和领导才能。

(三)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的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

顾正红；接着，发生南京路上的大屠杀，由此爆发了全国性爱国反帝的“五卅”运动。

针对帝国主义制造的这些血案，中共中央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进一步放手发动各阶层群众，号召上海全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坚决地向帝国主义者进行还击。五月三十一日晚，党中央决定，并由工会联席会议商议，一致通过成立了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总工会的第一个决议，就是要求全市各界从六月一日起开始总罢工。

六月一日清晨，根据上海市总工会的决议，怡和纱厂老厂的七千五百多名工人，在王根英等人的带领下，高喊着“报仇雪耻”、“反抗残暴杀人的外国强盗”等口号，冲出工厂，参加了全市各界十五万人的罢工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来到南京路上，与帝国主义派来镇压的巡捕遭遇，成群的骑兵穷凶极恶地向游行队伍扑来，企图驱散游行队伍。工人们奋勇直前，进行搏斗，把巡捕从马上拉下来，挥拳猛打。巡捕又用早已准备好的高压水龙，对着游行队伍冲射。工人们依然手拉着手，挺胸前进。这一天，王根英始终走在怡和纱厂队伍的最前列。她一面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一面鼓励大家前进！

在厂里，党、团和工会积极组织工人群众同英国老板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提出了保障工人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十一项要求：一，工人工资每月至少不低于十五元；二，工资应按物价至少每年调整一次；三，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十小时；四，星期日要休息，工资照发；五，不得无故打骂和乱罚工人工资；六，不准任意开除工人；七，因公死亡应发给抚恤金；八，工人在病假期内，厂方应负责医治，并发给半数以上工资；九，改善女工、童工待遇，妇女生产期内，应有一个月病

假期，工资照发；十，工人有集会、言论、出版自由；十一，改善工厂设备，如增设门窗、天窗、厕所等。

罢工期间，王根英废寝忘食，领导工人坚持斗争。作为共青团支部书记和工会的负责人，她和党支部书记李时民及其他党团员一起，挨家挨户到工人家中访贫问苦，送去从中外各方面募集来的救济金，及时解决了工人群众的生活困难，鼓舞了工人们的战斗意志。广大工人坚决表示：一切按照上海总工会的要求去做，不获全胜，决不罢休，资本家不答应工人提出来的要求决不复工。

波澜壮阔的“五卅”反帝运动，象一股强劲的飓风，冲击着上海这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大本营，同样震慑了老怡和纱厂的英国资本家。怡和纱厂的七千五百多工人，在全国人民反帝风暴造成的有利形势下，齐心协力，经过四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迫使洋大班哈尔波答应了全厂工人提出的大部分要求。同时，英国资本家还被迫同意，罢工期间每人发给三块钱的补贴。

持续四个多月的罢工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复工这天成了全厂工人无比欢乐的节日，他们兴奋地排着长队，高举着五色缤纷的标语，浩浩荡荡地绕厂游行，用大示威来庆祝这次罢工斗争的伟大胜利。

但是，“五卅”运动过后，英国资本家、日本资本家就开始向工人反攻倒算，把原来答应的条件全部推翻。怡和纱厂老板哈尔波还借口厂方有“困难”，扬言要削减工人，同时雇佣了一批打手，在厂里到处寻衅闹事，在车间里欺侮女工、童工，恫吓、打击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并且积极准备迫害领导斗争的工人领袖。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直在暗中窥探工人斗争动向的洋大班哈尔波，通过工贼的侦察了解，终于搞了一份怡和纱厂的黑名单；并与租界巡捕房相勾结，制定了逮捕计划。在这份黑名单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王根英。

十一月底的一天，王根英和邢红珠等带领一部分工人，到青云路去参加上海总工会召开的群众大会，回来后没有来得及上夜班。次日傍晚，工人正在交接班，纱厂总管孙富生领着一个绰号“打人老毛”的英国人，突然到车间里来，一见王根英就问：昨天夜班为什么许多人没有来？你们都往哪里去了？王根英见他们这副气势汹汹的模样，早知道来意不善，便沉着地回答说：昨天我们没有出去，有个工友病倒了，我们都去看她了。“打人老毛”一声奸笑，指着王根英和邢红珠说：那好，我们大班请你们二位去谈谈。

她们来到哈尔波的办公室。诡计多端的哈尔波，施展了软硬兼施的手段。一见她们进来，装出一副笑脸，妄想用加工资、当“拿摩温”来利诱、收买她们，要求她们以后不再带头闹事。王根英当场厉声驳斥说：别做梦了，你想收买我们做奴才，那是痴心妄想，永远办不到。只要有你们压迫和剥削工人的一天，就必然会有我们工人反抗的一日。哈尔波恼羞成怒，当场露出凶狠的目光，大声命令暗藏在里屋的打手，把王根英、邢红珠抓了起来，带上早已候在厂门口的警车，押解到榆林路巡捕房。

王根英和邢红珠被捕的消息马上传遍每个车间，激怒了全厂的工人。细纱车间共青团员王翠珍、姚素珍等带头关了车子，动员工友们起来斗争；粗纱车间共产党员马振开带了一批男工，团团围住哈尔波质问；其他各车间的工人也都行动起来。

来，人群象潮水般涌向工厂门口。随后，在工会统一号令下，全厂几千名工人，浩浩荡荡地朝巡捕房冲去。

这个时候，怡和厂党支部书记李时民和区部委工会负责人等，密切注视着这场斗争，及时研究情势的发展。涌向巡捕房的工人们，根据党支部的部署，由党员和积极分子带领，分成几个小队，从四面八方把巡捕包围起来，一面呼喊口号，一面向里头掷石头。那些被群众威力震慑了的巡捕们一个个缩着身子不敢露脸。手足失措的探长，虽然内心里对工人咬牙切齿，但是想起刚刚平息的“五卅”运动的革命风暴，心有余悸，岂敢再用武力镇压。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想了半天，才对缩头缩脑的巡捕大声叫道：“愣着干嘛，快拿水枪冲！”

随着探长的命令，几支水枪马上接通了水源，劈头盖脑地直向工人头上射来。许多来不及躲避的工人，都被强烈的水注冲倒在地，浑身湿透。时届深秋，夜晚寒气袭人，工人们衣衫单薄，有的还赤着双足，经水一淋，更觉寒冷，特别是一些童工冷得直打哆嗦，但是大家毫不畏惧，爬起来坚持喊口号、掷石头。巡捕房使用了全部的水龙，未能驱散工人群众，他们又怕事态闹大，不好收场，便打电话给哈尔波，哈尔波万般无奈，只得要巡捕房“放人”。

经过两小时的搏斗，工人取得了胜利。当夜九时左右，巡捕房的大门打开了，王根英、邢红珠在一片欢呼声里回到了工友们中间。工人们怀着胜利的喜悦，高兴地跳跃、欢呼，热情地拥抱她们。

王根英和邢红珠由群众簇拥着回到工厂，党支部决定举行罢工，由工会向英国资本家提出：厂方必须向受害者赔礼道歉；以后不准抓人；停工期间工资照发。厂方必须老实接受，

工人才能复工生产。罢工延续到第四天，哈尔波便被迫接受了工人们的全部条件。

刚满十八岁的王根英，在“五卅”运动的斗争风暴中经受了锻炼。这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展开的全国性反帝斗争，极其深刻地教育了王根英，在她的头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后过了很久，她还曾非常兴奋地谈起这一段终生难忘的斗争经历：

首先由恒丰厂发起罢工，接着就是我们，六、七千工人也罢下工来了，宣传日本人打死了工友顾正红，然后我们也组织了工会，再宣传别家罢工，帮助（他们）组织工会。当时罢工的一、二天内，只要见到马路上穿西服的，不问他是不是日本人，拉来就打。现在想起来，那时的“运动也是多么热烈啊！”过后两星期，由义和夜校的林先生夫妇介绍我入青年团。以后除了工会工作之外，经常找些青年女工来谈话，也把她们介绍给青年团。团员发展了，当时指定我当小组长，后来便发展到二十多，同志们都推举我当支部书记，我就不推托担任了。罢工数月之后，口头上马马虎虎答应了一点条件就复工了。这时候是工人更集中了，我们晓得资本家是很狡猾的，所以我们积极努力的发展团员，过了二、三个月，团员发展了六、七十，多是能起作用的。……

年轻的王根英领导团员们进行了勇敢的斗争，她们的胜利引起别厂工友们的羡慕和效法。不久，她又被推选为这个厂的工会主席。一九二五年，王根英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成

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

(四)

英、日资本家在“五卅”运动结束后对工人进行的反攻倒算，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向导》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为‘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的宣言，号召全国各界民众挺身奋起，高高举起反帝反军阀的旗帜，掀起革命斗争的新高潮。

当时，江浙区委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赵世炎和全国总工会负责人汪寿华以及沪东区部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以纪念“五卅”运动一周年的名义，领导怡和纱厂工人首先发动罢工，对英国资本家进行反击。

在开始罢工前，王根英领导工会组织了一批工人，拿着木棍、铁棍和斧头，对怡和厂内一些最反动的帝国主义走狗，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厂内党员吴启杰和粗纱间钢丝车上的几个工人，在总管孙富生每日必经的薛家浜，用斧头将其砍伤；接着又把代替他做大总管的原摇纱车间包工头“大和尚”，用木棒狠狠地揍了一顿；还用铁棍将“大和尚”新选拔的拿摩温金凤、贵福痛打一顿；……这些事情迅速地在全厂传开，那些包工头、拿摩温十分惶恐，暂时不敢明目张胆地与工人对抗了。反动势力的削弱，使得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宣传发动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广大工人群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更紧密地团结在工会组织周围，再次显示出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强大威力。

赵世炎、汪寿华和沪东区部委十分关心老怡和纱厂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经常找厂党支部成员了解情况，商谈工作。他

们看到老怡和纱厂的工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罢工的条件已经具备，便决定按预定计划由老怡和纱厂以纪念“五卅”运动周年的名义首先发动罢工，然后推动沪东地区各界民众罢工运动的发展。

六月十日，总罢工正式开始。为了防止发生意外，王根英和李时民等组织并且带领党、团员分头到各车间的工人中去，把工人组成若干支队，统一行动。随后，党支部又派王根英和邢顺娣、范家宝等人，代表工会向英国资本家提出了包括“不准撕毁协议”在内的十二项复工条件。

十日这天，党支部组织全厂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工人们拎着浆糊筒、标语纸、传单等，从杨树浦路厂门口出发，一直到英、日帝国主义驻上海领事馆门前，高声呼喊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共产主义的五卅烈士精神复活起来！”这个时候，沪西日本纱厂、英商电车公司等单位的党组织，闻讯也派出工人游行队伍前来助威，几支游行队伍汇合成一股巨大的洪流。

怡和纱厂老板哈尔波接连吃了几次败仗，遭到怡和洋行董事长的严厉训斥，气急败坏地躲在家里不敢露面，只让他手下的那些工头、走狗出来同工人周旋。但他贼心不死，暗中策划新的阴谋。

罢工坚持了两个多月，哈尔波一直装着不理不睬。他的肚子里到底怀着什么样的鬼胎，工会下一步应该如何动作，是王根英时刻在考虑的问题。

这一天，王根英冒着盛暑的余威，正沿着发烫的人行道，朝着设在厂外的怡和纱厂工会走去。路上，忽然工人纠察队队长吴启杰气呼呼地赶上来说：“工头陈毛毛，不知从哪里招来

一批新工人，说要去开工，被我们纠察队拦住了，正在争吵呢！”

“啊！”王根英眼睛里一亮，马上猜到这就是哈尔波的鬼花样。她折转方向，跟着吴启杰向出事的地方走去。

怡和纱厂工人的纠察线就设在离厂不远的马路上。王根英走近来，只见留着细分头、镶着大金牙，身穿香云纱衫的陈毛毛，正站在纠察线外高声嚷叫着：“这是干什么？自己不干活，还不许人家干活！”说着，又转身挑动他背后一大群新招来的工人说：“他们不让你们去，你们不能冲过去吗？”

这一群人里面现出一阵骚动，工人纠察队也正一个个摩拳擦掌，气氛异常紧张。王根英见此光景，快步赶上，站在高处大声呵斥说：“陈毛毛，你在干什么？”

包工头陈毛毛曾经多次和王根英打交道，深知她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见她来了，只得收藏起满脸的凶相，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是这样的，王师傅，大班要招收一批新工人，要我带他们去熟悉熟悉厂里情况，不料纠察队拦着不给走！”

王根英一针见血地说：“大班倒是会用心计，早不招收，晚不招收，这会儿咱们工人罢工，他突然招了一批人来，明摆着是破坏罢工嘛！”

陈毛毛听见她单刀直入，击中要害，不敢正面狡辩，回转身又去挑拨那批新招来的工人：“大班是为了你们好，你们失业在家没钱拿，大班招工是帮助你们解决生活问题，他们这伙人罢工有总工会分给他们津贴，可他们也不让你们上工，你们可要养家糊口。”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王根英说：“这是他们工会的头头，你们找她去评理！”

这番歹毒的挑拨，暂时产生了一点效力，在新招来的人群里

引起了一阵骚动。陈毛毛得意的闪在一旁，想在那里“坐山观虎斗”。

王根英压住心头的怒火，向在场的全体工人大声问道：“工人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要罢工？”

吴启杰高声回答说：“洋大班和狗工头压榨我们！”

王根英说：“对！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剥削我们，我八岁就进帝国主义的工厂当童工，每天要从鸡叫做到鬼叫，所得的工资只有一角钱，别说养家啰，自己一个人都难以糊口，进出厂要抄身，上班不要说吃饭时间都没有，连上厕所都要受限制。在这里，洋大班每天在车间里巡视两次，在洋大班巡视的时候，拿摩温把所有的厕所门都锁上了。一个童工吐口痰在地上，被洋大班看见了，硬逼着她要把那口痰吃掉！”

大个子纠察队员蔡文锦也站出来说：“我们车间里的一个童工，一次不小心，把筒管落到车肚子底下。洋大班逼着她去拣，结果辫子被卷进机器，人给轧得血肉模糊。洋大班仅仅看了看机器是否坏了，扬长而去。孩子的父母哭到厂里来，洋大班叫包工头陈毛毛把孩子的父母赶出厂外，并且把这个孩子的尸体用箩筐抬出厂外了事！”

“你们看，我手臂上的伤痕！”人群里响起一个童声，小纠察队员、童工小陈忽然登上高处，撩起袖子说：“就是今年夏天，一次绕了一些线，准备下班去放风筝用，在门口给包工头陈毛毛抄着了，把我一顿打，还罚我站在烈日下，晒得我头昏脑胀，汗水如雨淋，幸亏师傅们赶来，把我救了出来。”

听到这里，陈毛毛脸色顿时变了，吓得直发抖。正在这个时候，在他带来的这批新招来的工人里头，有个人愤怒地高声骂道：“工头陈毛毛说得多好听？说什么英国人的厂文明啦，什

么‘怡和’厂就是‘快乐’与‘和睦’的乐园。这样看来，开厂的洋鬼子都是一个样的黑心肠。”另一个新来的接着说：“陈毛毛这家伙，存心把我们朝地狱里送嘛！”

王根英望着激动的人群，继续大声说：“世界是我们劳动大众创造的，我们双手生产那么多财富，为什么吃不饱，穿不暖？这些钱落到哪里去了呢？落到帝国主义者的腰包里去了，落到陈毛毛这种狗腿子手中去了，咱们那一点低微的工资，经过三层剋扣：洋大班扣一层，包工头扣一层，拿摩温扣一层，到我们工人手里还有多少呢？包工头陈毛毛每逢过年过节，还强迫工人给他送礼送钱，否则就要找个借口开除工人！……”

她的话还没讲完，新招来的人群中又有人议论说：“这次招工，他还骗去我们每人两块钱，叫什么‘见面礼’！”

平日饱受陈毛毛欺侮过的工人，气得一个个怒不可遏，一齐拥上前去，拳头象雨点般落在陈毛毛身上。这个作恶多端的洋大班的走狗，不大一会儿工夫，就被打得气息奄奄。他被几个小狗腿子抬走，到医院就一命呜呼了。

包工头陈毛毛被工人打死的消息，马上在厂里传开了，工人们听到，无不称快。哈尔波串通租界巡捕房，开来了两辆消防车抓人（他们怕警车抓人太显眼，特地改用消防车），强令工人复工。王根英带领工会的同志冲上前去拦住辩理，同时组织工人包围了消防车，砸坏了司机棚的玻璃，房顶上的工人，还用梭子、筒管、砖头照准巡捕痛打，迫使消防车灰溜溜地撤走了。

党支部紧接着在厂对面的茶楼上召开了紧急会议，仔细分析了厂内外的形势。为了再次粉碎哈尔波的反扑，还研究了应急措施，其中包括：工人纠察队要加强巡逻，设置瞭望台，密

切注视巡捕房的动向，组织小分队到厂外去寻求社会的舆论支援和物资支援，解决工人生活问题，等等。

这次罢工已坚持四个多月。哈尔波在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惨败以后，不得不冷静下来正视现实，暂时认输，无可奈何地同工人代表谈判，接受了工人代表提出的复工条件，其中包括每人每天增加三分钱米贴。

在历次罢工斗争中，厂里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身份已经暴露，党组织考虑到当时的形势比较复杂，党的活动还不易公开，英国资本家执意要求这些同志离厂。因此，江浙区委、沪东区部决定把党支部书记李时民、共青团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王根英等四十多名党团员撤离老怡和纱厂。

可是，王根英和她的战友们在这里领导工人长期进行的斗争，为这里的党团组织、工会组织都打下牢固的基础。以后老怡和纱厂一直保持着模范支部、模范工会的称号。

(五)

一九二六年夏天，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誓师北伐，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进军，推翻军阀统治，从一九二六年十月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头两次起义都因准备不足和国民党方面动摇，在军阀孙传芳的镇压下遭到失败。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领导下，上海八十万工人举行总罢工，接着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英勇的上海工人经过两天一夜的血战，于二十二日占领上海，取得了起义的胜利，并建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王根英勇敢地参加了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她离开怡和纱厂后，先被安排在沪东区部负责妇女工作，不久又调到上海总工会任组织员。三次武装起义她都参加了，第二次和第三次都是工人武装纠察队队员，负责运送起义用的枪械等工作。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那天，当工人队伍到达华德路（今上海染印三厂附近）的时候，王根英从家里拿出几支枪和一箱弹药，分发给起义工人。这些枪枝，是周恩来在起义前亲自到沪东区部了解情况时送来的，弹药则是区部秘密购买的。当时王根英冒着生命危险，不顾哥哥的反对，把这些武器藏在家里。她在同敌人周旋时很机警，斗争很勇敢。有次在商务印书馆同巡捕对抗，她曾奋勇夺过巡捕的手枪。在这次起义中，女工队伍还到虹口公园西北面的铁道上卧轨，以阻止吴淞口方向增援上来的敌人。

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三十小时的激战，打败了军阀部队以后，在全市人民欢呼胜利声中，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宣告成立。王根英当选为市政府委员。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工人遭到残酷的屠杀和镇压，上海又处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之下。霎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全市，参加临时市政府的共产党员和左派成员以及其他战线上的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被蒋介石通缉。开头，王根英在工人中间隐藏起来，根据上海总工会的命令，领导工人继续罢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但是正象王根英后来所说那样：“军事上的失败，就使工人失去了保障，资本家就乘势收买走狗去工会捣乱，破坏罢工，我就不能继续工作下去了”。

因为王根英在历次罢工斗争和武装起义中冲锋陷阵，总是

站在最前线，在上海的反动营垒中，很多国民党警探、流氓以及租界巡捕房的暗探，都知道她的名字，要跟踪抓她，使她无法公开活动，而且在家里也不安全，总有人盯梢。到了晚上，王根英东躲西藏，时常住在别人家里不回家。在最紧张的时候，一天内要转移七、八个地方。过了不久，她便怀着对反动派的深刻仇恨，作为上海党的代表，前往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同她一起当选为上海党的代表的，还有她在怡和厂的小姐妹邢仁娣。

就在这个时候，经人介绍，王根英和陈赓相识。陈赓于一九〇三年出生于湖南湘乡，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进黄埔军校第一期，其后参加了广东的两次东征战争，一九二六年前往苏联学习保卫工作，一九二七年春回到上海，辗转来到武汉，任北伐军将领唐生智总部的警卫营营长。陈赓听到王根英苦难的身世，晓得她的勇敢斗争精神，深受感动；陈赓多年以来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心，也使王根英衷心敬佩。共同的革命理想、革命的深情厚谊，把他们亲密地联结在一起。两人就在当时全国革命中心武汉，结为伴侣。

“五大”会后，王根英又和邢仁娣一起，作为上海派出的代表，于五月间参加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但是，当她们到这个大会筹备处去报到的时候，由于白色恐怖弥漫全国，各地已经来到武汉的代表只有十五人，暂时无法开会。党组织决定：各地已经报到的代表先去长沙，各自介绍自己的斗争情况，交流斗争经验。当时分配给王根英的任务，就是要她宣传工人阶级三次武装起义的情况。她们到达长沙不久，国民党何健所部第三十五军的第三十三团团团长许克祥等，突于五月二十一日发动

“马日事变”，叛变革命，袭击湖南省工会、省农会以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王根英等一行到长沙的十五人，在敌人发动疯狂屠杀的环境中，只得分别隐蔽起来。王根英和邢仁娣藏在一个共产党员家里。这时陈赓曾经派人到长沙接她，没有找到。及至长沙至汉口的火车恢复通车，她们两人由陈公庆陪同，悄悄登上一节货车厢北上。同车厢还有一个国民党军官的老婆，王根英等主动跟她搞好关系。火车到岳州站的时候，国民党军队拦车检查，曾说陈公庆贩卖人口。陈公庆说，他同王、邢两位是亲戚；那个军官老婆说：她们几个人满规矩的。在火车上坐了两天一夜才到武昌，下车后在黄鹤楼稍事休息，就乘船渡江到汉口，陈赓曾请他们三人吃饭，以示对陈公庆的谢意。后来，王、邢两位参加了第四次劳动大会。

尔后，王根英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又出席了国际工人太平洋劳动大会，并且被调回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六）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陈赓参加了南昌起义。其后，起义军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军途中，陈赓于八月二十四日在会昌战斗中负重伤，左腿中了三颗子弹，胫骨、腓骨全被打断。他历尽千难万险，经过汕头、香港来到上海，已是十月中旬。

陈赓一到上海就和王根英会面。自从在武汉二人分别以后，王根英一直期待着陈赓的信息。她在报纸上看到八月一日南昌起义的消息，非常兴奋；不久又得到了起义部队南下潮汕失利的消息，担心和悬念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强烈地折磨着她。如

今，忽见陈赓拖着重伤的腿，备历艰险来到上海，便非常高兴地把她安顿在家里，尽心照料，并且马上帮助他 and 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党组织了解陈赓的伤势严重，想方设法把他送进上海著名的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疗。当时王根英正在党中央机关担任交通，常到医院探视、照料陈赓。牛惠霖大夫和他弟弟牛惠生的医术高超，按照陈赓的愿望，把折断的腿骨重新给他接起来，保住了这条多处负伤的腿。

在陈赓住院治疗的时候，党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倡议正在上海筹划成立中央特科，以保卫党中央的安全。陈赓曾于一九二六年冬天，被派往苏联学过保卫工作，因此，一九二八年四月，陈赓受伤的腿还未彻底治愈，就到特科负责领导情报工作。

这个时期，陈赓在异常艰险的条件下坚持工作。他的工作需要依托家庭作掩护，王根英就搬来和他住在一起，还把她的妹妹王旋梅和弟弟王心昌带来，组织了一个象样的家庭，以免敌人疑心。第二年，他们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知非。为了避开敌探特务的追踪，他们经常搬家，改换姓名。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每次都须选择出路多、遇事便于躲避的住房。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两年当中，他们就搬过五次家，先后在霞飞路、辣斐德路、保定路等地住过。在此期间，王根英努力地掩护陈赓，保障他的安全，使他能正常地进行工作。她自幼生长在上海滩，很早就参加了工人阶级的斗争，非常熟悉这里的情况。平素，她细心而巧妙地观察房前屋后的动态，注视着每一个形迹可疑的人，随时都在考虑如何应付可能出现的惊险紧张局面。无论是对待警察、巡捕的查问，或是遇到便衣

特务的打探，她都能够机敏地对付过去。她对同住的弟弟、妹妹，也经常进行保守秘密的教育，弟弟王心昌还帮助陈赓送过信。知非逐渐长大一些的时候，自个能说会跑，她不让孩子知道自己家的街道门牌号码，在孩子面前从不谈起陈赓的真实姓名和在外面工作的事情。陈赓有时把枪带到家里，睡觉时便压在枕头下面。在知非三岁的时候，有天独自个悄悄地跑到街上去玩，看到“红头阿三”身上挎的枪，忽然想起前几天爸爸藏在床头的手枪，天真地说：“红头阿三的枪，没有阿爸的枪好。”巡捕一听，马上盯住知非，紧跟知非到家门口，正好遇到根英出来找孩子。巡捕问她：“你家有枪吗？”她便想到可能是知非泄露了机密，马上机警地回答：“有，有支枪，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因她讲话的神情从容、自然，就把印度巡捕支使走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发生了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事件。由于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李克农及时地掌握了顾顺章叛变的情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经过陈赓、李强等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彻底粉碎了顾顺章及其主子妄图破获党的中央机关的阴谋诡计，使上海党在千难万险的局势中完整地保存下来。

在顾顺章叛变以前，陈赓同顾顺章工作关系密切，不仅陈赓工作上的来往关系顾顺章都晓得，陈赓的亲友顾顺章也全都认识。因此，这事发生后，周恩来便叫陈赓隐蔽起来，免遭敌人的暗算。不久又派他去天津工作。

这年六月十六日，陈赓便和陈养山北上天津，王根英和知非随同前往。他们到天津后在法租界交通旅社住下，对外宣称要在这里开设商店：陈赓是老板，王根英是老板娘，陈养山是

伙计（账房先生）。

陈赓来天津的任务是：营救被捕的同志，清查叛徒，同时研究在天津能否建立特科工作，以保卫党组织的安全。当时天津党组织遭受的破坏异常严重，许多同志被捕，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他们冒着盛夏的酷热，紧张地同叛徒密探周旋了三个月，由于时间短，营救工作未能完成；又因共同工作的一个同志被捕，被迫离开天津。这年九月，陈赓装作一个病人，带领全家同陈养山从天津乘火车绕道青岛，改乘一艘日本邮船返回上海。

不久，陈赓就被派往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工作。

（七）

一九三一年十月陈赓离开上海前往鄂豫皖红色区域以后，王根英带着孩子留在沪东区坚持工作。当时，东北三省相继沦陷，上海也正面临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九一八”的炮声震醒了沉睡的祖国大地，亡国灭种的大祸威胁着每一个中国同胞。中国共产党号召发动群众，武装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到处响起抗日救亡的呼声。党在这时候派帅孟奇到上海筹备工人反帝大同盟。她在沪东区找到王根英，转达了党中央团结各阶层人士实行抗日救亡的主张，并且指定王根英负责沪东区工人反帝大同盟分部的工作。从此，王根英投入紧张的抗日斗争，她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日夜不停地奔忙着。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进攻上海，第十九路军违抗蒋介石的旨意，奋起抵抗。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淞沪

抗战。这个时候，上海党组织紧急动员起来，全力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王根英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沪东工人救护队（担架队、护士队），直接开到前线服务。王根英和工人们一起，在炮火中抢救、运送伤病员，夜以继日地奔波，常常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她和同志们每天夜晚都到沪西自鸣钟附近的一个亭子间里碰头，向帅孟奇汇报情况。往往在这个时候，大家才感到肚子饿了。王根英便设法去借钱，买几碗阳春面让大家充饥。最后，上海抗战虽然被蒋介石出卖了，国民党政府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屈辱投降的《上海停战协定》，十九路军也被调往福建去进攻中国工农红军；但是党所点燃起来的抗日救亡大火，却越烧越旺，成为熊熊烈焰。

“一·二八”抗战结束后，王根英回到工厂做工。她先到香烟厂当临时工，为时不久，就被厂方解雇。她又进套鞋厂做工，进厂二十多天后，厂里发生了一件事情：资本家为要加强对工人的管理，强迫工人拍照片存档，遭到工人强烈反对。王根英根据全厂工人的情绪，向党组织请示后组织工人进行斗争，要求厂方取消拍照片的规定。由于工人内部没有团结好，这次斗争失败了，她和几个积极领导斗争的工人都被开除。

当时正值全国总工会成立了女工部，王根英被调去担任部长，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夏之栩任女工部秘书。她俩带着知非，同住在英租界的一个亭子间里。王根英几乎每天都往工厂里跑。她走了，孩子就由夏之栩照管。她经常回来很晚，孩子等急了，就哭着要夏之栩带他找妈妈去。在此期间，上海丝厂工人由于生活太苦，活不下去，就自发地举行罢工，要求改善生活。王根英得到消息，便去帮助丝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因为丝厂党组织的力量很薄弱，又因当时丝业萧条，老板破产，

丝厂工人的斗争没有得到胜利。

· 这年秋天，组织上又要王根英和夏之栩到全国总工会办的训练班去培训工会干部。训练班的任务是进行政治教育，同时教育工运骨干学会如何在秘密情况下做工会工作。党很重视训练班的工作，刘少奇亲自到这里讲过几次课，王根英每次都和学员一起听课。

王根英对党赤诚，为人忠厚，深得大家的赞扬。这时同她朝夕相处的夏之栩说：“我和根英同志相处不到一年，对她的印象很好。她待同志诚恳、亲切，不分彼此，生活很朴实。我们在一起时，吃饭是我俩用一个打气的汽炉子做。为的是不同外人一起做饭，以免泄露秘密。喝水，就到老虎灶去打开水。做这些事，她很熟练。陈赓同志多次提到这只汽炉子，好多党内同志都熟悉这只汽炉子，听说现在还保存在知非的姥姥家里。”

在此期间，王根英患过一场猩红热病。开始发高烧，还以为白喉一类的病，一直由夏之栩在家里照顾，不敢到医院医治。当时党的机关所以全都安置在租界里，就因为租界不报户口，可以随时搬家，改名换姓，便于隐蔽。但是租界里有一个规定，如果谁家有人患了传染病，巡捕晓得了就要到患者住处去消毒。王根英害怕巡捕到她们的住处来，泄露党的机密，忍着病痛坚持不去医院。直到病情恶化，连续几天发高烧不止，才到医院诊治。到医院后，对医生说是刚从乡下来医病的。医生确诊是猩红热，就住院治疗。王根英病愈出院，党又调她到全国总工会办的另一个训练班去工作，夏之栩这时调到中央组织部驻沪机关。

过了不久，陈赓从鄂豫皖苏区到上海来了。原来，陈赓于

一九三一年十月到达鄂豫皖后，曾经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任第十二师师长、方面军参谋长。在第三次、第四次反围攻中，他率部英勇奋战，多次取得重大胜利。一九三二年秋天，在新集（今新县）胡山寨战斗中，陈赓右腿膝盖处负重伤，还坐在担架上继续指挥部队作战。同年十月，当红四方面军越平汉路西进的时候，陈赓离开部队到上海来医治腿伤。

陈赓这次来到上海，又是经过王根英找到党组织的，也还是在牛惠霖医院里治疗的。陈赓腿伤治愈后，准备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下旬前往中央红区工作。组织上原决定王根英和他一同前去，王根英得知党的决定，能到中央红色区域工作，心里非常高兴。陈赓出院前后，她已经把动身有关的准备工作，全都做好了。她人虽还在上海，心早飞到红色首都瑞金。不料在他们动身前夕，陈赓突然因叛徒出卖被捕。当时王明推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不顾白区白色恐怖的严重情况，三天两头搞飞行集会，强令组织游行示威和发动罢工，致使许多党、团员与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杀害。王根英眼看着周围的亲人处境险恶，忽然又得知陈赓于三月二十四日被捕，受到很大刺激。正在不知如何是好，四月一日敌人又将陈赓押解到南京去。王根英在闸北酒店楼上听到这个消息，心里越发焦急，霎时间一阵头晕眼黑，支撑不住，竟和怀里抱的知非从酒楼上摔了下来，母子都受了伤。知非摔下来的时候，被下面的人抓住一只脚，因而保住了性命，但却把脑袋摔破了，送到医院里缝了好几针，至今头上还留下一个疤痕。此后，王根英在妈妈家里住了几天，害怕出事，又到上海郊区乡下杨家浜亲戚家里隐蔽了一个时期，才又回到上海，设法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陈赓从南京狱中逃到上海的时候，王根英正隐蔽在杨家

浜。他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的时候，曾到通北路底王根英的娘家找根英，根英不在，他已来不及再找，便对岳母说：“这次走后，短时间不会回来，根英有病，孩子只好留在外婆这里，委托外婆抚养。”

(八)

一九三三年六、七月间，王根英的病已渐渐好了，便从乡下回到上海市区通北路底家里，一面设法寻找党的组织关系，一面谋求职业。当时上海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王根英奔波数月，两件事都未能办成。

这年十二月间，由于叛徒出卖，王根英在家里被捕。出卖王根英的叛徒是张小妹和她的丈夫陈月先。张小妹是“五卅”运动时期和王根英一起闹罢工的恒丰纱厂女工，曾是这个厂的党支部干事。她的丈夫陈月先叛变了，叫张小妹去打听王根英的住址。一天早晨，张小妹的母亲买菜时看见早先同张小妹、王根英一起在纱厂做工时的小姐妹，辗转打听到王根英的住处。当天下午，张小妹就到王根英家探明路径。第二天早晨，王根英和弟弟在家里正准备吃早饭，一个穿长袍的瘦长个子特务来了，在外面还有好几个狗腿子守着。特务气势汹汹地进来，叫王根英跟他“走一趟”。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他也不说。王根英的弟弟说：“我跟你去吧！”那人不肯，一个劲地缠住王根英不放。特务如此蛮横，弟弟和家里的人都很气愤，想把特务打死。但王根英考虑到不能连累弟妹，示意他们不要莽撞。结果，这天的早饭没有吃成，王根英就跟随瘦长个子特务走了，再没回来。后经多番打听，知道她被关在提蓝桥监

牢，也不让家属探望。

王根英在上海经过会审公堂^①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后引渡给上海市公安局，马上又被押解南京宪兵司令部转送到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这时早先被捕的帅孟奇、夏之栩等人，已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从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转到这个监狱里来了。在这个监狱的女牢房里，关押的女政治犯有二十几个，除一两个党的外围组织的革命群众或家属外，都是共产党员。当时三号牢房里住的是被判无期徒刑的帅孟奇、夏之栩和被判有期徒刑十年的耿建华、十五年的何宝珍等，隔壁二号牢房里是钱瑛、纪钧、肖敏等人。王根英被押解到这里，和熊天荆等一起被关在八号牢房里。在二号和三号之间的墙壁上有一个小洞，安一盏小电灯，容易传音。三号的几个人，有事就和钱瑛商议。这样就以这两个号为中心，自然形成了以钱瑛、帅孟奇和夏之栩为中心的 leadership 核心，而在其他号子里，每处也至少有一个骨干，王根英就是其中一个。这个监狱的看守多是雇佣来的，并不懂得政治犯和刑事犯的区别，她们看到这些女政治犯斯斯文文，说话和气，从来不同她们吵闹，因此内心表示同情。常在中午或晚饭后，私下里把牢门打开让大家透透气，通点风。于是，大家利用放风、倒马桶、洗衣服和饭后洗碗的机会，抓紧传递消息，有事就分头通过骨干征求大家的意见，最后由三号的同志和钱瑛一起研究以后，再把决定传给大家。狱中的几次绝食斗争，就是这样发动起来的。

^①“会审公堂”指上海市军法会审处，是由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地方法院和上海市党部联合组织的，专门迫害革命者的审判机关。

当时，泛太平洋职工会秘书、国际互济会东方支部的波兰人牛兰，范绿意丝夫妇，被国民党逮捕送来模范监狱。他俩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社会人士不断声援，要求释放他们，国际舆论也大力声援，但国民党仍不理睬，牛兰夫妇就在狱中宣布绝食。三号牢房的同志和其他牢房的骨干得知此事，经过酝酿，一致同意以绝食的行动支援他们。她们向监狱当局提出的要求是：一、改善伙食，每周吃一次肉；二、允许亲友向监内送书、送食品；三、牛兰夫妇应当无罪释放。接着就开始了绝食。要在狱中取得绝食斗争的胜利，必须大伙齐心，否则不是饿死人，就是坚持不下去，使斗争失败。开始狱方对她们不加理睬，还把几个判无期徒刑的拉出去打了一顿，然后由典狱长钮传琦对其余的人进行挑拨，阴谋分化，他说：“你们别跟那几个无期的闹。她们是没指望的，你们还有希望。但是大家团结得很好，没有一个动摇的。俗话说：“七日不食则死”。大家坚持到第七天，监狱当局慌了，怕饿死人，被迫答应了大家提出的条件。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先期开始绝食已经奄奄一息的牛兰夫妇由狱方送进医院治疗，治愈后即行释放，牛兰夫人范绿意丝在出狱前还来看望了声援她们夫妇、共同绝食的难友们。此后不久，又取得了第二次绝食斗争的胜利。女监里的普通犯人深受感动，对政治犯的坚强意志非常佩服，有些看守也产生同情，私下里延长晚饭后洗碗的时间。

女牢房政治犯出出进进，由二十多人增加到三十多人，思想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做。一九三五年，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几乎把取得的胜利全部葬送掉。有个政治犯不是党员，也不识字，但她参加过前次的绝食斗争，认为胜利很容易取得。有天晚饭后的洗碗时间已经过了，别人都已回号子了，她还在外面

踉跄，并且和看守争吵起来。看守报告了最凶狠的“二科长”，二科长不问青红皂白，便下命令：此后除放风外，不准政治犯出号子，一切生活上的事情都由普通犯人代做。针对此事，党员们利用放风的时间，和骨干们商定，准备再次绝食，决心争回失去的权利。事先还同大家说好，绝食绝喝自愿参加，但参加后即不允许中途退出。绝食开始以后，年老体弱的同志头晕目眩，有的呕吐黄水。大家忍着难耐的饥渴，面对着狱方送来的饭和水，抱定宁死不屈的决心，毫不动摇。这种坚强的斗争行动，震动了整个女监。到了第四天，狱方感到问题严重，只得由典狱长出面宣布：一切恢复原状，希望大家复食。这场搏斗又获得了胜利。

王根英在狱中积极参加绝食斗争，表现得坚决、勇敢，在自己的号子里起了带头作用。她一面自己绝食，一面还跟其他女政治犯一起向普通犯人宣传绝食的原因，取得多数人的同情。在日常生活中，她也主动帮助难友，和同志们相处很好，由于陈赓这时远在中央红色区域，她母亲的家里极度穷困，别人都有钱寄来，唯独她没有。因她自幼过惯了穷困生活，也不以为苦，还常为大家做些洗衣服一类杂活。

共产党员总是把监狱视为一种学校，利用坐牢的时间学习政治和文化，而不让时间白白地空度过去。模范监狱女监的政治犯也是这样。王根英和其他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抓紧这个时机学文化，请文化水平高的当教员，熊天荆、帅孟奇给她以很大帮助。熊天荆是上海大夏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学生，负责教她算术。王根英非常用功，学得不错（都是利用倒便桶和饭前饭后以及放风的时间学的）。她在狱中还学会了刺绣、挑花这门手艺，曾经给知非绣了一对老虎枕头，托人带出来给知非留为纪

念。

一九三六年秋天，国民党当局把模范监狱的女政治犯调出，都转移到南京晓庄的“首都反省院”。到了这里，院方按每人的文化程度分班。王根英、帅孟奇等都说自己是工人，不识字，结果被分配在三班，以“学文化”为主。院方规定，全体犯人每天都得去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课，分在三班的同志故意叫喊听不懂，拒绝听。闹得教员没办法，只好改教他们文化课。她们刚到“反省院”的时候，本来是两人住一间房，因为有个叛徒告密，说女犯人调皮，结果改成“单人牢房”，每人住一间，单独关起来不许和旁的犯人一起生活；平时上课、吃饭、洗脸，也都是一个班集体活动，随时有人监视，不准互相谈话，以致大家很少有机会联系。

王根英就这样被敌人关押了三年多时间。面对着敌人的酷刑和牢狱生活的折磨，她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英雄本色，对党忠心耿耿，坚贞不屈，和难友们一起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九)

“西安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周恩来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和叶剑英等一起，直接同蒋介石及其代表人，先后在杭州、庐山、南京、武汉，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正是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的“五项国策”中的一项，是历次谈判斗争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九三七年八月，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到南京参加了蒋

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这个时候，周恩来和朱德一起接见了留苏回宁的学生并且作了政治形势报告。当时在场的姚素珍（她和王根英同时在怡和纱厂做工，并且一起参加了当时的历次罢工斗争），听了报告后，向周恩来说：王根英仍在狱中，还被关在南京晓庄“首都反省院”。周恩来说：不要紧，我会把她接出来的！

自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王根英所在“反省院”的情况也已有了很大改变，国民党再也封锁不住外面的消息了。而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情况变化更快，这里的看守对政治犯的管理也有些松动。周恩来要到监狱来的消息，王根英和在这里的许多女政治犯也都事先听到信息了。只是这些消息来得太突然，她们有点将信将疑，乍一听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八月十九日上午，周恩来和叶剑英、童小鹏等一起来到晓庄“反省院”。周恩来看了“反省院”全部政治犯名单，点着王根英和夏之栩、张琴秋三个人的名字（其他同志，在被捕后改了姓名），对这个“反省院”的院长说：“今天我们要见见她们。”院长满口答应，马上派人把她们三个叫出来。

王根英她们三个见到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时候，都被这意外的会见惊呆了。叶剑英先开口说：“怎么，不认识我们了？”她们才都如梦初醒非常高兴地迎上来，还把关在这里的其他同志的真实姓名，一一做了汇报。

周恩来同她们略事寒暄，亲切问好后，转向这里的院长说：今天先把她们三人带走。对方立即表示同意。站在一旁的特务却说：张琴秋是俘虏，若要出去，须得经过顾祝同的命令。这时，夏之栩向周恩来建议：熊天荆有病，可以让她顶替张

琴秋先出去。院长又同意了。特务却又提出：要走，还须有保人。周恩来幽默地对院长说：那么，我和剑英同志担保，可以吗？院长连连点头说：行，行！周先生要保还能不行！

于是，马上填了保单。周恩来又说：我能不能和大家见见面？院长又是满口答应，立即就叫关在这里的政治犯都到礼堂集合。周恩来和叶剑英向这里的全体政治犯作了形势报告，讲明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再度合作，一致抗日；还说红军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红军游击队也将改编，开赴抗日前线，并且在南京、重庆、西安、武汉等地成立八路军办事处，等等。周恩来还告诉大家：不久，你们即可奔赴抗日前线。他们的报告鼓舞了全体政治犯的抗日热情，受到热烈的欢迎。

报告会结束后，王根英等三人到牢房收拾好了东西。周恩来等回去后就派车来，把她们接到南京付厚岗一号——这座小楼原是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住宅，临时借给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

她们一到八路军办事处，就忙着营救当时关在各处监狱里的政治犯。夏之栩、熊天荆和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出来的几个男同志出面，一起办理了出狱同志的手续。以后，从南京的“反省院”、“军人监狱”、苏州监狱和上海的监狱里，陆续出来了二百多个难友，其中有许多人陆续到了延安。

这个时候，红军正在陕西省的三原地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陈赓和他的部队也驻扎在这里。所以，王根英出狱不久，周恩来就带她到西安来。八月二十六日，她又由西安转往云阳八路军总政治部和陈赓团聚。陈赓喜出望外。他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的日记里写道：“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

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作竟夜之谈。是晚彼此互诉离情，直达深夜，尚无疲惫，其快乐有胜于一九二七年武汉新婚之夕。根英在狱达四年，艰苦备尝，在敌威迫利诱下，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

王根英到达这里，正值八路军出征前夕，部队正在忙于整编。过了几天，王根英即去延安。陈赓正式被任命为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率部东渡黄河，驰往山西前线抗日去了。

(十)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王根英离开陈赓的三八六旅司令部，回到云阳总政治部。第二天，她与陈赓率部出师抗日的同时，离开总政治部前往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来到她在敌人牢狱中朝思暮想的党的怀抱。

王根英到达延安，先进陕甘宁边区党校学习。在这里，她学习得很好，心情很愉快，还对四年多监狱斗争生活做了回顾与总结。这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学习行将结束的时候，她向同志们谈了这次学习的感想：“我觉得毛主席的话真说得很确实。他说，学校好象是个洗澡室，好象磨刀石，同志们身上有脏的来洗洗，有锈的来磨起的锈。正是我要切实的洗，切实的磨。”王根英离开陕甘宁边区党校后，被调到《新中华报》社工作。

随着华北战局的发展，八路军三大主力在各战略区胜利展开。王根英眼望战火纷飞的华北前线，向往着八路军的战斗生活，一再要求到前方去。一九三八年秋天，党组织批准了她的请

求，调她到太行山区一二九师工作。她的愿望实现了，非常高兴地奔向已在开创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陈赓率领的三八六旅，这时也正战斗在太行山区。经过三八六旅驻地的时候，她在陈赓那里小住数日，就到一二九师政治部去报到，被分配到师供给部主办的财经干部学校任政治指导员。她对学员热情关切，工作深入细致，得到同志们的赞扬。当时在这个学校学习的一位女学员，在王根英牺牲四十多年以后回忆说：“一九三八年十月到一九三九年二月，我与王根英同志在一起。我是一二九师供给部财经干部学校的学生，王根英是我们的指导员。她穿军装，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她对同志特别诚恳，生活非常艰苦，晚上找我们谈心，了解同志们的思想和帮助解决同志们的困难。那时我刚入党，王根英就给我讲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还讲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的区别。先让我看书，然后让我讲感想。我们都很尊敬王根英指导员。在财经干校，我们女生是一个班，还有男生班，王根英是全校的指导员。她与我们一样，在老乡家吃饭，一点都没特殊的。一次，她收到一包战利品，说是她爱人送给她做纪念的。当时，我们不知道她爱人是谁。学校是行军式的（按：指没有固定校址，经常随部队行动），边行军边上课。组织上给王根英一匹马，她经常不骑，把马让给病号、掉队的同志驮背包。日军分进合击，我们坚壁清野。有时，我们一天就得走一百几十里路。”^①

这个时候，抗日战争正进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出现了更加紧张更加残酷的斗争局面。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间，日本侵略

^①见杨力1980年8月的一次谈话纪录。

者在华北敌后开始实施它所制定的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的作战方针。在晋冀鲁豫边区，敌人以冀南平原为重点，向我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以鹿钟麟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民族大义，竟与日寇的“扫荡”相呼应，派出部队进攻我军。为巩固冀南抗日民主阵地，坚持鲁西北地区的斗争，保障一一五师向冀鲁豫及山东发展，十二月下旬，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率三八六旅主力，越过平汉线，开进冀南地区。王根英所在的财经干部学校，也随部队东进。

一九三九年一月，日军抽调三万余人，分十一路对冀南进行大规模“扫荡”。我军主力带领冀南根据地的地方武装，立即展开极其激烈的反“扫荡”斗争。敌人气焰异常嚣张，每次受到我军袭击后，必派部队来报复还击。陈赓摸到敌人这一规律，就选择威县以南香城固附近的多沙地区，连续多次向威县敌人进行“诱其出犯”的夜袭，二月十日终将敌第十师第四十联队乘坐八辆汽车前来报复“扫荡”的一个加强步兵中队，一举全部歼灭。这次战斗创造了平原反“扫荡”作战的光辉战例，成为粉碎敌人大“扫荡”中的一次主要战斗。

三月以后，敌我斗争重点逐渐转向山地。冀南反“扫荡”已近尾声，财经干部学校决定跟随部队主力越平汉线西进，转往太行山区。这所学校从南宫附近开始行动的时候，突与日军遭遇。敌人放火烧了村庄，把这所学校的一部分人冲散了。王根英因为负责收容一部分伤病员，落在后面。她便把这部分伤病员带到一二九师供给部去。

三月八日，王根英随师供给部驻在南宫县东南的前后王家。这天，敌人进攻冀南军区驻地——冀南根据地的中心南宫地区，师供给部被敌人包围。这时，王根英不顾个人安危，把

分配给她骑用的一头骡子牵到卫生队来给伤员骑。伤员们知道她久受牢狱折磨，身体不好，执意不要。但因情况危急，她把一个伤员扶上骡子，招呼同志们先走，自己却徒步随警卫部队一起突出了重围。

王根英冲到村外，喘了口气，伸手一摸，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没有带出来。她着急地说：“不好！还有一笔公款没有带出来！”说毕，便毅然独身向村中奔去。大家想拦也没有拦住，她的身影已经没入村里。她在驻地已将挎包取出，不幸在出村时与敌人遭遇。等到大家组织好队伍，冲到村边来接应她的时候，她已经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

这个时候，陈赓正率领三八六旅越平汉线西进。他在当天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怀着无法抑制的极度悲痛，在日记中只写了一句话：“三·八，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此后一个多月，无限悲痛压抑着他，使他中断了日记的写作。直到四月十七日，他才在日记里写道：“月余来没有写日记，主要是懒。根英之丧，也有一些关系。”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六日，一二九师政治部出版的《前线报》发表文章悼念王根英，表彰她毕生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光辉事迹。这篇文章在结语中写道：“根英同志是忠实于劳动阶级利益的。同时，亦是最忠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她为工人阶级与中华民族而奋斗的精神，一刻也未停止过。她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妇女同志学习的。现在她的肉体虽然被敌寇毁灭了，然而她的精神是不死的，我们在今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学习根英同志的奋斗模范，并在广大群众中，创造出无数英勇奋斗的根本同志来，为根英同志复仇，为争取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而奋斗。”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王庶心（根英）：《自传》（1937年12月26日）。
2. 王根英：《斗争历史》。
3. 王根英：《被捕情况》。
4. 王根妹谈话纪录（1980年1月30日）。
5. 王旋梅谈话纪录（1983年4月）。
6. 《怡和厂史》（片断）。
7. 夏之栩谈话纪录（1980年7月18日）。
8. 帅孟奇谈话纪录。
9. 李强、童小鹏、张维桢、熊天荆、杨力、周萍、姚素珍等谈话纪录。

赵 铸

陈 华 鲁

(一)

赵铸一九〇六年生于陕西省府谷县赵家寨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在本县县立小学读书，刻苦用功，成绩优异；一九一九年受到“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思想进步。大革命开始时，他在山西汾阳一所教会学校——铭义中学读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和革命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他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积极参加宣传活动，从事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阶级觉悟不断提高，于一九二六年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府谷县立小学校长是个反动腐败的家伙，极力阻挠和破坏学校师生的革命活动。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学生们正在酝酿驱赶这个校长的时候，赵铸从外地回到家乡，并来到自己的母校，见到高克亭等许多同学。他讲了各地的革命形势，高克亭等向他介绍了校内的斗争情况。接着，他就帮助师生们出主意想办法，共同揭发校长治校无方、误人子弟、贪污腐化等罪行，开展广泛的宣传、罢课和请愿活动。在广大师生的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赶走了这个反动校长，斗争取得了胜利。

不久，党组织派赵铸去黄埔军校学习。他欣然接受，并立

即动身。高克亭一直把他送到黄河边，一路长谈，依依惜别。赵罇背着简单的行李，步行五百里到达太原，乘火车到北平后，发现路费不足，就租了一辆黄包车，风餐露宿，日夜在北平市里奔劳，直到挣够了路费，才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到达广州，进入黄埔军官学校，成为该校第六期的学员。

赵罇在黄埔期间，除了认真学习规定的课程外，积极参加当时已很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他曾任连党支部书记，并秘密发展了一些党员。他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当时校内常举行各种讲演会，各派政治力量也借此表演。在一次会上，有个国民党右派骨干分子大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不是国民党的，而是共产党的，疯狂反对我党和孙中山的进步主张。赵罇当即起立发言，系统地讲述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驳斥了那个家伙的反动观点，使其当众出丑，受到共产党员和左派群众的称赞。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广州事变”时，赵罇由黄埔军校机智脱险，前往武汉。

(二)

赵罇来到武汉以后，被党派到天津、北平做地下工作。后来被叛徒出卖，在天津被捕入狱。敌人对他软硬兼施，威胁利诱，毫无结果。两年后被释放，继续在平、津工作。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赵罇在北平再次被捕，关押在东北宪兵司令部。在连续四十天的审讯中，敌人施行了种种手段，他始终坚贞不屈。后被转到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军法处，又经多次审讯，两月后判刑，关进“北平军人反省分院”。

“反省分院”在北京草岚子胡同，院内设南监北监，每监有东西两排，每排有十间牢房，按顺序编为十个“号筒”，每个号筒只有一个窗子，两个号筒的隔墙上有个小孔，合用一个电灯，两排号筒中间是走廊。住在各号筒的“犯人”，除集体到食堂吃饭和三次短时间“放风”外，平时各号筒牢门紧锁，大小便也在房内。敌人对政治犯施行长期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妄图迫使他们自首叛变。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我党在监内成立了秘密的党支部，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赵罇（监内名赵朴）曾任支部组织干事。他被关在南监东排一号筒，靠过道有个窗口，牢方人员从东边楼上下来，或看守来查监，他首先可以看到。支部宣传干事杨献珍在病号监“照顾”病号，来回打水、倒马桶经过这里，便于和他联系。薄一波、刘澜涛等支部负责人关在二、三号筒，联系也方便。赵罇实际上是狱中党组织联系的中枢。他不大引人注目，却机警健谈，和牢方人员混的很熟，常利用他们进行工作。

当时在党支部领导下，有个学习委员会，赵罇是委员之一。他们通过被争取过来的看守，可以从监外带进党的文件，购进马列著作和各种报刊，英文的杨献珍翻译，俄文的殷鉴翻译。开始他们把厚书拆开，分夹在《红楼梦》等书里，利用壁孔传阅，后被敌人发觉，便不伪装，有人借窗孔放哨，看守来了就用举拳或敲墙的方法示意收藏；看守走了，又用伸掌或敲墙表示解除。赵罇除自己认真读书，并积极参加细致的组织领导工作，把监狱变成“马列主义党校”，加上严格的组织生活，所以大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一直坚持斗争。

敌人不断开展政治进攻，派人讲“四书”、“五经”，派

天主教“修女”给治病，派教徒讲“上帝创造世界”；派佛教徒讲“唯实宗”等，妄图从思想上征服这一批共产党员。每逢这时，赵罇总是站在前列进行反击，而且很能掌握政策和斗争艺术。例如对天主教，他不去讲有无神鬼，也不讲谁创造世界，而是讲现实的抗日救国道理，问他们谁见到“天主”，它能救国吗？谁去过“天堂”，那里能安民吗？教徒们常被问得无言答对。敌人还要每人每周写一篇学习感想文章，诱骗大家上当。赵罇和其他同志坚持不写，并说对政治犯不能强迫写文章。一九三三年后，国民党配合第四次“围剿”，派何应钦任北平行营主任，带来宪兵三团，插手监狱，改变了对政治犯的进攻方式，规定半年“审查”一次，不管刑期长短，只要在其预先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按个手印，即可释放；三次“审查”仍不悔改，就加刑或枪毙。党支部及时指出：“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动员党员坚持斗争，并研究了应付“审查”的办法。赵罇在每次“审查”时都表示：要杀就杀，我没有错，谁抗日救国我拥护谁；那些不抗日，把东三省奉送给日本的人才有错，应当悔过的是他们。敌人三次审查都告失败。

在党支部领导下的另一个组织是生活委员会（亦叫生活“公社”），赵罇是主要负责人。委员会把难友按牢房编组，任务是领导反剥削、反虐待，要求延长放风时间、改善生活等斗争。譬如生活费规定每人每月三元八角，实际只能吃两元，将近一半被克扣；有时饭里掺沙子、菜里浇明油等。发现这些情况，他们就在吃饭时当场提出，叫牢方答复。赵罇有时先发言，有时在中间或最后收场时发言，每次都积极领导，坚持斗争。赵罇还负责按“公社”原则，统筹管理经济。当时一百多人，监外援助的钱或物都交给他。这些钱，无论是寄给谁的，

除了对本人适当照顾外，其余都根据各人的实际情况，精心计划分配，就是几个烧饼，也切成小块分给大家。这样，就使监外无经济来源和体弱、生病的难友，在衣服、用品、营养、药物等方面，都得到适当照顾；还有利于培养共产主义精神，保证健康，坚持长期斗争。

监狱斗争的最高形式是绝食斗争。当时敌人对政治犯百般摧残，脚镣重的达八斤，轻的也有三斤，最难熬的是冬天，煤炭被克扣，牢内阴冷潮湿，百分之九十的人患关节炎，其他疾病也很多。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党支部研究开展绝食斗争。赵罇在重病情况下，也毅然参加。十九日早晨宣布绝食，各牢房选出代表，赵罇带病做代表，由人架着去谈判，向敌人提出了六项条件，敌人不答复。第三天，敌人在院内架上机枪，强迫复食，结果无效，只好同意病号去脚镣，体弱的换小镣，看书报自由，每号筒增加两个火炉，改善伙食，延长放风时间，各监房可以走动等项条件，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二十五日晚（绝食第七天）宣布复食前，赵罇说话已很困难，但他以共产党人的顽强意志，与难友们一起坚持到最后胜利。

一九三六年春，何应钦滚出北平，全国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党支部决定要当局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出去抗日，并派出代表交涉。牢方答复：“登报是制度，不登不行。”经党组织决定，不写“反共”字眼，只写某某启事，出去抗日或教书或务农，由杨献珍起个草稿，报到军法处。第二天，敌人忽然把张永朴（即薄一波，党支部书记）叫去，换上他们改写的带有“反共”二字的启事，叫张盖手印。张坚决拒绝：“你们要我按这个反共的手印永远办不到，你们的把戏骗不了真正的人。”他的话声音很大有意让大家听到。敌人见他不屈从，

便把他带到另一处关押；又造了一张张永朴已按过手印的假启事，叫别人跟着按手印。赵罇知是骗局，坚决不按，其他同志也不约而同地拒绝按，敌人的阴谋完全失败了。

一九三六年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新的革命高潮就要到来，党急需大批干部。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党中央做出决定，营救这批长期保存下来的骨干及早出狱。这时，赵罇任支部书记，负责具体安排难友们先后分批出狱，一共分了九批，九月上旬第一批出狱，他是最后一批出来的。出狱后，他仍善始善终，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将所有出狱的人向中共中央北方局详细作了介绍，表现了对党无限忠诚和高度负责精神^①。

(三)

一九三六年十月，赵罇出狱。多年监狱生活，使他身上斑斑伤痕，两腿走路发板，但他却精神焕发，迅速奔赴新的战斗岗位。他先到冀东特委，不久调任津南特委书记，化名王元，住景县城东北之大刘庄，以小学教员做掩护，活动于天津以南、津浦铁路两侧各县，主要任务是恢复党组织。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形势突变。党中央立即发表宣言，号召全面抗战，要求各级党组织发展武装抗日。国民党蒋介石也被迫宣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各界群众抗日热情很高，纷纷成立各种救亡自卫团体。赵罇对全国出现的大好形势极为高兴，认为党掌握枪杆子的时机

^①以上据薄一波等谈话整理，并经薄一波等审阅。

已经到来。但他到津南不久，人地生疏，力量单薄，困难很多，很想找一位帮手。这时，他想到了房东的族叔刘建章。他到大刘庄后，听这里的党组织介绍，刘建章早年在家乡即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三一年后曾任中共景县县委书记，如今在北平做地下工作。经河北省委同意，赵罇于一九三八年初化装去北平，找到刘建章后，又一起化装去天津，同河北省委具体研究组织抗日武装问题。省委决定刘建章以党领导的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南特派员及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九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在津南特委领导下进行工作。赵罇对此十分高兴。

赵罇斗争经验丰富，且有以前在黄埔军校学得的军事知识。他同刘建章回到景县后，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北方局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与战略战术，紧紧依靠群众，和原地下党的同志团结一致，以景县为中心，积极发动、联合各地自发的零散的群众自卫武装，很快发展到数千人，正式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等三个支队。

在大刘庄东三里路有个孙镇，驻有一股三四百人的武装，自称“民众自卫团”，实际受国民党掌握，又和日伪勾结，头目叫徐子和。孙镇离日寇据点不到二十里，赵罇考虑到这股武装一旦投降日寇，对我开展抗日工作威胁极大，后患无穷，因此便商定由刘建章去动员他们参加我“抗日联军”，委徐子和为营长。但徐不干，企图参加伪“忠义救国军”。赵罇说：“看来非打不行，但仍要先礼而后兵。”于是，便先派部队将其包围，由刘建章再去说服。徐子和等仍不转变。赵罇遂下令攻击，一举将其消灭，除了一大隐患。在武邑一带还有被国民党改编的河北民军第二路军，号称万人，上将总司令叫赵云祥，部队盘据四、五个县，也和日寇有勾结。赵罇等派人去争

取其参加抗日联军，他们不干，还想“吃掉”抗日联军。这时，徐向前、陈再道、宋任穷等领导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已进驻冀南南宫一带，帮助地方党开辟工作。赵罇、刘建章的党组织关系已由秘密驻天津的河北省委转到冀南区党委，他们考虑到由八路军主力去解决赵云祥部队不够策略，便决定由抗日联军部队去打，终于把他们击溃，其残部逃到冀县。从此，开辟了冀南北部大片抗日根据地^①。

一九三八年秋，赵罇调任冀鲁豫区党委党校校长，为党积极培养了大批干部。

(四)

一九三八年冬，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奉党中央指示来到鲁西，建立太肥山区抗日根据地，发展平原游击区，以控制平汉、津浦铁路间这一战略要地。一九三九年一月成立鲁西区党委，赵罇任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妇委会书记。

赵罇经过长期地下斗争的锻炼，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坚持原则，果断坚定，善做思想工作。党校学员史端楚年轻纯洁热情，赵罇常给她讲革命故事，讲革命过程中每个人都在变化，有的不断前进，有的被风浪淘汰。他说：“为了应付复杂斗争，你用个化名吧！”小史明白他的意思，就问：“什么名字好？”他说：“你叫史轮吧！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永远革命。”小史很高兴，一直念念不忘。有个同志失恋，情绪不高，觉得没脸见人，想自杀。赵罇亲自找她耐心谈话，要她别

^①以上据刘建章（原铁道部副部长）的回忆。

悲观，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可以另找一位称心如意的对象，以便更好的工作。这个同志终于想通了，变得很坚强。

太肥山区根据地建立后，日寇深感不安。五月初，驻山东的日军头目尾高次郎纠集济南、泰安、肥城等十四个据点的日伪军八千余人，分九路向太肥山区大举“扫荡”。区党委和党校由赵罇具体领导，随一一五师师部，统一指挥开展反“扫荡”。敌人包围圈越来越小，五月九日开始向陆房山区合拢，十日分别占领山外各重要路口，实行封锁。师部和区党委机关连续几天和敌人兜圈子，一天来到陆房一带宿营，命令主力六八六团一部抢占山区制高点肥猪山，凭险扼守，迎击敌人。十一日拂晓，敌人从四面向盆底似的陆房及周围不到五里的目标发起猛攻。区党委和党校同志迅速冲出村外，赵罇非常沉着，很快集合大家在沟里荫蔽，鼓励大家坚定必胜信心，认真组织后勤工作。黄昏，接到师部通知，准备夜间突围。赵罇首先布置党员起保证作用，随后全体集合做动员，精简行装，编组班排，指定干部，宣布纪律。党校学员无武器，分编到各班排，准备战斗。夜已漆黑，赵罇手提匣枪，带领队伍按照指定路线，向西南方向疾进。当队伍越过敌人暂住的林旁时，他已完全不象患有严重关节炎的病人，带着大家跑步前进。这时，背后响起密集的炮声，团团火光腾空而起，这是蠢笨的敌人正在向陆房及其四周各山头袭击。他们那里知道，赵罇带领的队伍早就冲出了包围，拂晓时分已到达离开陆房六七十里的地方宿营了。

到宿营地后，赵罇不顾疾病和疲劳，马上开会进行动员，安排生活，布置工作。一切就绪后，才去休息。这时，他和爱人李岩刚结婚月余，这天在陆房失散。李岩换上便衣，带领群众转移。以后她找回来，赵罇抱歉地说：“看我光照顾别人，把你丢

了”。李岩说：“看你说的，大家胜利突围就好，这一带我熟，敌人没法治我。”

赵罇在鲁西突出的工作是建党。一九三八年，党中央先后两次发出发展党的指示。赵罇在区党委的支持下，把大量发展党员作为头等大事。首先公开上党课，吸收部队、地方干部听课，他亲自讲解党的纲领、党的组织原则、党员条件、权利和义务。这种方式是过去地下党时期所没有的，因此影响很大，效果很好。五月办起了党校（公开叫“干训班”），他亲自讲课，大力培养骨干。同时大刀阔斧地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除原太西特委改为地委外，先后建立健全了四个地委和各县县委，要求县委在各区建立区委，村内有三个党员以上就成立支部。各级党组织把发展党员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定期汇报检查。东平县原有几十名党员，从六月到十月就发展了四百人。肥城、泰安、长清等许多县，都发展到千人以上。根据地内的各村都有了党支部。党的发展，带动了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统一战线、群众运动的发展，并为以后坚持长期艰苦奋斗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教育不够、手续不严、集体入党等现象，什么父子党员、姊妹党员、抗日党员都有，也有个别坏人乘机混入。八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十月又发出《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赵罇认为这两个文件非常适时重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是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因此，他积极贯彻，一面对党校学员加强马列主义、阶级斗争与党的教育，提高党员觉悟；使他们认识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正确关系；同时要求各级党组织一般

停止发展，仔细认真的做好党员登记、审查工作；慎重地清除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等。当他发现有的党组织在审查中，违反党的指示，不重证据，凭主观猜疑，随便捕人，刑讯逼供，把“肃托反特”斗争神秘化、扩大化时，就坚决纠正。他还经常深入基层，亲自动手，取得经验。长清县有个妇女干部，出身于一个有名的上层人物、地主家庭。她在学校接受了进步思想，“七七”事变后回家，在党的教育下，以后入了党，积极参加和领导宣传队、识字班、募捐等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在本地区影响很大。当时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县长，以抗日为名，积极反共，公开宣称：有“民先”队员，可先斩后奏；还经常到这个妇女干部家里拉拢、威胁。赵罇来到这个地区，听到以上情况，认为教育巩固好这个党员很重要。有一天，他在一个同志家里，同这个妇女干部亲自谈话，认真听取她汇报工作情况和反动县长的罪恶，以及她个人的思想、家庭情况；对她在困难的环境里积极工作，给予表扬，并希望她做好充分思想准备，迎接更艰苦的斗争，站稳立场，做好家庭工作。这次谈话，使这个干部很受鼓舞。以后她工作更积极，家庭也为抗战做了不少事情。

(五)

一九四〇年四月，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成立鲁南区党委，赵罇任书记，加强对鲁南地区各项工作的领导。

鲁南区北迄蒙山，南到陇海铁路，东达沂河，西至运河，地域广阔，是联系华中、华北、西北的枢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境内群山连绵，又是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但这个

地区处在日伪重重包围之中，境内国民党、地主武装很多，土匪猖獗；山区贫困落后，生活艰苦；党的基础、武装力量也很薄弱。一九三九年夏天，一一五师来后，才初步打开了局面，着手创建根据地。

赵罇到鲁南后，在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下，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首先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健全了区党委机关，并相继建立了三个地委。他先支持创办了《鲁南时报》，又主持创办了党刊《先进》，亲自写《发刊词》，要求党员认真学习，搞好团结，克服各种不良倾向。他兼任组织部长，筹办了党校，并兼校长，还经常亲自动手写文章，讲党课。他讲课深入浅出，联系实际回答问题，讲得生动活泼，深受学员欢迎。大家经过学习，坚定了革命意志，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成了各部门的骨干。

赵罇还兼任鲁南军区政委。在他的领导下，相继建立了军区机关和三个军分区，建立健全了各县的地方武装和基层群众武装，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他针对当时军队和地方之间存在的问题，经常告诫大家：“要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主力部队。”他经常向罗荣桓等同志汇报工作，请示研究问题。在他的影响和教导下，军政、军民之间进一步加强了团结。一一五师来鲁南后，经过郑马、白彦等一系列战斗，减员很多。赵罇动员各地展开拥军参军活动，数千名青年光荣参加了一一五师，增强了部队战斗力。

赵罇在抓武装建设的同时，还抓了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的工作。他来鲁南后，经过积极筹备，于六月中旬召开了抱犊崮山区（后叫鲁南区）抗日人民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讲了话。这次会议按“三三制”原则选举了专员，组成了专员公署；还

选举了参议长、参议员，组成了参议会。随后又相继建立和健全了各级政府和参议会，颁布各种法令，进行战备，禁毒、禁赌，开展民政司法、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工作。他发现各地有乱捕、乱关、乱罚、乱杀等现象，临郟地区最为突出，就和罗荣桓亲自去检查处理，及时制止了这些错误做法。郟城县县长翟兴亚贪污腐化，经查实立即撤职、开除党籍，并指示专署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批评各种挥霍浪费现象。所有这些，对稳定社会秩序、提高党和政府威信，战胜困难，都有重大意义。

赵罇十分重视群众工作。他每到一地，都亲自深入村庄调查访问，并耐心教导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接近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郟马、白彦等战斗后，区党委和一一五师马上抽调干部，组成两个工作团，开辟洙河两岸平原和天宝山区工作。他亲自和工作团的同志谈话，指示他们，除了依靠武力打掉地方反动武装，还要重视发动群众。根据赵罇的指示，费南工作团的同志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各种组织，发展党员，工作很有成效。后来天宝山区封建头子廉德三叛变，勾结日寇，欺骗群众，抵抗我军时，广大群众依然站在我们方面。在各地群众发动起来后，赵罇推动召开了鲁南区工、农、青、妇各代表大会，分别成立各团体领导机构和各界救国联合总会。他到会讲话，鼓励加强群众运动统一领导。赵罇对违背群众利益的现象深恶痛绝。当时根据地财政很困难，有关部门曾组织向敌占区出售耕牛换东西。赵罇知道后严肃批评，说这是“饮鸩止渴，慢性自杀”，后果严重。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保护了根据地的生产力。还有一次路过敌人封锁线，赵罇见路旁有马在吃豆棵，就问饲养员为何不制止？这位同志说：“这里是敌占区，

吃点没关系”。他就耐心启发这位同志：“敌占区的庄稼也是群众种的，敌人不会种，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爱护群众利益”。

赵罇对干部更是爱护备至。专署有位同志，工作忙忙碌碌，脾气又大，有人称他“官僚”。赵罇多次找他谈心：革命不能靠一个人啊，工作不放手，人家的积极性怎么发挥？批评人不择方式，别人怎么受得了？你这个样子别人都不敢接近、不敢说话，岂不成了聋子瞎子。赵罇还用斯大林的一段话，说明学习的重要性：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列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效率愈高，愈有成效；反之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列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工作愈可能受到挫折和失败，工作人员愈可能庸俗化和成为鼠目寸光的事务主义者。一席话，使这位同志深受感动。区党委有位同志路过敌占区被捕，赵罇闻讯，立即通过“内线关系”了解。当他知道该同志在敌方未暴露身份时，就及时指示当地组织设法营救。两个月后，这个同志受尽折磨，胜利逃回。赵罇见到十分高兴，对其热情鼓励和安慰，亲自筹办食品，帮助他恢复健康。这位同志感动地说：“我真象到了母亲怀抱一样。”

赵罇对别人体贴入微，对自己却非常严格，从不特殊。写报告、起草文件，都是自己动手。党小组开会，他认真汇报思想，听取批评意见。有一次，机关党支部书记总结工作时说：“向首长请示不够……。”他立即纠正说：“党内都是同志，不要称首长。”赵罇有肺病、胃病、关节炎等多种疾病，身体很弱，上级发给他一瓶鱼肝油，他说：“这药病号最需要”，就马上派人送到医院。有一次，部队打下一个敌人据点，缴获了一些小麦，就悄悄留下二百斤，要总务部门照顾赵罇身体。他知道后，想到党校学员过年吃不上白面，就把这二百斤小麦

派人送去，磨成面，让大家好好吃了一顿面条。赵罇对爱人李岩要求也很严格，每次出外，他总要嘱咐不要特殊，注意影响。李岩听得多了，就说：“你就是老一套。”赵罇无限深情地说：“这老一套做到可不简单啊！要夺取胜利就是离不开这老一套。”

(六)

赵罇以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和崇高的共产主义品德，艰苦朴素，忘我工作的精神，不到一年时间，就赢得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使鲁南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为坚持长期抗战打下了可靠基础。

但是这却引起敌人的极端仇视。不仅日寇进一步加紧了对鲁南根据地的“蚕食”、“扫荡”，国民党反动派也极力争夺这块地盘，调五十一军一一四师三三七旅来鲁南，并以六八三团驻鲁南中心区——临郯费峰四县边区（简称“边联县”，今苍山县）北部九女山一带，专门对付边区。斗争极其尖锐复杂。

一九四一年又遇严重春荒，人们多靠糠菜、草籽、残果、地瓜秧叶充饥，乃至吃酒糟、树叶、树皮、花生皮。干部战士往往早饭中午吃，午饭晚上吃，有所谓“三黑”之说，即黑天、吃黑豆窝窝、喝黑豆汤。这年春节是一月二十七日，区党委住在边联县车庄，除夕还没搞来给养，大家先把搞到的一点猪肉分开煮煮吃了。赵罇亲自到各部门看望并鼓励大家，直到深夜才归。惨无人性的日寇、汉奸，竟乘大年初一拂晓发动突然袭击。赵罇未及歇息，就带领大家迅速冲上山头，迎着刺骨

的北风，打击敌人。有位同志打趣说：“这个春节不错，五更吃大肉，天明放鞭炮。”这一天，他们一直在山上坚持到黄昏，敌人撤退了，方才下山进村。春节后，赵罇要求部队机关大力帮助群众春耕。一天，区党委机关住在房家村，赵罇带着大家给群众拉犁耕地。群众过意不去，悄悄煮了点地瓜和绿豆汤让大家吃。赵罇知道群众也很困难，再三谢绝。群众着急地说：“那您也别干活了。”这时他才说：“群众反对我们了，大家吃吧。”同时告诉群众再不能这样做了。

鉴于春荒严重，为避免与民争食，区党委和一一五师首长研究决定，机关和部队分散到收成较好的地区就食，借以开辟新区；边区只留少数地方干部和武装坚持斗争。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不顾人民死活，竟趁火打劫。四月二十五日，原东北军三三四旅、三三七旅各一部及地方反动武装王洪九部，分别向边联县突然袭击，六八三团为急先锋。他们大肆逮捕屠杀我干部、党员、积极分子和抗属，建立区、乡伪政权，编保甲，查户口，组织情报网，一片白色恐怖。我方成了所谓“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牵”，“一枪打透”的根据地。

赵罇看到这些情况非常痛心。他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和一一五师首长研究决定，坚决予以严惩，讨伐这些助纣为虐、祸国殃民的叛逆，并迅速组成“讨逆”指挥部，他任政委，教导二旅曾国华旅长任指挥，以两团主力和边区支队组成“讨逆”大军，六月开始分兵三路全面出击。激战两星期，全部恢复了边区根据地。接着，赵罇主持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了前段工作，肯定成绩，表彰了坚持斗争的有功干部，批评了动摇逃跑行为，分析了鲁南敌顽我三角斗争的形势，要求干部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经受考验，依靠群众，踏踏

实实工作；迎接困难，坚持斗争。会上正式宣布成立四地委，领导临沐地区工作。赵罇还审批了两起重要案件，一是边联县三区区中队长沈文佃自首叛变，交枪投降，判处枪决；二是六区公安特派员李之秀被诬告逮捕，查明后立即释放，并对诬陷者严肃处理。从而打击了歪风，申张了正气，振奋了人心。

(七)

一九四一年九月，“青纱帐”落以后，日寇又开始“扫荡”，实行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敌人先进犯临郯平原，接着进犯抱犊崮山区边联县，大肆烧杀抢掠后，又窜回据点。日寇合击时，赵罇领导区党委机关和党校机动转移，没有受到损失。敌军龟缩后，他们于十月二十日住进了银厂村。正要休整，国民党反动派又乘机暗下毒手。

银厂村位于边联县中部，西北距国民党五十一军六八三团驻地九女山村二十里。这天，国民党保山乡逃亡乡公所从银厂村坐探处得到我区党委机关进驻的情报，马上报告了六八三团政训处主任、特务于大川。于大川又立即派秘密便衣特务、叛徒侯德俊去打探虚实。侯德俊以赶集卖柿子为掩护，到银厂村详细了解。赵罇住宅位于村中十字路口，南靠东西街，西靠南北街，院门朝西，门外设岗；对面街西院内安电台，对面街南是大柴园，街口西南角是水井，井后是破石墙。侯德俊在这里一面打听，一面仔细看了赵罇住处的地形设置，又到村西看了松树林中党校学员听赵罇讲课的情况，马上回去详细报告给于大川和团长张本枝，得到了六十元的赐赏^①。

^①于大川、侯德俊的供词。

于大川、张本枝一边将此情况报告旅部；一边于二十六日晚五时召集各营长布署次日拂晓攻击；并在银厂村内布置了“内应”，由坐探、阎长刘清桂扮做去坡里挑秫秸，带敌兵六人进村，藏在街南大柴园内，夜里又将各围门关闭上锁。这天午夜三点左右，当敌尖兵来到村西时，村东场上燃起火光，刘清桂打开西围门，送出一人迎着尖兵谈了村内情况。尖兵来到村外，被我岗哨发现，立即放了一枪，我哨兵遂被打死。此时，敌兵相继赶到，一部自西门攻进村内，奔向各袭击点^①。

区党委机关和党校同志被枪声惊醒，分别集合或自动边打边向村外冲。但因围门紧闭，无法出去。同志们人自为战，有的越墙，有的破门，有的推倒石砌围墙，大多数先后冲出村外，只有少数仍在原地隐蔽。赵罇这夜睡得很晚，因为党校学员要毕业，有的谈工作，有的来告别，送走他们，又忙完其他事情，睡下不到三小时，忽然听见枪声。因为白天他接到一份“情报”，说鬼子可能出动“扫荡”。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为转移我注意力而制造的假情报，但当时没有识破。所以他起身后，首先向东边白山村驻军打电话，刚说了一句“可能敌人‘扫荡’”，电话线即被切断。宣传部吕志先副部长跑来问他：“是否向东突围？”他说：“可以，我随后就去。”吕志先便冲了出去。这时，由于赵罇门口的卫兵已被井旁敌人伏兵打倒，西院电台同志亦被敌人用木棍打死。赵罇在两个警卫员和一个通讯员的前后护卫下击退敌兵，迅速向东突围。但没走多远，他忽然想起秘书刘勇调动工作交下的一个机秘文件包，还

^①敌 683 团 1 营营副李世祥的供词。另见燕遇明等突围同志的回忆材料。

没带出，里面全是党中央指示等绝密文件，就命令通讯员继续前进，自己迅速返回屋内找到文件包。为了不使文件落入敌手，他当机立断，点火焚烧。一切办妥，又向外冲。他知道前门不能出，便去翻后墙，结果被敌伏兵逮捕。通讯员见他迟迟不来，也迅速返回屋内，只见烧过的文件余火尚红，但已不见赵罇，就又冲了出去^①。

二十七日早晨八九点钟，国民党顽军蓄谋制造的这次“围剿”，终于收场了，他们走时在村内四处放火，捕走了赵罇等二十五人，抢了部分马匹、枪枝、财物，才窜回驻地。

(八)

赵罇被五花大绑，关押在敌人团部通讯连，不给水喝，只给点发了霉的煎饼，用腿夹着吃。此刻，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在思考着如何进行新的斗争。开始审讯时，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说他叫王德忠，江苏人，在营部当文书。特务于大川很狡猾，没有轻信。在押的人里有个叫蔡明的，原是宣传部宣传科科长，在银厂负伤被俘，当了叛徒，供出了赵罇；还有党校的两个通讯员，也供出了赵罇。所以第二次审讯时，他泰然自若地说：“我是赵罇，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也告诉你，抗战无罪。”^②

于大川、张本枝见抓到鲁南共产党首领，欣喜若狂，当即向其上司报告。他们的上司要他们通过审讯，弄清鲁南共产党

^①孔彬等的回忆材料。

^②于大川的供词。

的情况，并劝赵罇投降。于、张经过策划，先摆宴席，邀请高级长官作陪，还大讲什么“一个政府”、“一个党”、“共军破坏团结统一”等谬论，劝赵罇投降。赵罇胸有成竹，拒不喝酒，俨然以我党谈判代表的姿态，端坐首席，针锋相对地宣传我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揭露国民党“一党专政”，坚持投降、分裂、倒退的反动政策。他质问敌人：“你们能举出一条我党我军不利于抗战的事实吗？”敌人无以答对，又胡扯什么“你受共党欺骗教育太深啦”，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蒋委员长不允许共党存在”啦，等等。赵罇说：

“我是自觉革命，决不盲从，我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党的最低纲领是实行孙中山倡导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我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合乎国情，顺乎民意，一定能实现的。蒋介石过去背叛孙总理遗教，剿共十年，不但没剿灭我们，反而招来日寇侵略，半壁河山沦陷；现在若再一意孤行，发动内战，恐怕连后方老家也难保。”敌人又厚颜无耻地说：“你们军无粮饷，弹无来源，到处游击，何以胜利。素闻先生才学出众，如能悬崖勒马，可不咎既往，呈请军座保证你相当于原有地位……。”赵罇轻蔑地一笑，又郑重地说：“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依靠民众，取之于敌，任何困难都能克服。关于我个人，只求民族解放，人类幸福，从不为升官发财。至于祸国殃民的官，更绝对不干。我倒奉劝你们悬崖勒马，继承东北军的光荣传统，与我军合作抗战到底。”敌人理屈词穷，宴会只好狼狈而散。

于大川、张本枝此计未成，并不甘心，又要新的花招。他们派了一个年轻女子，劝说赵罇招供投降。赵罇以共产党人的坚定

立场和崇高品德告诉她：我有爱人有孩子，现在也想念她们；但决不能为此而出卖党和人民的利益，这样遗臭万年，也对不起妻子后代。同时对她进行教育，劝她不要出卖灵魂，做反动派的工具。这个女人回去暗地夸赞赵罇真了不起。

于大川、张本枝恼羞成怒，妄图以严刑使赵罇就范。一次审讯中，张本枝凶相毕露，未说几句话，就拳打脚踢，破口大骂。赵罇以政治家的风度讽刺说：“你有话讲话，有理说理，象你这样岂不有失‘国军’团长身份。”于大川是国民党团党部总干事，他明知赵罇“理论高深，说不服，驳不倒”，又故意装出温文尔雅的样子，问赵罇：“你们既然也实行三民主义，我们信仰一致，何不归顺国军，共同努力，以求实现？”赵罇反问他：“你读过中山全书吗？三民主义宗旨是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你们干些什么？”于大川自知理亏，便说：“这些理论问题可暂不谈，依你身份可谈些别的。”

“别的谈什么？”“譬如你们的组织系统、驻军情况。”“这是我党我军的秘密，怎能对你谈。”“你知道你已是俘虏，由不得你。”“那好，就由着你，我告诉你，我代表鲁南共产党，共产党员就是我，怎么处置都可。”于大川图穷匕首见，就命令喽罗把赵罇绑在板凳上灌辣椒水。赵罇昏过去了，他们又用冷水泼醒。接着，又用吊打、压铁杠、灌煤油等惨无人道的手段，进行折磨。赵罇被关押二十天，先后刑审十多次，每次都被拷打得死去活来。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吐露半点党的机密①。

①于大川的供词。

(九)

银厂被袭击的当天，突围的同志未见赵铸，心中十分沉重，经多方查询，证明他已被俘，更是心如刀绞。但他们仍然保密，以免敌人发觉。当大家知道赵铸的身份已经暴露，并和敌人顽强斗争时，无不深为感动，而又提心吊胆，总希望他能转危为安，逃出虎口。为此，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李竹如和区党委一起研究，千方百计进行营救。不少群众还冒着风险，举行集会、请愿，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赵铸。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置正义呼声要求而不闻。当他们经过反复较量，知道赵铸稳如泰山，不可动摇，从他身上不能获得任何东西时，便采取了更卑鄙的手段。十一月十九日零点左右，赵铸被敌运输连押出村外，带到村西河西岸、沟北崖的小土台上，土台中间已挖了坑，四周警戒森严。赵铸心里明白，这是敌人进行秘密处决。对于死他早有准备。此刻他不但非常从容泰然，而且好象并非体弱多病，也未受过摧残折磨，显得特别精神抖擞。他要用生命的最后一息为党工作，要把刑场当课堂，教育国民党官兵。他要求讲话，开始连长不允许，赵铸就说：“我就要牺牲啦，还能剥夺我这点权利吗？”连长只得答应。赵铸屹立坑旁，迎着寒风，从容不迫地讲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大感人力、物力、财力不足，只要广大军民坚持抗战，渡过困难，最后一定会胜利。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准备投降，真是天怒人怨，不得民心。讲到这里他说：“当然国民党广大下层官兵是爱国的，

是不愿做亡国奴的，特别是东北军，有着光荣的抗战历史，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把东北大好河山、三千万同胞拱手让给日本，使你们背井离乡，抛开父老兄弟姐妹，流落关内，困难重重；现在还欺骗你们，不去抗日，反而枪口对内，屠杀自己的同胞。大家想一想，你们那个是地主，那个是资本家，你们打仗还不是替他们卖命。应当赶快觉悟，调转枪口，同我军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他又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从入党的一天起，为了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随时准备牺牲一切。但是我没想到，大敌当前，日寇还占领着我们的国土，蹂躏着我们的同胞，我没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却死在中国人手中，这是十分痛心的。当然我知道这是上边的事，你们是被迫的，迟早你们会觉悟。请记住：中国人民是杀不绝的，我死了会有千千万万人为我报仇，抗战一定要胜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说到这，他把钢笔、怀表取出，大衣脱下，告诉大家：“现在天冷了，这大衣给你们穿着打鬼子。钢笔给你们，好好学习，揭露鬼子和反动派。表给你们，掌握时间休息好……。”

赵罇句句动人的讲话，慷慨无私的行动，士兵们听着看着不禁热泪盈眶，有的抽泣出声^①。

特务于大川非常狡猾。他领受“秘密”处决赵罇的旨意后，开始没有直接出面，但他又不放心，便带着喽罗，手提匣枪，随后赶到刑场。见赵罇还在说话，就暴跳如雷，责问士兵：“为什么不快埋？！”赵罇毅然跳下坑去，士兵们还不忍心向他身上填土。于大川吆喝着：“快埋！快埋！”赵罇最后

^①九女山村群众的回忆。

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从容就义。时年三十五岁。

（十）

赵罇壮烈牺牲时，附近有个小屋，住着一位孤老大爷，名叫李安起，这夜从睡梦中惊醒，隔窗目睹了反动派的罪行，亲耳听到赵罇的雄壮讲话。他悲愤交集，彻夜未眠，天不明就悄悄去告诉别人，并要他们永远记住共产党的这位好干部。接着一传十，十传百，家喻户晓。后来逢年过节，善良的老人们就偷偷捧着纸香供品，到赵罇就义的地方悼念。几十年过去了，现在赵罇的英雄事迹，依然神话般传颂着，成了人们敢于斗争、坚持真理、正直做人的榜样。

当时被迫执行任务的运输连士兵，亲眼看到了这位真正无私无畏、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共产党人的英雄形象；再看自己的官长和国民党员的争权夺利，一心升官发财，压榨兵民，残害忠良，是何等卑鄙齷齪。两相对比，便开始觉悟，内心感到无限内疚，因此他们纷纷相约“开小差”，有的跑回老家，有的直接投诚我军，不到一个月，全连从士兵到连长全部跑光了。这个团其他连营的士兵受到影响，也跑了不少^①。

广大干部群众听到赵罇牺牲的噩耗，真象晴天霹雷，悲愤之情难以形容。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无比惋惜地说：“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各机关团体部队纷纷召开追悼大会，悼念赵罇。边联县在银厂村召开的追悼大会上，群情激昂，当众枪

^①房永一等回忆投诚士兵谈话的情况。

决了“坐探”刘清桂、刘清环，告慰烈士。

鲁南区党委、专署等机关在白山召开的追悼大会上，赵罇的爱人李岩抱着八个月的小凯英讲话时，全场一片抽泣声。

鲁南广大军民以烈士为榜样，咬紧牙关，渡过了最艰苦的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春，在新任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王麓水领导下，展开全面反击。一九四四年十月，“银厂惨案”三周年时，赵罇烈士遗骨被移到风景幽美的文峰山之阳，砌墓安葬。群众自动捐献铜钱，很快凑了整九斤，熔化后铸了铜象，嵌在墓前，并立碑纪念。这天，万余军民抬着祭品、花圈、挽联，齐集烈士碑前，隆重举行纪念追悼大会。鲁南区党委的巨幅挽联写道：“从容就义，共产党人本色！扫除奸丑，慰英灵于地下！”烈士遗孤、赵罇唯一的儿子、四岁的赵凯英喃喃地说：“报仇！报仇！”^①

但是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对赵罇烈士依然怀恨在心，一九四六年冬，他们进攻鲁南时，又用大炮轰击烈士碑和墓，还把赵罇烈士的铜象弄到马庄广场上，当靶射击，妄图把烈士遗迹彻底毁掉。但这是万万办不到的。一九四七年初，我人民解放军两天一夜就全歼了进攻这个地区的二十六师及快速纵队，活捉师长马励武。赵罇烈士的铜象，又被武工队抢回来，并请巧匠修复。接着，七区军民隆重召开庆祝胜利大会，鸣礼炮，吹喇叭，给赵罇烈士的铜象披上红绸，兴高采烈地抬上文峰山，重新嵌在墓前。

革命愈胜利，人们愈加怀念曾为夺取胜利而献身的烈士们。解放后，党和政府花大力进行了破案工作，将当年直接杀

^①1944年10月30日《大众日报》。

害赵罇的特务于大川和侯德俊、李世祥、迟天民等缉拿归案，依法给予严惩。临沂地区烈士陵园重立赵罇烈士碑，以表永远纪念。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象赵罇这样将一腔热血献给人民，对党忠心耿耿，先后三次被捕入狱，一直坚贞不屈，最后被敌人残酷杀害的光荣烈士，林彪、“四人帮”竟将其列入所谓的“六十一人”案内，扣上“叛徒”罪名，欲扒其墓、扬其骨、砸其纪念碑。这些无耻之徒与国民党反动派有何不同？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六十一人”案正式平反。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为胡锡奎等五位同志举行的平反昭雪追悼会上，胡耀邦同志在悼词中说：胡锡奎同志“在狱中同殷鉴、赵罇等同志一起，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以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和英勇不屈的献身精神，开展了监狱内的革命活动，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夺取了对敌斗争的胜利。一九三六年出狱后，又投入了新的战斗”^①。从此，赵罇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作者附记：赵罇任鲁南区党委书记时，是我的上级领导。写此文时，我又拜访了薄一波、杨献珍、周仲英、贺致平、朱则民、刘建章、张承先、高克亭、冯乐进、陈度、秦均、房永一、狄景芴、戴维珍、刘勇、张兆湧、于化琪、赵继连、李华林、孟淑华、刘亦夫、史瑞楚、张明、赵光、宋子成、张两帆、王保恩等八十多位同志和苍山等地的许多干部群众，并参阅了有关档案资料。

^①1979年1月26日《人民日报》。

王 国 兴

中 元 秀

王国兴是海南岛五指山区白沙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原是黎族的一位头人，后来逐步锻炼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是中国少数民族中杰出的英雄人物之一。

峒 长 之 子

王国兴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农历六月十九）出生于海南岛现今琼中县红毛峒番响村（原属白沙县）。他的父亲王政和是世代相传的黎族峒长。

峒是黎族的社会组织，原先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后来演变为地域性组织。峒的划分往往以河流、山岭为界。王国兴祖辈管辖的范围很宽，相传有七十二峒之多，是峒长中之大总管。但到王国兴父亲之时，其管辖范围已经大大缩小了。

解放前，黎族社会生产水平很低，有的地区还保留着原始共耕的“合亩制”^①，刀耕火种是很普遍的。因之黎胞的生活一般都很穷苦，每年约缺粮三至四个月，夏秋之际就要受到饥

^① “合亩制”是五指山中心地区解放前在黎胞中存在的一种处在解体过程中的原始公社所有制。

饿的威胁，大多数人只好以野菜野果充饥。即使是黎族峒长，一般也是有事管事，无事耕田的。王国兴一家也参加劳动，同一般黎胞一样居住在茅草房里。王国兴十一岁就下田，十五岁已经是村里公认的农活能手。他气力很大，善于弓箭，枪法很准，是一名好猎手。因是长子，成年以后，一家生活重担便落在他肩上。他曾到汉区当过槟榔园的工人，做过散工和挑夫。沉重的劳动锻炼了他刻苦耐劳的性格，生活的艰辛培养了他善于思考的习惯。因此，他比之自己那些囿于山区生活的同龄人，见识要广得多。

一九三五年，王国兴的父亲被国民党以“抗丁抗税”的罪名逮捕。那时，他还在地打散工，至年底回家才知父亲被捕。三年以后，王国兴卖去田产并得村人资助才将老父赎回，可是老人已经奄奄一息，不久便去世了。几天以后他母亲也因悲伤过度死去。

父母双亡，家产殆尽，一家生活陷入极端贫困，给了王国兴精神上极大的打击，同时也使他认识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面目，在他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按照黎族社会的传统习惯，峒长职务是父死子承的。但王国兴却没有继承父职，国民党另委王成顺接替了他父亲的职务。王成顺为人奸狡，贪财不义，欺压族人，黎胞对他极为不满，他派差时，村人都不理睬他。王成顺诬告是王国兴从中作梗，国民党反动政府便要捉拿王国兴问罪，王国兴只得逃入深山躲藏达一年之久。

一九四一年六月，国民党为平息民愤，缓和日益加剧的矛盾，玩弄了所谓“民主选举”的花招。群众却是真心拥护王国兴的，选举结果，王国兴当选为红毛乡长。此时他仍躲在深山

里，拒绝上任。后来村中父老怕反动派加害于他，派出长者到山里极力劝说，王国兴才结束了深山隐居的生活被迫上任乡长（国民党后将黎峒总管改称团董，后又改称乡长）。

此时，正是日寇的铁蹄践踏海南岛，国民党反动派龟缩五指山，不去抗日却加紧鱼肉黎族苗族同胞之际。王国兴管辖下的红毛乡近一千九百户人家有上万人。祖辈的传统威望使他在群众中能一呼百应；家庭和个人不幸遭遇又使他的心同广大黎胞紧紧相连。他不能忘记他同国民党反动派的不共戴天之仇。正因如此，王国兴虽身为乡长，却从没有骑在万人之上作威作福，而是生活在百姓之中。他仍然下田种稻，上山砍山栏（即种旱稻），打猎，当挑夫……黎胞们在背后戏称他为“伐海考”（即穷官）。

狂 飙 卷 白 沙

日寇在海南岛登陆之时，驻守在岛上的国民党军队竟一枪不放，争相逃命。地处五指山中心地区的白沙县，就聚集着国民党军政机关、守备团和九个县政府，共约五千余人。他们进入黎族、苗族聚居地以后公然宣称：“国难当头，官吃主粮，民吃杂粮；官吃杂粮，民吃野菜。”对黎族苗族同胞实行高压政策，使本来就很贫困的黎村苗寨变得更加穷苦、荒凉和萧条。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眼里，少数民族不过是“野人”，对之恣意污辱，甚至杀人取乐。即使对于王国兴这样的头人，也不例外。王国兴就常常因为没有及时替他们收缴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而受到责罚、训斥，有一次还将他绑起来吊打，直打得口吐鲜血。

反抗这残酷压迫的斗争在群众中酝酿着，王国兴的思想也正经历着激烈的斗争。父亲的惨死，自身所受的凌辱，无不使他怒火中烧。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一天，王国兴悄悄通知红毛乡属下各保保长到红毛合茂山一个茅寮里开会，佯称是请大家来研究摊派官粮。人到齐以后，他开诚布公地对大家说：“我们黎人世代居住在五指山，自从国贼（黎胞对国民党的蔑称）来了，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把我们黎人的活路堵死了，我们头人不能眼看着乡亲们受罪不管，我们不能就这样等死。”^①他的一席话立即得到全体与会者的响应，特别是二保保长王玉锦^②更是积极支持。大家都认为，打也死，不打也死，坐着等死，不如拚个死里逃生。

大家在一起估量了国民党驻红毛周围的兵力。有人认为驻红毛的国民党兵力不多，容易对付。王玉锦说：“我们要是光对付红毛的国贼当然容易，但是国贼是互相联系的，白沙县共有几千兵力，光靠我们红毛乡的人是打不过他们的，我们黎人也应该联合起来才行。”王国兴认为这个意见很对，便决定大家分头到各乡去串连，发动全县黎胞一齐动手打国贼。

王国兴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几乎走遍了五指山区，串连了周围比较合心的头人。他看到同胞们都在兴奋地谈论着起义的事，男女老少都在擦枪、磨刀、造弓、削箭，武装起义的准备

①王老朋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②王玉锦为红毛乡牙寒村人。年轻时曾被国民党抓壮丁到过大陆，几年后逃回乡，曾当过牙寒村保长。他是白沙起义的策划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是王国兴的得力助手，是起义者们军事上的实际指挥者，在以后的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解放后历任白沙县县长，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等职务，“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工作正在秘密地进行着，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希望。

同年八月，王国兴在红毛什亲山召开第二次筹备会议，进一步组织起义队伍。会上，大家一致推举王国兴为起义总指挥。与会的五十多人按照黎族古老的传统风俗歃血盟誓，表达了他们反抗国民党顽固派残酷压迫的决心。

十二月，又在红毛乡坎茂村举行了第三次筹备会议^①，有十六个乡的代表、暴动队长、指挥等一百多人参加。王玉锦向大家讲了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作了起义的军事布置之后，王国兴郑重宣布：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日卯时举行全县总暴动！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三日，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王毅下令对五指山区的苗族同胞施行集体屠杀，一天之内屠杀分住在中平乡、南茂乡和加略乡二十三个村庄的苗族同胞近二千人^②。黎族和苗族同胞世代相处，共居五指山区，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苗族同胞的惨遭杀害是一次血的教训，加深了数十万黎族同胞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更增强了他们反抗的决心。

在预定起义的前几天，白沙一区的部分头人突然发现国民党顽固派在暗中追查策划起义的首领。他们意识到起义风声已经泄露，便于七月十二日提前发动了起义。白沙、细水、元门等地的黎胞和部分苗胞在王亚福、符松龄等人率领下冲向反动政府及其军队驻地，四千多愤怒的人群，手持粉枪^③、弓箭、钩刀，甚至有的拿着锄头或木棍开始了一场谋求生存的战斗。两天之内，白沙、元门一带的国民党军政机关被一扫而光，其

①关于白沙起义的几次筹备会议的时间，众说纷纭，本文主要是参阅了王国兴自传中叙述的时间。

②中平乡、南茂乡和加略乡现今均属琼中县。

③一种装火药铁沙的老式猎枪。

余武装或被歼或向外逃窜，那里已经是起义群众的天下。

由于交通闭塞，一区提前起义的消息几天后才传到二区的红毛。王国兴得讯后，立即决定把全县起义的日期提前三天——七月十七日，并派人分头通知各乡的首领们。

这时，反动派驻守在红毛什存村的白沙、保亭、乐东三县联络所已经策划了捕杀起义首领的阴谋。七月十六日，王国兴和各保长都收到要他们到联络所开“紧急会议”的通知。王国兴知道敌人要动手了，便托病不去。至下午五时，联络所所长李有美派人将他强行绑去。在联络所，王国兴看到王玉锦等九个乡、保长均已被捕。敌人将他们关在一间小屋里，外面还加了两道岗哨。

这天夜里，王玉锦听到看守们交谈，知道敌人即将把全部黎族头人处死，便佯称肚子痛要上厕所。看守将他带出，他机灵地从厕所坑里逃跑了。脱险后，他立即向起义队伍预定的集合地——毛西村奔去。

毛西村头已经汇集了一千多人，正在商议营救王国兴等起义首领的办法。王玉锦一到，立即成为这支队伍的核心。他挑选了二十多人组成一支敢死队，由他亲自带领出发营救王国兴等人。其余的人们也悄悄向联络所进发，约定以枪声为号，发动总攻。

十七日凌晨一时许，敢死队员们悄然向关押王国兴等人的牢房接近。由于过份紧张，一个队员失足绊倒了，手上的粉枪走了火。正在悄悄向三县联络所进发的千人大军突闻枪声，以为是王玉锦发出的进攻信号，立即呼啸着向什存猛扑过去。人声呐喊，刀光闪闪，弓箭纷飞，枪声争鸣，象洪水奔流，象火山爆发。红毛乡的战斗在月色中展开了。

枪声传进牢房，王国兴非常兴奋，他不顾一切地冲向牢门，用力推搡。王玉锦很快冲进来，将王国兴救出牢房，可是其余的乡保长，除一人负伤外都已饮弹身亡。王国兴刚出牢门便率领起义队伍向逃窜的残敌追去。

起义群众遍及白沙全县，男女老少都参加了战斗。妇女们组织起来给义军做饭，送椰子水。义军越战越勇，人越聚越多。

毛贵、毛栈一带的起义群众数百人攻打驻在毛坎等地的感恩、昌江、乐东、崖县等反动县府，其反动官员除少部分逃走外，余皆被歼。此时，王国兴率义军已将驻红毛的敌主力守备二团围困在什向村，其余义军便向什向集结。自十九日至二十五日，敌企图从东北和西南面派兵来增援，可是他们在途中不断遭到黎胞的袭击堵截，始终不能进入红毛。二十六日黎明时分，王国兴率义军向守备二团发起总攻，正在睡觉的敌团长王弼的蚊帐被打穿了，这家伙从梦中惊醒匆匆逃命。眼看即将一举全歼这股顽敌，不料天气突变，倾盆大雨把义军们的火药淋湿了，使他们手中的主要武器——粉枪失去了作用。义军枪声一停，什向的守敌便乘机遁逃。

自七月十二日起至二十六日，是白沙起义的高潮。这一斗争的浪潮不仅席卷整个白沙，震撼五指山区，波及乐东、保亭、崖县、陵水等所有黎族地区，并影响到居于高山之上的苗族同胞。仅白沙县直接参加战斗的黎胞就约三万余人，计共歼敌八百余人，缴获机枪一挺，步枪三百余支，子弹、物资等一大批^①。

^①王国兴关于白沙起义的回忆录，原件保存在其子王家森处。又见起义老人王玉林、王家芳、吉有理、王老朋等访问记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白沙人民的英勇斗争使敌人胆战心惊，此后一个多月，国民党顽固派偃旗息鼓，不敢向白沙迈进一步。

在血泊中挺立

黎族人民的起义对于海南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当时海南岛沿海及各重镇均为日寇占领，白沙以外的各县均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活动，国民党反动派难以找到立足之地，白沙县原是他们唯一能赖以苟延残喘的地方。为此他们准备拚尽全力镇压黎族人民的起义。经过一个多月的阴谋策划，到九月底，国民党顽固派兵分三路，气势汹汹向白沙人民猖狂反扑。

起义群众四面迎敌，奋勇抗击。但毕竟是敌强我弱，既无正规武器，又缺乏军事常识，只凭勇敢正面迎战，很快就几乎全部解体。各乡的首领带了小部分人躲进了附近的深山密林。

敌人开始了疯狂的大屠杀。他们叫嚣“斩尽黎仔，杀绝苗人！”对黎村苗寨实行“三光”政策。留在村里的老弱妇孺成了敌人的砧上肉，每天都有人被处死，甚至是全村老少集体被枪杀。

反动派还使出历代反动统治者欺骗少数民族的惯技，先施以政治欺骗，后施以残酷暴行。他们诱骗人们去喝“悔过酒”，扬言酒后便既往不咎。有的头人信以为真，结果却被杀害。他们把抓到的起义者活活剥皮，挖肝挖胆，真是惨无人道。

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反动势力在白沙重建了反革命统治秩序。群众所剩余的一切财产被抢走了。枪枝、弓箭、大刀、长矛都被清缴。血腥的大屠杀持续了几个月，万余黎胞丧生，仅

红毛乡被害群众就有数千人。随王国兴参加起义的他的九位堂兄弟和胞弟，有三人被害；他的两个女儿被抓走，一个被踢下河溺死，一个被卖异乡。

但是，王国兴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他和王玉锦等一批坚强的黎族英雄们，拒绝了敌人一切欺骗和利诱，撤退到山高林密的鹦歌岭继续战斗。

“王国兴还活着，还在鹦歌岭坚持斗争”的消息，很快在黎胞中间传开了。不少人扶老携幼上山来投奔王国兴，追随他的群众很快就增加到近二百人。那时国民党顽固派在所有的山口都放了岗哨，严密封锁了所有的道路，把岭下周围的村子全部烧光，以切断山下群众同王国兴的联系，还悬赏一千元大洋，收买王国兴的头颅。

敌军日夜搜山，叛徒四出活动，群众联系断绝，王国兴带着二百多人在山上，处境越来越困难，饥饿和疾病同凶恶的敌人一样无情地摧残着这些不屈的勇士们。王国兴鼓励同伴们说：“我们大家活在一起，死在一处，绝不能向国贼低头！”^①他将青年人组织起来帮助伤病者，派几个青壮年出山侦察敌情，设法同王玉锦等人联系。

红毛起义队伍被打散以后，王玉锦带领上百名战士撤退到什寒山。毛栈、毛贵等地的义军也分别在首领的带领下撤进深山。他们也同鹦歌岭上的勇士们一样备尝艰辛。

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分散在几个山头上的起义队伍终于互相取得了联系，王国兴约王玉锦等起义首领到什兵村秘密相会。

^①郑放、王家芳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十月的一天，王国兴同王玉锦等人在什兵村相见了。王国兴问大家：“怎么办？”大家都表示决不投降，决不散伙。王国兴听后说：“弟兄们，这正是我要说的话。就是死也决不投降。但是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不能眼看着国贼把我们黎人杀光啊！大家赶快想办法吧。”^①起初，人们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后来王玉锦对大家讲起了他早年到大陆听说过红军的事。那时他被抓去当兵，曾经到过广东与江西接壤的地方，那里的村子里只有老人、小孩和妇女，青壮年都随红军走了，有些国民党军队里的军官也跑到红军那边去，还有的军官把队伍也拉过去了。他说：“我想红军一定是很好的，不然为什么老百姓都跟红军走，国民党的军官连官都不做也去投红军呢？”^②

听了王玉锦的话，王国兴也想起他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的红军闹革命的传说。那是在大革命时期，黎族人民早就同汉族人民一起并肩战斗。土地革命时期，在黎族、汉族杂居的陵水县成立过海南岛上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陵水苏维埃，有数以千计的黎族同胞为建立和保卫这一革命政权而献出了生命。中共陵水县委第一任书记黄振士就是黎族人。王国兴的家乡早已流传着共产党、红军为劳动人民谋解放英勇战斗的动人事迹。他在汉区当挑夫的时候，又听说过独立队（抗战期间海南岛人民把共产党的队伍称为“独立队”；把国民党的队伍叫“游击队”）既打日本又打国贼很厉害，他想那可能是红军。王国兴对大家说：“我们海南岛也有红军！找红军去，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③

^①郑放、王家芳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②③}郑放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寻找红军

王国兴决心去寻找红军。什兵会后他悄悄地独自下山，到他当挑夫时常到的岭门去打听红军的下落，但没有结果。他又想折到万宁县去找。这时有人告诉他：“大总管（改称乡长之后，黎人仍习惯以旧称总管呼之），你千万不能露面啊！国贼到处在悬赏买你的头，他们见到黎人就盘问，你走不过去的。”王国兴又想转到白沙一区去，从那里到临高、儋县去寻找红军。又有人告诉他，白沙通往外县的各条道路都已被封锁。王国兴只好又返回鹦歌岭。因为没有找到红军，他心情苦闷，坐立不安。

后来，王国兴同王玉锦等人商量，决定派人到白沙东北面的临高、儋县一带去找红军。他亲自选派了王文聪、王高定、王由理三人为代表，又叫略通文墨的王高定写了一张请求红军派兵讨伐国贼的呈文，大意是：黎人受国贼残害，被迫反抗。现今被困深山，特求红军火速解救。代表们出发前，王国兴对他们说：“只有找到红军，黎人才有生路，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们！”三位代表表示：“大总管放心，找不到红军我们就不回来见你！”^①

王文聪等一行先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打听到当年的

^①王昌：《一九四三年黎族人民的起义及建立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载《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又见吉有理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红军如今已经改名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了^①。在几位汉族同胞的引导下，代表们历尽艰辛，终于在一九四三年冬天来到了临高县和民乡能仁村——中国共产党临高县委所在地，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四支队正活跃在这一带。中共临高县办事处^②主任符英华、四支队队长马白山等，热情地接待了黎族人民的代表。

黎族人民的起义对琼崖党政军领导同志是很大的鼓舞。他们当即对白沙的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起义为我军进军白沙，开辟五指山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关于建立琼崖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党中央早就有过明确的指示，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琼崖党委的信中就指出：“认真在三十余万黎民中进行联络工作，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使他们信任我们，不仅使他们不为敌伪利用，而且要使他们与我们一起抗战。必须认识他们所在地的五指山脉〔一〕带山地，将是我们长期抗战的最后的可靠根据地，其他沿海地方都有敌伪盘据的可能，只有有了黎民山地作为我军的巩固后方，我们才能支持长期抗战。”^③因此，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在分析白沙形势之后，决定立即派出武装工作组前往鹦歌岭进一步了解情况，指导黎族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先后派往鹦歌岭的有王茂松、廖之雄、朱家玖和郑心梓等。

①琼崖革命武装队伍名称变更如次：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于1938年年底改编为广东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1939年4月发展为琼崖独立总队；1944年秋改称琼崖独立纵队；1947年10月据中央军委令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

②一说是临高县民主政府。

③原件藏中央档案馆。

王国兴日夜等候着王文聪等人的消息。他对王玉锦说：“我们一定要找到红军，如果文聪、高定他们这次找不到，下次我自己去找，就是死也要把红军找到。”^①当一九四四年初，武装工作组由起义代表带路来到了什寒山和鹦歌岭下的时候，他跑到半山腰迎接，拉着同志们的手连声叫“父母军！”^②表达了他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深情。从此以后，黎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就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转战鹦歌岭

“王国兴找‘伐答’（黎语，意“红色的米”，黎胞用以称呼红军）回来打国贼啦！”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白沙县的每一个村寨，给了在绝望中挣扎的广大黎族同胞以莫大的鼓舞。五指山区至今还流传着一首赞扬红军的民歌：

五指山咧五条河哩，
你知哪条流水多啰？
你知哪条流下海？
你知哪条流回来？

五指山咧五条河哩，
西边那条流水多啰，
国贼失败流下海，

①郑放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②王昌：《一九四三年黎族人民的起义及建立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红军胜利流回来。

许多黎胞悄悄跑上山来，要求参加王国兴领导的队伍。转战在鸚歌岭的这支队伍渐渐扩大。斗争迅速影响到白沙乡和牙叉乡，那里的群众也纷纷组织起来，先后有二三百人上了那凡山，全县有十八个乡组织了武装斗争的队伍。

这时，由于琼崖日、伪、顽三位一体已经形成了“剿共灭独”体系，因此，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关系到抗日战争的前途。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开辟白沙抗日根据地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部署。

一九四四年夏，琼崖特委决定派出由四支队政委陈青山、副支队长陈求光、参谋长王力征等率领的先遣队开赴白沙。当时，国民党驻白沙的部队有保安司令部、守备司令部、守备二团等一千多人。先遣队的目的是隐蔽行动，待进入白沙接近敌军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消灭其有生力量，为大部队开进白沙开辟道路。王国兴听到这一消息非常高兴，亲自布署、发动群众，筹集粮食，准备迎接亲人。

“‘父母军’来了！”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远远近近的黎胞赶来看“父母军”。这样一来，敌人也很快便得知我部队行动的消息了。在部队抵达那凡的第三天，国民党守备二团的一个营突然赶来偷袭。我军仓促应战，王国兴也带着他那仍然手持原始武器的队伍要求参战。由于特委指示部队注意保护王国兴的安全，领导只同意他带领黎族同胞担任一些后勤工作。部队苦战竟日终于把敌人打退了。次日早，敌守备二团倾巢而出，分三路包围了那凡。战斗中参谋长王力征牺牲了，死伤战士数十名。战斗结束后，王力征等烈士的遗体抬回来时，王国

兴抚尸放声痛哭，其他黎胞见状，也都哭起来。

由于敌情的变化，特委指示部队暂时撤离白沙。当天晚上，先遣部队领导召开了紧急会议，王国兴应邀参加。当他听说部队要撤走的时候非常难过，他说：“侬（我，我们）又要上鹦歌岭了！”部队领导告诉他，部队只是暂时转移，等待时机成熟再开进来，鼓励他坚持游击战，发动群众，准备再次迎接大部队进山。部队撤离之前，王国兴备了薄酒饯行，同指战员们依依惜别^①。

这次先遣队的行动虽然时间很短，不但没有打胜仗而且受了很大的挫折，但是对王国兴的影响却是深刻的。他亲眼看见琼崖独立总队的指战员们为了黎族人民的解放，不惜流血牺牲，使他更加坚信共产党是黎族人民革命的引路人。因此，先遣队撤走以后，他立即行动，准备以战斗迎接残酷的环境，满怀信心等待着党的队伍再次打回来。

先遣队撤出白沙后，敌守备二团、保安六团对黎族同胞进行了比之一年前的血腥镇压更为残酷的蹂躏，许多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骨干牺牲了，刚刚复苏的白沙革命力量又受到严重的摧残。这一年八月，王国兴第二次带领队伍撤上了鹦歌岭。不久，敌人闻讯，派重兵将王国兴的队伍重重包围。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王国兴迫于无奈，只得带着十分疲惫的队伍冲出敌人重围，奔向儋白边区的四支队驻地。

白保乐人民解放团

一九四四年初冬的一个早晨，在澄迈县美厚乡绿现山（亦

^①庄田、陈求光、吴之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称六芹山)黑藤水岭的一座简陋的茅屋里,王国兴同琼崖特委书记、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见面了。冯白驹不懂黎语,王国兴却懂得海南话。两人一见如故,畅谈竟日,十分投机。

王国兴向冯白驹倾诉了黎族人民的深重苦难,表达了他渴望共产党领导黎族人民争取解放的迫切心情,还详细地介绍了白沙起义的经过。冯白驹向王国兴讲解了全岛抗日战争和反顽斗争的形势以及特委开辟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计划。王国兴听后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两人还按黎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共饮了鸡血酒^①。

这次会见以后,一支以黎族起义战士为核心的新的战斗队伍建立起来了,命名为白保乐人民解放团,王国兴被任命为团长,王玉锦任参谋。特委还派了郑心梓、许世淮任副团长协助王国兴工作。四支队为解放团配备了精良和充足的武器,冯白驹亲自将总部的三名警卫员派往解放团,并指示他们要特别注意保护王国兴的安全。

王国兴带着党的重托,率领解放团返回了白沙^②。

解放团开赴五指山区以后,总部为把五指山内地的斗争与外围的斗争联系起来,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结合起来,对琼崖纵队的兵力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按照这个部署,一九四四年年底,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从澄迈向儋白边区转移,以便更有利于指挥向五指山进军的战斗。一九四五年春天,琼纵五个主力大队先后开进白沙,在解放团和黎族人民的有力配合下,消

^①江田、陈石、王怡亭、李汉、李独清等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②郑放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灭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部分有生力量，我出战白沙的部队纷纷告捷。

一九四五年夏天，琼崖特委决定成立挺进支队，立即开赴白沙，开辟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王国兴闻讯赶往阜龙，为进攻白沙提供作战方案，并亲自为挺进支队带路。行军途中，他同琼崖纵队副司令员兼挺进支队队长李振亚、支队政委符荣鼎一起，不顾疲劳，艰苦跋涉，使挺进支队士气大振^①。挺进支队旗开得胜，在白沙县合口首战告捷，歼灭敌军一个教导队。驻罗任的敌守备二团有着精良武器装备，又有坚固工事依托，挺进支队激战两昼夜，终于攻下罗任，敌守备二团丢盔弃甲，狼狽逃窜。部队马不停蹄乘胜追击，一举攻占了白水港，奇袭敌人的军械库，并向五指山腹地长驱直入。

挺进支队在解放团配合下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打垮了在五指山区横行霸道的守备二团和保安六团，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开辟了纵横一千多平方公里的白沙根据地。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白沙县抗日民主政府宣布成立，王国兴被委任为副县长。与此同时，各区、乡也纷纷建立了民主政权和抗日民众团体，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批黎族干部，分别担任了区和乡一级民主政权的领导职务。在县政府领导下组织了县武装基干中队和警卫中队，队员全部是黎族战士。

八月中旬，部队在一次战斗中全歼敌守备团团部，在缴获的文件里得悉日寇已于八月十五日无条件投降。琼崖特委命令全体部队展开全面的军事行动，向敌伪盘据的各地挺进，收缴敌伪武器，扩大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更多的民主政权。于

^①符荣鼎同志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是，挺进支队亦火速从五指山区向外线挺进。

这时，国民党反动军政机关和大部队纷纷撤离五指山区，争相奔向城市，抢占抗战胜利果实去了。残留在白沙的反动地方武装和白沙县各种反动势力重新纠合，趁琼崖纵队主力撤出白沙的机会，对黎族革命人民开始新的反扑。王国兴继续领导解放团的战士们以及县和乡的黎族武装，坚持斗争，为保卫白沙革命根据地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在反“围剿”斗争中

海南岛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多年，终于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在一个多月之后就派出了全副美式装备的四十六军到海南，经过半年的阴谋策划，又悍然挑起战争，把海南岛各族人民投入了内战的火海。

一九四六年三月，国民党四十六军兵分五路向我白沙等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大举进犯，所到之处，大肆烧杀奸淫，黎族人民又遭到严重摧残。

在此严酷的时刻，王国兴走村串寨，找群众谈心，鼓励群众全力支援革命战争，激励群众坚定革命信念。当有人贪生怕死投敌叛变时，他则信誓旦旦：“我王国兴到死也跟共产党走，革命到底！”^①

在王国兴的影响和带动下，黎族同胞为保卫家乡，保卫胜利果实，纷纷投奔革命队伍。白沙县革命武装迅速扩大，除县

^①马白山、郑放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武装猛进队、英勇队以外，各区都成立了常备队，各乡成立了常备班，每个村子都组织了后备队。这个庞大的群众武装队伍在斗争最残酷的阶段大约拥有五千人。他们不仅同国民党地方武装作战，还出其不意地袭击国民党的正规军。五指山下到处展开了清除奸细、消灭顽军、保卫家乡的战斗。黎族战士们在敌人进剿的必经之路挖陷阱、埋竹签、挂弯弓、设挂枪（将粉枪挂在树上，以绳牵引，敌人碰绳，自动击发，为黎族战士所创），使敌人处处挨打，寸步难行，有力地配合了琼崖纵队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四十六军的反革命“围剿”终于被粉碎了，该军军长不得不承认：“半年来损兵三千，民匪不分，不易清剿”，灰溜溜地撤出了海南岛。一九四六年九月，党中央为此拍来了贺电：“祝贺你们粉碎国民党进攻的胜利，希望全党全军团结一致，为消灭敌人，扩大解放区而斗争。”^①

与此同时，党中央又再次指示要抓紧开辟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一九四六年底，琼崖特委决定重新开创五指山根据地。次年一月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搬迁到王国兴的家乡——红毛。从此以后，琼崖的革命斗争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为建立五指山革命根据地而奋斗

一九四七年四月下旬，我军民一举攻下位于白沙和乐东交界的番阳、万冲等敌人重兵盘踞的据点，使白沙、保亭、乐东三县交界处的二十余乡连成一片，奠定了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党中央在四月二十九日给琼崖特委的贺电中指出：“海

^① 《中共海南党组织革命斗争简史》（征求意见稿）。

南根据地五指山初步建立这是一大胜利。”^①

五月九日，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在红毛召开。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大会以后，部队立即集中五个支队兵力，分三路向保亭、乐东等地区进军。各路军经三个月苦战，扫除了盘踞白、保、乐三县的残敌，解放了除石碌铁矿以外的三县全境，使原来分散在五指山周围的小块根据地连接起来。至此，方圆万里，人口达三十余万的解放区第一次出现在祖国南海的宝岛上。这是琼崖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

五指山区怀抱白、保、乐三县，是全岛的中心地区，与各游击区联络方便；境内丘陵起伏，群山耸立，密布原始森林，最高处海拔一千八百多米，我军进可攻，退可守，易于机动周旋，而敌人从外面则不易深入；乐东、保亭两县粮食丰富，白沙县又与粮产区儋、临接壤，有较充足的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白沙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势力，使黎族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在王国兴的领导下，对共产党极其信赖和拥护，有着可靠而稳固的群众基础。

一九四七年六月，白保乐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王国兴被任命为主任委员。

不久，在白沙县各地普遍开展了以清匪反霸为主要内容的土改运动。运动主要是打击那些罪大恶极、民愤很大的反动分子，将土地多的抽出来分给无地或少地的群众。王国兴全力支持这一斗争，做了许多工作^②。

王国兴亲自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动员青年参军，工作深入

^①转引自《冯白驹将军》，载《琼岛星火》第3期。

^②祝菊芬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细致。他经常出现在群众集会上和黎胞的茅屋里，向群众讲述自己的体会，启发和激励群众的革命热情。

五指山区涌现了支前拥军的热潮，动人的事例是很多的。当时，部队的生活很艰苦，战士们要打仗，可是却常常吃不饱。黎族同胞说：“只要侬黎人有一条命，就不能让‘父母军’饿肚子。”当时群众生活贫困，有的家里连一粒米也没有了，他们就把树上刚成熟的菠萝蜜摘下来给部队送去。当战士们看见这些赤裸着身体、面黄饥瘦的黎族同胞成群结队给部队送菠萝蜜的情景时都十分感动，有的同志忍不住掉下泪来。

黎族同胞还将他们的亲人一批又一批送上前线，村寨前常常出现妻送郎、母送子、奶奶送孙儿上战场的动人场面。还有不少黎族妇女参加了琼崖纵队。王国兴的夫人王爱英就是解放团的炊事员。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琼崖纵队提供了广阔而巩固的大后方，使之有了比较充足的人力和物力。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一年中，琼崖纵队从原来的七千余人发展到一万多人。一年以后又增加到二万二千余人，其中黎族战士占很大比重，仅一九四八年就有四千多名黎族青年参加琼崖纵队。黎族战士作战勇敢，在战斗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一九五〇年五月琼纵举行庆功大会时，有六十多名黎族战士被评为功臣模范，其中还有全国特等战斗英雄——陈理文。

冯白驹对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巨大作用曾作了十分确切的评价，他说：“五指山根据地的最大作用在于战略上保证了海南解放战争的胜利。”^①冯白驹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又说：

^①冯白驹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当年如果没有王国兴的支持，我们的处境将是非常困难的。”^① 王国兴对于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有着重大的贡献。

党中央的召唤

一九四九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飞越长江天险之后，势如破竹，向南中国挺进。全国解放胜利在即。海南岛军民在夺取了春季攻势的巨大胜利之后，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正准备开展夏季攻势。七月的一天，王国兴和五指山根据地的群众正准备在更长的战线和更广阔的地区紧张地进行支前工作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他完全意想不到的通知：党中央要他立即渡海北上，到北平去。

原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北平举行，党中央指定要挑选一名黎族代表参加会议，共商国家大事。

同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给琼崖区党委（琼崖特委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九日后改称）书记冯白驹拍来了电报：

“黎民中能否派一代表参加新政协，如有适当人选，望即开报姓名简历并准备经港赴平速复。”^②

当然，在斗争中经过严峻考验的王国兴是最有资格的代表。琼崖区党委将意见报告中央以后，党中央于七月十日又来电指示：“同意派王国兴为黎族代表，望即设法派适当同志当翻译，护送他安全到港来平。”^③

^①王越丰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②③}原件藏中央档案馆。

当时海南岛沿海几乎全部控制在蒋军手中，要渡海是相当困难的。琼崖区党委对王国兴的行程作了一系列巧妙的安排。

临行前，王国兴来到黎族干部训练班向学员们告别。因为此行是保密的，他只是告诉大家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他说：“如果我回不来了，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黎人只有一条光明的路，就是跟共产党革命到底。”^①

八月初的一天，王国兴登程上路。在粤桂边纵队和湛江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安全抵达香港。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设宴招待了王国兴等同志。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电告冯白驹：“马白山、王国兴两同志已安抵港拟直接北来。”^②（马白山已晋升为琼崖纵队副司令员，亦是政协委员）三天以后，他们都乔装华侨身份登上了一艘外国大轮船，从祖国的南海驶经东海抵黄海，在山东青岛靠岸。几天后，又改乘人民自己的火车驶向北平。

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怀仁堂正式开幕。王国兴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海外华侨的六百多名代表欢聚一堂，共同商议人民中国的第一件大事——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王国兴从尚未解放的海南岛来到这里，亲眼看到了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和平和繁荣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他怎能不激动呢？作为少数民族代表，他在大会上发言说：“少数民族向来被统治者认为做苦工、出钱、出粮、做奴隶是够‘资格’的，

^①王家政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②原件藏中央档案馆。

但参与讨论国家大事是没有份的。”“今天不同了，共产党不但分给我们田地，同时也分给我们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的权利了。我们只有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我们的一切权利，才会得到保障，我们的前途，才会光明灿烂。”^①

王国兴和代表们一起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亲切接见。在盛大的宴会上，周恩来亲切地同王国兴握手并把他介绍给代表们说：这是海南岛来的黎族代表王国兴同志。大家知道冯白驹领导海南人民打得很好，海南人民坚持了二十三年红旗不倒。黎族人民斗争很坚决，对革命贡献很大^②。

王国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他一再向党表示自己没有文化，没有能力负此重任，中央领导同志鼓励他说：“国兴同志，你有斗争经验，至于文化可以学，能力也是可以提高的。”^③

十月中旬，王国兴随同全国政协华南代表团南归。

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海南岛解放了。王国兴怀着急切、欣喜的心情回到海南岛，向黎族同胞传达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和他沿途的观感见闻。从此，他和黎族人民开始了建设家乡的新的历程。

光 荣 入 党

自参加革命那天起，王国兴就把自己看作一名普通的革命

^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文件汇编。

^{②③}冯子平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战士，把自己的命运和共产党连结在一起。在他同冯白驹相见以后重返白沙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看作是肩负党的重任、受党派遣的人了。

一九四八年，王国兴就向组织表达了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①。解放以后，他有机会受到党组织更多的教育，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的关怀，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个人率众起义之时，是为黎族人民谋求生存，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和压迫；参加革命以后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新中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战，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他的思想从一个民族起义首领的起点升腾到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高度。他的入党要求更为强烈了。

一九五三年，自治州党委对王国兴的历史和思想状况作了全面分析，认为他已经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可以吸收他入党。

一九五三年三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提名王国兴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在推荐书上写下这样的评语：“王国兴……十余年来跟党走，一九四八年即要求参加党”，“政治上忠诚可靠”，“是广东少数民族中最突出的领袖人物。”同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中南局批准王国兴为中国共产党员。批文上这样写着：“批准王国兴入党，不要候补期。”

五十九岁的王国兴，从一位“黎头”，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①见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提名王国兴为全国人大代表推荐书，原件藏中共中央组织部。

第一任州长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一九五二年，经政务院通过，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毛泽东主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一九五四年，我国第一部宪法明文规定了保障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从而结束了千百年来各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上毫无权利的历史，实现了少数民族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在自治地方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愿望。

对于党的民族政策，王国兴衷心地拥护，积极地宣传，认真地贯彻执行。

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经过民主协商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正式成立了。王国兴当选为自治区第一任主席。（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于一九五五年改称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自治区政府主席改称为自治州州长。）从此以后，王国兴在自治州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团结广大干部和群众，全心全意为自治州各族人民服务，为自治州的建设事业努力工作。他常常带着自治州党委、干部和广大群众关于开发海南岛和建设自治州的许多重要建议到北京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如有关公路建设、热带经济作物的种植、民房改造等等^①。

^①1951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文件汇编，原件藏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档案室。

这些意见对于自治州的建设是很重要的。

自治州在成立以后的几年里，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农业有了发展；群众生活有了改善；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初步兴起；原来没有学校的五指山区，小学、中学如雨后春笋，历代都是文盲的黎族苗族同胞开始送子女上学；从前只信鬼神，不知医药的山区群众开始求医治病了……这些都无不溶化着王国兴的心血^①。

王国兴对自治州的文化教育事业非常关心，他曾经向党中央反映：“黎、苗族人民，过去没有受过教育，大都是文盲，实行区域自治，干部缺乏，除目前必须要求大批汉族干部帮助外，为永远打算，对培养民族干部和发展文教事业，也是不应迟缓的。”^②他常对自治州的干部们说：“我这一代人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不能让下一代再做文盲了。”他鼓励周围的青年干部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他自己做出了刻苦学习的榜样。他参加革命之初只认识自己的名字，在战争年代就跟随战士们一起学习文化。解放后，他请秘书将每天报纸上的重要新闻告诉他，然后逐句逐字阅读。在他的笔记本里，抄录了许多文件，一条条抄得很细心。同志们去向他请示工作、或找他谈心时，他总是首先要搬出许多生字来请教，连警卫员也成了他的“文化教员”。由于他刻苦学习，到五十年代后期，已经能看报、看文件和写信了。当他七十高龄的时候，组织上送他到广东省委党校学习。他和其他年轻干部一起学习政治经济学，

^①韩立人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②1951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文件汇编，原件藏国家民委档案室。

十分认真，同志们都非常感动。最近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他亲笔所写的革命回忆录，共九十页，约有五万字，详细地记述了白沙起义的历史过程以及他个人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的思想发展。文字虽然不太通顺，有许多字是用海南方言或黎语语音记述的，并有不少字是用了三角形或圆圈代替，但是那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透出了他那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刻苦学习的精神^①。

王国兴在担任州长期间，留给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在维护民族团结方面的贡献。民族团结是他同民族干部经常谈论的话题。他在自治州提出了“向汉族老大哥学习”的口号。他常告诫黎族干部要特别注意团结汉族和其他民族干部。他说：“汉族同志来我们山区是遵照党的指示来帮助少数民族的，我们一定要尊重他们，爱护他们，关心他们。”^②

一九五三年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自治州开展了反大汉族主义的思想教育。当时的自治州州委书记是汉族干部，他带头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但是，由于人们没有很好地分清那些是大汉族主义，那些是属于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的关系而产生的错误，出现了批评过激的偏向。起初，王国兴见到州委领导同志诚恳、虚心的多次自我批评，非常感动。但当看到有些同志过激的批评时，心里很难过，当即找到冯白驹等领导人，要求纠偏。

王国兴对于自治州其他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同样关怀备至，

^①王国兴的回忆录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估计是“文化大革命”中所写，原件由其子王家森保存。

^②韩立人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非常注意主动搞好团结。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挑唆，黎族与苗族之间曾经存在过一些隔阂，王国兴经常教育黎族干部和群众要尊重苗胞的风俗习惯。有些黎村同苗寨共饮一江水，而黎村在上游时，他特别提醒那里的黎族干部说，苗胞是忌食狗肉的，要黎胞杀狗的时候到苗寨的下游去。因此，王国兴不但赢得了汉族、黎族干部和群众，而且也赢得了苗族干部和群众的信赖和尊敬，大家一致称赞他是民族团结的楷模。

深入群众，和群众亲密无间是王国兴的一贯作风。他经常下乡，每到一个村子，总要一家家一户户去看看。他一钻进群众的茅屋便在灶旁坐下来同乡亲们促膝谈心。只要他一进村，全村人都争先恐后来看望他，连高龄的老妇人也都颤颤巍巍的拄着拐杖来同他拉一拉手。

州长到群众家里很随便，群众到州长家里也不拘束。黎胞们喜欢到州长家里串门，王国兴家里经常挤满了客人。客人当中有的是同王国兴一道起义的革命老人，他们来看望当年的起义总指挥；有的是战争时期掩护过王国兴的老战友，他们来看望当年白保乐人民解放团的老团长；有的人是来向州长反映情况的；有的人则是把州长看作自己的民族领袖来同他谈谈心、叙叙情的。王国兴对于所有来访的客人都非常欢迎，热情接待，还常常在经济上帮助有困难的乡亲们。

王国兴家徒四壁，没有箱也没有柜，更没有高级用品，他带的手表可说是全家唯一贵重的物品了。他的子女起初不理解父亲，小女儿埋怨说：“我要一角钱那么难，老乡要几十元就那么容易。”王国兴语重心长地对妻子和儿女说：“群众当年支持革命，生命都肯拿出来，今天群众有困难，我有什么不应

该献给他们呢？”^①

王国兴的心里装着几件大事，这就是群众的吃饭、穿衣和住房问题。当他看到党的民族政策得到贯彻，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的时候，他便眉开眼笑。当他看到党的民族政策贯彻不力或被歪曲，群众生活很苦，问题很多的时候，他就双眉紧锁，心情沉重，寝食不安。当他看到有损群众利益的现象时，从不肯稍加容忍，不管对哪一级领导都敢于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如果他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他就向上反映，直到反映给党中央，表现了坚强的党性原则^②。

一九五八年，自治区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大搞“一刀切”、“以粮为纲”等等，琼中县就被“定”为“千斤县”搞“万斤亩”、“二万斤亩”。王国兴想，黎族地区过去亩产百来斤，增加到二、三百斤就很不错了，“万斤”、“二万斤”是怎么来的呢？他到黎村苗寨去了解实情，看到浮夸等“左”的错误在严重地损害着群众的利益，便建议县委火速解决救济粮，尽快煞住浮夸风。打那以后，王国兴戒了酒，直至他逝世前，都滴酒不进。

自治州的干部和群众都一致公认王国兴是一位平易近人的群众领袖，是一位关心群众的好干部。当他不再担任州长职务以后，自治州人民仍和以前一样尊敬和爱戴他。

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国家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也和全国一样，以它雄姿勃勃的步伐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得到

^①王国兴夫人王爱英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②张执一、韩立人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很好的贯彻，一批批民族干部成长起来，许多建设项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人们说，这是自治州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也正是王国兴处在他一生中精力比较旺盛，经验比较丰富，工作能力不断提高，思想不断成熟的时候。这个“黄金时代”，是他和全海南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干出来的。

但是，一九五七年冬至一九五八年春，在“以反地方民族主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全民整风运动”开展的时候，王国兴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在林彪、“四人帮”掀起的那场给党和国家带来极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中，王国兴更受到残酷迫害。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他被扣上“自治州最大的走资派”、“反动黎头”和“现行反革命”等帽子而被逮捕；一个捏造的所谓“以王国兴为总后台”的“民族分裂主义集团案”，牵连了千百名自治州的干部和群众。经过长达五年时间的折磨，一九七四年八月，王国兴被解除“监护”，任命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革委会副主任。然而，他的身体已经受了很大摧残，几个月后，即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这位八十一岁高龄的老人，在海口市与世长辞了。弥留之际，他对他的儿女们说：“你们一定要记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黎族人民的解放。你们要相信党，要团结汉族干部，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自治州建设好。”^①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已为王国兴平反昭雪，充分肯定了他在解放海南、建设海南，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大团结中做出的巨大贡献。那起所谓的“民族分裂主义集团”的假案，亦已彻底推倒。

^①王家贤访问录，存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十五卷编后记

胡 华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我们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总的目的，就是用前人的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后人，激发和调动人们的爱国主义热忱和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同时增强人们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精神污染的抵抗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积极贡献力量。

自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广州召开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以来，将近四年时间内，我们编成了《中共党史人物传》十五卷，包括一百七十一位著名的烈士和杰出的党史人物的传记，约计三百七十五万字。这是依靠党中央、中宣部、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老革命家们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支持，依靠全国各地的传记作者们的不辞劳苦、不怕困难、严肃认真的辛勤劳动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在党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新时期，我们的任务就是为更好地完成《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写工作而努力。

通过《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写，愈益深刻地感到这一工

作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

第一，我们写革命前辈的牺牲奋斗的传记，既是为了纪念和缅怀前人，更是为了教育后人，给后人以怎样做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榜样。

我们的革命前辈，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在艰苦的年代，抛弃家庭和个人幸福，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不惜献出鲜血和生命。他们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我们应该给他们立传，把他们的革命精神、奋斗事迹忠实地记录下来，彪炳史册，流芳百世，使后人永远纪念和缅怀他们。纪念也是为了激励，使后人知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要使后人读了革命前辈的传记，深深体会到创业艰难，前人是怎样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换来后人的幸福，从而使后代的青年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珍惜祖国统一，人民解放的胜利成果，更加自觉地为捍卫社会主义祖国、捍卫党的事业而奋斗。立传也是为了树立榜样。“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要使后人学习和继承英烈们无私无畏、自我牺牲的共产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使共产主义浩然正气，千秋万世充塞天地之间。同时，要使后人通过阅读英烈们的传记，学习到做人的榜样。看看革命前辈们是怎样学习、怎样追求真理、怎样树立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的；他们是怎样工作、怎样战斗、怎样对待困难的；他们是怎样对待党、对待同志和人民，又是怎样对待敌人的；他们是怎样对待自己，严于律己，生活上自奉俭约，并严格要求亲属的。他们的自觉性和模范作风，继承了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开创了共产主义高尚道德品质的新风。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整党的最有说服力的好教材。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和完人，但却有许多经过千锤百炼、经得起历史

考验的杰出人物。我们以杰出的共产主义者的崇高的道德作风为榜样，才能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共产主义新人。

第二，通过《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写，可以大大充实和丰富党的历史，具体生动地反映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党的活动，勾画出许多地区党的发展史。

人类历史是通过人物的活动来体现的。历史人物传记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历史书的一种独立的体裁，又是写通史或专史的史料基础。现在我们编写的中国现代史、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一般只能叙述和分析历史发展的梗概、重要事情的经过和最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某些活动。而党史人物的传记，则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历史事件中党的领导和党员活动的具体情节，反映出许多地区党的发展史的较为详细的情况，具体地显示出历史的经验和得失。党的历史本来是由党史人物的活动所组成的，它使一部党史、一部中国现代革命史变为许多虎虎有生气的英雄人物活动的舞台，大大充实和丰富了党的历史。

例如：我们读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蔡和森、向警予、徐特立等人的传记，可以看到老一辈革命者的发展道路。他们生于清末乱世，感叹于“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从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出发，接受康、梁变法维新思想，转变到接受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从辛亥革命后想走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资本主义道路，到五四运动时期受到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有的人一度热心于研究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论、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但很快又发现这些空想方案行不通，终于相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坚信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走上了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道路。这就显示了老一代革命家思想发展的规律，也显示了中

国革命的必由之路：中国必须共产党领导才有出路，别的阶级和政党不能领导，别的道路不通，这是实践证明了的。

我们读贺龙、续范亭、赵博生、董振堂、李明瑞、俞作豫等人的传记，可以看到许多真诚的爱国将领，几经摸索，终于走上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道路。我们通过周逸群传，可以比较清楚地知道党怎样做贺龙同志的工作，帮助他成为杰出的共产主义军事家。通过刘伯坚、宣侠父、许权中等人的传记，可以知道党是怎样联合和帮助冯玉祥将军倾向革命和参加抗日的。通过宋绮云、车向忱等人传记，可以知道党怎样帮助杨虎城、张学良将军走向抗日。

通过林伟民、苏兆征、黄爱、庞人铨、施洋、林祥谦、王荷波、邓培、刘华、顾正红、张浩等人的传记，可以看到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梗概。通过彭湃、阮啸仙、黄学增、韦拔群、邓子恢等人的传记，可以看到中国农民运动发展的史实。通过任弼时、卓恺泽、黄敬等人的传记，可以看到青年运动的发展概貌。

读李大钊、赵世炎、高君宇、郝清玉、张兆丰、于方舟、马骏等人传记，可以鸟瞰北方地区党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李大钊同志是怎样卓越地领导了党的工作，和他从容就义时宣称共产主义必胜的感人事迹。读何叔衡、陈昌、夏明翰、夏曦、毛简青、彭璜、蒋先云、罗学瓚、黄静源、罗纳川、王凌波等人的传记，结合毛泽东、李维汉等同志的回忆，可以较具体地知道早期湖南地区党的发展史。读董必武、肖楚女、林育南、张浩和许继慎、曾中生、徐海东、吴焕先、周维炯、高敬亭等人传记，可以知道早期湖北地区党的发展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的不少历史情况。读杨闇公、李鸣珂、穆青、邹

风平等人的传记，可以从中了解到不少关于四川地区党的发展史。读赵醒侗、陈赞贤、袁玉冰、黄道、曾延生、古柏等人的传记，可以知道江西地区党的发展史。读王尽美、邓恩铭、李慰农、郭隆真、陈少敏、鲁佛民、朱瑞等人的传记，能帮助我们看到山东党和根据地的发展史。读魏野畴、李子洲、唐澍、刘志丹、谢子长、王泰吉、王尚德等人传记，可以看到陕西地区党的发展史和陕甘宁根据地创建经过。读杨匏安、陈延年、刘尔崧、熊雄、杨石魂、周文雍和陈铁军、古大存、方方、冯白驹、王国兴等人传记，可以知道广东地区的党和海南岛根据地的发展历史。从邓子恢、朱积垒、张赤男、郭滴人等传记中，可以看到福建党和根据地的发展。东北抗联的领袖人物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冯仲云、陈翰章、童长荣、魏拯民、王德泰、赵一曼、曹亚范等人的传记，勾画出了东北抗联英勇战斗的历史。新疆地区的斗争，可以从陈潭秋、邓发、毛泽民、林基路、祁天民等传记中看出来。上海和江浙地区党的斗争和白区工作的艰险，可以从宣中华、侯绍裘、张秋人、罗亦农、任作民、卓兰芳、曹荻秋、茅丽瑛等传记中看出来。读卢德铭、张子清、何挺颖、陈毅安、王佐、袁文才、刘型等人的传记，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井冈山斗争的许多可歌可泣的伟大场面。

读李达、邹韬奋、朱镜我、任光、聂耳、吴晗等人的传记，可以看到许多正直的爱国的学者、文化工作者，是怎样走上为共产主义献身的道路的。我们读各根据地的创建人和将领们的传记，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出生入死创建红色政权和人民军队的。从白求恩、柯棣华的传记中，可以看到参加中国革命的外国共产主义者的献身精神。

以上是仅就已经编好的十五卷一百七十一篇传记，举例说明这些传记对党史增添了许多具体内容。现在有一些青年，由于不懂党的历史，只看见十年内乱中被破坏被歪曲的党的形象，缺乏对党的感情和高度信任。我们要用有生动内容的历史教育青年，帮助他们形成共产主义世界观。

第三，我们抓紧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必须继续强调抢救史料的紧迫性。

我党成立已经六十二年，早期参加革命的同志，健在的都已七、八十岁高龄，许多党史人物的珍贵史料，还存留在他们的脑海之中。如果我们不抓紧向他们调查访问，这些珍贵史料将因他们记忆力的衰退和陆续辞世而成为空白点，以致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例如杨度，如果不是周总理弥留之际证明他是共产党员，人们将永远不知道他是给党做出了特殊贡献的共产主义者。抢救史料的工作，不是少数几个人所能完成的，我们现在要尽先抢救和编写党的创立时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史人物的史料和传记。

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基本要求，是科学性、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

第一，科学性。就是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编写传记的指导思想。我们的传记作品，要贯穿人民创造历史，时势造英雄的观点。党史人物是时代的产物，是从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是同群众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是党组织的一名成员，而不是脱离群众、脱离党的领导的神仙或天生的圣哲。同时，英雄人物又对推动历史起重大作用，英雄人物有他的出类拔萃的许多特点，有他的不同凡响的许多杰出方面，例如，有对祖国对人民的强烈的

热爱，对敌人对黑暗和邪恶的无比憎恨，有过人的毅力，有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有不怕困难的勇气和坚定性，有善于团结人的宽广胸怀等等。他们不是只顾自己，无所作为，贪图安逸，鼠目寸光的人。传记的科学性，就是要写出党史人物既是人民的一分子、党的一员，又是一位有其特点的杰出的人物。要实事求是地用事实说明问题，既不要任意发挥、擅作溢美之词，片面夸张个人的作用；也不要贬低，抹煞人物的特点、出色之处和历史功绩。另一方面，要通过写前人的事迹、言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分析成败得失的经验，使人读了传记，在思想上有所收获，得到启迪和教益。虽然我们不是写评传，不需要加上长篇的评论，但是还是要有简洁的科学分析，提高传记作品的思想性和科学性。

第二，准确性。党史人物传必须是信史，要做到言必有据。必须认真查阅人物的简历、自传、小传和有关的原材料，进行考订、核对。要向党史人物的战友、亲属访问调查，最好到党史人物的出生地、斗争地区、牺牲地区作实地调查，找当地老人座谈。发现材料和记忆有矛盾出入的地方，要细心地考订核实。写党史人物传是非常严肃的工作，不能带主观随意性。那些抓到一鳞半爪，凭想象推理、随意渲染而写成的传记，是我们所不取的。要谨防把一些道听途说的神话故事般的材料，未经核实研究就写到传记中去，造成以讹传讹或张冠李戴。还要注意剔除材料来源中的偏见和成见。我们必须十分认真，对前人负责，对后代负责。

第三，鲜明性。写党史人物传记，有着鲜明的目的，这就是纪念前人，树立楷模，教育后人，有利于党的事业。革命人物有共性，有个性，我们要注意写出人物的性格、作风、特点

来，而不要写成千人一面，使人们读后对人物的印象不深。

《史记》写刘邦、项羽、张良等人，都写出了各人不同的性格，我们写党史人物也要写出他的性格特征来。对于人物一生的功过是非，我们应采取实事求是的公正态度。前人满怀对真理的追求精神，在黑暗中摸索，很不容易，要尊敬这些先驱者。他们是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是党的各条战线事业的开创者。开创者披荆斩棘，但也有不可避免的弱点和局限性，难免要走过些坎坷的弯路。开创性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以科学的恰当的评价。对他们的过失，应该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来写，不能求全责备、苛求于前人。有些过失的造成，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或者是由于执行了上级领导机关错误的路线方针，不宜过多追究个人的责任。毛泽东同志在《学习与时局》一文中讲了这个精神，这是科学的总结经验、团结全党的正确方针。当然，我们写传记，功过还是要分明，不能把过失歪曲为功绩，颠倒是非。我们写的传记，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第四，生动性。关键在于深入研究人物，熟悉人物，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对人物活动的重大情节作些生动描写。司马迁写《史记》，写了许多传记，写的都是历史人物的最重要的事迹。在《项羽本纪》中写鸿门宴，在《刺客列传》中写荆轲刺秦皇，都是描写得很生动的，人物的性格栩栩如生，给人以极深的印象，所以流传千古。六十多年来，我们党史人物更是有无数慷慨悲歌、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有待于我们生动地写出来。我们的作品，要力求做到“事信言文”，就是事实可信，文字表述有文采，能够以事感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当前我们的任务是：交流经验，提高党史人物传记的写作质量，加快写作进度，进一步推动这一工作，以期出现一个较高质量、较高速度的发展新局面。具体要求：争取至一九八四年底，再编写出五卷，共编成二十卷；以后每年争取编成七、八卷，至一九八八年或一九八九年编成五十卷。烈士们用鲜血写下了他们的斗争史，我们要用烈士的精神来从事这一崇高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在许多革命老前辈的领导和关怀下，我们要团结一致，为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而努力！

（本文系作者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长沙召开的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摘要，发表于湖南《求索》杂志一九八四年第一期。收进本书时，由作者改为现题。）

封面设计：王艺光

统一书号：11094 · 118

定 价： 1.60 元